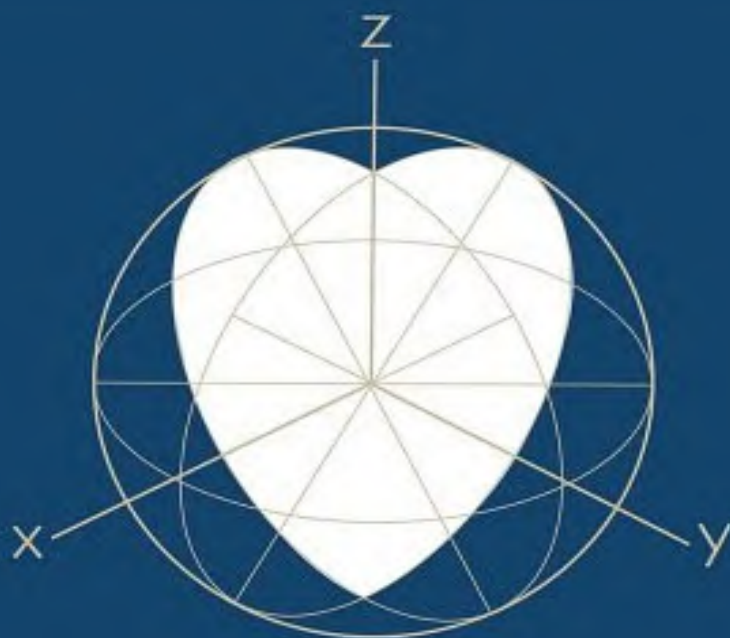


# L I E B E

## 愛\情\的\哲\學

EIN UNORDENTLICHES GEFÜHL



哲學是對人生的睿智思考；  
愛情的哲學是對愛情——一種亂七八糟的感覺——的睿智思考。

RICHARD DAVID PRECHT

——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 著 ——

關旭玲 譯

強力推薦

知名作家 卜大中 | 創意人、作家 李欣頻 | 作家、評論家、媒體人 蔡詩萍 | 臺北大學中文系教授 賴賢宗

## 〈導讀〉

# 性、愛、婚姻的生命倫理賴賢宗

賴賢宗

此書（《愛情的哲學》，*Liebe: ein unordentliches Gefühl*）作者理查·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從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John Morris）的《裸猿》（*The Naked Ape*）與《人類動物園》（*The Human Zoo*）的觀點開始講述此書，以物質基礎的「科學」研究出發，他闡明新近的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關於愛情現象的研究成果，對於過分強調追求「真我」、「真愛」的愛情的心理分析的形上理論加以批評。此中的論述策略有如莫里斯早已提出的，認為人類被自己的文化所限，行為能力退化到像是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人類唯有掙脫枷鎖，以充滿創造性的方式回歸生物本性才能阻止人類文明的徹底凋零。普列希特將此處的愛情的「生物本能」超越於「情緒」的範疇，而擴大到「抉擇」與「詮釋」的向度。因此，愛情的「生物本能」必須包含身、心、靈三個層面，不可將任何一個元素加以化約。

普列希特也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對於關於愛情的精神哲學與心理詮釋加以批評，例如對於佛洛姆著名的《愛的藝術》一書。佛洛姆認為愛不只是命運，還得靠經營與藝術的點化，引發目前這種以自我療癒

（*Selbsttherapie*）為宗旨的婚姻諮商風潮。「藝術」這個詞將戀人提升到藝術家的層次。人類在愛情之中的原本自然需求，比方說想要在愛情裡被喜歡、被讚美或被認同，這下子全成了心理扭曲或人格不成熟，戀人的可塑性在心理治療師、諮商師的分析下成了心理殘障。祭出佛洛伊德之「受害理論」後，心理治療師、諮商師的功力如虎添翼，「真愛」成為一個謎語，婚姻之中的問題乃因為「真愛」沒有得到實現，所以問題乃是出在別人身上。佛洛姆《愛的藝術》一書「以存在代替擁有」，以真實存在的形上真實取代現實生活中的實際生存，此說的危機乃是在

於以作者通俗的話來說，夫妻中只要有一方覺得自己不被理解，便一股腦的鑽進那個伴侶根本不懂的「真我」（das wahre Ich）之中來取暖。所有的過錯都是「真我」在不當關係之中已經遭到異化的錯，都是對方沒有體會到我的「真我」。這個「真我」成為我內在深處最珍貴的核心，佛洛姆著名的《愛的藝術》一書以這樣的理論製造了不良婚姻關係之中的「受損害意識」，然而對於解決真正問題卻於事無補。

又，本書對於當前大行其道的伴侶治療或婚姻治療之理論盲點加以批評。在西方世界，越來越多夫妻求助於心理諮商，但是效果頗為有限。幾年前，婚姻諮商仍以促進婚姻和諧為宗旨，諮商師最大的目標就是穩定伴侶關係。然而，只能短暫達到效果而已。前一代婚姻諮商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不認為愛情是伴侶關係的目標。此書作者則對此加以修正。

那麼，以愛情是伴侶關係的目標之婚姻諮商，如何真正能夠完成呢。性、愛與婚姻之中都有其生命倫理，回到生命感通與「恩情」、「恩義」與「緣分」之體會，「愛」是「性」的基礎，「倫理」是「愛」的規範、動力與終極目標。

此書作者普列希特引用沙特在《自我的超越性》一書的說法，認為吾人的心理絕不同於純粹的生理反應。因為心理乃是永遠與所知的情緒，和所知的感情密切相關。例如，當我說「我想家」的心理反應，那麼在此中我必須知道：一、自己正在想家；二、什麼是想家。否則我只會覺得心情不好，而不會產生「我想家」的覺察。在這個說明之中，沙特批評了科學研究的化約論，但是此書作者也藉此而指出了沙特這裡所說的「我的感受」和「我對這項感受的解釋」永遠不可能是同一的。因此，若是「愛情」是建立在「好新」、「探索」之上，就像西方哲學建立於「驚訝」（surprise）之上，那麼到底什麼是「真愛」，什麼是我真實自我的真實愛情的愛慕對象，便會變動不居。我們的意識性思考

（bewusstes Denken）會解釋身體反應並賦予它一個形式。然而令人困惱的是，在描述自身感受時，我一定得先回想和反思。這又意味著，我必須與我的感受保持距離。因此，「我的感受」和「我對這項感受的解釋」永遠不可能是同一的。在西方傳統哲學之中，這個保持距離的觀察

著的我也是變動不居。

此書作者普列希特主張情緒、感情和行為，三者共同作用，便形成我們稱之為「愛」的東西。「愛」不只是情緒而已，感情和行為乃是涉及到「抉擇」與「詮釋」的問題。科學說明無法完全解釋「愛」是什麼。因為藉由電腦螢幕的影像來說明「愛」，這種作法無異於指著「開關」解釋「光」。事實上，「愛」這個過程涉及情緒、感情和行為三個層面：某人對我造成強烈的感官刺激（不一定是性方面），引起我的強烈好感，這是一種情緒。接著，我察覺到自己的心理內在變化，於是進入感情的層面，這裡所說的「察覺」乃是一種認同與投射。最後，我不只對那個人發出的訊號有自發性的反應，我還會思考讓我產生反應的真正原因，進行反思活動，這乃是一種「詮釋」活動。我可以清楚分辨自己的狀態，是墜入情網就是墜入情網，若是深愛就是深愛，通過這樣的「抉擇」與「詮釋」，進而發展其人生意義。在第三個階段，我會根據對方的期望和需求而有意識的與對方進行互動，也就是進行愛情的交往，所以愛情乃是包含了反思的行為，包含了「抉擇」與「詮釋」。這個過程不只在剛墜入愛河時發生，它會持續出現在我們的愛情的整個關係之中。

對於「維持愛情」、「如何挽救婚姻」的問題，重要的不是「挽救外表形式」，而是「維持具有真正動力的愛情」、「如何挽救婚姻之中的愛情」。關於「如何挽救婚姻之中的愛情」，此書作者批評坊間流行的各種婚姻心理諮商理論。「愛」不只是情緒而已，感情和行為乃是涉及到「抉擇」與「詮釋」的問題，所以，「愛」乃是一種「生命體驗的詮釋學」。科學說明無法完全解釋「愛」是什麼。因此，在婚姻之中，夫妻之間乃是「愛情」，更是「恩情」、「恩義」與「緣分」。因此，我們會為對方設想，為家庭設想，對自己加以調整，相信那是對彼此都好，而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真我」、「真愛」。「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性、愛與婚姻之中都有其生命倫理，回到生命感通與「恩情」、「恩義」與「緣分」之體會，回到「無名天地之始」的無以名之的真實感動，才能抉擇與詮釋出愛情與婚姻關係之中的意義，重新創造，進行「有名萬物之母」的價值創造活動與人生罪過的修補。

關於「維持具有真正動力的愛情」、「如何挽救婚姻之中的愛情」，答案應該說是：「愛」是「性」的基礎，「倫理」是「愛」的規範、動力與終極目標。然而如何的「愛」才是「性」的基礎？「性」其實也潤澤了「愛」，甚至是生養了「愛」。又，「倫理」如何是「愛」的規範、動力與終極目標。此中的解答，必須展開作為「生命意義與價值實踐的生命倫理關懷」的「生命倫理學」，分為五個部分探討「性、愛與婚姻之生命倫理」的種種問題：「本真倫理學」（ethics of authenticity）、「價值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Value）、「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溝通倫理學」（communicative ethics）、「苦難神學」，這五個部分整合而觀就是「實存詮釋學」意義的生命倫理學。

在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之中，愛情（Eros）是起源於缺乏的滿足，此中所謂的「缺乏的滿足」，一者是肉欲的，二者是靈性的。此外，基督宗教所說的上帝對人的愛是 Agape，Agape 是一種上帝真善美之滿溢而出的餽贈，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救贖，而不是 Eros 之為缺乏的滿足的由下而上的求索。東亞文化傳統的「愛情觀」與「婚姻觀」重視「緣」、「緣分」。一方面，是我們在世間遭遇一位情侶，這是「緣」。有緣而經過存在的抉擇就有了「分」（本分，責任），結髮為夫妻，共同生育子女，經營家庭，這些都是「緣分」。擴大了我們世間存在的橫向的空間性的，向世界開放，「緣分」所透顯的是夫妻「恩情」與「恩愛」。在此之中，愛與敬構成了一個「圓」，Eros 與 Agape 構成了一個「圓」，縱與橫的生命存在的兩種向度構成了一個「圓」。

有「緣」斯有「分」，對「緣分」向內體會，盡到一份倫理責任，就能夠創造生命的「圓」。人生總有些讓人無聲以對的時候！婚姻的不和乃是當代人的生命問題。就此捨棄，另求真愛嗎？然而如何保證真愛，而非相同問題的輪迴呢？圓缺了一角而有了殘缺，雖然有這樣殘缺也仍然可以是美的，但是只要我們把圓周縮小，仍然能在殘缺的內部也畫出一個圓。也就是「接納」自己和對方的過去，在生活現實的磨練之中，如何克服各種障礙？仍然成就一個圓，或許對於以往的自我執著而言乃是一個小圓，然而成就了生命的夥伴、圓滿了家庭，豈不是成就了

一個真正的大圓。在愛情關係之中，在家庭之中，有「緣」斯有「分」，向內體會，對「緣分」盡到一份倫理責任。再者，存在在吾人的心裡的真正的圓是無限大的，因為每一個點就是一個無限大的圓，所以真正的關鍵是我們能不能體會每一個當下的點都是一個無限大的圓，每一個當下的緣都是一種無限大的圓滿。內心若能縮小到無限小，就能體會到世界的無盡寬廣，不僅是在一己的「緣分」之中盡到一份倫理責任，而且從此在世界之中，到處隨緣犧牲奉獻，海闊天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本文作者現為臺北大學中文系教授）

## 導論

# 火星上的男人，金星上的女人

寫本探討「愛情」的書，有這麼困難嗎？

這是一本探討「男人」和「女人」的書，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那件既美好又很奇妙的事——愛情。「愛」是人類「最愛」探討的主題。寫小說不涉及「愛」少之又少，拍電影不談到「愛」鳳毛麟角。雖然，我們沒有一天到晚把愛掛在嘴邊，但不可否認的，愛對我們而言真是太重要了。不過，從人類的歷史來看，情況並非一直都是如此！無論如何，「愛」如今儼然一切事物的著力點，商品架上的體香劑和爽身噴霧沒有一款不以「愛情」為訴求，時下的流行歌曲沒有一首不以「愛情」為主題。

「愛」真是個威力無窮的題材，無所不包。從「世上為何有男人和女人？」到「我該如何挽救我的婚姻？」包羅萬象，無遠弗屆。愛上有迷濛雙眼的美女，愛上西伯利亞泰加林（Taiga）的美麗月夜，愛上某些習慣，愛上把牙膏擠得整整齊齊的男人，愛上波斯貓，愛上血淋淋的牛排，愛上科隆的嘉年華會，愛上佛寺裡的寧靜，愛上謙遜，愛上跑車，愛自己所信仰的神，這所有的愛通通沒有衝突，可分別發生，並行不悖，甚至能同時發生！

雖然，世上有這麼多種愛，和這麼多值得去愛的事，但本書只打算聚焦其中之一，也就是讓男女成為伴侶的兩性之愛。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全面的探討愛，眼前的這一本也不打算這麼做。單是「男女」之愛（當然也可能是「女女」之愛或「男男」之愛）就已經夠複雜了。「兩性之愛」的確讓人充滿疑惑，作為一個主題，雖然有許多一流的詩人處理過它，卻鮮少有聰明絕頂的哲學家肯探究這個問題。

「兩性之愛」對我們而言很重要。但在西方哲學的傳統裡，自柏拉

圖以降，兩性之愛就一直被視為非正統的「休閒音樂」。只要哲學家們繼續以「理性」定義人類，「愛」就無法比「凸槌」或「錯誤」好多少，「愛」只不過是理智在一連串令人扼腕的迷失中，造就出來的混亂情感。任由情感主宰我們的靈魂，這種行為本來就應該受到苛責。一項行為，如果你無法證明它是理性的，明哲保身的最佳作法就是——千萬別碰。哲學史上幾個赫赫有名的「異數」剛好印證了這項鐵律，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盧曼（Niklas Luhmann）都對「愛」發表了不少發人深省的見解，縱使如此，時至今日在大學裡開設以「愛」為主題的系列講座，還是會讓一位哲學家在學術界飽受質疑，甚至無可避免的淪為同僚奚落的對象。哲學是個非常保守的領域，不碰觸某些主題的作風根深柢固。目前，絕大多數充滿智慧的哲學書籍，都在探討形式邏輯或康德的範疇理論，冊數之多遠大於探討「愛」！

但恰恰相反的是：大概沒人會真的認為，對人類而言，形式邏輯的重要性遠大於愛吧！的確可惜，哲學有那麼多把鋒利的刀，卻（似乎）無法把愛情剖析個清楚。也許，誠如德國哲學家卡爾·亞斯培（Karl Jaspers）所言：「愛是絕對意識（das absolute Bewusstsein）裡最難以掌握的一項事實，因為它既是最毫無道理，也是最理所當然的。」沒錯，「愛」的確既狡猾又難以捉摸。但話說回來，難道對心理學家而言這個問題就比較簡單？還是說，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對化學家和生物學家而言，「愛」從來就不曾帶來過困擾？「愛從何而來，欲往何去？」「愛為什麼動不動就消失？」「愛在出現和消失之間對我們產生了哪些作用？」科學家們真的已經對這些問題提出解答了嗎？

「愛」或許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交界點上最值得探討的主題。愛既不能用邏輯來推理，也不能用哲學上的終極論證來解釋。可是，難道因為這樣，就要把如此重要的問題全權委託統計學家、問卷調查、心理測驗、血液分析，或荷爾蒙研究去處理？

如今愛情變得這麼珍貴，甚至「貴」不可攀，關鍵或許就在於此。因為我們把愛情交給愛情顧問和關係大師去處理，愛情才會重要到、複



雜到凡人無法應付。如今，這些專家的人數多到不勝枚舉，其影響力大到難以估計，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後果不堪設想！他們所提出聰明絕頂的好方法，無一不在告訴我們，只要跟隨他們的腳步，聽從他們精心策畫的妙計，就能覓得最佳伴侶，就能讓愛情永保新鮮，就能成為一個魅力無窮、熱情如火的理想伴侶，而且一輩子永遠幸福快樂。於是，所有床上與床下的功夫，全都非常便利的寫在書上了。什麼愛情操作手冊、做愛技巧，一應俱全。某些不求甚解的大腦科學家甚至發表了大量論文來佐證：為什麼女人慣用右腦，男人慣用左腦；為什麼男人在冰箱裡老找不到東西，女人永遠不會停車。還有，性愛能帶給男人快樂，男人一心想要上火星，但愛情才是女人要的；女人一心想要上金星，而除了愛情之外，女人還可以藉巧克力獲得滿足。於是乎，幸運的現代人，只要找對了書，好好拜讀，就能覓得理想伴侶，結成神仙美眷，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雖然，這樣的神話沒有發生在你我身上，但至少它們全寫在書上了！

其實，對「愛」我們知道的並不多。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男女究竟是怎麼開始互相吸引、有好感的？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充滿意識形態，其僵化程度比備受意識形態荼毒的政治立場還可怕。愛對我們是如此重要，但我們偏偏在這個議題上，滿足於一知半解或不明就裡。或許，正因為該主題太過重要、太吸引人了，才会有這麼多似是而非的看法或學說，而我們也樂於接受人云亦云、嚴重簡化的論點：只要他們說男人都怎麼樣，我們就相信男人是那樣，只要他們說女人都怎樣，我們就相信女人是那樣。縱使日常生活中，明明很多事情只跟「個性」有關，根本與「性別」無涉。仔細想想，我們在面對愛情或性別的問題時，能夠挑選的答案真的不多，相反的，在選擇手機答鈴時，卻有挑也挑不完的選項，可以一直挑到自己滿意為止。

所以是時候了，該把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什麼是愛情的這些問題一一釐清，並且從各種新舊成見與錯誤觀念中解脫出來。但愛情的測量門檻或許真的太高了，就像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所說：「世人人都知道什麼是暴力；但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什麼是愛。」或者，說清楚根本是多此一舉，因為有些人認為：愛情根本不存在。所以只要

隨便打個比喻、一語帶過即可，就像大哲學家柏拉圖說愛情是「神聖的瘋狂」，或法國道德家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說愛情如「鬼魅」<sup>註1</sup>，有了這些比喻就夠了。

其實愛情自成一個世界，由強烈情緒誘發豐富想像和精采觀念的美妙世界。就這點而言，「愛情」與藝術、宗教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此三領域所形成的觀念世界，都是直接訴諸感官經驗而取得價值，並非訴諸理性與知識。或許有人要說，既然愛情的邏輯如此高深莫測，愛情只能是一種文學主題。不少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甚至認為，愛情只是文學中的虛構發明。所以，若要探討愛情只能待在文學裡？出了文學便窮途末路？

在《我是誰？》（*Wer bin ich?*）書裡，我用了一個小章節探討愛情，作用之小，就好像舉起手電筒照向星空。對於愛情，我自己也充滿好奇，渴望有一天能好好探索一下這個神祕星系。愛情對我們而言，就像是個既熟悉，又陌生、充滿魅力的小宇宙。既熟悉，因為愛情主要與自己有關，而且常常是遠勝於「與對方有關」。又陌生，因為愛情總有讓戀人搞不清、弄不懂的地方。愛情不是一副攤開來的牌，但這樣也好。我們的激動莫名，我們的無法自拔，我們的熱情澎湃，我們的無可救藥只想妥協，這一切全不是想說清楚就說得清楚的。但或許愛情就需要這樣剪不斷，理還亂。

那麼，一本有關愛情的書要怎麼寫？愛情涉及的都是極私密的事、極曖昧的狀態、極美好的幻想，這樣的書要怎麼寫？在本書中你學不到閨房密技，也找不到解決性高潮障礙、消弭忌妒心、攻擊性，可幫你度過失戀痛苦，或促進伴侶信任的好方法。這本書無法增加你的魅力。它不是一本針對兩性關係所寫的諮商大全，裡面沒有美化日常生活的妙點子。本書只想幫助你釐清一些之前或許不清楚的事，讓你往後面對類似情況時，得以充滿自覺。詳細探究及測量這個你我（幾乎所有人）都想沉醉其中的瘋狂國度，其實是件很有趣的事。讓我們一起思考性別角色和社會角色，對再理所當然不過的反應動動腦筋。也許你會變得跟我一樣，喜歡多花點時間探究自己的狀態和處境。不必勉強，等你有興趣再加入也不遲。

其實，這也點出了哲學這門學科所具有的嶄新意義。哲學未必要再提出新的真理，它可以盡其所能的整合各家觀點，釐清各種看法的差異性與關聯性。這樣的工作就已經工程浩大。不過，哲學家想釐清的問題如果是愛情，那麼競爭對手可不少。以愛情為主題大量出書的有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文化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近年來還有越來越多的化學家、遺傳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大腦科學家（腦神經解剖學家）和科技新知記者紛紛加入了行列。

百家爭鳴提供了許多有趣觀點。但各家說法並列，相安無事得就像一頭頭飼養在生物實驗室裡用籠子隔開的動物，彼此竟像從未照過面一樣。「人類是動物」、「人類服膺的是化學作用」、「人類是文化產物」……大家對人類的基本看法如此不同，難怪提出的愛情見解也南轅北轍。對於忠誠、廝守、感情變化和兩性魅力等，各家提出的解釋可謂毫無交集。

最令人驚訝的是，各看法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但實際生活中又可以相互混用，且無人有異議。既然可以混用，是否代表大家所指的其實是同一種「愛」？既是同一種愛，要如何才能為社會學家講的西班牙話和遺傳學家講的中國話，搭起溝通的橋樑？睪丸激素和苯乙胺、自我投射和繁殖壓力、適應度和對期待的期待，這各式各樣的說法之間有沒有共通點？彼此是否有所相關？有從屬關係嗎？或根本毫無交集，只是並列的論點？抑或，只要追根究柢就會發現它們共同的立論基礎？

攤開各學科的專業著作，可以清楚看見定義上的壁壘分明與獨斷。社會學全然漠視愛情裡的生物化學作用，而愛情化學家對社會學的觀點同樣不屑一顧。在最根本的立論上，同屬自然科學的各學科或許還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人文科學的各學科也如此，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卻存在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

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道鴻溝。依我看來，它根本不必存在。童年起我就對動物學非常著迷，它是所有學科中最能啟發我探索人類奧秘的一門。其實，我的許多宗教信念與體驗有一定程度奠基於動物學。今天我在閱讀各種生物學理論及解釋時，同時帶有批判精神。許多生物學的前

提都沒有解釋清楚，應用法則也缺乏根據。多年來對此領域的鑽研，讓我一讀到生物學家的奇特觀點就會特別懊惱。關於男人與女人這個主題，生物學家發表過最多奇特看法。那些有關人類欲望的生物學論述，絕對是生物學領域裡最令人失望的部分，儘管如此，仍大受歡迎。當然，這要拜藉生物學之名增加可信度的心理學家之賜。

在此，我想藉各哲學學派的思想，來檢視並批判這些生物學論點。沒錯，我對自然科學的人文觀點和人文科學的自然基礎充滿興趣。我珍視自然科學追求精準與正確的堅持，也珍視人文科學「儘管如此，但是.....」追根究柢的精神與睿智分析。在學術上我無黨無派，無須捍衛任何一種學說或派別。我深信，通往真相的道路不只一條。我既非自然主義者，他們堅持只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分析人類；我也不是觀念論者，他們獨斷的主張人類可以揚棄自然科學所提供的知識。我深信，自然科學與哲學缺一不可；沒有自然科學的哲學是空洞的，沒有哲學的自然科學是盲目的。

至今為止，尚未出現任何可靠的愛情知識。所有言之鑿鑿的理論其實都漏洞百出。即便大家最愛引用的大腦科學，也未能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女人思考時啟動的腦區當然跟男人一樣，不僅跟男人一樣，連黑猩猩也一樣。就解剖學的觀點，男女腦袋幾乎沒有差別，就生理學的觀點則非常接近。否則，具有「典型」男性特質的女人，例如特別會停車的女人，豈不是腦袋有問題？特別願意傾聽別人訴說的男人，豈不是大腦發生病變？

為了回答有關愛情的問題，我將從各學術領域及派別著手，試圖為讀者提供較寬廣且豐富的視野，並將各種學說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對照。除了《我是誰？》提到過的幾位哲學家，本書將再多介紹幾位，例如美國文化哲學家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英國語言哲學家吉爾伯特·萊爾（Gilbert Ryle）、美國哲學家暨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另外，我將詳細介紹幾位生物學界赫赫有名的大師，例如威廉·漢彌爾頓（William Hamilton）、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當然不得不提

的還有重要的社會學家，例如艾瑞克·佛洛姆（Erich Fromm）和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我挑中這些重要的思想家，並非因為他們最具有代表性，而是他們的思想或多或少與我們的主題有關。

要了解「愛情生物學」就得先知道什麼是演化論，知道它的基本論述。時下最流行有關男女的生物學理論大多奠基於演化論，為求根本，我們得先檢視一下這個基礎。一到五章我將介紹性別角色的生物學與文化基礎。各種性別特徵與特質從何而來？是動物遺傳？源自遠古的演化？還是當代的發明？（第一章）基因遵循什麼樣的生物程式？對我們有何影響？（第二章）什麼是女人典型的性偏好？什麼是男人典型的性偏好？我們對這些行為了解多少？（第三章）女人大腦的運作方式與男人不同嗎？（第四章）文化對我們身為女人或男人的自我認知和對世界的認知影響有多大？（第五章）

第二部，也就是從第六到第十章，我們才要真正進入本書的主題「愛情」。首先要探討的是愛情的生物學意義。為什麼會有愛？或許一開始「愛」並不是為了男女結合而「設想」的？（第六章）我們試圖為愛這種糾結難解的感情勾勒出輪廓。既然愛情不是單純的情緒或本能，那麼愛情到底是什麼？戀愛時我們的大腦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當「戀愛」變成「愛」，情況又有何不同？相較於高山田鼠，平原田鼠算是非常專情，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從田鼠身上學到了什麼？內分泌化學作用對我們有何影響？這些問題的探討和釐清，有助於我們認識到男女最重要的差異不在於內分泌，而在於自我概念（第七章）以及童年所受的影響（第八章）。我們將發現愛情要的不只是親密與相守，還要刺激與適時的保持距離。愛情並非全然無私無我，也不一定要結為伴侶（第九章）。愛情匯集了各種嚮往、想像與觀念，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相當固定的「符碼」（Code）系統；愛情是一場期待的遊戲，更精確一點：是一場「因可期待而產生期待」的期待遊戲（第十章）。本書的第三部，將針對當前的愛情問題（個人問題和社會困境）進行探討。為什麼「浪漫」愛情會變得如此重要？（第十一章）如今浪漫儼然消費品，如果所有的浪漫都可以購買，那麼還有「真愛」嗎？（第十二章）綜觀現代家庭所面臨的困境，我們將深入探討如何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取得平

衡？（第十三章）最後，讓我們再次針對人類剪不斷，理還亂的一種感情「愛情」，做一個簡短的總結，回顧其起源與日常生活中我們面臨的愛情困境。（第十四章）

於盧森堡家中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

[註1](#)：出自拉羅什福科所著《箴言集》（或譯《道德箴言錄》）第七十六條：「真愛如鬼魅，眾口相傳，然嘗目擊者，鮮矣。」

# 第一部 男人與女人

## 第一章 一筆不明就裡的遺產

愛情與生物學有何關係？

### 幾乎堪稱絕妙的點子

生物學家都知道：女人喜歡富有、健康、高大、身材對稱、肩膀寬大且腹部結實的男人；男人喜歡年輕、苗條、乳房豐滿、屁股大、會生小孩，且皮膚光滑、細嫩的女人。對呀，整個星球都淪陷了，所有人都這麼想，唯有一小撮勇敢的人拒絕了這種想法，至今仍頑強抵抗。

如果事情真有這麼簡單，我們的性偏好如此單純，為什麼實際生活會那麼複雜、狀況百出？為什麼有男人專挑不符合這些標準的女人？為什麼有許多成年人不但不想跟外表最美的異性談戀愛，還不願意跟他們結婚？為什麼有男人就愛大噸位的女人，有女人就迷戀弱不禁風、多愁善感的男人？如果所謂的生物學標準如此受歡迎，真能為我們帶來演化上的優勢，那麼演化至今，人類社會為何不是滿街的俊男美女？最後再問一句，最美麗、最富有、最優秀的那些人，怎麼沒有生出最多的小孩？

多年來生物學家不斷強調，我們的性偏好是什麼，又會對我們造成多大的影響；這些性偏好儼然清楚自己所具有的演化功能。我們覺得誰美麗，會為誰傾倒，會想跟誰做愛，想與誰廝守，全都遵循自然法則，可納入環環相扣的生物學三大領域裡解釋清楚。此三大領域為：生物化學、遺傳學、演化生物學。

生物學的解釋能力堪稱無遠弗屆。所有的一切都是（沒有靈魂的）演化力量在背後推動。所以收拾起我們紊亂不明的愛情，看清楚隱藏在

永不理性背後的方正邏輯，掌握住人類怪異行為背後的客觀道理吧！無數學者陷入這樣的邏輯中，無法自拔，科學新知的記者們也前仆後繼以此為準繩，為市場打造出一本本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書。專業期刊、正派雜誌紛紛以「愛情密碼」、「愛情公式」為主題大肆探討。二〇〇五年《明鏡》週刊以「會愛的猿猴」（*der liebende Affe*）為題，刊出了這樣一段文字：「受演化遺產的制約，受基因及荷爾蒙的操控，人類在既定的本能生活中瞎忙、瞎闖。」於是，愛情作為日報或週報的一項主題，它不再主打軟調性的藝文版面，而是專攻冷硬的科技新知。原來被自然科學界視為旁門左道的研究，如今反倒成了主流。每天都有演化生物學、大腦科學或內分泌研究的最新成果出爐，為愛情專家提供更具實證的基礎。生物學三大領域，上千個科學研究中心的人員，孜孜不倦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愛情密碼解出來了嗎？

有一門學科集以上之大成，自稱為「演化心理學」，它嘗試解釋：龐雜的人類天性和人類文化如何以符合演化史的方式逐步開展。那些告訴我們男人不擅長傾聽、女人不擅長停車的暢銷書，正是這種演化心理學的娛樂版。較嚴肅的版本則是美國科學新知記者的報導或專書（如今也有不少德國記者跟進），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資深記者威廉·奧爾曼（William F. Allman）就以《都會中的猛象獵人：演化遺產如何塑造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Mammutjäger in der Metro. Wie das Erbe der Evolution unser Denken und Verhalten prägt*）為名寫了本暢銷書，根據他的看法，你我大衣底下都藏著一隻剛獵回來的馴鹿。所以，人類的性和愛都只是化學作用的結果，目的僅在於繁衍後代。躲在背後操控一切、讓我們無能為力的就是基因，及其所具有的神祕作用。

這樣的宣稱確實吸引人。人類的所有行為得到一個明確的解釋，或至少可以納入一個適合的範圍內，真是太好了，不是嗎？但也可能並非如此。某人覺得親眼見證到的靈魂，很可能是別人眼中的鬼魅！如果一切全納入自然科學的範圍內，那人文科學和文化呢？愛情的哲學、心理學或社會學，這下子全都要束之高閣了嗎？我們從中獲得的智慧珍寶，真的是演化心理學所能取代的？



美國演化心理學家、同時也是愛情與伴侶關係專家的大衛·巴斯（David Buss）說過，演化心理學為「科學革命畫下了完美的句點」，為「未來千年的心理學發展提供了穩固基礎」。從前我們視之為文化的，例如魅力、忌妒、性、熱情或結為伴侶等，原來都只是動物世界中諸多特殊行為的一種。尼日河裡象鼻魚的求偶秀和世界各大都會裡年輕人的追逐異性，原來都該用同一種詞彙和方式來描述。人類學家以民族學觀點看到了民族與文化特色，而演化心理學家則是抬出大衛·巴斯，輕而易舉打破了「多元文化的神話」，以證明全球人類的「性欲和愛情行為都是一樣的」。

發明「演化心理學」一詞的是，目前任職於美國加州科學院的生物學家麥可·季瑟林（Michael T. Ghiselin）。一九七三年，季瑟林在他發表於《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一篇論文，首先使用了「演化心理學」的名稱，當時他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季瑟林堅信，用演化生物學的方法和工具，絕對可以解釋整個人類心理，此想法承襲自達爾文。

現代演化論之父達爾文在他的第二本著作《人類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八七一）裡，不僅以生物學角度解釋了人類的起源，也解釋了文化的起源。於是道德、美學、宗教和愛情有了大自然的根據與清楚的意義。許多與達爾文同時代的人以及後世的信徒，欣然接受了這樣的觀念，並且把演化論中的「適者生存」延伸到社會及政治領域。「社會達爾文主義」興起並迅速竄紅，尤其是在英國和德國。從生物學的「適者生存」到法律上的「強者權利」（*Recht des Stärkeren*），其實僅一步之遙。後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這樣的意識形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儼然成為「自然法」（*Naturrecht*），但大家似乎仍覺得不夠，種族理論應運而生，出現了集中營與大屠殺，為貫徹納粹的優生政策，「不值得活的人」全都得死。

這樣的災難當然會有後遺症。長達二十年以上的學術停滯；與文化有關的生物學論述，全然沉寂。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英國演化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sup>註2</sup>才在一片死寂中，將英國人再度搖醒。至於德國和奧地利則以前種族主義理論家兼國家社會主義者康拉

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sup>註3</sup>為首，捲土重來。六○年代末，生物學終於等到了重新出發的最佳時機。到處可見認同過去以生物學觀點解釋社會現象的生物學家，只不過這次沒人敢再碰敏感的種族議題。至於政治，在見證過戰爭的可恥暴行後，人人敬而遠之。就在此時，季瑟林適時提出了「演化心理學」的名稱。演化生物學家艾德華·威爾森

（Edward O. Wilson）<sup>註4</sup>則喊出了「社會生物學」的講法。威爾森的社會生物學風行於七○和八○年代。到了九○年代，便換成季瑟林那聽起來比較不敏感且更為現代的「演化心理學」。

社會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的基本思想是：至今為止解釋生存競爭與生物演化的最佳法則是「適者生存」，適者是最能適應環境變遷的生物。最能適應環境的物種將他們珍貴的生物特徵遺傳給下一代，藉此贏過其他適應力較差的物種，獲得生存優勢。

這樣的論調，如今已被廣泛接受且視為毫無爭議，成為演化論的主流闡述。演化心理學據此更近一步的延伸出：所以人類身體的各項重要特徵，過去一如現在，必能為我們帶來演化優勢。然而，不只身體特徵如此，連心理特徵也是。我們的心理之所以是目前這樣，一定也是因為它能為我們帶來生存優勢。我們的知覺、記憶、解決問題的策略、學習方式，一定都能為我們帶來生存優勢，增加生存機會。若非如此，我們不會是現在這樣，或早就滅亡了。既然情況不是那樣，我們大可推出結論：目前我們所擁有的精神特徵一定是最好的。我們的心理一定是最適合這個環境的。但「這個環境」，此處顯然有點跳躍，可不是指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而是指現代人生物特徵形成的時期，也就是：石器時代！

現代人的出現和我們目前所擁有的環境，形成時間都很短，還來不及影響人類的「心理生物發展」。我們腦中足以左右我們行為的「運作模式」（Module）存在已久，雖然古老，但它功能齊全。面對男女明顯的差異，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會認為，這是學習所致，或文化造就，或社會化的結果。但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所有性別差異，連同思想上的，都是我們繼承自人類祖先的演化遺產。他們會說，其實只要把形成於演化過程中的各種「思想機械配備」搞清楚，就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些基

本差異（例如性觀念的差異）。威廉·奧爾曼因此主張，兩性差異就像車子，比方說「計程車和跑車」，只要「搞清楚這兩款車的基本配備，如引擎和避震器」，就能理解它們為什麼會有差異。

好吧，我們確實看到了好多款車，亦即出現在我們這個環境裡形形色色的現代男女。但我們真的有辦法搞清楚我們承襲自石器時代的古董配備——引擎和避震器嗎？

## 人類動物學

馬爾他（Malta）是地中海上一個很美但有點荒涼的島。如果你到風景如畫的丁格麗斷崖（Dingli Cliff）健行，也許會在山頂上遇到一個八十幾歲、光頭上戴著一頂棕色帽子的老翁；他極可能是那個二十世紀時享譽全球，讓許多人相信人類行為無異於動物的動物學大師。

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John Morris），一九二八年出生於英國。先後在伯明罕及牛津攻讀動物學，他對於自己到底要成為動物學家還是藝術家，一直拿不定主意。他應該是想兩者兼顧吧，不過結果或許是：樣樣通，樣樣鬆。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淡水刺魚的求偶儀式，三十歲以黑猩猩為主題進行油畫創作，並在倫敦當代美術館展出，曾為電視節目製作過一系列有關動物行為的影片；一九五九年接下倫敦動物園哺乳動物館館長之職，並在任內寫出了讓他成為動物學權威的代表作。

《裸猿》（*The Naked Ape*）出版的正是時候。英文初版的封面先一步用了柏林K2公社（Kommune 2）那張知名照片，三個背部全裸的人：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至於德國封面則增加了一隻人猿。這種照片在一九六七年幾乎算是色情照，無怪乎《裸猿》會迅速竄紅，成為眾人爭相拜讀的經典，尤其是當時的年輕人。理由很簡單，誠如印在封面上的簡介：「這本具革命意義的書籍，將徹底顛覆你的思想。讀完這本書，你看所有人的方式將徹底改觀，無論是鄰居、朋友、女人、小孩或你自

己。原本你習以為常或想不通的事，將因為這本書而頓時豁然開朗，且忍不住會心一笑。」

一夕之間，莫里斯和他那位時髦的妻子雷夢娜（Ramona）成了搖滾文化的天王巨星。我們這位以動物學享譽國際的藝術家，或說以藝術成就聞名當代的動物學家，他那本《裸猿》全球熱賣超過一千萬冊，可謂有史以來最暢銷的書之一。莫里斯大肆鼓吹性解放，聲望扶搖直上。一九六九年《人類動物園》（*The Human Zoo*）出版。莫里斯認為，人類被自己的文化所限，行為能力退化到像是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唯有掙脫枷鎖，以充滿創造性的方式回歸生物本性，才能阻止人類文明的徹底凋零。

莫里斯給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個新潮的革命家；《裸猿》一舉推翻了一九六〇年代保守的性道德。《人類動物園》堪稱是綠色和平運動的先驅。但仔細探究，在開明作風與充滿創意的形象下，隱藏的其實是一種最古老的意識形態：人類的生物本性乃天生的、既定的。你的確可以拿著莫里斯那些令人興奮的書去對抗僵化的宗教規範，或推翻市民階級的假道學。但是，人類的生物本性乃天生的、既定的，這種想法不僅不樂觀，還可以說毫無進步。莫里斯認為，根據人的「本性」，人類充滿野心、貪婪、好色、權力欲重、殘酷、自私，且完全為本能所控制。

根據莫里斯的看法，所有人類的重要行為：一是天生的，二是一筆繼承自石器時代的遺產。自此莫里斯成了極端生物學世界觀的代言人。一九七三年，為找出行為天生的理論基礎，莫里斯再次回到牛津從事研究。他的老師荷蘭籍教授尼可拉斯·汀伯根（Nikolaas Tinbergen）<sup>註5</sup>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行為學家。莫里斯回到牛津的這段期間，也是「動物行為學」（Ethology）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一九七三年汀伯根獲頒諾貝爾獎，共同獲獎的還有康拉德·勞倫茲。一如莫里斯，勞倫茲也把自己的創見付諸文字，他所撰寫的《鏡子的反面》（*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同樣企圖以生物學觀點，來說明和闡述人類文化。如果勞倫茲的觀點沒錯，那麼適用於生物學的法則同樣適用於人類文化。如此一來，所有人類的行為就可以用本能或生物學習過程來解釋了。末了，勞倫茲還大膽但非常悲觀的預言，人類文化勢必遭逢新一波演化衝擊（他

這麼說實無助於讀者相信他那些既獨斷又大膽的論點）。莫里斯至少還對裸猿的命運充滿信心，勞倫茲卻認為人類文明終將走向滅亡——不會是因為太多女孩子穿了傷風敗俗的迷你裙吧。

那些針對人類天性的分析，乍看之下超越時代限制又十分犀利，常是轟動一時卻壽命極短。原因很簡單，既然要論斷人類的「天性」，就必須對人類天性有充分了解。但無論是勞倫茲或莫里斯，他們想掌握的那個人、那份人類天性，都不是奠基於現代，而是遠古。他們認為，人類的許多特徵都是源自於石器時代，性方面如此，社會方面亦如此。我們的攻擊性、愛好、充滿創造力的好奇心，我們的飲食習慣和衛生習慣，甚至我們的宗教觀，都是承襲自石器時代。但我們對石器時代的真實狀況了解不多，於是各種藝術家的想像力與不切實際的穿鑿附會，全都可以毫無節制的大肆發揮。莫里斯對更新世（Pleistocene）的勾勒，堪稱是超現實主義的曠世傑作。

女性乳房絕對是人類演化史上的一大謎團。相較於其他哺乳動物和猿類，許多女人所擁有的乳房真是大得出奇，但未必有豐沛乳汁，甚至可以說乳房大小跟乳汁分泌並沒有絕對關係，這一點莫里斯知之甚詳。然而莫里斯發揮精湛想像力，勾勒出這樣的觀點：女性乳房和嘴脣負責從正面放送性感訊號！原先生活在森林裡的人類祖先主要從背後接收性訊息，女人「半球形渾圓的屁股和兩片紅通通的陰脣」，讓男人忍不住要撲上去。但是遷徙到草原之後，人類站了起來。莫里斯認為，直立讓人類釋放心性訊息的最主要部位，從原本的背後轉移到正面，並開啟了正面交配的姿勢。此推論鐵證如山，因為女人所擁有的「乳房和嘴脣根本就是屁股和陰脣的複製品」，由正面釋放心性訊息的結果就是正面交配。莫里斯進一步推論出，正面交配讓男女在心靈上更加親近，因為望著彼此的眼睛，有助於「成為一對」，並從此結為一夫一妻。

這則有關石器時代的美好故事，當然是胡說八道。要質疑莫里斯這種「鐵證如山」的動物學，我們甚至不必追問：為什麼有些男人也有性感豐脣？我們只需問：為什麼猿類裡唯一行一夫一妻的長臂猿（約有十五個亞種），乳房都相當乾癟？還有，倭黑猩猩喜歡玩遍各種交配體位，包括男上女下且正面的「傳教士體位」，為什麼倭黑猩猩沒有發展



出一夫一妻制。牠們不但雜交，也沒有所謂的伴侶關係，雖有正面交配，但母倭黑猩猩的乳房卻不大。

莫里斯的乳房理論堪稱趣味橫生，乃演化心理學發展初期的一絕。當然這樣的趣味如今更是隨處可見。遠古的不可考讓演化生物學家得以盡情發揮精湛的想像力。美國科學新知記者威廉·奧爾曼，對莫里斯的乳房理論顯然相當讚賞，他迫不及待的做出呼應：「大胸部的出現很可能是女性的一種戰略，目的在於把性伴侶『留在身邊』。隆起的乳房原本是懷孕的徵兆，男人藉此得到訊息，這個女伴目前已無法再受孕，所以他該去找別的女人了，這時已經跟他『交配過』的女人只能孤零零、不受保護的退居一旁。於是女人乾脆經年累月的讓胸部顯得很大，一直釋放『我已懷孕』的訊息，即便沒有懷孕也如此，久而久之，這項訊號便完全喪失了它原有的意義。結果就是，男人終於願意為他的『繁殖協議』負責，留在女人身邊，幫助她一起照顧下一代。」屬於精神性的「戰略」是怎麼變成生理特徵的？這項祕密大概只有奧爾曼才知道。根據目前的遺傳知識，「戰略」既無法遺傳給下一代，也不可能變成生理特徵。女性的大胸部能讓男人變得忠實且樂於照顧小孩，這樣的想法非常滑稽。

演化心理學家競相昭告，石器時代的人類如何交配並加以闡釋，這樣的學術風氣還真是獨樹一格。讓我們先提出一點小小的質疑：請問，誰說所有生物特徵一定具有功能？難道不可能是，這些特徵剛好不會對擁有它的生物造成困擾，也不會威脅到牠的生存，所以這些特徵就留下來了，並維持到現在？這樣的想法後文還會再談到。女人胸部之所以變大，其中一個原因會不會與食肉量增加有關？根據研究，食肉的確會提高某些荷爾蒙的分泌。況且就我們目前所知，以食肉為主的社會（比方說美國），婦女胸部的確明顯大於以素食為主的文化（例如南亞）。女人的胸部大小應該與做愛體位、一夫一妻制，以及其他演化生物學的功能無關吧？

為了解釋如今人類的狀態，而把人類化約成某些「單純的」形式，或依附在過去某一個時間點上，這樣的作法至少會面臨四大難題：首先，出現在大自然裡的一切，包括人類，用生物邏輯真的就可以解釋得

通？生物學（一般的自然科學也是）總喜歡在大自然裡尋找邏輯，但邏輯根本不是大自然的特色，而是人類的一種思考能力。在此我們忍不住要問：預設大自然背後一定隱藏著合乎邏輯的解釋，這樣的預設合乎邏輯嗎？

第二大難題是：我們真的有辦法搞清楚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條件嗎？石器時代的整個環境真的到處一樣？生活在雨林、草原或海邊的原始人，他們面臨的環境挑戰一樣嗎？

第三個問題難度更高：人類的生物行為和文化行為真的可以分開來看嗎？其所涉及的時代又是一個我們如今所知不多的遠古。

第四大難題是：如今所有被我們視之為與生俱來的行為，真的像演化心理學家所言，是石器時代人類為適應環境而產生的結果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與本書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請問石器時代的愛情是什麼模樣？

## 愛情與更新世

與人類生物結構的形成密切相關的時間為更新世，亦即新生代的倒數第二個世。更新世的時間大約從距今一百八十萬年前到距今一萬一千五百年前。我們通常將它泛稱為冰河時期，但更新世其實包含了許多冰河時期。

更新世前期，東非和南非出現了兩種原始人：巧人（*Homo habilis*）和盧多爾夫人（*Homo rudolfensis*）。根據各種跡象，他們極可能是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n*）演變而來，雖然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難以確認。爾後熱帶草原上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從非洲出發到了歐洲和亞洲。歐洲的尼安德塔人很可能就是直立人的後代。尼安德塔人似乎是強壯而單純的大個子，基於不明原因，尼安德塔人在距今約

三萬到四萬年前完全滅絕。無論哪種原始人，人類似乎越來越懂得使用工具，例如使用石斧，後來更进一步知道要利用火。

非洲的直立人在距今約三十萬年前滅絕，現代人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出現在距今約十萬年前，兩者之間的空白後來由一九七年在非洲衣索比亞發現的長者智人（*Homo sapiens idaltu*）填補，長者智人乃目前我們所知的人類最古老的直接祖先。人類祖先當時的總人數大概勉強上萬。智人後來從非洲出發，逐漸遍及全世界。直立人的出現到底比智人早多久，近年來越來越莫衷一是，比較確定的只有他們生活在較寒冷的地區。他們既是獵人也是採集者，吃植物、水果、種子、根莖、菇類、蛋、昆蟲、魚和腐屍，他們到了很後期才真正變成狩獵高手。中歐的直立人，一如尼安德塔人，皆會獵殺野牛、新生代猛象和長毛犀。

隨著猛象和長毛犀滅絕，中歐的原始人開始定居。最近的一個冰河時期結束，石器時代的人類慢慢出現了定居生活，並開始耕種、畜牧。但其他地區的人類祖先未必如此，因為各地的獵物和氣候並不相同。有些人類祖先數千年皆以捕魚為生，有些則繼續狩獵和採集。

不同的生活方式，勢必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原始人有的住在岩窩，有的住茅草屋，也有住在山洞裡的。他們在草原、沙漠、縱谷、高山、海邊、島嶼等地落腳，生活方式各自不同。演化心理學家不是說「存在決定意識」，如此殊異的存在方式，想必造就出截然不同的意識。雨林裡的採集果實，和山澗小溪的捕魚，及雪地上的獵殺猛象，應該不一樣吧。對後者而言，最可怕的威脅來自酷寒氣候；對前者而言，從來就沒見識過天寒地凍。有些原始人住在四周都是猛獸的地方，有些原始人則在完全看不見猛獸的地方（以紅毛猩猩為例，婆羅洲的紅毛猩猩喜歡流連在森林的地面上，但蘇門答臘的紅毛猩猩就不敢，因為蘇門答臘有老虎，婆羅洲沒有）。有些原始人長期待在同一區域，有些會跟著動物長途遷徙。有些原始人是食人族，有些則會埋葬死人，甚至舉行儀式。當某些原始人的大腦因應茂密的雨林生活而朝此方向發展時，另一些原始人的大腦面對的卻是一望無際的草原。



總而言之，更新世跨越的時間極長，當中所涉及的差異極大。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出現過許多不同的原始人，他們的生活環境幾經更替，天差地別。就算他們跟大部分的猿猴一樣過著團體生活或有家庭組織，有關原始人社會的遊戲規則我們還是所知不多。如果事情真像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演化心理學家勒達·康斯邁德（Leda Cosmides）和她的丈夫人類學家約翰·托比（John Tooby）<sup>註6</sup>教授所言：「我們的現代頭顱裡裝的其實是石器時代的靈魂。」那真是叫人沮喪，因為要解開這個謎團還真是無望。誠如著名的肯亞古人類學家理查·李基（Richard Leakey）<sup>註7</sup>所言：「人類學家所面臨的嚴峻事實是，他永遠無法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要證明另外一個人跟我有相同的意識水準已經夠困難了，更何況大部分的生物學家，至今還不敢去研究和確認動物所具有的意識程度。既然如此，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對我們自己所想像出來的、早就死亡的對象進行意識描述？在考古遺跡中，有關意識的證據，甚至比語言更不可得。」

對演化心理學家而言這真是一大惡耗。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沒有因此而收斂，反而繼續闡述石器時代的人類行為。為何會有男女之別？性和廝守又有什麼關係？演化心理學家理所當然的認為，這一切導因於「思考器官」之不同。威廉·奧爾曼說：「在原始人時代，男女雙方對性這件事情看到的問題基本上完全不同。男女大腦因此有了不同的發展，這也就是兩性後來在選擇伴侶的標準上，對於不忠和性需求等問題的反應會如此不同的原因。」如果這段話沒錯，那麼動物界的雄、雌大腦也應該要不同才對。從早到晚照顧幼獅的母獅子，牠的大腦肯定跟只要窩在一旁當老大、偶爾望一下小獅子的公獅大不相同。但我們從未聽過有動物學家認為，雄性動物和雌性動物的大腦有明顯差異。縱使沒有明確的證據，還是有人堅信男女腦袋大不同，否則也不會有像威廉·奧爾曼這樣的人，主張我們身上有「存在於腦中的性別器官」。他們還主張人類的繁殖本能，「愛和原欲」都源自於石器時代。面對以上這些義無反顧的說法，我們只能說他們勇氣可嘉。

其實演化心理學家也很不愛談「愛」。奧爾曼在《都會中的猛象獵人》裡雖然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探討「愛情的演化」，但他談的哪裡是

愛，根本是性。奧爾曼認為，性是石器時代人類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些不這麼做的原始人，例如把時間、精力全花的研究獵捕猛象的技巧，或把性欲全發洩在樹幹上的原始人，他們將無法獲得後代。」

演化心理學家一方面把人類祖先的性事想得太簡單，一方面又對愛支吾其詞。根據他們的說法，如今設定在我們身上的生物程式，應該來自石器時代，我們腦子裡裝的「模式」也來自石器時代，所以我們的愛也是一種早就既定的「程式」？我們腦子裡存在著既定的「愛情模式」？如果真是這樣，其目的何在？

演化心理學家斬釘截鐵的說，愛情模式的存在既是為了子女，也是為了兩性。好吧，即便如此，這些程式和模式落實為具體行為時，內容為何？至今我們沒有找到過一首尼安德塔人寫的情詩，也沒有挖掘到任何一對可供我們揣測其具體行為的化石情侶。

再說，我們真的拿得出證據證明人類祖先的性觀念與性偏好嗎？幾具壯碩的新石器時代女性遺骸，一些用石頭雕成、用陶土捏出的擁有豐乳闊肩的女性，它們一尊尊被賦予充滿藝術氣息的名字，比方說「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sup>註8</sup>，至於它們的真正功能，我們只能用猜的！相較於那些既細膩又美妙的古動物繪圖，藝術家似乎不太知道要怎麼畫原始人。很少藝術家敢嘗試或敢說，他畫出來的女原始人跟實際出現在石器時代的女性非常像。剛才提到的那些古代雕塑源自於全新世（Holocene），距今一萬多年前。根據演化心理學家的說法，我們如今的生物結構並非奠基於這個地質時代，所以它並不是很重要。

無論如何，要從石器時代的遺跡裡找出關於人類祖先的性偏好、伴侶行為和愛情證據，確實很難。演化心理學家轉而求助僅剩的唯一辦法：在現代既存的文化裡，找出跟遠古狩獵社會或採集社會類似的生活方式。但如今要找未受外界污染的「原始部落」，談何容易？遑論研究。縱使只跟一萬年前的情況做比較，如今的狩獵社會和採集社會所擁有的生活條件，也跟那時候相去甚遠。十九世紀末殖民主義橫掃全球，不僅摧毀了各地原住民文化，還大肆散播傳染病，奴役其他地區的民族，徹底毀壞他們原先的環境和生活條件。所謂的原住民，如今不是生

活在保護區，就是住在觀光客必遊的人類動物園裡，再不然就是依附在某些慈善機構的認養下。

如今的狩獵文化和採集文化幾乎不具有真實的古人類學意義，但是演化心理學家還是以它們為根據大肆推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的人類學家海倫·費雪（Helen Fisher），她言之鑿鑿的宣稱，狩獵社會和採集社會裡行的是短期的一夫一妻制。她說原始部落的伴侶通常只在一起四到五年，也就是共同撫育幼兒的那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會分道揚鑣，各自尋找下一個一起生活的對象。海倫·費雪說得如此理所當然，彷彿當日我們祖先也必定如此。所以根據人類天性，唯有「序列式一夫一妻制」（Serial monogamy，或譯「系列式一夫一妻制」）才合乎人性。短期忠於伴侶才是最真實的人類行為；無論是孩子仍小就出軌，或一夫一妻一輩子，這些都是有違人性的。這麼說來，「七年之癢」並不對，應該是「四年之癢」！不信的話你看，根據美國的離婚統計，大多數的夫妻果真在第四年離婚。如果這不是沿襲自石器時代的天性，那是什麼？男人和女人後來之所以會一輩子綁在一起，原因是有了共同的耕地與牲畜，原本只能為期數年的互相「霸占」，逐漸轉變成婚姻形態。剛剛提的這種生活形態一直到全新世才出現，但演化心理學家認為，這樣的發展乃奠基於原本就存在於我們腦子裡的「愛情模式」，換言之，我們的石器時代腦袋在全新世之前就完全定型了。無怪乎，人類的真實本性跟猿類的關係，遠勝於新石器時代（隸屬於更新世）對一夫一妻制的需求。既然只有在猿類的身上才能見到真實人性，那麼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了：五大猿類，哪一種最值得我們取法？

## 迷霧中的一座橋

人類祖先的靈魂無法變成化石讓我們挖出來當作證據，而人類演化過程中，活生生的「見證者」又不會說人話。牠們在數百萬年前就跟我

們分道揚鑣、各走各的演化之路了，牠們是：長臂猿（Gibbon）、紅毛猩猩（Orang-Utan）、大猩猩（Gorilla）、黑猩猩（chimpanzee），和倭黑猩猩（Bonobo）。七百萬年前，牠們曾和我們有過共同的祖先，但後來牠們繼續留在原始森林裡，我們人類逐漸往東非大地塹（也稱「大裂谷」）另一邊寬闊的草原移動了。即便如此，生物學家一如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可以從那些猿類的身上學到許多東西；研究猿類的家庭組織和互助行為，就可以找出人類道德的起源。「你幫我，有一天我也會幫你」，這種思維可以在猿類的身上找到最初的動物根據。一九七〇年美國社會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Robert Trivers）<sup>註9</sup>稱這種行為是「互惠利他行為」（reciprocal altruism），對此研究成果豐碩且著作等身的荷蘭靈長類專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sup>註10</sup>也表贊同。

向猿類學習，其實就是跟人類自己的起源學習。好極了。但我們的長毛表親到底能為複雜的人類行為，比方說性行為，或者再複雜一點，比方說男女間的愛情，提供多少答案？

答案是：少得可憐！長臂猿、紅毛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這些猿類的性欲行為與人類截然不同，就連牠們彼此之間也差異頗大！一說到性，大家的共同點就頓時瓦解。每種猿類都不同。長臂猿堅守一夫一妻制，地盤意識很強的長臂猿夫妻會在自己的地盤上廝守終生。長臂猿甚至會為了覓得合適伴侶，尋偶時間長達數年。

另外四種猿類就不具備這種新石器時代的專情了。紅毛猩猩的行為彈性之大令人驚訝。母紅毛猩猩會尋找棲地，公紅毛猩猩則是到處遊蕩、散居。母紅毛猩猩可能帶著小猩猩單獨找地方生活，也可能和其他母紅毛猩猩形成小群居生活。紅毛猩猩的行為似乎很有彈性空間，遊戲規則也非常鬆散，所以至今為止，紅毛猩猩的社會行為給我們留下很多謎團。

相反的，大猩猩的社會結構就非常穩定。一位雄性首領霸占著整個「後宮」，只有這隻為首的大猩猩可以跟母猩猩交配。群居的大猩猩，族群成員從四到四十位不等。小猩猩長大後幾乎一律離開團體，無論雌雄。

但黑猩猩的社會規範又沒有這麼嚴格了。雖然黑猩猩的團體也以一隻雄性為首，但除了這隻雄性首領，其他的公黑猩猩也都可以跟母猩猩交配，甚至是跟多位母猩猩交配。有時候，公猩猩會霸占著跟牠交配過的那隻母猩猩，甚至會帶著母猩猩離開大家，獨自到林中生活一段時間。黑猩猩的社會裡似乎沒有很固定或嚴格的行為規範。黑猩猩的團體通常比長臂猿大，成員約為二十到八十位。

倭黑猩猩對性的態度又跟其他猩猩大相逕庭。牠們非常喜歡團體生活，族群的成員數也比其他猩猩都多。性交是牠們最熱愛的活動。牠們每天變換姿勢，玩遍各種想得到、想不到的姿勢。只要願意就可以交配，完全不必管自己在族群裡的地位。倭黑猩猩似乎是藉由這種方式釋放壓力；總之，跟黑猩猩比起來，倭黑猩猩的確比較愛好和平。

就基因而言，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跟人類的差異大約相同。我們跟牠們的基因差異大約為百分之一點六到一點一（不同的研究結果數據略有差別），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間的基因差異也大概如此。如果說基因是解開人類起源之謎的最可靠證據，那麼這項證據顯示，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類三者之間的差異大約相同。那麼問題來了，我們到底該以誰為範本來追溯自己的性欲行為？法蘭斯·德瓦爾認為，人類或許就界於「社會階級分明的」黑猩猩和「社會階級薄弱的」倭黑猩猩之間。德瓦爾說：「人類何其幸運，體內竟住著兩種猿類。」

但威廉·奧爾曼在他那本《都會中的猛象獵人》裡斬釘截鐵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奧爾曼認為，人類毫無疑問的是先像大猩猩，後來又像黑猩猩，這一路的發展再清楚不過。他以目前為止出土最完整的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又譯「非洲南方古猿」）「露西」（Lucy）為證。露西生活在距今約三百萬年前的非洲衣索比亞地區，大約九十公分高的露西相當瘦弱，體重可能不超過三十公斤。至於露西的男性族人，出土的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化石，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應該比露西高大。但奧爾曼非常篤定的寫道，他們是露西的「兩倍大」。這樣的「男女體型差異讓我們推斷出，露西和她的族人所形成的社會，應該類似今天的大猩猩」，而他們的「性生活」應該也符合今天的大猩猩。



我們真能全盤接受奧爾曼的看法嗎？當然不能。首先，南方古猿的體型是不是真的男比女大兩倍，無法證實。其次，紅毛猩猩也跟大猩猩一樣，雌雄體型大約差兩倍，但兩種猩猩的社會行為完全不同。人類起源既無法直接追溯到大猩猩，也無法牽連到紅毛猩猩。

即便如此，奧爾曼還是認為一切再清楚不過了，我們先是「類大猩猩」，後來又變成「類黑猩猩」。奧爾曼最厲害的地方還在於論述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兩性的體型大小越接近，越會發展出一夫一妻制。但他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情況！若說人類由於兩性體型相近，所以天生行一夫一妻制，這哪裡是什麼天生，根本是美式清教徒的典型想像吧！德國哲學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sup>註11</sup>早就表示過，說人類天生是一夫一妻就好比說人類是由鳥類演變而來：「嚴格的一夫一妻制乃美德之顛峰，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最感驕傲的當屬條蟲，因為條蟲每五十到二百節或一定長度，就會完整的長出雄性性器和雌性性器，終其一生，牠的每一段身體都能自己與自己交配。」

藉由觀察猿類來解釋人類的性欲和廝守行為，這簡直就像一場動物學式的算命。要算得準，訣竅就在於，你得盡量挑那種符合自然科學家對人類看法的猿類。很長一段時間，最受歡迎、最常拿來跟人類做比較的是黑猩猩。因為保守派生物學家，例如康拉德·勞倫茲喜歡援引黑猩猩來證明人類本性乃殘暴、奸詐、狡猾，且充滿權力欲望。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大家對倭黑猩猩的了解漸多，一群提倡「性與和平」（sex and peace）的人在一隻嬉皮倭黑猩猩的帶領下遊行，這時候最符合人類天性的，當然就是倭黑猩猩了。

企圖透過今天生活在雨林裡的動物來釐清石器時代的迷霧，釐清人類最初的性欲和愛情行為，這種作法實在不可取。演化心理學家想藉此方法正確解讀「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機制」，就像大衛·巴斯希望的那樣，但這根本不可能。因為「有人就有文化，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不受文化影響的性是怎麼一回事，」靈長類專家法蘭斯·德瓦爾認為：「人類最初的本性就像聖杯一樣，大家永遠在找，但永遠找不到。」

與本書關係密切的難題是：愛和性總是被混為一談。大衛·巴斯在他那本長達六百頁的經典大作與業界範本《演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裡，整整花了一百八十頁談性，至於愛僅僅兩頁！「愛，」書上寫道：「或許是表示廝守意願的最重要證據。」

這樣的定義還真是言簡意賅。如此就能把我們稱之為愛的「精神機制」解釋清楚？愛，的確常跟廝守意願發生關聯。愛一個人會常想跟他在一起。縱使明知在一起無望，我們還是會愛一個人啊。比方說，雖然兩人互有愛意，卻很清楚彼此合不來；或兩人雖然相愛，卻因為各有牽絆不能在一起，只能等待感情慢慢變淡。大衛·巴斯接下來的這句話就比較無傷大雅，可能是對，也可能是錯：「被視為愛情之基本成分的那些行為，事實上都是在對伴侶釋放想與其性、經濟、情緒或遺傳資源，發生聯結的一種訊號。」

這段話雖然解釋了「愛了之後」會怎麼樣，卻沒有解釋：愛這種感情到底從何而來？作為一門學問，既然連「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機制」都解釋了，怎麼不乾脆把愛是什麼也一次講清楚？可惜，大衛·巴斯不打算這麼做。他的原則似乎是：「愛是前提，沒必要講。」就這樣？即便很少有其他感情或觀念，能像愛這樣對人類心理形成如此巨大的影響！

抑或，兩性之愛根本是演化心理學特定的研究方法所無法掌握的？只要無法用我的漁網撈上岸的，就不是魚！或許，人類的兩性之愛真的不只跟「生物演化」有關，還跟「文化演化」有關，所以純自然科學的方法才會永遠撈不到愛情這條魚。

人類的大腦演化絕大部分發生在遠古，甚至遠早於人類的出現，這樣的看法即使是對的，少了對人類文化演化的了解，許多重要而根本的東西還是解不開。誠如「人道」演化心理學家的先驅，動物學家兼科學政治學家朱利安·赫胥黎，於一九六〇年慷慨激昂的寫道：「社會心理之發展，換言之，一個能主動演化的人出現後，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演化階段，……這與原始人的生物演化完全不同，其差異就像從無機的和非生物的跨入生物演化一樣。」

即使人類目前的精神狀態，是人類祖先為了適應當時的生理及心理環境而產生的演化結果，發生在今天的某些現象，例如忌妒或伴侶選擇，還是沒有固定不變的成為人類的「常數」，而是很明顯的會因文化而有差異。生活在極地的伊努特人（Inuits）跟住在非洲伊圖里（Ituri）原始森林裡的班圖人（Bantus），他們的性道德並不一樣。就像住在酷寒洞穴裡的尼安德塔人和三萬年前住在喀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的原始人，他們的伴侶關係也肯定不相同。哪些與愛或與性有關的行為是被允許或不被允許的，這其實不只涉及個人，還涉及個人所處的群體，群體又跟整個「大環境」息息相關，而大環境一直就是人類力求適應的目標。不僅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演化心理學家想在迷霧中為我們搭起一座通往光明的橋樑，卻總是功敗垂成。所有想藉由生物學把人類剖析個清楚的心理學家，都不喜歡「文化」這個詞。因為文化讓一切變得複雜。文化是模糊的，生物是明確的。但真是這樣嗎？這種看法實在值得懷疑，下一章我們將發現或許情況剛好相反；文化反而比較清楚，模糊的是生物。

根據演化心理學家的說法，兩性關係一定是從「性」開始的。但這麼多年了，演化心理學家始終還停留在這個開始。愛只存在於母親與子女的關係中，兩性之所以會在一起，只是基於「廝守意願」；相對於我們性本能的力量，廝守意願根本只是作用力薄弱到不行的接著劑。

但那個影響至鉅、決定了許多事情的性本能，到底從何而來？為什麼男女的性本能會天差地別（演化心理學家堅信，就性方面男女大不同）？此外，演化心理學家還主張，想了解人類、人類的性欲行為，就得先搞懂基因所具有的神奇作用。因為推動我們一切行為和告訴我們該怎麼做的，全是內建在基因裡的「程式」。

真的嗎？隱藏在基因裡的那些作用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先離開一下演化論，進入到基因的世界，一窺究竟。下一章的內容比較枯燥，都是些理論，幾乎與本書的主題愛情無關。比較沒有耐性的讀者可能會覺得乏味，但這些問題對釐清人類本質的重要性就像國之憲法，我們怎麼解讀這部憲法，關係到許多最根本的東西——人類



和人類心理的本質。除此之外，我們還將釐清一些影響重大的誤解。覺得無聊的讀者，建議迅速往後翻個二十頁，直接跳到第三章。第三章要談的是既具體、又實際的性欲行為和伴侶選擇。至於不覺得無聊的讀者，歡迎和我一起進入下一章。

---

註2：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也是哲學家，著有《人類的危機》。曾說：「在我們運用的字眼中，最含糊、容易受到誤解與傷害的，就是『愛』。」

註3：一九〇三至一九八九，奧地利動物學家，現代行為學的奠基者之一。提出比較動物學的方法來研究動物與人類行為。一九七三年與另外兩名動物學家共同榮獲諾貝爾獎。著有《所羅門王的指環》等。

註4：一九二九年生，生物理論界翹楚，曾獲時代雜誌評定為影響美國當代最鉅的二十五個美國人物之一。昆蟲學家，以研究社會性昆蟲螞蟻成名，有「螞蟻先生」之稱；命名「演化生物學」，發揚「島嶼生物地理學」，開創「社會生物學」，又稱「生物多樣性之父」。

註5：一九〇七至一九八八，出生於荷蘭海牙的英國動物行為學家，勞倫茲的門生，研究棘魚爭鬥及求偶行為。

註6：康斯邁德一九五七年生。托比一九五二年生。

註7：一九四四年生，著有《人類傳奇》。

註8：目前展於奧地利維也納自然史博物館，代表生育之神，三圍極為肥壯，而頭部纏繞著髮辮，遮掩了視覺、聽覺與說話的功能，象徵不聽、不說、不看的女性「美德」。

註9：一九四三年生，七〇年代演化生物學「革命」的重要人物。

註10：一九四八年生，著有《猿形畢露：從猩猩看人類的全力、暴力、愛與性》。

註11：一八二〇至一八九五，與馬克思共創德國共產黨，合著《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

## 第二章 基於經濟考量的性？

為什麼基因不是自私的？

### 斷指天才

有些人信仰上帝，有些人信仰充滿神祕色彩、具有神奇魔力的基因。根據後者的說法，基因無所不能，基因乃萬能。基因是生物的「建築指南」、「建造藍圖」，甚至是「材料」。你我都是根據基因打造出來的。基因規範了所有的一切：我們的健康、我們的長相、我們個性，還有兩性間如何相互吸引、共組家庭等等。

演化心理學的教科書和知名學術期刊無不大肆闡揚：我們所有的行為都可溯因於遺傳與基因。基因是人類存在方式的幕後操縱者，它決定了我們的擇偶方式，以及我們的相愛方式。

對生物學家而言，發現了充滿神奇魔力的基因，實在是天大的幸運！因為，如果沒有基因，大概就沒有演化心理學的存在。如何重建、回溯石器時代的情況，這一直是個棘手難題。但基因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立足點，根據這個立足點，所有人類行為都可以被一一解讀。這樣的立足點不可或缺，因為生物學家跟神學家一樣，都受不了偶然和偶然所導致的無法預測。

法國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賈克·莫諾（Jacques Monod）<sup>註12</sup>，曾在一九七〇年的著作《機會與需求》（*Chance and Necessity*）中主張：生物學屬於「機會」（偶然）的管轄範圍。此話一出，不僅生物學界為之震撼，連宗教人士也深感不安。一直以來，生物學所追求的就是規律和法則，生物學家的看法一直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出現和動植物的演化，在一片看似混亂與毫無章法中，其實存在著某種不容置疑、牢不可破的法則。

莫諾發表他的看法後六年，年輕的英國動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sup>註13</sup>提出了與莫諾剛好相反的論點。這位當時年僅三十五歲的牛津講師原本沒沒無名，一夕間竟竄升成為新一代的生物學大師。宗教上，道金斯是一位徹底的無神論者。但跟許多信仰虔誠的人一樣，他也追求秩序、追求意義、追求一個一體適用的終極解釋。近年來他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是《上帝的幻覺》（*The God Delusion*，或譯《上帝錯覺》）。這本書的作用猶如《舊約全書》，道金斯也企圖要世人相信，他找到了一個比基督教上帝、伊斯蘭教阿拉更好、更全能的神，他找到了基因。基因無所不能，擁有無與倫比的強大力量，是一切的因。人類從母體開始，一直到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受基因控制。基因不但主宰了動物界，也主宰了人類。

用基因的觀點來闡釋演化，這樣的創見並非始於道金斯，雖然今天一講到基因就想到道金斯，但真正讓基因成為世界中心的，其實是一個比暢銷作者道金斯略長幾歲、被生物界同儕嚴重排擠的怪胎天才。

這個天才就是威廉·唐納·漢彌爾頓（William Donald Hamilton），他於一九三六年出生於開羅。父親是紐西蘭裔的英國工程師，母親是醫生。漢彌爾頓在英國和蘇格蘭度過了童年。當時戰爭打得如火如荼，英國頻遭空襲，漢彌爾頓的父親奉命在家為英軍製造手榴彈。同一時間，漢彌爾頓完全沉浸在自然書籍的探索中，並蒐集了許多蝴蝶。有一天，漢彌爾頓在父親的工作室裡發現了製作火藥的材料，並做起了實驗。火藥爆炸差點要了他的命，危急之際，母親為他切除了數根右手指。休養數月，漢彌爾頓終於從這場意外中撿回一條命。

長大後，漢彌爾頓到劍橋大學唸生物，躬逢其盛，見證了生物學一段既精采又令人興奮的蓬勃發展。一九五三年，漢彌爾頓剛進劍橋，當時美國生物學家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sup>註14</sup>和英國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sup>註15</sup>正好在劍橋，他們成功解讀了核酸的分子結構和DNA的雙螺旋結構。在此之前，學術界並沒有人看好他們，化學界甚至嘲諷他們是「學術小丑」。但華生和克里克卻給那些人上了重要的一課：若想了解遺傳最基本的運作方式，就得從生物化學著手。至此，基因研究終於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漢彌爾頓立刻投入此一嶄新領域。一開始他就鎖定兩大問題：基因在演化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如何藉由數學（量化的）方式，將它所具有的意義精確的表達出來？當時達爾文的演化論正好亟需一個遺傳學的基礎。因為，無論是動物界或植物界，物種之所以能成功的適應環境，一定有它們獨特的適應方式，即遵循遺傳法則的適應方式。

當時的理論大多把研究重點放在讓動物或植物較具生存優勢，或較能適應環境的生物特徵上，然後再據此進一步探究，這些特徵能為整個動物家庭、群體或族群，帶來怎麼樣的優勢。但漢彌爾頓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向是錯的。

漢彌爾頓的論點源自於一個一直以來跟生物學幾乎沒有交集的領域。漢彌爾頓在倫敦政經學院撰寫博士論文，他花了八年的時間，企圖用數學方式來表達演化過程所遵循的遺傳法則，並賦予它經濟學意義。身處倫敦政經學院這個到處都是經濟學家的環境裡，漢彌爾頓真正想探討的或許不是生物學，而是遺傳經濟學。其立論基礎在於，基因唯一關心的是如何讓自己繼續「生存」下去。但存在於一個會死的生物體中，如果基因想繼續生存下去，唯有透過遺傳，將基因傳遞給下一代。下一代身上出現越多自己的基因，就代表這個生物的生存越成功。就遺傳行為和伴侶選擇的觀點而言，基因的任務在於盡可能的讓自己繁殖，或幫助與自己血緣關係最近的族群繁殖，因為血緣關係越近，基因越相似。

漢彌爾頓的作法非常符合政經學院的作風。他以數學公式來掌握遺傳法則，並且把自己的觀點完全納入「成本與效益」這個嚴格的經濟學原理之下。如果漢彌爾頓的看法沒錯，那麼，基因就本質而言，儼然一名數學高手和經濟學家，因為基因深諳：遺傳的效益除以成本，其值必須大於一除以血親等級（或血親程度）的值。都聽懂了嗎？

其實很簡單：就基因的觀點，如果我自己生了兩個小孩，那很好，但除了自己生小孩之外，我還可以運用其他辦法讓我的基因遺傳下去。例如，我可以協助（基因跟我有百分之五十相同的）哥哥多生養五個小孩，並撫育他們長大。第一種情況用成本與效益公式算出來的值是二，第二種情況算出來的值卻高達二點五。所以，重點是：血緣關係跟我越

親近的人，越能幫助我把基因傳遞下去。藉此論點，漢彌爾頓同時也解釋了，何以動物和人類在跟那些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親戚互動時，常給人不自私的印象，原因就在於，他們會本能的計算基因遺傳的成本與效益。

一九六八年，漢彌爾頓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雖然引起一些注意，但影響僅限於學術圈。當時較受矚目的觀點是：性別角色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以及社會化對性別的重要性。漢彌爾頓的經濟生物學在當時顯得不合時宜，加上他實在是個不討喜的大學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很複雜，還不太會教書。雖然他的個人聲望在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代持續攀升，但絕大多數的人仍覺得他是個怪胎。在此期間，他成為哈佛大學和聖保羅大學的客座教授、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的榮譽會員、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最後更成為牛津大學的教授。

漢彌爾頓鑽研非主流理論的嗜好，到了晚年更是登峰造極。當這位演化生物學界的大師宣稱，他找到了愛滋病大肆傳染的原因時，學術界無不搖頭嘆息。他認為愛滋病擴散開來的最初原因是：一九五〇年代在非洲行醫的西方醫師，誤將受病毒感染的血清應用到製作小兒麻痺口服疫苗上。相關想法是他在流行音樂雜誌《滾石》（*Rolling Stone*）上看到的。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沒錯，他遠赴剛果。對演化生物學家而言，到雨林實地進行田野調查並非罕見，但罕見的是他提出的怪異看法。話說回來，不只漢彌爾頓，許多享譽國際的科學家到了晚年常突發異想或有怪異之舉，在學術圈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著名的化學家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sup>註16</sup>晚年時堅持維他命C可以治療癌症；天文學家弗雷德·霍伊爾（Fred Hoyle）<sup>註17</sup>聲稱感冒病毒來自外太空；和達爾文同樣主張天擇說的阿弗雪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sup>註18</sup>甚至辦起了招魂法會。唯一不同的是，漢彌爾頓並非老了才這樣，他自年輕起就很另類。不過其他人的古怪想法，「後果」都不如他的那麼致命。漢彌爾頓在剛果染上了瘧疾，雖緊急返英，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仍病逝於倫敦的醫院，享年六十四歲。

漢彌爾頓死前留給世人的最後印象是：一位難搞的學術泰斗。但他



的理論經過多位妙筆生花的作者與魅力無窮的演說家闡述、修飾，變得大受歡迎。對許多社會生物學家和演化心理學家而言，漢彌爾頓不僅是指引方向的沉默星辰，更是位幕後英雄。他最大的貢獻在於，他並非藉由單一動物或植物的直接生存需求，也不是透過某一群體、族群的個別需求來解釋演化，而是聚焦基因，完全以基因的觀點來解釋演化。漢彌爾頓所提出的「新咒語」是「總體適應度」（Inclusive fitness）<sup>註19</sup>。所謂的「總體適應度」是指：個體本身的繁殖成果，加上個體在繁殖成果上對遺傳近親的整體貢獻。

如果漢彌爾頓的理論沒錯，那麼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論就得改寫了，得用基因的角度來寫，一個達爾文聽都沒聽過的東西。果真如此，要適應環境的將不再是物種，而是遺傳基因。基因追求的是盡可能存在於一個健康的生物體中，好讓自己不要太早死亡，並寄望自己能藉此生物體頻繁的散播出去。基於這個原因，個體會不斷尋找可能的交配對象，而且必然會深愛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近親，因為我們會非常在意，他們的基因是否也能順利、盡量的傳遞下去。越聰明、有成就的人，基因被散播、傳遞出去的機會越大。隨著演化，成功者的基因數量越來越多。是的，就是這樣，靠著基因的這份堅持，歷史將持續的往前演進。

這樣的理論若屬正確，演化心理學家所面對的一切人類行為全有了答案。難以捉摸的性欲、複雜的心理狀態、性格特徵等，都能迎刃而解。「從基因的角度來思考選擇的問題，演化生物學頓時擁有無數新面向」，美國演化心理學家大衛·巴斯欣喜若狂的表示：「總體適應度，此一理論的提出對於了解家庭心理學、利他主義、互助和群體生活，甚至是攻擊性.....都有極大的幫助。它幾乎涵蓋所有演化生物學的問題，視之為演化生物學的最高指導原則也不為過。」

在一片讚美聲中，我們還是得問：基因何以如此無所不能？根據專家的說法，基因不會思考，沒有需求、企圖、目標，也不會做計畫，它不懂得戰術、策略，也沒有嗅覺、味覺、視覺，沒有任何感覺。基因沒有大腦，說得更明白一點，它似乎什麼都不是，也什麼都不會，既然如此，基因憑什麼是萬能的？上述對基因的看法真的能稱之為科學嗎？漢彌爾頓會不會根本就只是一位現代版的神祕學家？他同樣是在傳教，只

不過這次傳的是「基因教」，他要我們大家信仰全知全能的基因——一個沒有崇高目標，只求自我存續的基因。

## 基因神話

漢彌爾頓的理論之所以能發光發熱，前面提到的理查·道金斯厥功甚偉。一九四一年，道金斯出生於肯亞首都奈洛比，跟漢彌爾頓一樣，道金斯也是戰爭兒童。父親服役於英軍，一九四九年才從非洲回到英國。道金斯畢業於牛津大學，一九六六年取得動物學博士。漢彌爾頓提出他的理論時，道金斯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是助理教授。當時的柏克萊是美國學運的重鎮，孕育了許多新的社會觀念和烏托邦理念。不過，他們的強勁對手，優異的保守分子，也同樣聚集在柏克萊，比方說麥可·季瑟林。只要有人敢說：讓一個人成為這個人的關鍵不在於生物因素，而在於社會因素，鐵定會招來季瑟林的迎面痛擊，而季瑟林拿來反駁對方的利器，就是他即將要稱之為「演化心理學」的理論。

學運熱度漸褪，道金斯秉持生物學和心理學將有畫時代轉變的信念，返回牛津，只可惜升等為教授的心願遲遲無法達成。有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他都只是名講師，即便當時他已全球聞名；他所撰寫《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成為全球暢銷書，之後他又陸續出版多冊相關的暢銷書籍。藉由《自私的基因》，道金斯不僅讓漢彌爾頓的理論眾所皆知，還進一步將它擴充為能涵蓋並解釋一切的文化理論。但學術界對道金斯的看法不甚熱絡，甚至抱持懷疑態度。因為道金斯的理論並不是奠基於事實，他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博士論文完成後，他未再從事生物學的實地研究。一九九五年他在美籍匈牙利軟體大亨查爾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sup>註20</sup>的贊助下，於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開設了自然科學概論講座，並成為講座教授。

個性上，道金斯和他的精神導師漢彌爾頓可謂大異其趣。演講時道

金斯魅力無窮，寫作時妙筆生花，授課時口沫橫飛、慷慨激昂。不過，他們兩人的立論基礎幾乎如出一轍。正如漢彌爾頓，道金斯也完全以基因的觀點來建構他的演化史。他用極生動活潑的文字描述：所有生物，無論動物或人類，實際上都只是基因的「生存機器」（survival machine）。生物體充其量只是個「載體」或「運載工具」

（vehicle），是基因為了讓自己有效遺傳到下一代而建造出來的。用道金斯自己的話來講：「什麼是自私的基因？.....讓我們先假設自己有這樣的自由來談論基因，而基因也彷彿正遵循著某些既定目標。在這過程中，我們得一再的回頭確認，運用那有點鬆散的語言，盡可能表達出正確的意思。接著我們可以問：單一基因所追求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基本上，基因只要做到下面的描述就算達成目標：將那些基因置身於其中的身體，設計成能讓基因存活下去，並得以再複製、繁衍的模樣。」

簡而言之，這段話傳達的訊息是：你不算數，你的基因才算數！道金斯的描述彷彿戰爭：「這些生存機器對基因而言無異於被動的容器，基因使用它們的方式，也無異於和對手進行化學戰爭時必備的防護牆.....。」

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道金斯「基因戰爭」的觀點廣為流傳。對於這位牛津講師戰爭理論的極端看法，許多生物學家感到可笑，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引用了「演化是基因戰爭」的觀點，並且持續傳播。不勝枚舉的科普暢銷書莫基於道金斯的觀點，興致盎然的玩起將人類當作「基因野獸」的遊戲。一個看似客觀而科學的新論點儼然成型，只可惜在一片叫好又叫座的歡呼聲中，針對道金斯而發的睿智反駁全被忽略了。幸好，如今曙光又現，我們終於有機會對人類與文化進行徹底的反思。

或許會有人覺得不可思議，當初怎麼有那麼多人推崇道金斯的理論；「自私的基因」的缺失，明顯到想忽視它都不行。無論在人類或動物的群體生活中，我們都能輕而易舉的發現道金斯觀點不切實際的例子。但這也是它最令人嘖嘖稱奇的地方：即便實務上根本行不通，大家還是認為它在理論上很有道理。倘若道金斯是對的，那麼不管在動物或人類世界，長期下來，存活的應該都是最好的基因。但事實證明，真的



有許多生物既不是最優秀，也沒有竭盡所能，把握每個讓基因得以延續的機會。這種現象又要怎麼解釋？還有，如果某個男人沒有娶最迷人的女人為妻，或身為女人沒有努力生兒育女，是否代表這些人的基因出問題了？不只人類有自願放棄交配和繁殖機會的例子，既存於動物和人類世界的同性戀現象，這都是道金斯的理論無法回答的。

就連漢彌爾頓的總體適應度，以及為此而設的數學公式及套裝理論，也都與事實不符，甚至相去甚遠。那是生物學家在以經濟學為主流的大學中，閉門造車的結果。就整個動物界而言，親屬關係只對極少數的幾種動物具有意義。蠕蟲、甲蟲、海蟑螂、鯉魚、盲蛇蜥、箭毒蛙等動物根本不知道有親屬，也不哺育下一代，遑論知道「遺傳的效益除以成本，其值必須大於一除以血親等級的值」，這條公式顯然不存在牠們的意識與潛意識中。牠們根本不關心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動物，牠們對所謂的親戚毫無反應。牠們的基因全睡著了？還是失靈了？對牠們而言，「血親」與己何干！老鷹的雛鳥會為了不必分享食物，而把較弱的手足擠出鳥巢；公鱷魚會因為不知道小鱷魚是自己的後代而把牠吃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像大象或猿那樣重視親屬關係的反而是例外。即便是猿和人，也絕非「不可抗拒的」一定跟自己血緣關係較近的親屬感情密切。沒錯，兄弟姊妹大多滿親近的，但不可否認，也有成年後幾乎不與兄弟姊妹來往的人，甚至還為數不少！難道，這些人罹患「基因障礙」？如果不是，又要如何解釋，我們跟朋友的關係往往比血親之間更加親密？還有，幫別人照顧小孩，例如幫女性友人照顧小孩，這在遺傳學上有什麼意義？為什麼繼父要充滿愛心的照顧前人的小孩，而不乾脆娶個沒生過孩子的女人？

一九九〇年代，情況有了改變，學術界出現不同的聲音。當時以漢彌爾頓及道金斯為主流的演化心理學聲望正如日中天。值此之際，許多生物學家開始對他們的理論感到不滿，期待有更新、強而有力的說明；他們終於認清，複雜的演化過程絕非單靠基因就可以解釋。基因不像大家一開始認為的那樣，具有無遠弗屆的魔力。基因並非所有生物的「建築指南」、「建造藍圖」，而是生物發展過程中一個可供運用、有趣的資源而已。

道金斯的主要批評者之一，美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sup>註21</sup>舉了個例子，直指道金斯的缺失：有個袋子裝了數百萬顆小麥種子，農夫把一半的種子撒在肥沃的田地裡，充分的施肥、澆水，另一半的種子撒在貧瘠的田地裡。結果會如何？肥沃田地的小麥有的高、有的矮，每株不同。這很正常，因為環境雖然一樣，但種子的基因各異；有的「天生」就長得比較壯。那麼，貧瘠田地的情況如何呢？如出一轍，有的比較高。關鍵便在於基因。但如果拿這兩片麥田做比較，就會發現，肥沃農田的小麥整體而言確實長得比貧瘠農田的高大、茂盛。發生在第一塊農田裡的差異可以百分之百歸因於遺傳，第二塊農田裡的差異也是如此。但這不代表，第一塊和第二塊農田之間的差異也能完全歸因於遺傳！

路翁亭的例子告訴我們，生物的演化不只跟基因有關。生物的生存能力與外在表現牽涉到許多因素。在某些情況下（依物種之不同），個別性也與基因同等重要，有時也牽涉到個體生活於其中的群體。基因雖然是「資料的承載者」，生物特徵得靠它一代代傳遞下去，但我們仍然不能說基因是演化的唯一因素和決定一切的法則。基因的神奇魔力於是大幅縮減。演化過程中與基因等量齊觀的，至少還有物種所置身的「舞台」，以上述例子來講，就是肥沃或貧瘠的農田。

所謂的舞台，指的是物種的生活空間，當然也包括其社會環境。「環境」可指對其行為產生關鍵影響的群體，或指有血緣關係的親屬，也可能是突然闖入生存空間，要來瓜分資源的外來物種。二百萬年前，南美洲有一種叫作駭鳥的掠食性動物，腳長，體型大如駝鳥，屬隼科，位於食物鏈的頂端。後來南美洲和北美洲因地狹形成而產生聯結，原本生活在北美的劍齒虎因而南遷，成為彭巴草原上極具威脅性的競食者，牠們獵食的對象幾乎與駭鳥完全重疊。屈居劣勢的駭鳥在很短的時間內滅絕。這樣的發展根本與基因無關。

演化關係到許多層面，包括基因，在行有性生殖時發生基因交換，但除了基因之外還有環境因素，如今這已成為演化生物學界的主流觀念。基因好比一台車子的機身，它並非推動演化的馬達。物種能否成功生存，還仰賴許多其他因素。如果對某生物或某物種造成生存威脅的是

外來因素，不管此生物或物種本身的遺傳條件有多好，都無濟於事。基因無法保護我們免受掠食者的攻擊，或脫離火山爆發的威脅。總之，基因是構成生物體不可或缺的必要資料。但生物之所以擁有這樣的構造卻是生物和環境互動的結果。無論是動物或植物，只要能成功的與環境互動，就能生存下來，牠們的基因也才得以繼續存在。所以，不是基因決定生物能否生存，而是生物的生存決定了基因的存在。

所有的演化理論中，這是目前最為學術界接受的。持此觀點並與道金斯相提並論的學者是哈佛教授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sup>註22</sup>。古爾德罹癌多年，已於二〇〇二年去世。古爾德有許多引人入勝且銷售極佳的著作，其靈感源自無數同行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模型，從不同層面來解釋生物的演化史。

根據其觀點，促使演化運行的機制不僅是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也包括了限制。妨礙某一生物或物種發展的限制可能來自於遺傳基因，也可能來自於環境。例如，被迫生活在孤島上的某種生物，發展狀況一定跟生活在大陸上的同種生物大不相同。那些限制因素有時候是優勢，有時候是缺點。例如，不到一千年前，許多地中海島嶼上都還有一種體型比聖伯納犬略大的象，因為生活在島嶼上無法遷移，又得適應島上貧乏的食物供給，在演化過程中體型變得越來越小。生物學家給這種現象一個滑稽的名稱：「島嶼侏儒化」（Insular dwarfism，或譯「島嶼微型化」）。在這些島嶼上，母象青睞的對象顯然不是高大和強壯的公象，否則克里特島、馬爾他島、薩丁尼亞島、西西里島和賽普勒斯島上的小矮象早就絕種了；這些島上的象反而是越小越性感。後來這種侏儒象是因為人類而滅絕的。

對演化生物學的現狀有了梗概的了解後，便會發現道金斯的觀點如今已顯得落伍。但更令人驚訝的是，社會生物學家和演化心理學家仍緊抓著「自私的基因」論點不放。進一步探究，也不會感到意外。因為，只要一直將人類行為歸因於基因的願望、意志與目標使然，只要一直用這種簡單的生物學方法來解釋人類，我們自然會相信，那些我們稱之為欲望、個人特徵或想像力的東西，實際上全是時而隱晦、時而明顯的遺傳基因在作用。

相較於此，新的演化觀點幾乎要讓演化心理學家無立足之地。新的演化理論企圖透過不同層面來解釋，如此必會摧毀演化心理學的立論基礎。以往可以斷言的東西，現在將變得不確定。或許這正是演化心理學家頑強抵抗的原因，雖然明知自己的立論基礎在今天的學界已不被認同。我們當然不能期待，知名科學家結束講座並公開聲明：「我們先前的看法是錯誤的！」其實，失之東隅，未必不能收之桑榆，演化心理學家如果能坦承錯誤，接下來未必不能豐收。新的演化理論提供一個有趣、又能有效解決困境的出發點，它就是「文化」。關於這部分，之後將有深入的討論。

採用演化理論的新觀點，反而不必面對先前的難題，比方說既然基因不具有意識，它如何產生意願，讓生物根據可靠性、有效性及經濟效益等標準來擇偶？雖然道金斯曾如此聲明過：「自私的基因」只是一幅圖像而已。遺憾的是，他沒有把圖像當作圖像，反而把它描繪得像事實一般，並不斷試圖證明基因奉行「利己主義」。在他的闡述中，基因不只自私，還懂得算計，懂得如何當個精明的生意人。在他的眼裡，基因遵循兩大原則：一是成本多少？一是效益多大？乍聽之下，簡直要讓人誤以為，生物學乃經濟學的一支，基因單憑本能便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不過，道金斯的想法難道沒有可取之處？基因會不會就是個精明的生意人？

## 資本主義式的繁殖

演化生物學和經濟學之間似乎存在著一份既古老，又歷久彌新的愛。這份難分難捨的愛並非始於威廉·漢彌爾頓一九六八年在倫敦政經學院寫下的博士論文。這把愛的火苗點燃於在此一百二十年前的維多利亞女皇時代，亦即當時的資本主義英國，也就是達爾文撰寫《物種起源》的那個時空。當時流亡到倫敦的馬克思，對達爾文的大作相當感興

趣，「達爾文在自然界裡，隨處見到了與英國社會如出一轍的現象。」馬克斯對達爾文的這本書推崇備至，他讀得非常仔細，他認為達爾文在演化論中，不只引用了社會學，還引用了經濟學的概念。

比方說，演化論的著名概念「生存鬥爭」（Struggle for Life），就是源自於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托瑪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sup>註23</sup>。馬爾薩斯很早（比達爾文早了數十年）就用人口統計學的方法來研究世界人口的發展趨勢，並過分悲觀的推測：災難必將降臨。馬爾薩斯在一八二一年斬釘截鐵的預言，不久的將來，人滿為患的地球將再也養活不了這麼多人。

因工業革命而興起的資本主義，以及剛要竄起、以適者生存為主軸的演化論，就「語言」上來講，完全一拍即合。它們彼此援引，互為立論基礎。當然，我們不能因為達爾文引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某些社會學觀念和方法，就說達爾文的觀察和論點一定不對，但不可否認的，他的表達方式和所舉的例子，確實造成了許多誤導和誤解，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

達爾文的確認為自然界裡存在著成本與效益的考量。但主張所有一切完全服膺於成本與效益法則的是美國社會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他是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新伯朗士威克校區的教授。在他決定主修生物學之前，曾經唸過數學和歷史。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他在哈佛大學擔任講師，一如任教於牛津的道金斯，哈佛的崔弗斯，也醉心於漢彌爾頓的總體適應度。

崔弗斯比他的啟發者漢彌爾頓更熱中於經濟術語。社會生物學家崔弗斯繼承自達爾文的觀點有：一、競爭乃促使各種生命形態繼續發展的關鍵動力；二、競爭必然導致「軍備競賽」並帶來進步。只可惜，自然界剛好是「持續進步」的最佳反證。比方說恐龍，雖然演化出完美的適應力，歷經三大地質時代而存活，是演化得非常成功的物種，最後還是滅亡了。跟恐龍比起來，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顯然沒有比較好。人類是否有朝一日也能像恐龍一樣締造出傲人的演化成就，實在值得懷疑；足以支持「擁有較高智慧，在自然界裡就是一大優勢」的證據，實在少得



可憐。號稱較聰明的哺乳動物，在超過數億年的時間裡，完全生活在恐龍的陰影下，還是靠偶發的大型天災才得以嶄露頭角。況且哺乳動物發展至今，數量上並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反觀甲蟲，一種被我們認為和聰明沾不上邊的生物，卻在數量上成果傲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動物在演化的過程中，不僅沒有發生所謂的進步，反而還退步了，比方說螻蛄。

即便如此，崔弗斯還是認為，大自然就像不斷擴張的總體經濟。身處當中的生物，都是精明的男、女生意人。崔弗斯的觀點在學術圈內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比方說演化心理學家大衛·巴斯就認為，人類的交配行為應該引用經濟學觀點來闡述：「我們在基礎經濟學的課程中都學過：擁有珍貴資源的人，絕不會根據『偶然法則』來分配他的資源。在演化的過程中，女性承擔了極高的投資風險，其後果是我們身為兩性物種所必須面對的，演化賦予了女性可以仔細挑選伴侶的優勢。我們的女性祖先，在選擇伴侶的過程中如果不夠謹慎、挑剔，就得付出極高的成本代價。」

以上看法有沒有問題？真實性如何？下一章會再仔細討論。可以確定的是，一旦我們相信了崔弗斯和那些演化心理學家的話，我們的性行為將只剩下經濟意義。換句話說，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獲利；兩性以父母的角色進行投資以獲得利益。就此觀點，所有的生物，究其根本（因為做主的是基因）全都是資本主義者；他們只想（從異性身上）獲得好處、擷取資源，只想用最少的投資創造最大的利潤。根據理論，這就是演化的動力！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驅使人類不斷往前，所有行為皆可溯源於此。我們就「天性而言」都是掠奪者、騙子、投資銀行家、基因投機分子、持有後代基因的大股東等等。我們的所作所為，包括愛，全都可溯源於此，甚至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所有行為的意義與真相。那些讓我們歡喜、陶醉、興奮、著迷的東西全都是表象，都只是隱藏在背後的自私動機所製造出來的效果。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才是我們的本性，所以世界到處都有它們的蹤跡。

演化心理學的所有論點中，兩性理論和兩性行為最具爭議，對這方面的解釋實在不宜把話說得太滿。但討論到其他議題時，例如人類的攻

擊性，演化心理學的解釋又能言之有物。演化心理學家的目標在於提出適用於所有社會的性別原型，以及與此相呼應的普遍特徵。當然，最後他們要進軍的就是遺傳論戰了。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沒錯，過去三十年來他們蒐集了無數例子，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好好檢視一番。

---

註12：一九一〇至一九七六。法國生物學家，發現了蛋白質在轉錄作用中扮演的調節角色，而與安德列·利沃夫（André Lwoff）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他同時也是一位科學哲學作家與音樂家。

註13：一九四一年生，英國演化生物學大師，重要著作有《盲眼鐘錶匠》、《自私的基因》、《伊甸園外的生命長河》。

註14：一九二八年出生於芝加哥。一九五三年與克里克做出了正確的DNA分子模型，開創了分子遺傳學，兩人並因此項重大發現而獲得一九六二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註15：一九一六至二〇〇四。他曾說過：「我的腦子和大多數科學家一樣：對於世界感到好奇，然後學習以科學方法看待事情，但這並不是一種自然的做事方式，反而是種近乎詭異的方式。」

註16：一九〇一至一九九四，美國化學家、教育家、作家、和平運動者，諾貝爾化學獎與和平獎得主。

註17：一九一五至二〇〇一，除了科學研究著作，也寫過幻想小說與劇本。

註18：一八二三至一九一三，英國博物學家、演化論者，與達爾文一起提出自然選擇學說，是動物地理學的奠基人。

註19：或譯「總體適合度」、「整體適應度」、「整體適合度」、「概括適應度」、「內含適應度」、「血緣適合度」、「總括生殖成效」。

註20：美國微軟集團創辦人之一，Word、Excel等微軟應用軟體均在其領導下成功開發。

註21：一九二九年生，曾與史蒂芬·傑·古爾德在哈佛大學成立社會生物研究團。

註22：一九四一至二〇〇二，演化生物學家，美洲演化古生物學巨擘，著有《達爾文大震撼》、《貓熊的大拇指》和《生命的壯闊》。

註23：一七六六至一八三四，一七九八年發表了代表作《人口原理》。



### 第三章 勢利的伯勞，不動如山的蛙

男人與女人想要什麼？

## 投資

「灰伯勞」，可不是英國驚悚大師艾德格·華萊士（Edgar Wallace）的改編電影，而是雀型目鳥類大家族中最強悍的一員。這種鳥在歐洲、北美、熱帶草原及亞洲中部高山皆可見。冬季時通常會飛向南方。灰伯勞喜歡吃老鼠和鼯，但也獵捕小型鳥和大型昆蟲（例如大黃蜂和甲蟲）。天氣好的時候，牠會在空中狩獵；視線不佳時，牠就在地上跳來跳去覓食。用完餐，灰伯勞會將喙靠在樹枝上左右磨蹭。灰伯勞看起來就是很一般的鳥。但對演化心理學家而言，牠們可是生物學界的超級巨星。

灰伯勞是雀中猛禽，凶猛程度動物界少有。牠甚至會獵捕跟自己體型類似的動物，狩獵時會擺出誇張的恫嚇姿態，尾巴整片撐開，豎起身上所有的羽毛。牠們捍衛地盤時無比凶狠，體型雖小，一旦攻擊起來，連凶猛的鵲和鳶都要退避三舍。灰伯勞喜歡把獵物插在有刺的灌木上，或當作裝飾掛在枝桠上。當灰伯勞先生遇見心儀的灰伯勞小姐時，牠會先表演一段飛行秀，只見伯勞先生迅速旋轉向上，然後又非常優雅的滑回地面。接著牠開始展示自己插在樹枝上的獵物，邀請灰伯勞小姐一同巡禮，看看牠的存糧有多豐富。伯勞先生打的主意是：往後伯勞小姐將漸漸喪失獨立性，牠會越來越依賴伯勞先生的食物供給，終至徹底依附。伯勞小姐要付出的代價是：伯勞先生的地位將越來越高，姿態越來越驕傲。只見伯勞小姐巍巍顫顫的窩在巢中，眼巴巴的等著高高在上的伴侶叼來食物。

這麼懂經濟學的鳥！演化心理學家看中的是什麼，不言而喻。一九八〇年代，以色列動物學家發現母灰伯勞在擇偶時首重豐富的存糧。如

果公灰伯勞盤據的灌木叢越是插滿獵物且裝飾得很美（比方說有羽毛），就越受到母鳥青睞。與存糧豐富的公灰伯勞相較，窮酸的公灰伯勞簡直毫無勝算。看到這樣的研究結果，大衛·巴斯之類的學者喜不自勝：「母鳥檢視過所有公鳥之後，才選擇存糧最豐的公鳥。」

瞧，人類的女性不也是這樣嗎？她們睜大眼睛到處看，不就是為了找個財力雄厚的對象？母灰伯勞要的正是人類女性要的，一種根植於生物演化的行為。所以，雌性的貪婪其來有自，歷史悠久。女人骨子裡無異於母灰伯勞，不管男人溫不溫柔、粗不粗魯，只要財力雄厚、資源眾多就是首選。「這個例子頗為可議，」英國科學哲學家約翰·杜皮（John Dupré）<sup>註25</sup>不滿的說：「能提供掛著美麗窗簾的郊外別墅和滿屋存糧的男人，就對女人比較有吸引力。」

演化心理學家的希望再次落空。不管教科書上寫得多麼言之鑿鑿，生物學界早就把灰伯勞的例子推翻了。二〇〇四年，動物學家皮歐瑞·堤昂瑙斯基（Piotr Tryjanowski）和馬丁·赫洛馬塔（Martin Hromada）經過多年研究後發現，灰伯勞的母鳥根本不會站在枝頭上「遍閱公鳥」，然後才進行擇偶。母灰伯勞的確會先試個幾隻，但到底是哪幾隻完全隨機。至於一定要先確認對方有沒有滿滿的糧倉，這根本毫無根據。可以確定的只有，糧倉一旦被洗劫一空，公鳥就不會再有所眷戀。兩位動物學家還指出，灰伯勞並非一直是一夫一妻。母鳥在巢裡孵蛋時，公鳥會叼著食物向其他母鳥獻媚，而母鳥也會隨機和出現在鳥巢附近的公鳥交配。

各種跡象顯示，灰伯勞的母鳥比先前以為的要有人性，而人類女性也不像母灰伯勞那樣「見食（錢）眼開」。即便眾口鑠金、積非成是，在世人廣為流傳後，灰伯勞的習性彷彿成為事實，但參考價值其實不高。況且，在數百萬計的動物中，為什麼我們的心靈偏偏跟灰伯勞最相似？不同國家有不同民情，不同的禽類同樣也有不同的鳥情。比方說隼形目的猛禽（如鷹、鵟、鵂、鵙、鳶等）主要是由體型較大的母鳥餵養雛鳥，為什麼人類不援引這種鳥當依據？如果展示財力（糧倉）如此重要，為什麼人類的近親猿並沒有所謂的糧倉。即便世上有那麼多種動物，展現出變化多端的樣貌，演化心理學家還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匆匆

選定一種並不恰當的動物來做比較。如果他們能拿人類跟灰伯勞相比，是否意味著我們也可以拿人類跟黑寡婦蜘蛛或螳螂相比，這兩種昆蟲可是一交配完，母蟲就會把公蟲吃掉。或者像公鱷魚，牠可是會吃掉自己小孩的，但也有保護幼魚不遺餘力、甚至不惜和母魚對抗的公鯊，或是把卵含在嘴裡孵化的雌麗魚。我們甚至能在各種近親動物身上看見完全不同的角色分配。

說灰伯勞的心理狀態跟人類很像，實在讓人難以信服。演化心理學家要闡述的當然不是鳥，而是法則。他們想藉灰伯勞的母鳥證明，無論是動物或人類，女性追求的都是：有效投資。

關於繁殖是一種「投資」，前一章已有描述。一九七〇年代，崔弗斯率先提出這種觀念。到了八〇年代，他更進一步將此觀念應用到人類身上。從此以後，男女開始承擔完全不一樣的「投資風險」。之所以完全不一樣，理由既簡單又明確：女人一輩子只能製造四百顆成熟卵子，男人卻可以製造三億條精蟲。所以對男人而言，讓女人懷孕只是一次生物上的小小征戰：犧牲一些精子，任務完成！理論上，播完種後男人就可以繼續踏上征途，尋找下一個能讓他享受繁殖之樂的女人。但女人就無法如此瀟灑了。女人的「原料」不多，一旦真的受孕成功，懷孕期間至少九個月。這整段時間她都不能再受孕。

崔弗斯以經濟學的方式說明：女性的最低投資比例明顯高於男性的最低投資比例。所以女性的投資風險比較高。男、女的繁殖策略和擇偶心理也因此迥然有別。根據崔弗斯的說法，男人基本上是隨時隨地都想性交。女人則遇到絕佳機會才會想性交；她一定得先找到一個出類拔萃的男人，要不基因最優，要不最願意悉心照顧下一代。崔弗斯認為，兩者兼具基本上不可能，這一點我們後面還會再談到。

關於人類追求繁殖最優化的傾向，十八世紀的法國自然科學家喬治·路易·布封（George-Louis Buffon）<sup>註26</sup>形容「追求有效性的欲望」是「性本能」；布封所處的時代乃市民階級興起並極力爭取社會地位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承襲上一世紀的觀念，將「生存鬥爭」引用到生物學的繁殖理論上；當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位，大英帝國國力昌

盛，擁有無數殖民地，並竭盡所能在全球搜括資源與礦藏。到了二十世紀末，崔弗斯提出男女「性交易」的概念；時值新經濟蓬勃發展，金融界勵行全球化，市場規則與消費行為成為主流。這一路下來的發展雖非刻意，卻也不是純屬偶然。

「我們所有的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sup>註27</sup>說：「只能在具象的表達中掌握自己的思想，並且在它們的引領下宿命的去行為。」這正是經濟法則如今能統領演化心理學的主因。性行為是一種男女各自承擔不同風險比例的投資。此觀點一出，連一些古老的生物現象，例如女性高潮，也因而獲得嶄新的意義。由於沒有性高潮女性也會受精，所以性高潮這個原本生物學上多餘的生理反應，變成另有深意，一種經濟學的深意。

一九八〇年代崔弗斯提出的理論中，女人成了心機很重的馬基維利主義者：由於願意照顧小孩的居家好男人缺乏魅力，所以女人一到排卵期就會不安於室，到處尋找遺傳條件最佳的英雄，找到之後便跟他上床。接下來是最令人驚訝的部分。相較於家裡那個親愛、熟悉的老公，這個男人更容易讓女人達到高潮。為了得到這位傑出情人的基因，讓他成為孩子的生身父親，大自然有了絕妙的設計：女人做愛時如果達到高潮，吸入體內的精子就會大幅增加。一九九〇年代，美國一批研究人員證實了這項看法。他們找來一批自願者，測量性交後被女性排出體外的精液量。結果，若女性在男性射精前一分鐘或射精後六十分鐘內達到高潮，排出體內的精液量就會較少。演化心理學家的結論呼之欲出：女性高潮乃大自然的傑作，女性藉此將遺傳條件較佳男性的珍貴精子大量「吸進去」。他們還認為這樣的論點有事實為證：美國每五到六個小孩中，便有一個來自名義上的父親，而非親生父親。

就算不問這些實驗在怎麼樣的條件下進行，也不問參與實驗的伴侶心態為何，單是指出這項實驗竟未對女性出軌行為做出任何交代及說明，就令人玩味再三。深入探究便會發現，上述研究根本站不住腳。一夜情真的比較容易讓女人達到高潮？遺傳條件最優者，亦即號稱最帥，又最健康的男人，真的就是能讓女人迅速達到高潮的完美情人？生理條件最佳一定等於做愛技巧高明？這未免太天真！稍微想一下就會知道，



這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男人的調情功力和做愛技巧與他的長相或健康，甚至睪丸激素分泌量都毫無關聯。

同樣離譜的還有「精子戰爭」（sperm wars）<sup>註28</sup>一說，這根本是英國學者自己的突發奇想。他們想盡辦法找出精子在受精過程中奮力擊敗對手的證據。相應的作戰技巧、戰爭策略紛紛出爐。曼徹斯特大學的研究人員甚至主張精蟲會瞄準目標後殲滅對手；有些精蟲會不斷膨脹自己，炸掉自己的同時也消滅競爭者，另外還有精子擅長化學戰。這些學者所謂的精子戰爭，原本是指同一個男人自己的精子之間，但後來研究人員竟把它推演為男人和男人之間也有精子戰爭的證據：強悍男與他強悍的精子會擊退攻擊性較弱的疲弱男與他的精子。一項理論的提出如果不受學界認同，通常就會轉而訴諸大眾媒體。對大多數的生物學家而言，精子戰爭無異於男性的幼稚幻想或學術科幻片。被曼徹斯特大學研究團隊視為精子戰爭的現象，在其他科學家眼裡根本是受精過程的一種失誤：精子竟然無法瞄準卵，而是錯亂的去衝撞其他精子！此外，既然精子看起來都一模一樣，研究人員根本無從分辨，那要如何區分出各類型的「精子戰士」呢？

這些充滿娛樂效果的想像最令人生氣的地方還在於：研究人員想利用它們來證明，人類的性行為自始至終是一場彼此廝殺、無人能置身事外的殘酷戰爭。身為高等演化生物，人類在面對這場生存戰爭時，手法特別細膩精緻，人類將它轉化為基因與情緒的交易。戰爭理論、經濟法則與演化心理學從此完美結合，再也不分開。這是所有人的戰爭，也是兩性的戰爭，這樣的行為奠基於內建在我們體內的生物程式，一個根深柢固的好戰世界。只有經濟目的能讓兩性結合，此乃自私基因的考量。全球知名的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sup>註29</sup>，同時也是鳥類專家，也認為人類的「兩性鬥爭」出自天性，他在《性趣何來》（*Why is Sex Fun*）一書中寫道：「這種鬥爭既非鬧著玩，也不是難得一見的偶然。……這項殘酷事實是醜陋人性的基本原因之一。」

兩性互有不同的生物興趣怎麼會是醜陋？人生之所以不乏味，難道不是拜兩性衝突這項「殘酷事實」所賜？讓兩性互相吸引的關鍵因素，怎麼會是戴蒙所說的「醜陋人性」？導致兩性關係緊張，除了生育與照

顧後代，難道沒有其他原因？否則，不想生養小孩的男女碰在一起，就絕不可能互相吸引，這不荒謬嗎？這一點之後還會再談到。

那些描述生物緊張關係的語言，往往帶著濃厚的經濟色彩。可以這麼做，但沒有必要如此。應該避免直接用經濟語言來闡述遺傳生物學的邏輯，別讓自然科學淪為經濟學的分支，例如社會的或性欲的「商業意義」、基因利益之間的「協商」、愛情遊戲中的「交易」等等，這些用法很不恰當，該有人提醒那些大名鼎鼎的演化心理學家，並對此提出質疑。因為類比經常一轉身就成了事實，而事實又會製造出新的類比。無怪乎，用這種方式解釋「人類行為」時，常讓人覺得很陌生。錯誤的研究反而成了主流。至今似乎無人能撼動演化心理學家的自信心，他們顯然不只有一種法寶，即便有關石器時代的生物遺傳難以證實，而自私的基因奠基於無數的研究、問卷調查、性別行為測驗、情色喜好測驗以及伴侶偏好測驗，這總不會有錯吧！或者，還是錯了？

## 男人的願望

大衛·巴斯曾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一名不得志的社會心理學家。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演化心理學讓這位現年五十五歲的大學教授重新燃起熱情。當時演化心理學方興未艾，學說中充滿假設與臆測，即便如此，大衛·巴斯仍想證明：男女的行為與興趣大不相同，其差異主要是生物上的，而非社會或文化上的。

不同於一般心理學教授對生物學的倚重，巴斯想借重實證方法來進行研究。他最想見到的是數字、統計和實例。他的計畫工程浩大，他花了很多年，總共請了一萬零四十七名來自三十個不同文化的人，幫他填寫問卷。他費盡心思讓填寫者遍及各社會階層、宗教及年齡層。他仔細詢問他們對異性的偏好。

一九八九年，研究成果終於出爐。這份問卷對人類選擇「性伴侶」



和「廝守伴侶」提供了截至目前為止最豐富的資料。問卷中的選項羅列了各種人類生理和心理的特徵。巴斯最後還要求填寫者為這些選項做一個排序。最重要的寫在最上面，依序往下。排序結果幾乎完全符合巴斯原先的預測，不管是住在極地或沙漠，人類選擇伴侶的偏好舉世皆同。唯一的差異存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但同性沒有差異，大家喜好的異性和特徵都一樣。這證明了什麼？巴斯喜不自勝的得出結論：在進行與性有關的選擇時，人類腦袋裡確實存在「普遍的偏好模式」，它同時彰顯出人類此物種所具有的基本特色。

男人挑選性伴侶和廝守伴侶的標準是「適應度」。他們在為自己的基因尋找最佳對象。男人要的是年輕、漂亮、豐脣、皮膚光滑緊緻的女人，他們希望對方明眸皓齒、頭髮有光澤、肌肉勻稱、該瘦的瘦、該胖的胖，走起路來輕盈曼妙，說起話來表情豐富、精力充沛、容光煥發。因為這些特徵代表了：她很能生！無論生活在哪裡，不管幾歲，基本上所有男人要的都相同。

這樣的擇偶標準，一如前面所說，源自於自私基因的假設。但自私基因，也像前面分析的，是一種既粗糙又簡化的主張。只有某些喜歡譁眾取寵的專家才會認同這種論調。生物學家兼大腦專家本恩·葛林斯汀（Ben Greenstein）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脆弱的男性》（*The Fragile Male*）中寫道：「男人的第一要務就是讓女人受孕。將自己的基因射進女人體內的欲望是如此強烈，終其一生，從青春期到死亡前，都被這股欲望所操縱，它甚至強過殺戮的欲望。……甚至可以說，製造和散播精子是男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其生理的力量、殺戮的渴望，全都以此為最高目標，以確保物種中最優者，得以繁衍。一旦被迫不能散布自己的基因，男人就會備感壓力、生病，甚至崩潰或完全失控。」

葛林斯汀藉科學之名所宣揚的內容，根本就是道金斯基理論的小丑版，極盡誇張之能事。如果他說的是事實，沒有小孩的男人豈不想自殺，或瀕臨瘋狂邊緣。其實連人類的近親都不像他說的那樣；雄黑猩猩和雄倭黑猩猩沒有把繁殖當作生命的唯一目標，牠們對其他許多事情充滿興趣。如果大量繁殖真是男人存在的唯一目的與任務，他們最該選擇的播種途徑是精子銀行，男人該像德國創作歌手漢納斯·華德（Hannes

Wader)所寫的歌詞一樣：「我想，我總有一天會做出理智的事／例如從現在起就把我的精子捐給精子銀行／並在你看到街上的每個小孩／都流著我身上的血液並長得跟我一樣前，絕不死亡。」

道金斯和葛林斯汀的主張讓人困惑不解，男人為何不善用精子銀行來提高自己的繁殖成就？對此，崔弗斯給了一個絕妙的答案。他說，現代男人不樂意捐精子，是因為石器時代沒有精子銀行，捐精子不屬於男人的天性。奇怪的是，石器時代也沒有光碟和情趣用品店，為什麼現代男人都曉得去情趣用品店尋找色情光碟？為什麼有那麼多男人熱愛非石器時代的情趣內衣？還有，不知道現代人對尼龍絲襪的喜愛源自於石器時代的哪個洞穴？

基於各種實際原因，捐精子對男人而言是件毛骨悚然的事；有許多自己無法為他們負責的小孩，不知道他們會流落到哪裡，不知道他們的命運是否坎坷，這當然是件令人害怕的事。我想只有極少數的人會樂觀其成。很多事情真的比基因繁殖更重要。男人不敢到處播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弱的一項理由是：害怕伴侶的反應。威廉·奧爾曼認為，受基因主宰的男人不敢大量繁衍後代只有一個原因：「某些事關係到兩個人，一方的行為會受到另一方反應的影響，另一方可能有全然不同的願望、需求和目標，有時當一方發現伴侶欺騙了自己時，甚至會做出不符合『最大適應度』的行為。」已婚男子不敢有婚外子女，主要原因是老婆不肯、不夠有錢，或怕被「情敵報復」。奧爾曼不認為還有其他原因。因為男人隨時隨地都想交配，除了上述原因，其他都不符合他的理論。

既然巴斯的問卷證明了，全世界男人偏好的女人性徵都相似，那就應該錯不了吧。然而一九九〇年代初，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的一批研究人員發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結果。研究人員針對六十二種不同文化進行審美觀的調查，發現演化心理學家認定的普遍標準，例如女性要身材苗條，反而成了少數。六十二種文化有一半認為肥胖才是美，有三分之一認為稍微有點肉的豐腴是美，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認同目前西方世界的苗條審美觀。

上述研究讓我們更加懷疑，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普遍有效的標準當真放諸四海皆準？他們最愛拿來計算體脂肪分布的詭異公式，據說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男人喜歡騎在生育能力較佳的女性骨盆上，卻又討厭胖胖的屁股。這種公式可信？水蛇腰的女人一定比水桶腰的女人健康？從古至今，男人都喜歡細腰？各種跡象顯示，饑荒時代或瘟疫流行時，西方男人也曾迷戀過豐腴的女人，不信的話看看巴洛克時代的繪畫，仙子、繆思和眾女神哪一個不是豐滿的？沒有一個有纖細的腰身。

雖說男人喜愛代表生育能力強的性徵，但事實上那些特徵往往與生育能力無關，例如波濤洶湧且型美的女性乳房。此外，許多男人跟女人做愛時拚命想阻止女人懷孕，請問這種男人為什麼要重視女人的生育能力？就男人一輩子的性行為總數而言，為生育而做愛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一旦相信巴斯的問卷調查，不但無法解開謎團，還會新增謎團。因為如果做愛、廝守意願和生育打算是三件不同的事，男人很少會想要三者兼顧，全世界男人對女人的偏好怎麼可能這麼相似呢？

對此，演化心理學家會面無難色的回答你，因為這三件事在石器時代是同一件事。這就更奇怪了，石器時代的男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性角色，遠古的獵人根本還不知道精子肩負的使命，他們甚至無法確認孩子是不是自己的。當然，我們這些體毛很長的祖先是可能知道女性的體脂肪如何分布才算健康。那個時代的基因顯然還沒有剝奪人類的思考權，即便我們對石器時代的人類有諸多揣測。饑荒時期的男人偏愛豐腴的女人，有很多可能原因，但肯定不是遺傳基因在作祟。

## 女人的願望

巴斯同樣對女性做了問卷，結果相當有趣。相較於男性，女性似乎複雜許多。女性偏好年紀大一點、有錢、有權、健康又強壯的男人。這部分比較沒問題，但另一方面就弔詭了。女人既喜歡男人忠心、溫和、

會照顧小孩，又喜歡男人雄性激素旺盛、性欲強且粗獷。但這種男人根本不存在，至少就生物學而言不可想像。所以，女人是複雜的。說得更明白一點，沒有男人能滿足女人。關鍵在於女人的生物天性，女人是最懂「心理」的，女人必須具備看透對方的能耐。大衛·巴斯說：「對女人而言，選擇伴侶時心理機制乃屬必須，因為它能夠幫助女人掌握對方的所有特性，並且正確的加以評估。」

女人的困境是，最佳伴侶既要基因最優，又要會照顧小孩，這樣的兩難前面已經分析過。比較奇怪的是，在演化心理學家眼裡，女人一如男人，永遠在尋找最佳繁殖機會。但女人做愛常是為了樂趣而非生育，這又該怎麼解釋？這根本不符演化心理學家的論點。於是德國科技類新聞記者巴斯·卡斯特（Bas Kast）<sup>註30</sup>在他的書中獨具創見的寫道：「事實擺在眼前，就是女人不了解自己。唯有當女人找到一個有能力且願意，除了奉獻一些精子外，還肯投資精力在下一代的男人時，女人的投資成本才能降低。」言下之意，人類女性其實跟母雞、母狗、母騾、母狒狒一樣，表面上的尋歡其實是有通盤考量的，都是為了繁殖。

人類女性尋尋覓覓的就是基因最優的男性，但這種行為應該不是源自於石器時代，因為我們的近親猿並非如此。大猩猩、黑猩猩和紅毛猩猩的首領沒有太多選擇，畢竟雌性的數量已經不多。至於母倭黑猩猩則基於天性完全不挑剔。若想理解人類典型的女性行為，看來似乎得把目光放遠，參考動物界裡的其他例子。於是乎，極具排他性的「灰伯勞」就成了人類的良朋益友了。

另一個能證明人性的絕佳例子是格鬥蛙（gladiatorfrog，拉丁文學名為羅森堡雨蛙〔Hylarosenbergi〕）。這種兩棲類跟人類沒有什麼淵源，牠們目前生活在中美洲的爛泥中。為守護卵，公蛙會先挖小坑。公蛙求偶時得忍受母蛙的猛烈衝撞。母蛙的撞擊力道有時會強到把公蛙整個撞出坑去。只要公蛙被撞倒就算出局，因為只有不動如山的公蛙能與母蛙交配。

巴斯認為這種相撲蛙的「撞擊測試」，是了解人類女性行為的絕佳線索：「高大、強壯、優異的身體狀態和絕佳的運動能力，這種男人最

能吸引女人。」如果是這樣，那麼全世界最性感的當屬阿諾·史瓦辛格；這種雄性大概最有本事守護受精卵。只可惜一體適用的主張連雨蛙自己都不捧場，事實上牠們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這樣，亦即在資源極度欠缺時。事實上，也只有部分人類女性偏好肌肉猛男型。所以票選性感男星時，溫文的強尼·戴普得票率遠超過加州州長阿諾。

可見大猩猩的偏好不等於人類女性的偏好。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女人跟饑荒時期的格鬥蛙不一樣，竟然不喜歡強壯的雄性？哪裡出了問題？二〇〇四年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的生物心理學家維克多·強斯頓（Victor Johnston）試圖證明，最能表現睪丸激素分泌旺盛的男性臉孔，對女人最具魅力。眉毛越濃、嘴唇越薄、下巴越有稜有角，對女人越有魅力。所以說，那些因睪丸激素分泌過量而什麼事都藏在心底的男人，肯定是最健康的男性。這種說法大概只有德國前財政部長魏格爾（Theodor Waigel，其特徵便是濃眉、薄唇、下巴有稜有角）的粉絲會認同；即便這項研究發表時轟動一時，但它並不符合事實。

英國杜倫大學的心理學家琳達·布斯羅伊（Lynda Boothroyd）和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大衛·裴瑞特（David Perrett）於二〇〇七年發表了一項剛好相反的研究結果：女人喜歡陽剛與陰柔並濟的混合型容貌。太過陽剛的臉對女人的吸引力不大。兩位心理學家解釋，太過陽剛的臉代表容易出軌，並缺乏照顧小孩的意願。而女人最在意的就是這兩件事，所以她們會據此評價男人的外表。這樣的詮釋還真是奇怪，因為受訪女性是看著電腦螢幕上的男性臉孔作答的，她們既不認識那些男人，也不打算跟他們結婚生子，受訪過程中她們只要憑直覺圈選自己覺得性感的臉。

這些研究結果充滿偏見。據說，女人原本喜歡的是代表睪丸激素分泌旺盛的臉，但後來因擔憂和深思熟慮，漸漸覺得還是混合型比較好。看起來比較陽剛的男人就一定比長得漂亮、剛柔並濟的男人容易出軌？苗條的滾石樂團歌手米克·傑格（Mick Jagger）<sup>註31</sup>年輕時就一定比壯碩的阿諾·史瓦辛格專情？為什麼有那麼多女人希望男人擁有性感雙唇？性感雙唇不是女性的象徵？只因為聽說這樣比較會照顧小孩？為什麼女人喜歡男人有雙漂亮的手？為什麼男人結實的小屁股迷人，它在演化上

有何優點？

另外，堪稱演化心理學中不可撼動的一項神話是：女人在選擇伴侶時，「對稱」是最重要的標準之一。沒錯，的確是「對稱」！許多人主張，男人的臉型越對稱，身體越對稱，越吸引女人。堅持這項主張的有新墨西哥大學的生物學教授蘭迪·松希爾（Randy Thornhill）。松希爾的本行是昆蟲專家，一九八〇年代起轉換跑道研究「強暴」，之後則登上了「對稱」教皇的寶座。對稱，一個源自於昆蟲世界的概念，越對稱代表越健康。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受寄生蟲的傷害越多，身體就會越不對稱。松希爾的觀點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便不斷被人引用，並以各種推陳出新的方式一再闡述。就生物學而言，這樣的觀點相當可笑。寄生蟲對人類外觀（包括對稱性）帶來的影響根本微乎其微。該為我們那有點歪的鼻子負責的通常不是什麼病菌，而是同樣有個歪鼻子的祖父。如果不對稱真的是寄生蟲造成的，那麼發展中國家人民的鼻子，應該普遍比富裕又衛生的先進國家不對稱。但至今沒有人提出證據。

若想了解松希爾的對稱理論，就得先了解受試者受試時的真實狀況。松希爾給那些年輕女受試者看的臉，清一色是他們設計出來的電腦合成照。那些照片上的臉沒有一張擁有表情，所以沒有個性、魅力，也沒有情感。從那些臉上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些平面特徵，例如「對稱」。所有會影響真人面貌的因素，在那些照片上完全看不見。令人驚訝的是，松希爾的研究方式一再被援用且當作證明。真正有說服力的應是找真人面對面測試，可惜至今沒有人這樣做。

有關女性對男性生理和社會特徵的偏好同樣充滿偏見。巴斯問卷裡有一個問題是：你認為異性的哪項人格特質最重要？男女選出來的前兩名相同，一是「友善」，一是「聰明」。顯然沒有人願意跟壞脾氣且愚蠢的人交往。演化心理學家認為，女人的考量是：友善的人比暴躁的人更願意投入家庭並照顧小孩。這麼說來，女人只要不想生小孩或過了更年期，就能受得了脾氣暴躁的男子？對演化心理學家而言，「女人」的限制還有真多，該物種只對繁殖與哺育後代有興趣。

還有什麼事是女人覺得重要的？灰伯勞之間的利益糾葛前面已經分



析過。威廉·奧爾曼很愛引用一份「醫學系女大學生的擇偶標準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年輕女性，雖然自己的生活水準已經很高，未來也能提供自己高度的經濟保障，即便如此，她們還是比其他人更希望找到一個收入高、地位高的理想對象。」無論如何，這份以美國醫學系女大學生為樣本的問卷，如今儼然成為過去女人、當今女人和未來女人的行為範本。用這種方式當然會得出一個結論，女人「在短期關係裡的目標是盡可能榨取對方的物質」，巴斯稱這種現象為「資源榨取」

（resource extraction）；妓女是該現象的極端例子。有研究據此推論，女人在短暫的偷情關係中，特別希望男人在第一次幽會時表現得很慷慨。

的確，許多女人喜歡藉男人的財富與權力過舒適的生活，但男人也很喜歡從女人身上得到相同的東西。金錢，即便不是為了養育下一代，也能提供更多自我發展的機會。許多女人因此偏好年紀較長的男性，這似乎沒錯。但這種偏好一過四十五歲，往往有翻轉的跡象。當然大前提是，熟女要能幫自己找到一個迷人的年輕男子。瑪丹娜和黛咪摩爾應該不是特例。

女人會偏好「安全感」和「權力」，應該不足為奇。根據巴斯的調查結果，有一項特質對女人的吸引力竟然勝過這兩項，那就是：幽默！演化心理學家一直沒有對此做出解釋。的確，我們並不知道石器時代的「幽默」為何，也看不出長得滑稽的鳥是否有說笑話的天分。不過，稍微發揮一下想像力，還是可以依照演化心理學家的邏輯回答：幽默能有效對抗寄生蟲！因為大笑可以提高我們的抵抗力，穩定免疫系統，不是嗎？幽默的人肯定比脾氣壞的人長壽，也能長期保有優秀的基因。難怪，人類是一種非常幽默的物種！

還要繼續跟著瞎起鬨嗎？我們該相信巴斯一九九三年針對美國女大學生所做的問卷調查？男人一輩子想要十八個性伴侶，女人平均只要四到五個？無論男女，這樣的數字未免太低，而且不是說男人肩負基因的使命，一心只想到處播種？世界真是不可思議，根據巴斯的說法，女人偏好與社會地位較高的男性發生婚外情，因為他們提供「較好的基因」。是嗎？權力和金錢的基因？人類真的跟大猩猩一樣，地位越高、

身體越強壯？巴斯說，追求「性滿足」並非女性外遇的「重點」，而是持續獲得新的交配對象。這種說法能相信？

結論是什麼？總的來說，男人對女人、女人對男人的偏好都差不多。例外只能證明規則真的存在。大多數人都喜歡迷人、風趣、友善又聰明的對象。如果還能有錢，那就更完美了。這些說法我們早就耳熟能詳，巴斯不過是再證明了一遍。但如果他想進一步延伸並普遍化，那就是危險而投機的行為。事實上，有許多人真的專挑不該愛的人去愛。有些人就算覺得對方很有性魅力，也不願意與他（她）廝守一生。性欲是性欲，理性考量是理性考量。況且每個人有自己偏好的個性與身體特徵。有些人會因為對方的一個笑就墜入情網，即便不知道他（她）是誰。有的男人偏愛年長的女人，有的女人偏愛姊弟戀。有的人即使病入膏肓，仍有人愛上他，甚至願意嫁給他。下面這段話有一百四十年的歷史：「在幫動物配種前，人們總會小心翼翼的檢查這些馬、牛、狗的個性與家族史。可是當人們自己要結婚時，很少人或根本沒有人會如此大費周章。」寫下這段話的可不是刻意模仿生物學家口氣的哲學家，而是達爾文！

## 非理性的文化

你我身上都帶有演化遺產。演化造就了我們的身體和心靈，而唯一有爭議的是，這些遺產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連達爾文自己都認為，影響程度並沒有那麼大。人類很可能是世上唯一會與自己建立關係、為自己打造形象的動物。正是這種稟賦與條件讓人類能夠脫離自然給定的模式。由於世界各地的人類行為大多相似，演化心理學家於是推論，這是奠基於生物遺傳的因素。其實還有許多其他的解釋。如今大多數的文化都認為，一夫一妻制是最廣為人類接受的伴侶模式。無論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或佛教徒，在南美、北美、歐洲，或亞洲的許多地區，都有一夫

一妻制的法律。但我們怎麼能以今天制訂成法律的一夫一妻制，來推論石器時代的人類情況。此制度能夠貫徹是因為法律，不是因為它是演化的生物「模式」（就本性而言，人類也有多夫多妻的傾向吧）。所以文化因素影響甚鉅。猶太教宣揚一夫一妻制是為了防止傳染病擴散，羅馬法律規定一夫一妻是為了方便遺產分配；如今盛行於西方的基督教婚姻倫理乃集兩者之大成。

如果說生物條件是黏土，那文化就是塑形的模具，材料和形式之間有很大的差異。許多生物學家都說，男人的基因任務是盡可能的大量繁殖，然而這並不符合二〇〇八年德國的現況。二〇〇八年四月德國《明鏡》雜誌做了一份問卷調查，受訪者為兩千名德國人，「您認為什麼事比性更重要？」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訪男性勾選了「沒有——性是最重要的」。如果世界真如葛林斯汀形容的，生物天性主宰了一切，如果道金斯「自私的基因」沒錯，為什麼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男人勾選這項答案，真是匪夷所思。約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女性認為：性是人生首要的事。這比例對女性而言又未免太高。至於另一個問題的結果更令人費解：「快樂和諧的伴侶關係對人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嗎？」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訪女性回答是，比例未免太低。但回答是的男性竟高達百分之六十九！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女性認為生小孩是有意義的事。請問，這些人都怎麼了？他們的生物程式罷工、錯亂了嗎？只有百分之四十八的男性認為生小孩是有意義的。

自私基因的捍衛者在面對錯誤時，態度還算中肯。他們認為毫無疑問的，基因必須為我們的性欲負責，而性欲的目的就在於繁殖。沒錯，但有趣的是，性欲本身並不知道這件事！它有自己的關注的焦點。我們的性欲幾乎跟原始的繁殖任務脫勾了。從基因到性欲到繁殖，原本一直線的清清楚楚聯結，如今發展出許多獨立支線。當今之世，性欲本身就是其目的了。我們可以把性欲比喻成一艘小船，它被派遣出去，卻忘了原本受託付的任務，因為它發現世上竟有那麼多精采刺激的冒險，等著它去經歷。

如今我們輕而易舉的把遺傳驅力一筆勾銷，關鍵或許就在當下的生活環境，例如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和金錢照顧一個家庭。但這樣推論也

可能有錯，因為據說基因能強制我們繁殖，如果是這樣，繁殖應該在所有其他需求之上？為什麼卻沒有？我們反而能跳脫遺傳基因的控制，這是怎麼辦到的？基因和理智會在腦子裡進行對話？怎麼對話？在哪裡？為什麼它們的對話結果老是出乎你我意料之外？演化心理學家顯然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也從來不去思考這些問題。雖然他們也覺得文化會影響生物本能，甚至否決生物本能，但這場「跨界戰爭」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細節為何？他們實在想不出所以然。

其實未必要把它當成一場戰爭。基因也許不像假設的那麼自私，沒有那麼強的宰制性。我們的基因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感染了。至少就性欲方面，文化的影響力一點也不亞於生物因素。「生物的層級越高，」十九世紀末俄國哲學家索羅耶夫（Vladimir Sergeyevich Solovyov）<sup>註32</sup>說過：「繁殖潛能越降低，性吸引力就越高升。」這該怎麼解釋？

人文發展乃生物之延伸，這一點基本上沒有爭議。問題是怎麼延伸？用什麼方法？對演化心理學家而言，作為生物之延伸的人文發展，只能採用生物學或類生物學的方法。但批評者認為，人文發展另有方法。

之所以認為人文發展另有方法，原因之一是：人類壽命近千年來持續增加，已超過生物的必要。尤其是女性，性生活的延續遠超過繁殖需求。四十五歲以上的女人對演化心理學而言毫無意義，不算有性能力的生物；唯一的功能或許就是成為祖母，幫忙照顧後代。一切只能繞著繁殖打轉！演化心理學家發表了無數有關美國女大學生的研究，卻幾乎沒有人研究過四十五歲以上女人的性偏好。這方面的調查想必能帶給世人許多啟發，因為它極可能偏離現有的性偏好模式。結果也許（甚至毫無爭議的）是：性不單純只為了基因的繁衍！否則女人應該生育能力一結束，立刻毫無「性」致才對。如果性不完全由基因來驅動，那生育能力結束後，驅使我們從事性行為的是什麼？

第二道讓演化心理學家束手無策的難題是同性戀。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一位生物學家為同性愛慕或同性戀建立過生物學知識。就生物學而

言，同性戀根本不可能。但它是怎麼發生的？至於為數不多、且天花亂墜，企圖為同性戀提供生物基礎的理論，此處可以了無遺憾的直接跳過，因為同性戀絕非人口過剩的結果，也不是為了讓異性戀男人多一種選擇。怎麼就沒聽說過，饑荒時旅鼠會自動變成同性戀？至於宣稱只要略施絕技就能讓動物變成同性戀的專家，大概也是自欺欺人的成分居多。同性戀無法為演化帶來效益，所以絕大多數的演化心理學家也不認為同性戀藏著什麼大自然的神祕策略。他們只認為同性戀是種缺陷。同性戀者的自私基因睡著了？或者同性戀是一種可遺傳的基因突變？一再有人聲稱發現了眾所期待的「同性戀基因」，只是有點小遺憾，沒有任何可靠證據可以證明。每次有人發表同性戀基因的研究成果，很快就會被其他學者推翻。

以下現象多少與文化有關：很多養得起孩子的夫妻不想生小孩；女人過了更年期還是會有性欲；每二十個男人、每三十個女人就有一個有同性戀傾向。連我們的近親猿，似乎也一有機會就偏離遺傳任務。演化心理學家越仔細觀察，就越會沮喪的發現，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行為根本不符合追求「最大適應度」的原則。人類應該是像大猩猩，這樣就方便解釋了！母黑猩猩不只跟首領交配，還會跟地位低微的公黑猩猩一起躲進樹叢裡恩愛。母倭黑猩猩更是從來不問：「誰最強？誰擁有最優秀的基因？」母倭黑猩猩只根據好感隨機交配。

人類的近親怎樣，人類應該就那樣！我們永遠在找適應度最佳的交配對象。根據演化心理學家的邏輯，就是最美麗和最健康的，這是很固執的想法，在心理學與演化論上都難自圓其說。

其實人類尋找伴侶的標準通常是合不合得來。無論男女，在選擇伴侶時，最重視的很少是最美麗或最會照顧孩子。擇偶的條件或許跟個人的人生經歷有關，也可能跟生物演化有關。就人生經歷而言，想不想生小孩通常跟個人目前的狀況有關，十八歲的年輕人交了個美美的或帥帥的異性，一旦上床浮現腦海的恐怕是一些違反基因要求的現實：有了小孩，學業就得中斷，組織家庭得放棄先前懷抱的許多人生夢想；或者已經有很多小孩了，根本沒錢結婚組織家庭。至於生物演化主張最美麗、最優秀的人，最會生小孩，簡直是胡說八道。只要看一眼真實世界就會

發現，最美麗、最優秀、最富有的人，並沒有比平凡或貧窮的人更會生或生更多。

為什麼會這樣？開同學會的時候，班上最美的三朵花有兩個沒生小孩？那個最不起眼、運動細胞最差的男生，婚後一連生了六個？

達爾文的話很有智慧，人類並非遵循養牛場老闆的育種理念及邏輯在交配。原因之一或許是：基因繁衍並非長期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可以生四個小孩，但他們長大後可能一個孫子也不生給我；但我也可能只生一個小孩，他就為我帶來許多子孫。原因之二可能是：性欲與情緒特別強烈的人對品質的要求也高，他們很挑剔，甚至吹毛求疵。原因之三可能是：性欲很強的人不一定就喜歡大家庭。總之，主張遺傳條件最佳、「適應度」最強的人，生存優勢就最大，能繁衍出最多子孫，根本是一派胡言。

## 文化如何塑造我們？

達爾文很清楚，要把天擇的想法套用到人類身上有些困難。一八五九年，達爾文藉由天擇來解釋物種起源的書一出版，許多英國學者，尤其是德國科學家和哲學家，爭先恐後將此演化法則套用在人類身上。達爾文自己反而持保留態度。達爾文後來花了十二年時間，長期觀察英國南部養牛、養狗及養鴿場的育種情況。這些家畜如何進行繁殖不是由環境決定，而是由人類決定。「性擇」（**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sup>註33</sup>是他後來提出的關鍵字。意思是，最好的雄性跟最好的雌性交配。或許自然界的高等生物如鳥類與哺乳類會進行「性擇」。但真的嗎？是誰來選擇？母鹿喜歡最強壯的公鹿，雌孔雀（達爾文這裡的假設有誤）偏好尾巴最長、最絢麗的雄孔雀。培育更高等、更優秀的萬物，乃大自然的法則、擇偶的邏輯。達爾文欣喜的得出結論：所有較高等的動物都藉「性擇」來繁衍，並且永遠只選擇遺傳條件最好的對象。可惜，有一種



動物例外，性擇不適用於牠。令人懊惱的是，達爾文之所以大費周章提出性擇理論，就是為了要解釋這種動物：人類。

達爾文當時並不知道，人類並非唯一的例外。絕大多數的猿猴在繁殖時也沒有遵循養牛場老闆的選種邏輯，連鳥類都可以找到許多例外。的確，跟所有動物相較，人類的「性擇」似乎是最沒有原則和最隨性的。但只要是生物學講不通的，一定是那件事本身有問題。不管演化心理學家針對人類的擇偶邏輯提出多少偉大論述，現實總是不肯配合，結果導致傲慢自大與文化悲觀論。換句話說，只要理論不符事實，要不是大多數人有行為障礙，就是人類全都退化了。

若說人類目前處於退化狀態，那麼人類的正常狀態在何時？石器時代？石器時代之前？現代大象的正常狀態又在何時？是遠古的乳齒象、猛象？還是現今的非洲象、亞洲象？或在未來？主張石器時代的人類是正常狀態，才具有人類的「真實天性」，無異於把過渡狀態說成不變的常數。演化哪知道什麼是常數，演化只會帶來變遷與變異。若想真正了解大自然，就得正視大自然不斷變化的事實；硬要將人類的「真實天性」定在某個點上，是不切實際的。企圖用生物學方式將人類定型的理論並不周延，不是因為它們是生物觀點，而是用生物觀點來看它們，尤其不周延。

德國保守的天主教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sup>註34</sup>說：「一提到人性，就是在說謊！」這是一句極嚴苛的警語，經常被引用，警告我們千萬別隨便把人類普遍化，在生物與文化上都不該這麼做。沒錯，人類大腦的某些結構或許奠基於石器時代，遺傳基因很可能從此未有大幅改變，但據此推論，人類演化從石器時代起便已定型，未免太過草率。

無論如何，生物的自然現象就是生物的自然現象。如前一章提到的，經過時間的考驗遺傳下來的生理和心理特徵未必是最好的。只要不造成嚴重困擾就不至於被淘汰或消失。以人為例，人身上有許多（以今天的角度來看）根本不具功能，且無法帶來實際好處的特徵或器官。例如我們不需要盲腸，不需要腋毛，男人則不需要乳頭。這些承襲自祖先

的遺產雖屬多餘，但不至於帶來困擾。即便是被視為遺傳缺陷的藍眼珠，也不至於致命。

人類許多床上床下的技巧其實都無助於生育，但幸好也不至於讓我們絕子絕孫。就生物觀點而言，人類的所有行為（除了吃飯、喝水、睡覺和生育外）以及人類的整個文化，其實都是多餘的。但這才是我們該好好掌握的線索，演化「功能」反而不是。唯有從這裡出發，我們才能找到人類行為和文化的真實意義。「倘若人是由如此扭曲的木頭所做成，那再怎麼刨，也別想把它完全刨直。」這是大哲學家康德曾發出的喟嘆。同樣的，就算是生物學也別想把它刨直。

人為環境對大腦形成的要求，肯定與自然環境對大腦的要求不同。在學校上課不同於野外求生訓練，看電視不同於戶外散步，閱讀需要的能力不同於做木工。這些要求是如此巨大與顯著，很難想像它們不會對我們的先天狀態造成影響。運用目前的遺傳學方法與工具，很難將先天與後天的互動過程解釋清楚，但不代表這樣的過程不曾發生。

遺傳條件和外在環境沒有交流互動，此教條乃一八八三年由德國生物學家奧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sup>註35</sup>在一場名為「關於遺傳」（Über die Vererbung）的演說中所樹立。但最新研究再再顯示，我們的行為確實會影響到先天的遺傳條件。新的關鍵字為「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sup>註36</sup>，它研究生物體內的遺傳資訊在什麼情況下會顯現、什麼情況下不會顯現的監控機制。此一深具前瞻性的研究方向，未來值得期待。

「演化」不是數學課本，也不是套在自然現象上就能正確計算的公式，更不是績效卓著企業的標準作業流程，演化呈現無數的偶然，任意的並存與交織，以及無數沒有作用的形式與能力。簡言之，大自然並非整齊規矩的，大自然不是透過一個一體適用的理論就能全部解釋清楚的。

只要演化心理學家認定基因擁有至高無上的力量，人類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功能就只是協助基因完成遺傳的目的。所謂的文化演化不是根本無法想像，就是被視為遺傳演化的純粹複製，例如道金斯提出的概念

「瀾」（meme），即所謂的「文化基因」。一如基因會複製和遺傳其所擁有的資訊，「瀾」也會複製和遺傳它所承載的文化概念。道金斯的構想大致如此。但實際上，文化概念的傳播不像道金斯形容的僅是「複製」，它還會產生新的概念或種種變異，其複雜程度絕對超過偶然的生物「突變」（mutation）。無論在人類或動物的世界裡，都可以看到由此產生的許多新現象，或並不令人討厭的無謂行為。

很多鳥喜歡模仿其他鳥叫，例如紅背伯勞。但紅背伯勞並非單純複製其他鳥類的叫聲，而是把那些聲音當作自己叫聲的變化元素；至於這麼做是否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或目的，似乎沒有。若說紅背伯勞的公鳥會發出烏鶯的叫聲，是為了讓母鳥覺得牠比較有吸引力，不僅令人難以信服且無法證實（沒聽過紅背伯勞和烏鶯之間有什麼祕密戀情）。近年來烏鶯酷好模仿手機鈴聲，無論原因為何，大自然顯然重視形式大於意義。反應在人類各種性行為的表現上，不也如此。

整個人類文化本來就是一個透過模仿及變化而形成的文化。孩子模仿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行為，到學校裡學習知識和規範。但面對這些知識，孩子會思考、提問、更動它們，這確實是一種演化，但不是遺傳演化，而是立足於另一層面的演化，此乃文化演化。

明顯的，奠基於自私基因的演化心理學必走向死胡同，而這種困境能為我們帶來許多啟發。男人和女人不像演化心理學家形容的一定是怎樣。兩性行為不會服膺於性別原型而一成不變。但兩性行為真有不同，不是嗎？針對男女差異，會不會演化心理學家的分析並沒有錯？雖然文化會對我們造成影響，但男女差異乃先天既定，所以文化因素也莫可奈何？男女的差異到底有多大？對此我們又知道多少？

---

註24：一八七五至一九三二，英籍驚悚推理作家，也是新聞記者、劇作家、小說家。

註25：一九五二年生。

註26：一七〇七至一七八八，也是數學家。

註27：一八一九至一八八〇，本名為Mary Ann Evans，作品有《羅姆拉》。

註28：英國學者羅賓·貝克曾以此為名寫過一本暢銷書。

註29：一九三七年生，也是生理學家、生物地理學家，著作有《槍砲、病菌與鋼鐵》、《大崩

壞》、《第三種黑猩猩》，曾獲普立茲獎。

註30：一九七三年生，大學攻讀心理學與生物學，曾任GEO等雜誌與報紙記者，獲科學寫作獎。

註31：一九四三年生，搖滾樂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主唱之一。

註32：一八五三至一九〇〇，宗教哲學家、詩人。

註33：生物身上常有一些誇張的特性是天擇無法解釋的，如雄孔雀華麗的尾巴。達爾文提出「性擇」，指因競爭交配機會所做的適應。

註34：一八八八至一九八五，德國知名法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對二十世紀政治哲學、神學思想有重大影響。

註35：一八三四至一九一四，他主張「種質論」，認為後天獲得的性狀不會遺傳。

註36：國內專家學者對此術語有各種中文翻譯，常見為「表觀遺傳學」、「表觀基因學」、「上位遺傳」、「後生遺傳」、「超基因學」、「基因修飾」等等。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健康局網站上的說明：Epigenetics的字首「Epi」意為「之上」或「之外」，Epigenetics意指所有對基因的修飾機制，但並不會造成基因序列本身的改變。基因外的修飾包括像分子的增加，像增加甲基群到基因的骨架上。增加的這些分子將改變基因的結構與外觀，因而影響基因在細胞核中與重要轉錄因子之交互作用。

## 第四章 我看見的，你看不見

男女的想法真的大不同嗎？

### 娛樂效果絕佳，內容大有問題

才十歲，亞倫·皮斯（Allan Pease）就知道要挨家挨戶推銷海綿。賣保險讓二十一歲的他晉身富豪；澳洲最年輕且最有成就的百萬富翁非他莫屬，一個只要他想賣你東西，就一定能讓你買下任何東西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你敢跟他交朋友？「皮斯」，很可能不是他的真實姓名。

皮斯遇到了一個年輕貌美的模特兒。芭芭拉（Barbara）堪稱是女版皮斯，只不過比皮斯漂亮許多。十二歲就出道，曾替豐田汽車、可口可樂走過秀。二十出頭的她已擁有自己的模特兒經紀公司，成就斐然。芭芭拉和亞倫共結連理。婚後他們突發奇想，他們想出書，藉此成名，並且更成功。他們寫了許多書，關於自我分析、男女分析、為什麼他們在一起不快樂、要怎樣才能快樂。他們的論點是：男女不僅大不同，而且是徹底不同。

亞倫和芭芭拉並不是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或大腦科學家。他們是道地的生意人。只要是他們覺得值得販賣的學術論點，他們就會美化它、修飾它，甚至刻意扭曲它，把它包裝得完美、符合市場需求。結果就是十六本暢銷書，翻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全球熱賣一百個國家。全世界的男女有兩千多萬人買了皮斯的書，就百分比來講，德國人最多。五百多萬個德國家庭裡擺著皮斯寶典。所以至少有五百萬個德國人知道《為什麼男人愛說謊，女人愛哭》，《為什麼男人不聽，女人不看地圖》。

皮斯的書妙趣橫生。許多話動聽極了，只可惜動聽的話不見得是正確的。但是上千萬冊的銷售量，這樣的書怎麼可能會錯！近年來，皮斯集團更跨足其他領域，皮斯除了出書，還出DVD，製作及主持電視節目、談話秀，開設研討會及各種人際溝通訓練課程。但有一件事大家永

遠不清楚，這對明星夫妻到底幾歲？你找不到他們的詳細生平。這對光鮮亮麗的夫妻為業界樹立了典範，將把戲玩到了登峰造極！

放眼天下，或許只有一個人能超越皮斯，那就是美國的約翰·葛瑞（John Gray，一九五一年生），十六本著作狂賣超過四千萬冊。他的論點是：男女大不同，並且徹底不同，他最著名的就是《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約翰·葛瑞不同於皮斯，他有明確的出生年月日，還有碩士學歷。葛瑞自稱是伴侶關係及家庭諮商師。他不像皮斯只是個教人如何溝通的「溝通專家」。頒給葛瑞碩士學位的是哥倫比亞太平洋大學，他在這所大學主修「心理學暨人類性欲」。哥倫比亞太平洋大學是一所位於加州的私立大學，因學位取得容易，向來有「碩士製造機」的美名，二〇〇〇年因教學內容不符標準被勒令關閉。許多人認為這種野雞大學的文憑不算數。所以，約翰·葛瑞與亞倫·皮斯之間的差異或許沒有想像中的大。

一如皮斯，葛瑞也經營了一家聲名遠播的人際互動訓練機構。一如澳洲皮斯，美國葛瑞也認為男女之不同奠基於石器時代。只不過葛瑞的石器時代更厲害，是外太空的，是火星和金星上的石器時代。亞倫與芭芭拉·皮斯，還有約翰·葛瑞，聯手對西方文化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滲透與教化。他們用有趣的故事和彷彿充滿知識價值的好玩觀點，打造了大眾的認知。自從有了皮斯和葛瑞這樣的暢銷作家，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認定：男人「聽力差，視覺弱，卻是傑出又稱職的狩獵者」，女人「空間感不足又愛嘮叨，卻是最優秀的採集者」。皮斯和葛瑞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就連佛洛伊德也要甘拜下風。

如今學術界對石器時代的了解有多深入、可靠，前面已分析過。至於對火星和金星的了解，在此無須多費唇舌。那些有關人類祖先的臆測，事實上只是根據現代人的行為加油添醋的史前史。這些書最常用的技巧就是冷不防的冒出一句「根據美國專家的研究……」。既然如此，當然值得我們拜讀。但是，美國專家研究出來的結果還真是多啊！這些專家到底是誰？在什麼條件下、運用哪些方法進行研究？

就學術觀點而言，這些書並不適合大學的環境氛圍，它們比較像是



一場場的脫口秀。其中讓人最不欣賞的地方就是，他們老喜歡找一男一女來扮演夫妻或情侶（如今這股風氣也吹到了德國），總是會有個春嬌和志明，兩人為了照顧小孩或看電影的問題爭執不下。針對這樣的個案，專家最後做出診斷，結論通常是：看吧，這就是男人！這就是女人！他們擺脫不了典型的男女行為！果真如此？總之，專家最後會提出睿智的建議和可遵循的黃金法則，例如「神祕的愛情增溫計畫」，或令人期待、絕對能扭轉乾坤的錦囊妙計，「吵得再凶，別把氣帶上床」，「切記，帶束花，轉移太太的注意力」。因為根據美國專家的研究指出.....。

這些書如此成功，不禁讓人好奇，它們的魅力何在？這些書基本上都是既有趣又易懂。隨便翻到哪一頁都可以立刻進入狀況，沒有理解上的困難。它們滿足現代人兩大需求：一、提供一個清楚明瞭、毫無疑義的立足點。相較於文化，生物學給人的印象是簡單、明白、合乎邏輯，其實唯有刻意簡化、有目的的曲解，生物學才能顯得如此明確。我們對生物科學的信任已達前所未見的程度，並且還在迅速增加中。能控制基因的人、能培養人工胚胎的人、能研發出最新腦神經外科技術的人（例如治療巴金森氏症的腦深層電刺激術〔Deep Brain Stimulation〕），這些人肯定能告訴我們：我到底是誰。

二、為先入為主的想法提供實證基礎。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的社會改革，雖然撼動了十九世紀的認知模式，撼動了教會與父權思想，卻沒有提出足以與之抗衡，且真正能令人信服的知識。為了對抗獨斷的「一切都是天生！」改革者喊出了「一切都是教育！」但同樣失之偏頗。自此以後，許多觀念變得不清不楚。

葛瑞和皮斯的書適時為大眾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答案。一方面，他們的書重新鞏固了性別解放之前僵化的性別角色：男人皆好色、具攻擊性、權力欲重，且只會單向思考。另一方面，這些書又告訴讀者，男女的權力分配已經發生大變革，男人雖然還是那麼糟，但女人不用怕了，甚至可以微笑面對！因為女人即使喋喋不休、注意力欠佳、思考能力差、一到陌生城市就會迷路，但是無妨，因為女性在社交能力上遠勝過男性。

二十年來，這些書對「社交智能」的推崇，讓女性一舉登上最優秀性別的寶座。雖然比較會開車的人還是男性，但對心理諮商師而言，男性早就喪失了統治權。要怪就得怪那些源自石器時代的優點；男人的特長在現今社會毫無用武之地；獵人特有的眼力，早已派不上用場！

女人十萬年來唯一沒變的是，為了生出優秀的下一代仍在尋覓優秀的基因。因為女性荷爾蒙一如遠古，所以現代女人擅長某些事，而某些事又完全不會。

定型於石器時代的生理與內分泌狀態，以及因此而形成男女不同的腦袋，決定了從古至今所有的男女差異。所以，像皮斯說的，「女人一見到裸男就會發笑，男人一見到裸女就會被吸引」，而且不只澳洲、歐洲和美國的男人刷牙時會抖腳，就連亞馬遜地區、南北極和哈薩克的男人也是這樣。搶在演化心理學家（例如大衛·巴斯）之前，皮斯早就勵行從單一實例或觀察中推演出全世界一體適用的法則。但女人在強悍基因的主導下竟然還能出軌？大衛·巴斯認為這主要是受物欲影響，「包括昂貴的設計師服裝、事業心、珠寶首飾，以及想開伴侶的車」。人類所有的共通性都可追溯至生物遺傳的源頭嗎？光是觀察非洲伊圖里原始森林裡的木布堤（Mbuti）矮人和非洲納米比亞的布須曼人（Bushmen），就不禁要讓人懷疑上述說法的可能性。

澳洲、歐洲和美國的男女之間，並非所有的，而是某些差異，肯定能藉由大腦裡性別所特有的「模式」來解釋。於是演化心理學家與科普暢銷書作家，把希望寄託在大腦科學的研究上。只要男女腦袋一剖開，就能證明兩性的差異之大，思想之不同，感覺之不一樣，連帶的就能解釋男女社會行為不同的原因。約翰·葛瑞便認為，男人愛起來像「橡皮筋」，來得快去得也快，女人愛起來像「海浪」，慢慢捲起，再慢慢落下，而這種差異是大腦造成的。難道沒有剛好相反的男女？男女愛的方式當真大相逕庭？到底男人與女人的腦袋之間存在多大的生物差異？

# 性別與腦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第一次拜訪紐約，美國大型連鎖書店如博得斯（Borders）、邦諾（Barnes & Nobles），以及位於百老匯大道和十二街交叉口的老牌書店「拱廊書店」（Strand），都讓我嘆為觀止，它們的寬敞與舒適讓我著迷。我常一整天流連在書店的自然科學區，邊看書、邊喝咖啡、邊吃布朗尼。我總要待到華燈初上，才意猶未盡的走出書店，迎向五光十色、嘈雜又混亂的紐約市。當時，每家書店都把某一本充滿科學知識的書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就是安妮·莫伊爾（Anne Moir）和大衛·傑塞爾（David Jessel）合著的《腦內乾坤：男女有別，其來有自》（*Brain Sex: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woman*）。一九九五年，我開始對大腦科學產生興趣，看著這本書的標題，我驚訝的想著：大腦科學什麼時候已經發達到可以針對男女大腦之差異發表專書了？當我翻到內頁，發現這本書是再版，我更驚訝了。這是一本英國著作，原始的出版日期為一九八九年。以今天大腦科學的發展來看，當時的大腦科學尚處於幼兒階段。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大腦科學最受矚目的關鍵技術有個非常拗口的名稱：「功能性磁共振斷層攝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當時任職於美國電信集團AT&T旗下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的日本人小川誠二（Seiji Ogawa）剛發表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亦即造成轟動的「核磁共振成像儀」<sup>註37</sup>。藉由這部機器，我們可以對腦部血液進行掃描，以偵測電磁波訊號，再經由電腦分析訊號形成磁振造影，並顯示於電腦螢幕上。這項發明一舉突破了以往X光、超音波和腦電圖的侷限。現在起，研究人員可以藉助這具夢幻儀器觀察到病人的腦內狀況。但核磁共振成像可以讓我們清楚看見男女是怎麼感覺、怎麼思考的嗎？可以讓我們看見其中的差異？

我在紐約看見的那本書出版於核磁共振成像技術發表前。遺傳學博士安妮·莫伊爾和新聞記者大衛·傑塞爾比皮斯及葛瑞更早主張：「男女

不僅不同，而且還徹底不同！」那本書上寫道：「要說男女在能力上及行為上都一樣，無異於把一個社會建立在生物學及科學的謊言上。」這本書後面所附的參考書目有兩頁半，無疑要證明書上所寫的一切都是有憑有據，且奠基於大腦科學的研究結果。

一九八九年，當時的人要如何比較女性和男性大腦的差異？比較他們腦中的感覺和思考差異？要怎麼知道差異有多大？尤其，要怎麼看見腦中的情況？能看得多清楚？

第一個從事大腦研究的知名學者是十九世紀晚期法國巴黎的神經解剖學家保羅·布洛卡（Paul Broca）<sup>註38</sup>。布洛卡測量了不同國家的人腦重量，並且比較了男女的腦重。他欣喜的發現男人跟女人的腦確實有差別。男人的腦無論在體積或重量上都比女人平均大了百分之十到十五。成年女性的腦平均重量為一千二百四十五公克，成年男性的腦平均重量為一千三百七十五公克。縱使考慮體型的個別差異，男人的腦平均來講還是比女性大。布洛卡喜不自勝的下了結論：根據各種跡象顯示，男人的確比女人聰明。因為毫無疑問的，「聰明才智與大腦體積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關聯」。可惜不久之後，他就沒興趣再測量大腦了。他的法國同行卻發現（身為愛國人士的布洛卡肯定不會樂見）：德國人的腦容量平均大於法國人。

腦袋越大就越聰明，這是一項沒有根據的揣測。我們的腦擁有超過一百兆個神經細胞（或稱神經元），但我們真正使用到的部分很少。其實比大小更重要的是，複雜的大腦運作模式和腦神經迴路。晚近一些研究成果令人玩味，研究者試圖用女性腦中的灰質區較多來說明，何以有人主張女性擁有較佳的語言能力。

既然大小不是關鍵，那麼造成男女差異的會不會是腦神經迴路？「女人思考時慣用右腦，男人思考時慣用左腦」，這是經常聽到至理名言。但真是如此嗎？

人腦看起來很像一顆放大的核桃，腦組織像軟軟的蛋糊。表面上看起來左右兩半腦非常相似，但仔細探究其實有很多不同。最重要的腦區既不在左邊，也不在右邊。如果有某個男人或女人真的只用半邊腦思

考，那他不是重度殘障，就是不具備正常的生活能力。解剖學證實男人的腦和女人的腦確實有不同，但不同的地方在於兩條腦溝。其中一條位於額葉和頂葉之間，稱為中央溝（central Sulcus）。另一條位於顳葉和頂葉之間，稱為外側溝（lateral sulcus）。這兩條腦溝位於左半腦的部分，確實男長於女，而且是所有男人都比女人長。

謝天謝地，終於找到差異處！三十年來臆測多於實證的專家學者們都備受鼓舞。兩條腦溝之一的外側溝，尤其受到學者專家的青睞。外側溝結束於主管語言認知的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附近。美國神經心理醫師露安·布哲婷（Louann Brizendine）<sup>註39</sup>博士據此結論出：女性腦擁有較大、較發達的溝通中心。她在那本書名有點可議的暢銷書《女人的大腦很那個……》（*The Female Brain*）裡寫道：「女孩因為擁有較大的溝通中心，所以比她的兄弟健談。」

對此，應該不只有我這個嚴重比兩個妹妹愛說話的哥哥感到懷疑吧。首先，韋尼克區並不是腦中唯一的溝通中心，而是很複雜的神經網路的一部分。其次，誰說腦溝的長度一定就跟功能的強弱有關。實際生活中，我們真的見過語言天分極高的男性溝通專家和即席翻譯官，也見過語言能力很差的女性，那這些人是怎麼了？

好不容易找到解剖學上的證據，雖然差異很小，但還是可以拿來證明男女有別。專家學者的一番苦心不難理解。我們常聽到的臆測還包括，女人的語言天分較男性佳，男人的抽象能力比女人好。如果這是真的，一定也跟我們的感覺及思考方式有關。只可惜，單藉觀察腦溝無論如何都無法證實上述的臆測。

有關男女空間能力的測驗同樣大有問題。雖然藉由核磁共振成像，我們可以看見在回答某些問題時，有些女人的腦袋會「繞路」，即需要額外用到其他腦區，而男性不需要。但據此論斷，男性的空間思考能力絕對優於女性，未免太過武斷。雖然經過許多測試後，女性的表現平均較男性為差，但不可否認的，有些男性的表現也很離譜，尤其是在三度空間的應用上。

二十五年前，進一步的男女腦差異被發現時，大腦科學家和演化心



理學家莫不額手稱慶，這次發現的是胼胝體（Corpus Callosum），一個位於左、右兩半腦之間，不大，卻非常重要的聯結，所以胼胝體也常被稱為「橋樑」。胼胝體之所以一夕成名，全拜一九八二年細胞生物學家拉蔻絲烏坦辛（Christine De-Lacoste-Utamsing）和人類學家哈羅維（Ralph L. Holloway）兩位專家在學術期刊《科學》上發表的研究成果。其實在他們之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神經解剖學家賓恩（Robert Bennett Bean）<sup>註40</sup>就已指出，胼胝體乃男女差異的重大指標。賓恩的研究原本想證明，美國黑人的左右半腦聯結較美國白人為差。但在密西根大學任短期客座（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時他同時發現，男女胼胝體並不一樣大。

根據拉蔻絲烏坦辛和哈羅維的研究，胼胝體由二億條神經纖維組成，女性的胼胝體後方較男性為粗。胼胝體的形狀很像古董電話的聽筒，不僅外形，就連功能也像。左右半腦得靠胼胝體來相互聯繫。如果拉蔻絲烏坦辛和哈羅維的研究沒錯，那麼女性兩半腦的聯結性應該優於男性。結論呼之欲出，在感情與理智的整合上，女性絕對優於男性，所以女人的直覺能力一定比男人強。此外像「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的能力，同樣奠基於左右半腦的聯繫，想當然耳也是女性優於男性。

以目前的觀點來看，拉蔻絲烏坦辛和哈羅維的研究結果可以被引用那麼多年，實在不可思議。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僅大腦科學家一窩蜂的跟進，還啟發了無數暢銷作家的靈感，例如前面提到的《腦內乾坤》。這兩人的研究原本取樣於二十八顆腦，但他們卻只根據一半的樣本作出結論。自一九八〇年代起，胼胝體的研究蔚為風潮，也展開了一場科學界的鬧劇，胼胝體幾乎是聲名狼藉。有人想更明確的證實女性胼胝體的後方確實比男性粗大。有人主張，女性胼胝體其實是整個都比男性大。但也有不少人反對，他們要證明，胼胝體還是男人的大！另外有一群專家，而他們是今天的大多數，根本就找不到男女胼胝體的差異。

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相信男女心智差異可藉由腦區定位（就像在地圖上畫標記一樣）來確認，未免太過天真。我們的心智能力，比方說語言，是如此複雜的一種現象，絕非單靠定位於腦溝或某一



束神經纖維就能解釋清楚。無論是說話、寫字、理解語句、掌握上下文、學習文法，或體會外語的語境，這所有的心智活動都是集許多腦區共同作用的複雜過程。即便未來有一天，我們真能對此過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還是不能忘記，我們的語言能力始終關係到生物稟賦、兒時影響，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各種正面與負面經驗，以及諸多其他因素。藉腦神經解剖學找到的差異雖然很可能是因素之一，但絕非像某些人主張的那麼關鍵或重要。

打個比方來說，要在腦子裡為人類的心智功能定位，就像要一個不懂電腦的門外漢打開電腦主機，在一大堆零件中找出運算程式一樣。那些數量越來越多、企圖要我們相信男性腦及女性腦不一樣的書籍，可靠性令人懷疑。

針對男女腦袋大不同發表議論且引申過度的大師，當屬英國的西蒙·巴隆科恩（Simon Baron-Cohen）<sup>註41</sup>。如果你覺得這名字很熟，可能是因為他有個全球知名的親戚薩夏·巴隆科恩（Sacha Baron-Cohen），也就是主演電影《芭樂特：哈薩克青年必修（理）美國文化》

（*Borat*）的喜劇演員。西蒙·巴隆科恩既不是喜劇演員，也不是學術騙子，他是個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自閉症專家。但他那本大受歡迎、探討男女腦袋的暢銷書《基本差異：男女的腦袋以及關於自閉症的真相》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Male and Female Brains and the Truth About Autism*）頗有可議。西蒙·巴隆科恩並非大腦科學家，他是劍橋大學的心理系教授。對於男女的不同，他的解釋相當簡陋。胎兒在母體內分泌的男性荷爾蒙越多，大腦結構就越偏離「標準模式」（也就是女性模式）。分泌量在一定的範圍內，胎兒就會長成典型的男性，如果分泌量過多則會形成障礙，變成自閉症。患有自閉症的人不太能或甚至完全不能設身處地體會別人的感覺。他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至於正常人是介於原本的女性狀態和自閉症之間。

巴隆科恩若說得沒錯，男人的腦袋應該跟女人的腦袋迥然不同。但這並不代表男人比較差。女人雖然有完美的「共感腦 / 充滿同理心的腦」（縮寫為「E腦」），但男人因為會分泌男性荷爾蒙，雖然一定程度的自閉（在健康的範圍內），但也因此較具系統天分（亦即擁有「S

腦」）。巴隆科恩認為，這種差異在嬰兒時期就已確定。一歲大的小女孩喜歡看真人的臉，看的時間也比較久。但同齡的小男孩偏好看手機上的人臉影像。結論就是，我們應該相信男人和女人真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動物。但是，荷爾蒙到底會對我們產生哪些影響？影響有多深？荷爾蒙真能徹底改變我們、完全控制我們？讓男女大不同，思想、感情、嗅覺，甚至連愛的方式都不同嗎？

## 荷爾蒙

人類的性別原來有三種。男性源自於太陽，女性源自於地球，最完美的是半男半女的球形人，他們源自於月亮。球形人具有宇宙間最完整的性別，他們有四隻手、四隻腳，前後各一張臉，也就是一顆頭上有兩張臉。球形人乃完美的。他們能以翻筋斗的方式極快速的往前滾，還能瞬間轉向，動作敏捷、靈活到難以想像。除了體能強，思想上更是登峰造極。但有一天他們突發奇想，竟想攀上天界攻擊眾神，天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眾神之王宙斯不得不出面阻止。「因此，我現在，」宙斯說：「要將他們一分為二，讓他們變弱，這同時也對我們更有利，因為他們的人數將變多，並且用兩條腿站著走路。如果他們還繼續行褻瀆之事，不肯安分，那我就再將他們劈開一次，」宙斯說：「讓他們只能單腳跳躍前進。」於是宙斯像切水果一樣將球形人劈開。自此以後人類便分男、女，雙腳站立行走，並時時渴望尋獲自己另一半的性別。渴望找到另一半的欲望就叫作愛（Eros）。

這是一則很有名的神話。西元前三百八十年，柏拉圖在《饗宴》（*Symposium*）中對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講述這則有關球形人的故事。顯然柏拉圖並不相信故事的真實性，但他似乎也不太熱中這方面自然科學的解釋。柏拉圖跟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不一樣，柏拉圖認為我們無法從事物本身掌握到真理，而必須透過更高的理型。但男人和

女人，以及發生在他們之間的吸引力，對柏拉圖而言似乎無法用合邏輯的方式來掌握，所以他才會以神話故事說明。

柏拉圖的球型人神話，如今有了相呼應的生物學解釋。這些生物學解釋與古老神話之間有共通性，但也有差異性。它們最大的共通處在開始的階段。胚胎在母體中原先只有一種性別，雖然聽起來很像是神話，卻千真萬確。所有的人類一開始只有一種性別，而且全都是女性。宙斯那導致男女有別的一劈發生在懷孕第六週。此時胚胎除了X染色體之外，還可能跑出一個Y染色體，Y染色體能讓胚胎長出男性陰囊和分泌男性荷爾蒙睪丸激素（Testosterone，或稱「睪固酮」）。但擁有兩個X染色體（沒有Y染色體）的胚胎不會發生上述變化。

造成男女差異最重要的化學物質是男性荷爾蒙睪丸激素。雖然女性的腎臟腺皮質也會分泌睪丸激素，但分泌量極明顯的低於男性。睪丸激素是最重要的一種男性荷爾蒙，能促使精子成熟，讓男性長出陰莖和陰囊，體毛較濃密，會長鬍鬚，肌肉和骨骼也較大多數女性強壯。至於心理上，睪丸激素的分泌量增加時，性欲會提高，行為也會比較積極主動，甚至出現強勢的領導行為。

以上這些生理特徵和心理特質的出現，是因為人類腦中有睪丸激素的受體（或稱「感受器」）。從在母體開始，胚胎就會在睪丸激素的刺激下形成特殊的神經細胞及神經束，男女皆然。獼猴實驗證明，睪丸激素對情緒、記憶和天生的性欲行為，有很深的影響。而睪丸激素與攻擊性及領導行為之間的關係異常複雜。獼猴在領導猴群時，睪丸激素的分泌量並不會一直維持在高峰；一旦牠要展現或爭取領導地位時，睪丸激素就會飆高到十倍，甚至更高！人類的情況很可能也是這樣，睪丸激素的分泌量並非單純取決於先天的生物條件，還深受後天的生活環境及突發狀況影響。

造成男女差異最主要的腦區或許就是下視丘（Hypothalamus，又稱「下丘腦」）。大小如碗豆，下視丘可謂是「腦中之腦」。下視丘位於間腦，主管自律神經系統，負責調節體溫和血壓，控制飢餓感、睡意和性欲。下視丘裡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內側視前核（Nucleus praeopticus

medialis），男性的內側視前核明顯大於女性的。內側視前核在男性的攻擊性與性欲上，似乎扮演著關鍵角色，而攻擊性與性欲又常密不可分。

不只自律神經系統上有睪丸激素的受體，作用旺盛的大腦皮質也有睪丸激素的受體。某些腦神經解剖學的研究結果顯示，男女的腦幾乎沒什麼差別，那麼導致兩性差異的會不會是受體？

這個問題實在很難回答。大腦科學家雖然大多認同，男性或女性荷爾蒙對思考能力有影響。但荷爾蒙到底怎麼對思考能力產生影響？影響程度有多大？這些問題尚無法釐清，也無法證實。最有名的實驗就是空間想像力的實驗，結果顯示男性的空間想像力較強，許多科學家據此推測，關鍵應該就在睪丸激素的分泌量（男高於女）。但諷刺的是，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的心理系教授多琳·木村（Doreen Kimura）證明了，睪丸激素分泌量低時，男性的空間想像能力較佳，睪丸激素飆高時，空間想像力卻會降低。如果木村教授的研究沒錯，那麼演化生物學之前主張，「猛象獵人擁有超級肌肉，既是狩獵高手，也是空間天才」，這種說法頓失立論基礎。無怪乎，許多一流的數學家並沒有像演化生物學家認為的是外表男性特質較顯著的人。情況甚至剛好相反，比較像我們在學校時期看到的，數學資優生常顯得體能較弱，精力旺盛的飛車男孩成績並不理想。

西蒙·巴隆柯恩所提出的解釋模型：越男性化的男人，空間能力越強，這樣的立論基礎非常薄弱。另外，越女性化的女人，越不會開車，但越有同理心，這類看法同樣值得懷疑。無論女性荷爾蒙，例如雌激素和黃體素會對思考造成什麼影響，它們都不會癱瘓女性的空間智能，也不會讓女性變得較多愁善感、較健談。

許多重要的荷爾蒙確實男女有別，這不容置疑。但切莫忘記一點，男人和男人之間，女人和女人之間也存在著相當大的荷爾蒙分泌量差異。所以，基本上很難斬釘截鐵的說：「男人就該是這樣！」「女人就該是那樣！」就算荷爾蒙濃度和下視丘的荷爾蒙受體數會造成兩性差異，而且是目前所知最可靠的差異原因，但我們還是不能就此太快或太

跳躍的做出結論。荷爾蒙和下視丘的差異不能證明思考能力一定會有差異，也不能進一步導致出其他結果。如果有人說：「只要你告訴我，你的荷爾蒙分泌狀況，我就能告訴你，你是哪一類型的人。」這種判斷的準確性肯定不高。上述的獼猴實驗告訴我們，環境和狀況會影響我們的荷爾蒙分泌量。根據荷爾蒙分泌量就能判斷出個性，這種說法無異於：決定溫度的是溫度計。實在荒謬！睪丸激素分泌量高，的確有可能導致攻擊性強，但也可能引發自殘行為。什麼時候、在哪些情況下會出現哪種結果，根本說不準，完全因人而異。

沒錯，男女各有專屬的荷爾蒙組合，在荷爾蒙的分泌上男女不同。終其一生，男女的荷爾蒙週期也不相同，懷孕和更年期的荷爾蒙變化對女性影響巨大，但男性似乎就沒有這麼直接和明顯。無怪乎，男女的性欲本能也不盡相同。主管男性性欲的是腦中的內側視前核，女性則是腹內側核（Nucleus ventromedialis）。

所以兩性不僅荷爾蒙不同，腦內的關鍵部位也不一致。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說男女在性欲行為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差異。許多女人的性欲表現，若根據那些主張男女大不同者的標準，簡直男性化到不行，她們喜歡一夜情，樂於嘗試各種性伴侶。有些女人即便名花有主，還是抗拒不了魅力男人的誘惑（可不是為了跟他們生孩子，以取得他們的基因）。相反的，也有很多男人真的是安分守己的好爸爸，他們根本不像那些人所說的，一看到美女就想撲上去。

至今，我們對男女的忠誠行為和外遇行為依舊所知不多。要做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困難，試問誰會毫無顧忌的告訴科學家自己有沒有出軌過？根據金賽性學研究的估計，一九五三年，美國大約有百分之五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女人有過外遇。到了一九七〇年，一份問卷調查顯示（受訪者是八千名已婚的美國男女），有百分之四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六的女人至少有過一次婚外情。一九八七年的《海蒂性學報告》（*Hite Report*）結果為，百分之七十五的男性和百分之七十的女性曾對伴侶不忠。不管有多少人針對這些數字發表過高見，這些數字代表的其實只是美國各階段的社會狀況，而非「人類」共同的生物狀態。

說來有趣，男人真的不總是做出典型的男性行為，女人也不總是做出典型的女性行為。如果說，男女因為不同的遺傳條件與荷爾蒙，而有既定的行為方式和遊戲規則，那麼豪放女是怎麼一回事？宅男又是怎麼來的？

那些「男女諮商教室」的困境在於，過分高估了荷爾蒙化學作用的威力。「全都是化學作用！」諮商師武斷的下此結論。照此邏輯，我們也可以說一切都是物理作用！因為沒有物理作用力的推動，哪來的化學作用？一切只是化學？即便人類的情緒反應是化學作用，但哪個是電源開關？哪個是光？這些都尚未釐清。心理或許不能完全影響荷爾蒙分泌，但沒有那些心理反應，我們不可能愛上一個人，也不可能想要與他（她）廝守。

決定男女差異的並不只有下視丘和荷爾蒙。在實際生活中，男性荷爾蒙、女性荷爾蒙、生活經驗、對各類型異性的看法，所有因素會共同作用、難分彼此。我們的性別行為和自我認知絕非只是生物現象，還跟「文化演化」有關。如今的女人偏愛男性體香劑遠勝於男人腋下的粗獷味，如今的女人大多推崇「有文化」的男人剪得乾淨清潔的指甲，許多男人也對踩著高跟鞋的女性趨之若鶩，可見有時候文化因素的確會凌駕於生物遺傳因素之上。

男女的荷爾蒙不同，並因此形成差異，這是對的。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行為，絕不像有些理論描述的那般斬釘截鐵、涇渭分明，而是充滿了灰色地帶。大腦科學家在我們的腦子裡，找不到生物學家預設的控制性別行為的大腦「模式」。那些所謂的「模式」既不是特定的腦區，也不是特定的腦神經細胞或腦神經束。如果「模式」真的存在，它也一定是高度複雜的，絕非腦神經解剖學或各種大腦化學作用所能證實和解釋的。直到二〇〇九年，在探討和爭論「性別專屬的行為模式」時，依舊充滿濃厚的宗教味。

模式是否存在，簡直成了信仰問題。連帶的，根據模式所衍生的一切推論，比方說石器時代的狩獵男、採集女等等，也都成了信仰問題。不論專家學者將來要我們相信和學習的是什麼，或不是什麼，總之我們



的個人經驗、偏好，在生活中練就追求異性的策略等，同樣會發揮影響力。所以最關鍵的問題是：造成我們社會角色遊戲規則的究竟是生物條件？還是文化條件？

---

註37：或稱磁振造影儀，核磁共振成像也稱為磁振造影、核磁共振攝影。

註38：一八二四至一八八〇年。

註39：一九五二年生，成立了女性情緒與荷爾蒙門診，以腦部荷爾蒙分泌為重點，治療女性的情緒問題。

註40：一八七四至一九四四年。

註41：一九五八年生。

## 第五章 性別與性格

我們的第二天性

### 社會性別

「他永遠像剛搭了三十個小時的火車，髒兮兮，疲憊不堪，又皺巴巴的，只見他歪著身子，一臉失魂落魄，不停的在那兒踱來踱去，身體彷彿隨時隨地想找面看不見的牆靠上去。一小撮鬍鬚下，有張不知何故苦惱到不得不往下垂的嘴。」奧地利知名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sup>註42</sup>不喜歡這個看起來很神經質的年輕人，不過很多人奉他為偶像。佛洛伊德欣賞他那「既嚴肅又俊美，不時閃過一抹慧詰的臉」；瑞典文豪奧古斯都·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sup>註43</sup>盛讚他是「英勇的男性鬥士」；奧地利劇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sup>註44</sup>、德國威瑪共和時期重要作家庫爾特·圖霍斯基（Kurt Tucholsky）<sup>註45</sup>，都對他讚譽有加，就連希特勒也說他是個「有教養的猶太人」。

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一八八〇年出生於維也納，一輩子只寫過一本書，這本書出版時他才二十三歲。很少人像他具有如此殊異的精神狀態；他到底是瘋子、精神病患，還是難得一見的天才？他的著作《性與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乃二十世紀前半葉最受矚目的著作之一，許多人用嚴格的學術角度來審視它。一九三三年被納粹政府列為禁書前，總共再版了二十八次。這本書被列為禁書，並不是因為它的內容，而是因為作者是猶太人。

魏寧格在維也納大學求學時主修哲學與心理學。可想而知，大家對他的風評不佳，同學們都不喜歡他。他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博士論文《愛神與賽姬》（*Eros und Psyche*）。此論文的構想猶如一顆震撼彈。眼見西方的沒落迫在眉梢，二十二歲的魏寧格企圖要以超越藩籬、打破禁忌的方式來檢驗西方文明，並寫就一本末世預言。啟發他靈感的是華

格納的歌劇《帕西法爾》（*Parsifal*），這齣歌劇讓他找到了問題所在：「交媾乃男人為壓迫女人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男人跟女人發生性關係，並不是因為男人自己想要，而是想藉自己的生育能力來回報女人，並讓生命得以延續下去。一筆令人不恥的交易，魏寧格認為，這種交易必須盡快結束，方法就是：男人得徹底禁欲。魏寧格帶著這樣的構想來到佛洛伊德居住的山間小巷拜訪他。佛洛伊德讀完後，既讚歎又無法認同，這讓魏寧格深深受挫。回到維也納，他著手將原本的論文擴充為書，準備出版。一九〇三年六月《性與性格》問世。

這本書的問世就像一個徵兆。全書不帶任何歉疚，充斥著二十世紀初世界觀的典型偏見、陳腔濫調及仇恨心態。魏寧格一分為二的將世界分為善與惡。屬於善的有精神、道德和理智，其代表者就是男性。至於惡，屬於惡的有性欲和肉體，惡的代表者當然就是女性和猶太人。女性和猶太人都是低等的，受性欲所宰制，既愚昧又淫蕩。善的一方若想贏得勝利，唯一的辦法就是藉由「男性原則」（M-Prinzip，「M」代表「男性」）來徹底克服猶太氣質和女性氣質。這個世界需要的正是「新男性」。

但他自己顯然沒有加入新男性的行列。被各種沉重又負面的想法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魏寧格，來到了貝多芬死於施瓦茨巴尼爾街的房子，他租了一個房間。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門房發現二十三歲的魏寧格陳屍房中，子彈命中心臟。身為男性強烈的失落感讓魏寧格決定結束生命。

像他這樣因害怕女人而心理出現問題，因恐懼面對自身性欲而性格扭曲，因無法克服自卑情結而成為反猶太主義者的猶太人，難免會走上這一步。但那些一流的作家，例如卡爾·克勞斯和庫爾特·圖霍斯基，他們到底在魏寧格身上看見了什麼，為什麼會如此欣賞他？為什麼連佛洛伊德也覺得他出類拔萃？

最關鍵的一點或許在於，魏寧格大膽的為「生物」和「文化」搭起了一座橋樑。魏寧格認為，就生物學的角度而言，我們具有明確的性別角色。單憑這一點，這個性格乖僻的奧地利青年足以榮登第一位演化心

理學家的寶座。他甚至認為，編織和烹飪乃「女性的副性徵」，這主張同時也讓魏寧格的性別角色出乎意料的具有現代感。的確，連在物理系或數學系中，也都找得到喜歡下廚的男生和女生。魏寧格並不相信立論於腦溝和胼胝體的理論，也不相信演化模式，他只堅信男女雙性的理論。也就是說，不管男女，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另一種性別的特徵。而且他認為男性、女性的標準越清楚，「人」就會變得越不清楚。

這樣的觀念其實源自於柏林一位名叫威廉·弗立斯（Wilhelm Fliess）<sup>註46</sup>的猶太耳鼻喉科醫生。不過，這位醫生肯定不樂見魏寧格後來造成的巨大影響。根據弗立斯的觀點，年輕的心理學家兼哲學家魏寧格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性別理論。魏寧格認為每個人都是中性的，但因為個人傾向不同，有的人女性化傾向比較重，有的人男性化傾向比較重，所以才會有男、女之分。隸屬於生物學的只有生理上的性別構造，至於社會上的性別角色並不屬於生物學的範圍。魏寧格認為，我們每個人都試圖在性別中發現和找到自己。一個人渴望從「什麼樣」的異性那裡獲得性欲及情感的滿足，和我們自身的性別狀態很有關係；非常男性化的男人喜歡找非常女性化的女人，女性化的男人喜歡找男性化的女人，但最終還是會成為柏拉圖式的整體，魏寧格說，這就是吸引的法則。

只可惜，魏寧格還愚蠢的主張，兩性應共同致力於消除「女性」這種性別，讓它徹底絕跡。就是這個愚蠢的主張模糊了焦點，讓世人忽略他書中一項彌足珍貴的觀點，對於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區分。之後，什麼屬於男性化的行為，什麼符合女性化的行為，端賴我們如何去塑造和建構我們的「性別角色」。換作美國心理學家約翰·曼尼（John Money）<sup>註47</sup>於一九五五年所提出來的概念就是——塑造和建構我們的「心理性別」和「社會性別」（gender）。令人莞爾的是，將性別區分為「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的作法，竟讓魏寧格成了某種「理念」的開路先鋒，那就是他一向深惡痛絕且視之為無意義的女性主義。

# 我們是被塑造成的

其實，女性主義歷史悠久。但女性主義者肯定沒料到會出現魏寧格這樣的人物。無論如何，這位奧地利青年確實以極吊詭的方式啟發了女性主義的立論靈感。婦女運動的發軔，就時間點而言，最近可追溯到法國大革命，當時的訴求為自由與平等，而且是人人平等。既然人人平等，當然包括女性，雖然當時有許多革命宣傳家和參與者並不樂見男女平等。之後，工業革命進一步在十九世紀的父權社會中，為女性解放帶來更大的希望。早期的女權運動者，不乏女性社會主義健將。既然馬克思主張工人要向雇主爭取平等，且現代機械的發展有助於勞工獲得自由，那麼受益者當然也應該包括女性。不過，當時的人顯然還沒有想到要取消男女之間的差異，亦即取消心理學上所謂的男、女角色。所以，女人還是女人，男人還是男人，這樣的區分保留了下來。唯一該廢除的是，由一方統治另一方。

無論如何，將某些行為歸諸典型男性或女性的，這種區分在兩性之間畫下一道涇渭分明的鴻溝，這在魏寧格偏激的著作發表之後，逐漸成為議題。「女人是形成的，不是生成的。」一九四九年，法國女哲學家暨女權運動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sup>註48</sup>在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寫下這句名言。波娃這本書帶給後世鉅大的啟發；達爾文視之為演化的過程，在波娃的眼裡，不過是女性主義的發展歷程。魏寧格堪稱綜合了各種批評與觀點的雜燴之作，儼然變成了女性主義者遲來的立論基礎。但波娃不太可能讀過魏寧格偏執的見解，因為到了一九七五年《性與性格》才有法文譯本。巧的是，兩人有許多看法不謀而合。比方說，魏寧格說過：「陽具，是導致女人無法絕對、徹底獲得自由的關鍵。」許多女性主義者應該會同意這句話，即便未必同意他接下來的那句：「女性是不自由的，她們終究得受制於生理需求，渴望被一個男人或甚至所有男人強暴。」

但無論如何，在魏寧格之後，最遲到西蒙·波娃，已提出區分人類

的生物角色（性〔sex〕）和社會角色（性別〔gender〕）。套句約翰·曼尼的話：「性別角色（gender role），此概念乃統稱一個人為了彰顯自己身為男人或男孩的形象，身為女人或女孩的形象，而表現出來的所有言行舉止。」然而我們能對生物角色和社會角色做出多大的區別？這兩種性別角色之間又有什麼密不可分的關係？

人真的可以自由塑造自己的角色嗎？可以想要成為男人就成為男人，想要成為女人就成為女人？還是，打從一開始，生物上的性別就決定了一切？針對這一點，演化心理學家和女性主義者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前者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定的；後者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是既定的。

保守派堅稱，小男孩傾向於玩機械式的玩具，例如積木或樂高玩具等，小女孩偏好玩洋娃娃或跟人際關係有關的社交遊戲。男孩子脾氣較粗暴，女孩子較溫和。根據巴隆科恩的嬰兒試驗，女嬰明顯對人的臉孔較感興趣，男嬰對會動的玩具反應較強烈。直到今天，從事人際關係相關工作的大多是女性，從事技術相關工作的大多是男性，至少在西方國家是如此。雖然如今男女衣著不像五十年前差別那麼大，但直到今天，打領帶的女人還是少見，化妝的男人更是難得。

或許職業別和流行服飾會受社會因素影響，但幼兒的遊戲偏好呢？尤其是以嬰兒為實驗對象的研究結果，又該怎麼解釋？為什麼愛好電玩，尤其是「第一人稱射擊遊戲」（First person shooter）的絕大多數是男孩？為什麼女孩比較喜歡拿起手機講電話？

以上都是企圖消弭「生物性別」的女性主義者必須面對的難題，所幸美國文化哲學家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sup>註49</sup>在她女性主義經典之作《性別風波》（*Gender Trouble*）中提出了解決之道。巴特勒要反駁的不僅是生物性別，還有男性與女性的概念。她認為，根本不存在本體論上的「男性自身」與「女性自身」，它們只是「建構」和「詮釋」的產物。或許男孩的確對科技方面的東西比較感興趣，但這不能得出結論：科技或男孩是男性化的。我們的社會慣於遵從刻板印象或是草率歸類。這種無時無刻不在區分兩性的作法並沒有意義，追根究柢，它源自



異性戀男人的幻想。何謂「男性（化）的」與「女性（化）的」？坦白講，沒有人能做出絕對客觀的判斷。二者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概念或解釋。所謂的生物性別，亦即一般理解的男人或女人，事實上只是一種語言及文化上的「發明」。

當我說對方具有某些特性時，我所說的不過是一種詮釋，此想法源自法國哲學家傅柯。「性別自身」這種實體並不存在，此想法源自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sup>註50</sup>。巴特勒將二者合而為一，她說：「性別指的並不是我們具有什麼，而是我們做了什麼。」意思是，就算我們沒有特定的行為方式，別人也會用特定的方式來解釋我們的行為。只要男人和女人尋常的表現自己，就等於不斷在塑造男人和女人是什麼。

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是演化心理學的天敵。根據基因自私的論點，性別的根本任務在於繁殖。一切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方式，都是為了有助於性交與養育後代。除此之外，均不符合生物學意義。於是，性別和社會行為被迫互為因果。一旦二者之間出現矛盾，例如不願生小孩的夫妻、同性戀者、變裝癖者、變性人、熱烈追求已停經女人的男人，或自願結紮的年輕男子……，演化心理學就踢到了鐵板。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嚴重違反生物原則的行為？用生物學的角度來解釋社會性別角色，立論根據薄弱。但是演化心理學家和女性主義者，又不可能同時都是對的，結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雙方都很堅持立場，要不「一切都是天生的」，要不「一切都是後天造成的」。

一邊以茱蒂斯·巴特勒為代表，一邊以西蒙·巴隆科恩或大衛·巴斯為代表，兩邊歧見之深，彷彿雞同鴨講。演化心理學家一開口便是荷爾蒙、大腦功能和統計數據。但茱蒂斯·巴特勒會反駁說，大腦功能是我們自己「建構」出來的，至於針對性別角色做的統計分析無異於「語言遊戲」。她會咄咄逼人的質問巴隆科恩和巴斯的追隨者，「男性」和「女性」到底所指為何？只見演化心理學家面露輕蔑的微笑，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樣，邊搖頭邊回答：「這有什麼好問的？」

對演化心理學家來說，世人認定典型的性別行為是人類自石器時代

以來具備的「生物模式」，但對女性主義者而言，它只是近代「社會建構」的產物。回顧一下歷史發展，會發現一項有趣的事，這兩派學說發軔於同一時期，二十世紀六〇年代末期。一九六八年的學運撼動了許多原本理所當然的想法。影響所及，男人與女人的議題同樣亟需一個全新的意義與秩序。在一片混亂中，當代的女性主義研究、社會學和演化心理學，紛紛展露頭角。為對抗當時從生物學角度出發的世界觀，女性主義喊出了口號：「生理結構並非宿命！」但演化心理學家也不甘示弱的反駁：「才怪，性別行為是大自然所賦予我們的！」

這是雙方多年來壁壘分明的原因。其實這兩派理論各有其立論上的弱點。以生物學為基礎的觀點，對「自然」的理解太過簡單。如果說性別行為都是大自然所賦予，之前就得先知道什麼是「自然」。只可惜，我們對「自然」的看法只停留在人類自己的設想；我們對自然的看法並非什麼實體攝影，而是人類自己的闡述與解釋。我們根本無從得知什麼是「自然自身」。我們所知道有關自然的一切，全是人類勾勒出來的圖像。

這也正是茱蒂斯·巴勒特等女性主義者最愛強調的一點：一切都只是我們的解釋，一切都只是我們的認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沒有錯，但同樣有其限制。若把每個生物學的結論都歸為個人詮釋或文化模式，最後一定會陷入荒謬。理論上，可以把每個關於世界的看法說成是「語言遊戲」，一以貫之的推下去，結果就連我們自己的看法也不過是一場無謂的語言遊戲！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有一批獨領風騷的法國哲學家便這麼做過。他們企圖「解構」人類的邏輯、思考模式與信以為真的事實，那一波熱潮可謂哲學界的最後絕響。幸好（實在不得不這麼說），這種遊戲玩到最後，不但哲學家自己厭煩，連觀眾也不捧場。如今，「解構主義」算是完全過時了。

人的性別角色是否一生下來就已經確定？這種問題的重要性會不會被高估了？無論是主張沒有什麼是天生的，或堅稱性別認同取決於生物因素，都失之偏頗。答案或許介於兩者之間：有天生的，那只是我們的性別，不是我們的認同。比方說男同性戀者喜歡的是男人，所表現的行為就未必是生物學上典型的男性。變性人就更不用說了。或許可以達成

一點共識：性別乃生物上天生的（可以改變），但認同是一種「作為」，必須藉由習慣、感覺和自我理解逐漸形成。所以，生物性別雖然是天生的，但要不要讓它具體「呈現」出來，怎麼讓它呈現出來，全操之在我。

女性主義者應該會支持這種看法，演化心理學家則未必。將「性別」和「認同」區分開來，對演化心理學的理論而言是一大打擊。他們無法接受社會性別和生物性別之間的聯結如此鬆散。無怪乎，演化心理學家會把西方社會越來越多樣化的性別角色，看成是一種問題，甚至是一種退化。唯一能讓他們感到安慰的是，別管這日趨怪異的西方社會了，何不放眼天下？瞧，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不都一樣？如果每個地方的兩性行為都很類似，或甚至一模一樣，怎麼能說它只跟「文化」有關呢？

## 薩摩亞

她是那個時代最受崇敬的女性學者之一，出版過四十本書，每一本都翻譯成多國語言。總共有二十八所大學頒發榮譽博士給她。她企圖證明，性別形象有多種可能，我們的性別形象只是當中的一種，而且男女關係不一定就像西方文明所認知的那樣。她發表過上千篇相關的學術論文。在六八學運中她是眾人的偶像，尤其是她那幫志同道合女鬥士們的偶像。她的竄起猶如傳奇，但她的殞落更是戲劇化。

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九〇一年出生於美國費城，是五個小孩中的老大，父母的政治立場傾向民主。就讀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她是名教授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sup>註51</sup>最鍾愛的女弟子之一。法蘭茲·鮑亞士乃德裔美國民族學家，當時享譽國際。他證明了北美印地安人是從亞洲跨越白令海峽遷移至北美。接下來他想研究的是印地安文化、伊努特（Inuit）<sup>註52</sup>文化和玻里尼西亞文化。法蘭茲·鮑亞士

派瑪格麗特·米德前往太平洋玻里尼西亞群島的薩摩亞時，米德才二十三歲。在西方人的想像裡，玻里尼西亞群島就像是一則神話，它是純真的樂園、性幻想馳騁的天地。米德隻身前往薩摩亞，開始了她的田野調查。鮑亞士交付米德的研究任務是：薩摩亞少女的青春期的青春與美國少女相同嗎？到了當地，米德寄住在一個移民到薩摩亞的美國家庭中。為了跟她的研究對象溝通，米德每天學習一個小時的當地語言。米德找了二十五位年輕的薩摩亞女孩進行訪談，她花了半年的時間詢問並記錄她們的感受和經驗。後來她將研究成果寫成《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書，在當時的學術界造成轟動。

這本書的結論是：薩摩亞人的青春跟西方人的截然不同。薩摩亞的少女無論是在自我關係、與男性的關係，或與大自然的關係上，都可說是水乳交融、完美和諧。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美國少女會遇到的青春問題，如角色衝突、壓力和焦慮等，對薩摩亞少女來說都是陌生的。原因很簡單，薩摩亞男人不會壓迫女人，而是公平的對待女人，所以那裡的生活真可謂無憂無慮。

米德的老師法蘭茲·鮑亞士對這樣的研究結果非常滿意。因為在二十世紀初，乃至今天，「先天／天生的」（nature）還是「後天／教養的」（nurture），這個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演化心理學家今天所堅持的立場，很像當初的達爾文極端主義者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反對他們的人，比方說鮑亞士，正醉心於行為研究的新興學派，即「行為主義」（Behaviorism）<sup>註53</sup>。鮑亞士的論證方式非常現代化，他認為：如果人類所有的角色行為都是天生的，那麼世界上就不該有明顯的例外。但問題是，世上存在著差異極大的各種文化，這該怎麼解釋？米德那本有關薩摩亞文化的書剛好印證了鮑亞士的假設，並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據：各文化之間的確存在極大的差異，尤其是在男人與女人的角色上。

瑪格麗特·米德迅速竄升為學術界的明星。之後她又前往新幾內亞研究當地的文化。結果如出一轍，她再次證明，當地的性別角色同樣與美國的大不相同。於是，原本被許多專家學者視為「理所當然」的男、女行為，現在起都得歸因於各種不同的文化因素。此後，不管她到哪裡進行田野調查和研究（包括峇里島和另外七個南太平洋小島），結論都

是：性別行為的確有文化差異。米德的學術生涯一路順遂，屢獲殊榮，學界爭相頒予她各種頭銜與獎項。她既是享譽國際的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教授，又是美國人類學學會的主席。

一九八一年，也就是米德過世後三年，其聲望跌落谷底。肇因是紐西蘭人類學家德雷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sup>註54</sup>的一本書，德雷克·弗里曼是一位深受肯定的薩摩亞專家。弗里曼比米德晚了十五年到玻里尼西亞群島，他先在那裡停留了三年，也就是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除了在那裡教書之外，他還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甚至被當地人尊為酋長。一九四三年他自願回到紐西蘭服役。之後又去了婆羅洲，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他重返薩摩亞，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研究當地生活。他很震驚的發現，米德的研究跟他觀察到的事實完全不符。就弗里曼接觸到的，薩摩亞是一個完全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他認為米德書中的描述，有關薩摩亞社會的多情與浪漫，根本是米德的誤解與偏見。弗里曼的研究結果奠基於四十年的實地考察，因此他的看法一出，立刻讓米德在學術界的聲望一落千丈，並引發了人類學史上最激烈且盛大的一場論戰。弗里曼對米德的攻擊毫不留情。年紀輕輕的女學生瑪格麗特·米德根本不懂當地語言，其研究自欺欺人，她一廂情願的將她的世界觀套用在薩摩亞人身上，所以才會只看見她想看見的。

弗里曼的攻擊切中要害。的確，瑪格麗特·米德一開始就設定了想要的研究結果：「我們要讓大家知道，人類的天性具有極強大的適應力，所以文化脈動比生理脈動更具強制性……。我們將證明，人類性格的生物基礎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是會改變的。」有了這樣的既定想法，難怪米德發現的全是她想發現的，她壓根就沒想過要找到其他的。

瑪格麗特·米德被推翻了，這是演化心理學家求之不得的事。看看吧，唯有藉助於伎倆和膚淺的信念，才能大言不慚的欺騙世人說：世上某些地方的兩性文化與西方國家的有著天壤之別。演化心理學家洋洋得意的宣稱，真相其實是：世界各地的男女角色和行為法則都很類似。

如果說米德在研究薩摩亞文化時充滿了預設立場，那麼試圖推翻米德的人也同樣如此。的確，當時年紀輕輕的米德在研究薩摩亞文化時或



許力有未逮，但用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二〇年代的研究結果，這是否公平？也難怪米德的表現會顯得不合格。事實上，米德的學術成就不侷限於薩摩亞研究上，她後來的許多論文，就各方面而言，都相當嚴謹、詳盡，並且獨具創見。就算米德研究薩摩亞少女的著作是她學術生涯上的一大敗筆，這不代表其反對者的主張：世界各文化的性別行為都極為相似或相同，就是正確的。

## 自我概念

米德的例子讓我們了解，人類的性別行為越固定、典型，就越符合演化心理學家的期待。他們會說，縱使沒有數以億計的人行為方式雷同，也有數以百萬計！如果世界各地的女人都表現得像女人，男人都表現得像男人，背後肯定有某種既存的生物因素。因為，若有數以億萬計的人都在扮演同樣的社會角色，那麼除了生物因素之外，還能找到其他的原因或意義嗎？為什麼文化因素不讓眾人的角色模式相異而是相似呢？

這樣的論調乍聽之下很有說服力，一直以來也廣為大眾接受。若能進一步探究性別行為是如何形成的，就會發現光靠「生物程式」這塊招牌還不夠。我們從小就一直學習當個小男生或小女生，並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建立自己的性別認同，藉由觀察父母、兄弟姊妹、幼稚園和學校裡的同學來學習性別行為，透過不斷的嘗試，一點一滴摸索出自己的性別角色。有時我們會全盤接受從環境中看到或學到的，有時我們又會反抗它，甚至拒絕它。不管是複製或排斥，藉由這種方式逐漸建立屬於自己的認同。有些男孩傾向於仿效母親的性別行為，有些女孩喜歡模仿父親。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父母、與父母的關係，一輩子影響了我們的性別角色，其力量之大，遠超過任何一項生物程式。

支持這種想法，且試圖用殘忍的方式證明其正確性的，就是前面提



到的約翰·曼尼。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也是社會性別概念之父。一九六七年，這位心理學家正值四十幾歲的壯年，他主導了一場大膽的實驗。大衛·利馬（David Reimer）二歲時因為割包皮發生意外，導致陰莖毀損。他的父母正徬徨無助、不知所措，恰巧看到電視上約翰·曼尼在接受專訪，於是決定求助這個知名的心理學家。曼尼接受了他們的請託，決定協助他們。由於深信是社會因素決定了人類的性別認知，所以他建議大衛的父母，把大衛當女孩子來養。於是大衛變成了布蘭達（Brenda）。除了幫大衛摘除睪丸，還做了人工陰道手術。在學界與媒體的關注下，布蘭達逐漸長大，並成為一個典型的女孩。這樣的結果令曼尼志得意滿，女性主義者更是對他推崇備至。可惜一如米德的薩摩亞事件，大衛案同樣讓曼尼顏面盡失。到了青春期的布蘭達發現自己完全找不到歸屬感。男孩子嘲笑她，女孩子無法接受她。後來，布蘭達知道了變性事實，她強烈排斥這個被人設定的女性角色。他決定恢復自己原本的性別，除了將名字改為大衛外，還接受了荷爾蒙治療和相關的外科手術。可惜人生並沒有從此幸福快樂。三十八歲，大衛·利馬決定結束他無所適從的一生。

大衛·利馬的遭遇是一則悲慘的故事。聽完後會暗自竊喜的大概只有演化心理學家，他們會點頭如搗蒜的說：天生的性別角色是不容人為干預的！但除此之外，或許還有其他合理的解釋。很明顯，布蘭達的問題在於別人不接納她。

就許多方面來看，性別角色並非絕對，而是相對的，因為它始終關係到他人對我的看法。世人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在伊斯蘭馬巴德跟在柏林肯定不一樣，原因不是大腦結構、基因或荷爾蒙。文化會形塑我們的性別認同，無須動用到宗教或民族歷史的力量。連動物界都有可相比較的例子。德國大腦專家、哥廷根大學教授蓋拉德·許特（Gerald Hüther）<sup>註55</sup>指出：「一匹馬喝斑馬奶、跟著斑馬長大，後來會比較喜歡跟斑馬群在一起，而非馬群。所以，並沒有一項內建在這匹馬體內的遺傳程式會告訴牠：『你是一匹馬！』反而是出生後，早期發展所累積的各種經驗會在牠的大腦中建置聯結。」

毫無疑問，人類一生處在「可塑」狀態的時間要比馬長。我們跟父

母、親戚、朋友以及其他認識的人，彼此之間的互動方式有無限的可能，並會形成無數的經驗。相較於此，源自石器時代的遺傳因素似乎變得無足輕重，而且總是擺脫不了那道難題：我們對原始人的實際狀況所知無幾，無法確定哪些行為是來自石器時代的古老遺傳。舉例來說，活在今天的人類，誰有辦法知道舊石器時代晚期住在石窟裡的克羅馬農人（Cro-Magnon），或在衣索比亞高原的直立人是否有同性戀者？

我們的「社會性別認同」不是非常固定，它可以改變，可以更換，而且還很容易。今天在西方社會，女人會穿裙子和洋裝，男人很少會這樣穿，但這跟生物遺傳沒有關係。裙子和洋裝有什麼生物意義？為什麼許多東方國家的男子穿的正是類似洋裝或裙子的長袍，而非長褲？在西方國家，化妝的大多是女人，這只是目前的情況！別忘了，巴洛克時期的男人也跟女人一樣撲粉、化妝；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其他地區，仍有男性化妝。

所以，讓我們盡情描繪「性別」的那張畫布不是生物，而是文化。每個性別角色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我們對自己的感覺和看法，決定了我們的認同。無論我們覺得自己是特別的男性化或女性化，這都與社會對男性化與女性化行為的看法密不可分。這也關係到我們內心的定論，評估自己有多男性化或女性化。人類總喜歡不斷的評估自己，包括自己的智能、幽默感、外表、能力或技術等。直到一九六〇年代，領有駕照的女性仍是稀有動物。不只男性認為開車是男人的專利，就連女性自己也相信，女人「天生」不適合開車。所幸，這樣的觀點已宣告陣亡；女性天生少了倒車入庫基因的神話終於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無數針對男女空間想像能力的測驗。對演化心理學家而言，測驗結果理所當然是：男人輕而易舉贏過女人，因為這是男人遺傳自遠古、從獵殺猛象起即具備的能力。姑且不論自冰河時期起即具備的方向感和空間感，是否因為年代久遠而無法展現在電腦三D立體繪圖上，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因素和自我概念影響了現代人這方面的能力；空間想像能力的發展史儼然是女性出頭天的勝利史。一九七〇年代，男人在空間想像能力上的表現，明顯優於女性，但最新研究顯示，兩性在這方面的能力已毫無差別了。據此或許可以推論，過去三十

年來，女性在空間想像能力上發生極驚人的遺傳改變。其實，更有可能的是，社會的角色模式改變了，相較於以前，今天的女孩和女人都更樂於從事立體繪圖工作。我們知道，在各種智力測驗中，自信一向扮演著重要角色。

結論是什麼？男人跟女人基本上沒有不同。許多重要的感覺和需求是相同，或至少是極為類似。我們有生物性別，它不單是「構造」而已。但是我們對它所知不多。一旦要證明我們的某些行為是天生的，就會令人困惑。（哪些行為是全然天生的？）箭毒蛙、灰伯勞和人類，三者所具備的本能行為，就性質而言並不相同。人類發展出豐富、多樣且高度的文化，所以和兩棲類及鳥類截然不同。

如果社會性別是由我們自己「發明」出來的，那麼兩性的愛情呢？愛情同樣也只是一種社會建構嗎？還是它有確切的生物基礎？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將瑪格麗特·米德和茱蒂斯·巴特勒擱在一旁，回頭看看那些滑稽的生物，比方說河馬，然後大膽提出乍聽之下離譜得可笑的生物問題：為什麼會有性行為？為什麼會有男人和女人？藉此或許能了解到，兩性的愛情並非由自私的基因所管轄。演化心理學家那套清教徒式的觀點：愛情源自於性，是為了長相廝守而產生的情感，也強烈遭到質疑。因為無論是為了性行為，或為了長期結合以撫育後代，都不需要愛情這項「發明」。

愛情，另有其來源。

---

註42：一八八一至一九四二，德語猶太作家，在二次大戰期間，為躲避納粹迫害流亡國外，輾轉英美，最後落腳巴西，一九四二年與妻子在里約熱內盧的家中自殺。知名著作有《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熱帶癲狂症患者》、《象棋的故事》、《灼人的祕密》、《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

註43：一八四九至一九一二，二十世紀瑞典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被稱為瑞典現代文學之父，也是近代劇壇大師之一，寫超過五十部劇本，如《父親》、《茱莉小姐》。

註44：一八七四至一九三六，奧地利劇作家，德語文學中的諷刺大師。當過演員、記者，後成為職業作家。主要劇作有《人類的末日》。

註45：一八九〇至一九三五，為改信新教的猶太人，擅長評論與諷刺文章。

註46：一八五八至一九二八年。

註47：一九二一至二〇〇六年。

註48：一九〇八至一九八六，法國知名女作家，被譽為二十世紀女權運動的先驅。《第二性》探討女性內心共同的本質，對當時婦運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引發一連串的女性主義運動。全書分二卷，第一卷「事實與迷思」，從宏觀面討論婦女的處境、權力及地位的變化，透過女性群體的角度思考問題。第二卷「女人今日的生活」，以微觀面的研究描述各種年齡、類型女性生理、心理及處境的變化。波娃一生與存在主義作家沙特維持伴侶的關係，兩人也是思想觀念上的夥伴。

註49：一九五六年生，二十世紀後半葉重要思想家，其理論著作在性別研究、酷兒研究領域有所貢獻；代表作《性別風波》或譯《性別麻煩》，提出「性別展演」和「展演性」，引起許多學者討論。

註50：一九〇一至一九八一年。

註51：一九五八至一九四二年。

註52：北美原住民之一，分布在北極圈周圍。

註53：二十世紀初起源於美國的心理學流派，主張研究可以被觀察和直接測量的行為，遵守科學共有的客觀性原則，使心理學在方法上日趨精確。

註54：一九一六至二〇〇一年。

註55：一九五一年生。

## 第二部 愛情是什麼？

### 第六章 達爾文的疑慮

是什麼將愛與性分開？

#### 為什麼有男人與女人？

海馬是一種很奇特的動物：圓滾滾的眼睛、喇叭嘴、捲曲的尾巴。這種海龍科的滑稽小魚，不僅「看起來」像大自然裡的一首狂想曲，連行為也跟外表一樣，很詭異。絕大多數的海馬分布在熱帶或溫帶海洋裡，牠們既安靜又善於偽裝。但每一年，牠們總會為動物觀察家提供好幾次獨特、令人大開眼界的交配秀。交配季，公海馬和母海馬會一大早就聚集在海草叢生的地方。選定伴侶後，海馬會互相勾住對方的尾巴，展開一場水中共舞。接著，母海馬開始在公海馬面前呈螺旋狀的上下舞動。最後則將產卵器插進公海馬腹部的育兒袋內，將卵產在裡面。這時，育兒袋內的組織會迅速的與受精卵產生聯結，並提供受精卵氧氣。經過十到十二天的孵育，公海馬會再次潛回海草中，誕出小海馬。

海馬真的很不一樣，非常的不一樣。海馬的演化重點似乎在於：牠剛好具備了跟其他動物完全相反的性別角色。雖然產卵的是母海馬，但育兒的工作卻交給了公海馬。喜歡太快下結論的人或許要說：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反正在海馬身上，一切剛好相反就對了。母海馬「專攻」求偶，公海馬「專攻」育幼。的確，有些海馬的近親，例如海龍，牠們確實如此。母海龍為了爭取到將卵產在公海龍腹中，的確使出渾身解數、爭奇鬥豔。但海馬不是這樣：母海馬根本無須為了求偶而競爭。這一點真教人跌破眼鏡，因為根據演化生物學的原則：孵化過程越艱辛，求偶競爭就應該越激烈。相較於海龍，公海馬孵育小海馬的過程倍加艱辛，犧牲也更大。既然如此，母海馬的求偶競爭應該也要比母海龍更激烈才

對！關於這一點，就連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家，同時也是全球知名的海馬專家阿克瑟·邁雅（Axel Meyer）教授都不得不說：「『父母的職責』與『角色扮演』的關係，顯然比我們之前假設的還要複雜許多。」

海馬的確很不一樣。無論是哪種海馬，絕大多數的海馬都是一夫一妻制，牠們廝守終身，唯有對方死了，海馬夫妻才會分開。而且，只要伴侶一死，另一方就會完全失去「性」致。對魚類而言，這樣的行為非常罕見。專家們觀察西澳洲的海馬發現，那裡的海馬夫妻通常體型相似。也就是說，海馬不太會去找體型比自己大或「更具生存優勢」的伴侶來交配，牠們幾乎全都傾向於追求體型跟自己差不多的伴侶；換句話說，體型類似的海馬比較容易結成夫妻。

我們從海馬身上學到，生物的「性別行為」不一定跟牠的「性別」有關。真正的關鍵在於角色；也就是說，無論雌雄，生物在交配、生殖及孵育下一代的過程中，牠所扮演的「角色」才是真正決定其「性別行為」的關鍵。性別行為似乎有了各種可能，一條規範著「什麼情況下，什麼條件下，雄性必然會如何，雌性必然會如何」的生物學基本法則，似乎不存在。其實海馬並非特例，跟海馬一樣，性別角色與一般動物相反的，還有巴拿馬箭毒蛙和摩門蟋蟀。若以這樣的觀點看來，所有的性別行為，事實上都只是角色扮演，而非單純的生物天性。不過，另一個範圍較小的事實卻指出，就五千五百多種哺乳類動物，尤其是當中兩百多種較高等的哺乳類動物而言，負責受孕和孵育下一代的清一色都是雌性，無一例外。

人類在繁殖下一代時，性別角色似乎固定，至少在自然受孕的情況下如此。即使藉用人工，例如人工受孕或將胚胎植入代理孕母體內，人類所遵循的生物法則基本上沒變，只是多了其他新的受孕方式。

但是，人類越將自己的性別角色視為理所當然，就越難掌握住其中的生物學要義。為什麼會有「兩」性？這簡直是個謎。直到今天都沒有一個好答案。一個生物學家，如果他夠誠實的話，就不得不承認：「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會有愛？關於這問題我知道些什麼？那麼我告訴



你，我甚至於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男人跟女人？」如果生物學家不先解決後面那個問題，就請他不要再動不動就拿「性」去解釋愛，或拿「性」去代替愛。

在還沒有解釋清楚「男人和女人」的問題之前，生物學界倒是先提出了兩個令人氣餒且不完整的理論。這兩種理論各有充滿想像力的名稱：一是「河岸灌木叢理論」（Tangled Bank Hypothesis，也稱「灌木叢理論」或「茂密河岸假說」），一是「紅皇后理論」（Red Queen Hypothesis，也稱「紅皇后效應」或「紅皇后假說」）。在介紹這兩種理論前，我想先說明的是，這兩種理論試圖要解決的都是極重要的問題。如果人類的基因也像其他生物的基因一樣，目標都在於盡可能的讓自己繁衍下去，那麼單性生殖應該才是最佳的繁殖途徑！因為，唯有單性生殖，後代所遺傳到的基因才會百分之百與上一代相同。事實證明，許多動物的確是進行無性生殖。牠們像植物一樣，透過分裂、出芽或增生來繁殖。蠕蟲、水蚤、小水熊蟲和輪蟲都屬於無性生殖。象鼻蟲、竹節蟲、頭蟲，和某些蠍子類、甲殼類、貝類也可以行無性生殖。另外像蜥蜴類，例如澳洲的壁虎，或巨大的科莫多龍、窄頭雙髻鯊，牠們也可以透過無性生殖來產生下一代。猶如耶穌的誕生，牠們可以行「處女生子」（單性生殖）：在荷爾蒙的作用下，未受孕的雌性或雄性會進入生育狀態，也就是在體內產生能逐漸成熟為另一個完整個體的下一代。

無庸置疑，無性生殖確實是一種成功的演化模式。相反的，有性生殖就各方面來看，尤其是某些極關鍵處，實在缺點多多。有性生殖只能讓一半的基因遺傳下去，而且是雄性和雌性各取一半。對基因而言，這根本是場大災難！更別提交配過程的艱辛，以及找不到適合的交配對象，或最後落得一場空的風險！套句漢彌爾頓學派的經濟學用語，這種繁殖方式：「不但提高了風險，還讓成本暴增。」

為什麼還要行有性生殖？意義何在？第一個試圖為此做出解釋的是「河岸灌木叢理論」。提出者是美國演化生物學家羅伯特·崔弗斯和他的同事喬治·威廉斯（George Christopher Williams）<sup>註56</sup>，他們以達爾文的一項觀察為出發點。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故居位於倫敦南方的唐屋（Down House）。閒來無事時，達爾文喜歡在「蘭花岸」（Orchis

Bank)<sup>註57</sup>的丘陵地散步。他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提到：「觀察河邊的灌木叢實在有趣，這裡生長著各式各樣的植物，樹叢裡有鳴唱的小鳥，各種昆蟲在四周嗡嗡亂飛，地上還爬著蠕蟲，此情此景，你不禁要想，牠們各自具備的形式何等縝密，彼此間既有差異，又能以如此不同的方式互相依存，一切都遵循著法則，而這些法則同樣也作用在我們身上。」

根據崔弗斯和威廉斯的推論，如果演化的祕密在於，每種生物在生命的河岸擁有自己的生存利基，那麼擁有最大利基的生物，生存的時間一定最長。而且，任何生物後代之間的差異如果越大，就越能適應不同的環境與變遷。在這層意義下導出的想法就是：有性生殖是有利的，因為這種繁殖方式所產生的後代，比較能適應環境變遷，並贏得新的生存空間。

如果上面的推論沒錯，有性生殖果真是一大優勢！不過，事情沒這麼簡單，有性生殖被過度美化了。事實上，任何生物的後代若是大幅偏離親代的特徵，幾乎都只有一種下場：死亡。基因變異是非常危險的事，絕大多數的生物之所以是目前的樣子，正因為這樣能讓牠成功的活下來。偏離或變異帶來生存優勢的機率微乎其微。所以，為什麼要行有性生殖，讓下一代承擔巨大的生存風險？既然手上已握有一副好牌，為什麼不善用它，而要浪費它？

第二個試圖提出解釋的是「紅皇后理論」。這項理論源自威廉·漢彌爾頓，先前已提過他並介紹他的解釋模型：寄生蟲！「紅皇后」這麼富文學氣息的名稱，並非大師漢彌爾頓自己想出來的，而是他的同事芝加哥大學的凡威倫（Leigh Van Valen）<sup>註58</sup>教授所提出。但也不是他自創的，而是引自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小說《愛麗絲鏡中奇緣》（*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典故。

在一段深具哲理的談話中，紅皇后告訴困惑的愛麗絲：「在這個國度裡，盡全力跑，也只不過是為了要維持留在原地而已。」對漢彌爾頓及凡威倫而言，這段話同樣適用於生物的處境。對生物，尤其是壽命較長的生物而言，寄生蟲一直是他們難以克服的問題。寄生蟲的繁殖速度

極快，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能繁殖數百萬代。各宿主之間的差異越小，相似性越大，越有利於寄生蟲的生存，牠可以很輕易的轉換宿主，並且一下子就能適應。所以行無性生殖的動物在面對寄生蟲時，似乎屈居劣勢，毫無反抗能力，因為牠們的同伴或後代跟牠們一模一樣，面對寄生蟲時將束手無策。最慘的情況下，整個物種會因寄生蟲而滅絕。但行有性生殖的生物就沒有這種問題。因為牠們的後代彼此間有一定的差異，這樣的生存環境對寄生蟲相當不利。就在寄生蟲努力適應的同時，宿主很可能已經透過有性生殖而讓「敵人」（寄生蟲）的生存條件變得更加嚴苛。宿主和寄生蟲之間的戰爭，有些生物學家喜歡稱之為「軍備競賽」。

根據紅皇后理論，物種的存續有賴於牠的「多變」：唯有改變，才能讓自己保持不變。這樣的推論到底對不對，見仁見智。但不容置疑的，許多行無性生殖的動物，或可以行無性生殖的動物，雖然也被寄生蟲寄生，但後來還是生存了下來，並且活得又久又好，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後遺症。所以，接下來要問：世代循環週期較慢的動物，例如人類、鯨魚和大象，是不是真的比較有能力對抗寄生蟲？有一點是確定的：寄生蟲要從一個宿主過度到另一個宿主身上，的確比較困難。既然兩種生殖方式各有優勢，那麼，最後該質疑的對象顯然是「大自然」。為什麼大自然只讓極少數的生物同時擁有兩種生殖方式？讓牠們「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例如前面提到的科莫多龍。正常情況下，牠們行有性生殖，但在沒有雄性的情況下，例如在動物園裡，必要時牠們也可以行「處女生子」。這種極罕見的混合模式，難道不最具優勢？

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無論是「河岸灌木叢理論」或「紅皇后理論」，這兩種生殖理論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在達爾文天擇理論裡就已經存在的：「最適者」生存的錯誤。大自然跟那些專門打造城市地標的建築大師不一樣，建築大師追求的是最優化，亦即「最佳」答案。但大自然的現象，例如有性生殖，它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因為它能提供最有利的生存優勢，或它的好處遠多於壞處。雄性不能懷孕（或者海馬的例子是雌性不能懷孕）可能只是一種偶然，不至於讓此物種因威脅而導致滅絕的偶然。事情就是這樣，沒什麼更高深的道理了。許多人執意要找

出一個生物學的真諦，如前所述，這是一種神學傳統，標榜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唯有如此才能主張：全能的上帝不會創造出瑕疵品！除了神學，不少被扭曲或穿鑿附會的經濟學觀點，也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

支持有性生殖的論點中，最可笑的莫過於：無性生殖的生物一直還停留在原始狀態，沒有發展出更新、令人讚賞的生物形態。套句那些人的話：此乃三十三億年的演化停頓！或許真是這樣，甚至一點也沒錯，但這又有什麼不好？我們從什麼立場出發，斷定這樣就是不好？為什麼多樣性就是一種更高的價值？在以快刀斬斷單性生殖的「戈爾迪死結」之前，憑什麼認定多亂如麻的新形態就是比較好？

無庸置疑，無性生殖是自私基因的樂園。「自私的基因」向來聲勢凌人，操控一切，影響層面廣泛，為什麼在此反遭到排斥？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釋。就生殖而言，基本上，「性」並不是必要的。那麼

「性」為什麼會出現在世界上？目的何在？同樣是沒有答案。我們大可以假設，這裡面根本不存在什麼高深的道理。到今日，性和生殖二者的關係在許多生物身上，還是有極大的差異。蝸牛雖然行有性生殖，卻是雌雄同體，同一隻蝸牛既是母的也是公的；麗魚科的拉氏彩蝶鯛甚至能改變性別，一下子公，一下子母。另外有些昆蟲在生物學上根本沒有性別，牠們會根據後天的環境條件自行選擇。

就生物學觀點而言，世上之所以有男女，不是因為在性或性欲上非如此不可，性別的存在並不是為了生殖。性別認同、性行為和生殖是三碼子的事，它們之間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關係。基本上，求偶時可以男追女，也可以女追男，但不必然是這樣；性行為的目的可以是為了生殖，但不必然是這樣；兩性交往可以發展出戀情，並（或）產生愛，但不必然是這樣。男人可以愛男人，女人也可以愛女人。戀愛與愛情可以跟結為伴侶有關，但也可以無關。

企圖把性別、性行為、生殖、戀愛和愛情等通通放在一起，並排出一個邏輯順序的作法，並不符合自然。哲學家叔本華，同時也是演化心理學的老祖先，在一八二一年提出一項錯得離譜的觀點，他倒果為因的

說：「各種與愛情有關的人類行為，因其最終目的.....比人類生活中所有其他行為的目的更重要，而具有嚴肅的意義。每個從事這項行為的人，都在做一件極有價值的事，亦即藉此繁衍出下一代。」根據他的看法，性行為當然只能發生在兩性之間，目的是為了繁衍出下一代；至於愛情，則是兩性有了「關係」後才慢慢產生的東西。這樣的看法是錯的。

## 達爾文談情說「愛」

概念的原創者達爾文似乎已經預見，若要把「適者生存」套用到人類身上，實際上是很困難的。無論是交配或擇偶，細菌的情況和人類肯定有所差別。在那些區分雌雄、並透過競爭才能贏得性伴侶的動物身上，「天擇」（自然選擇）有自己的一套運作法則。因此，一八七一年達爾文在另一本著作《人類起源》中，提出了「性擇」的概念以取代「天擇」。

這本眾所期待的大作是本「奇特」的書，它讓達爾文的追隨者陷入挑撥者的尷尬處境，到今天還是如此。大師原本的用意是想要達成和解，消弭分歧。這本書寫得不慍不火，和藹可親，「就像一位慈祥的大叔，完全沒有考驗他人容忍度的意思」，傳記作者戴斯蒙德（Adrian Desmond）與摩爾（James Moore）形容：「彷彿坐在高靠背椅上講述一則精采的冒險故事，關於英國人和他們的發展歷程；他們如何努力向上，脫離猿猴階段，如何再接再厲擺脫野蠻狀態，接著又是如何繁衍後代，讓子嗣遍布全球。」這真是一則美好的維多利亞式長篇故事，還有幸福快樂的結局。演化到最後，人類成為具有完美情操的道德者。座椅中的達爾文甚至預言：有朝一日，人類還會更好！

在《人類起源》中，出現了前作《物種起源》未曾提及的概念——道德。先前與道德全然無涉的事，現在開始與風俗、禮節與細膩的行為

方式有關。簡言之，天擇下的動物只知道要自私，但性擇下的高等動物，像人類，便知道要利他了，並有同情心、道德感，而且懂得——愛。達爾文若是聽到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肯定會以為那指的全是低等動物。達爾文認為，人類的激情在沒有失控的情況下，是受道德強烈約束的。

達爾文對道德的看法，並無任何新穎之處。蘇格蘭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sup>註59</sup>已談過人類的道德感。達爾文一向對亞當·斯密推崇備至，這位知名的經濟學家、資本主義理論奠基者，對人類的美好看法，符合達爾文的脾胃。一七五七年達爾文曾寫道：「無論人類看起來多麼自私自利，但在他的天性中明顯存在特定的基本潛質，讓他自覺別人的命運與他有關，參與別人的幸福快樂乃是必要的，即便他無法從中獲得任何利益，除了見證者的快樂。」

如果達爾文還活著，必會對那些打著他旗幟的演化心理學家充滿質疑。雖然，達爾文想以演化的觀點來解讀人類心靈，但沒有跡象顯示，他想如漢彌爾頓那般用數學公式來說明它，或像崔弗斯或道金斯將遺傳因素神祕化。他的論點絕不會變得這麼唯物。達爾文認為，心理和精神現象各有獨立的運作法則，不受制於生物學中較低階的層面。很明顯，人類身上的某些機制無法用「自然」的觀點來解釋。達爾文認為，這一方面與感受，也就是各種感情有關，另一方面跟文化有關：「為生存而奮鬥是何等重要，但在觀察了人類絕大部分的本質後，必須承認還有其他的力量更重要；因為道德特性會直接或間接的透過習慣、思考力量、教育和信仰等因素，發揮作用，讓我們比透過天擇還更進步。」

愛便屬於最重要的「道德特性」。達爾文真的用了「愛」（Love）這個字，而非「性」（Sex），儘管陰錯陽差，「愛」在書中的索引只出現一次。根據達爾文的說法，愛是一種道德特性，只有高等動物才具備，並在人類身上得到全面的發展。相較於低等動物不帶感情、全憑直覺尋找交配對象，愛在人類的演化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直覺來自複雜的本能，它引發低等動物對特定的行為產生特殊偏好；但對於我們而言，愛和它所喚起的各種感情，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對人類的有性繁衍具影響力的，不是純生物學上的優勢，而是諸多強烈的感情。這也是我們與低等動物不同之處：「藉由愛和忌妒的影響，藉由認同其聲音之美、色澤之美，或形態之美，然後做出選擇。」愛讓這個世界有了一種全新的品質；愛是人類沒有遵照養牛場老闆的育種邏輯，進行交配的最主要原因。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援引「達爾文」來反駁「達爾文主義者」。因為這些人以及深受他們影響的演化心理學家竟然把「愛」扭轉為「性」，結果變成：最棒的男人征服最棒的女人。他們敢這麼說，因為沒有人知道更新世到底有沒有愛，又是怎麼一回事。對於直立人和巧人的愛的感受，我們一無所知。同樣的，我們也不知道，愛是從何時開始成為擇偶的重要因素。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說：沒見過就等於不存在，現代人的出現除了性偏好，其他一概不算數！

由於無知，我們單方面高估了生物因素在演化上的意義，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也抹煞了人類祖先情感與表達方式的可能面貌。演化心理學家善於操弄這種簡化主義，不是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而是因為不知道。就這點而言，演化心理學家算不上是心理學家，因為對於我們的祖先、人類的始祖，我們了解最少的就是心理！既然所知極有限，從何掌握自己哪裡跟他們一樣？哪裡又不一樣？難道說他們只是「建構的產物」，把「現代人」減去「現代」，或以此類推，再減去理性、語言、文化等等，剩下的就是他們了。但情感呢？或許我們的祖先在情感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並有許多進步的想法。他們應該也有自己的個性、喜好或弱點。如果不是那些積極研究黑猩猩、倭黑猩猩、大猩猩、紅毛猩猩的靈長類學者，這些動物的許多特性大概也會被全盤否定吧！

視「愛」為「性」的衍生物，這並非演化心理學家的獨到見解。除了叔本華，尼采也抱持相同看法。佛洛伊德更進一步主張，人類所有的社會關係全歸因於潛意識的性欲。根據前述說明可知：愛不只具有生物學上的功能，即讓兩性為了撫育下一代而能長時間生活在一起。事實上，許多長期相守的動物，例如某些鳥類或海馬，並不會讓我們想到牠們之間有愛。相反的，在人類生活的許多情況下，當我們談及愛時，也沒有想到男女雙方必須長相廝守，更遑論共同撫養下一代。

愛是從「性」或「撫育下一代」中衍生出來的，這個結論下得太草率。基本上，「愛」並不像美國演化心理學家大衛·巴斯所說的，是「廝守意願最重要的指標」。人真的可以愛某個人卻不想跟他在一起，因為對他儘管有強烈的情感，但很清楚彼此合不來。主張「相守和相愛」兩者息息相關，並以此為立論基礎建構出一整套觀念，是大有問題的。「與廝守意願有關的表現還包括，」巴斯進一步說：「將資源用在所愛的伴侶身上，例如餽贈昂貴的禮物。這類行為表達了與伴侶長相廝守的意圖。」不是，不是這樣的！人類不同於雨蛙或麗魚，動物求偶行為中的特定訊號確實具有某種意義，但人類並非如此。許多有錢男人喜歡送昂貴禮物給性玩伴，卻毫無與她們長相廝守的意圖。「女性所處的情況是，她們可根據演化所產生的偏好去選擇擁有較多資源的男性，她們的確也這麼做了。」這樣的看法不該接受檢驗和批評嗎？女人當真無一例外偏好有錢的男人而不愛貧窮男？這些研究愛情的學者，到底活在哪個世界？

至於達爾文自己，如我們所見的，他對這個問題已有相當精闢的看法。對他而言，愛是將性和道德聯結在一起的橋樑，建造這座橋樑的磚石就是「美感」與「感情」。許多人非但沒把目光集中在「最優秀」（最適者）的對象身上，還常會愛上條件並不好的男人或女人。甚至可以說：「愛」經常是我們選擇「理想」伴侶的絆腳石！從遺傳上「最優化」的觀點來看，愛反而無法幫助人類「進化」，這是純就交配與生物學而言。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有「愛」呢？

## 「愛」是為了利己？

讓我們先來看兩段文章。

第一段：「自然所遵循的經濟法則，自始至終，都是以競爭為導向。一旦了解此經濟法則是怎麼運作，為什麼這樣運作，就能知道各種

社會現象所依據的基石。那就是生物利用其他生物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方法與途徑。只要放下浪漫情懷，我們就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或團體具有博愛情操。所謂的合作，只是一種投機行為兼互相利用。促使動物自我犧牲的動力，最終還是利己，為了讓自己得到好處，就算是間接也無妨。所謂的追求社會『福祉』，其實無異於增加有能力者的負擔。所以只要對自己有利，任何一種生物，你都會看到他樂於幫助同類或夥伴。只有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他才會致力於社群福祉。一旦他有機會完全依據自己的利益行事，他會滿腦子充斥著自私的想法，不管是兄弟、伴侶、父母，還是孩子，他都能殘忍以對，傷害他們，甚至置他們於死地。利他主義者的臉一旦被抓破，你會發現藏在底下是一張偽君子、流著血的臉。」

第二段：「如果母親死亡時，幼兒小於三歲，還非常依賴母乳，自然無法存活。即使進入青少年時期，不再仰賴母親提供食物，孩子仍然有可能因母親死亡深受打擊，而喪失活下去的力量，終至死亡。以菲林特（Flint）為例，母親菲蘿（Flo）死亡時，牠已經八歲半，具備自我照顧的能力。……但一直以來，牠的世界都以菲蘿為中心，失去了母親，牠的生活變得空虛且毫無意義。我永遠不會忘記，菲蘿死後三天，我在菲林特身上看見的一切。那天，牠爬上河邊的一棵大樹，沿著樹幹往前，然後停住，文風不動的站在那裡，望著一個空蕩蕩的鳥巢發呆。兩分鐘後牠轉身，爬下來，動作像極了年邁的老頭。之後，牠走了幾步，躺下來，睜大眼睛，空洞的望著前方。那個鳥巢是菲蘿死前，牠跟菲蘿一起發現的……。菲林特的活動力越來越差，且毫無胃口，牠的免疫力嚴重下降，然後便生病了。我最後一次見到牠，牠眼窩凹陷，瘦得皮包骨，非常沮喪。牠蹲在離菲蘿死處不遠的地方。……牠即將走完此生的最後一段路，每走幾步就停下來喘一口氣。最後，牠來到菲蘿死去的地點。牠在那裡逗留了好幾個鐘頭，一再望向水面。然後牠拖著虛弱的身軀往前走了一小段，最後整個身體縮成一團——再也沒有動過。」

第一段文章出自麥可·季瑟林之手，他是「演化心理學」一詞的創始者，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他的著作《自然經濟學與性的演化》（*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中。第二段文字節錄自珍·古

德（Jane Goodall）《大地的窗口：珍愛猩猩三十年》（*Through a Window: My thirty years with the chimpanzees of Gombe*）。以研究黑猩猩聞名全球的英國女學者在她的書裡，以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談「愛」，特別是描述小黑猩猩在母猩猩或親愛的兄弟姐妹死後，所承受的痛苦。季瑟林所謂的自身經濟利益，在珍·古德觀察到的黑猩猩身上卻是再真實不過的感情。珍·古德記錄下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描寫的全是黑猩猩「充滿愛和關懷的個性」，牠們流露的真情絕不可能只是因利己而形成的生物聯結。小黑猩猩菲林特，就生物學觀點而言，沒有母親也完全能夠生存。在生物學上，牠已是獨立的個體——但感情上並不是。

上面兩段文章，哪一段比較合理？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是，珍·古德不僅敘述比較動人，觀察也比較深入。與其他的生物產生情感上的聯繫，或許跟自身利益不無關係，但若說這只跟自身利益有關，未免太牽強了。如果像季瑟林那樣，全然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生命，那麼「愛」將變得無法解釋，甚至根本不存在。

但如果沒有愛，如何理解人類的行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想像一下：如果季瑟林的觀點沒錯，人類會怎麼做？那個總是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的人，似乎得先想清楚：什麼對他有利？什麼對他不利？這可是個大哉問，難度之高，遠超乎我們的想像。若要時時刻刻依據自己的利益行事，我們得先清楚知道自己關心什麼。誰能萬般篤定的回答這個問題？我所關心、在乎的，是那些我會時時估算的事情。然而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大部分都不會花時間做這種事。吃早餐、上班、購物、照顧小孩，廣義而言，或許都屬於利己行為。但在做這些事情時，幾乎沒有人會去想，自己關心在意的是什麼？又能從中獲得什麼具體的好處？簡而言之，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認真的去計較利害得失。

季瑟林的錯誤或許在於，他認為人不斷努力的目的是想擁有，或想從別人那裡獲得什麼。但我們同樣關心的事情至少還有：去做特定的事，成為某種人。我們無時無刻在乎別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關心自己的形象，並透過與他人的關係打造自我形象。我們透過「知道自己不是怎樣的人」來確認「自己是怎樣的人」。自我的形象的重要性，幾乎超越了任何我們想要擁有的具體東西。

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行為中，利己並不是什麼黑暗陰險的本能，反而是與他人的福祉密不可分。或者就像哈佛大學哲學家科斯嘉（Christine Korsgaard）<sup>註60</sup>教授說的：「道德的產生不該只歸因於諸多阻撓我們利益的障礙。……想像世上有某個人從不把別人當作成就自己的工具，並且從不認為別人有可能這麼對待他，這比想像有人老是在算計別人，更站不住腳。因此，我們會想像有某個人，他將所有人當作利己的工具，或視為必須排除的障礙，而他自己也預設別人會這樣對待他。我們會想像有某個人，他在日常交談中，從不會率直或不假思索的說出真話，而總是在盤算，如何對別人講話以達到自己的意圖。我們會想像有某個人，當他遭到矇騙、欺凌、鄙視，也不會怨恨（儘管他很不高興），因為他深知這一切都是身為人合乎常理、想像得到，被他人對待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們想像了一個活在內心深處、極孤單的人。」

誰能真實的觀察人類，就不會把人看成自身利益的俘虜。我們應該避免把自己描述成偽裝功力很差的野獸，將心理變態說成常態。道德並非人類萬惡本性的掩飾。試問：這種違反本性的掩飾，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好處？

同情、喜歡、犧牲奉獻、責任感，這些都是我們遺傳自人類祖先的天性，而人猿也具有這些特質。珍·古德在這方面有很多的觀察。在較高等的脊椎動物身上，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聯繫是非常強烈的，強烈到超過利己的要求。即便母子之間的聯繫原本是為了基因利己的需求，但是當母黑猩猩與小黑猩猩之間的關係深刻到遠超過必要性時，生物上的利己需求在哪裡？這時若像季瑟林那般，硬給他們冠上一頂「機會主義」或「剝削」的大帽子，不是有些可笑嗎？兒子菲林特沒有剝削母親，母親菲蘿也沒有剝削兒子。如果他們的母子關係僅奠基於機會主義，那麼菲蘿在菲林特長到夠大，可以不需要她時，就應該把他從身邊趕走，這樣才符合自私基因的要求，她的自私基因才能獲得安全保障！

根據各種跡象顯示，就人類而言，這種原本存在於母子之間的聯繫，至少擴大到某些近親，並達到相當的強度，讓人以另一個字來稱呼它，那就是「愛」！這是偉大情感的源頭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不就代

表了，愛最初根本不是為了讓兩性一起生活「設想」出來的，而是為了某種截然不同的東西？

## 愛情的誕生

有一則關於人類愛情起源的故事，在生物學家之間廣為流傳。美國人類學家海倫·費雪在她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愛慾——婚姻、外遇與離婚的自然史》（*The Anatomy of Love: A Natural History of Mating, Marriage, and Why We Stray*）中提過。

故事的內容是：約四百萬年前，人猿離開了森林，至少是部分的人猿。因劇烈的地殼活動在平坦的東非製造了一條巨大的裂縫，我們今天稱之為東非大地塹。當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祖先們，繼續在面積越來越小的森林力求生存時，人類的祖先已朝著熱帶草原出發。遼闊的草原跟以往的生活環境大不相同。雖然人類的祖先還是會攀、會爬，但草原上的生活讓他們越來越倚重後面的兩條腿，這種姿勢的好處是，能在草原上抬起頭來觀望，但這對母人猿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從前在森林裡，母人猿通常把孩子舒舒服服的背在背上。雙腿站立後，母人猿既要用手撿樹枝、石頭，又要抱孩子，這該怎麼辦？總之，草原上的生活讓母人猿手忙腳亂，難以負荷。於是她改變了擇偶策略。現在起，我們的女祖先要找的是情感豐富，雄性荷爾蒙較弱的對象，他們或許不夠男性化，但溫柔體貼，善於與人互動，對這階段的她們來說是最有利的伴侶。女人由此開始追求一夫一妻制。宇宙中最奇妙的現象於焉產生：人類的大腦突然長出了愛情迴路。它先以女性需求及精神狀態為基礎發展出來，然後以極晦暗不明的方式過渡到了男性身上。讓我們引述一段海倫·費雪的話：「當時伴侶關係對女人產生了關鍵性的意義，對男人而言也非常有利。男人要獨力保護及照顧一群女伴，其實非常吃力。天擇的結果就是，隨著時間的演變，情況較有利於遺傳上傾向一夫一妻的



男女。接下來，人類大腦也發展出相應的化學變化。」

多迷人的故事啊，或許可以稱之為「愛情起源的生物學神話」。當然，願意的人儘管可以相信。這是一個相信與否的問題，因為沒有時代的目擊者可以向我們透露它的真實性。手忙腳亂的夏娃，樂於助她一臂之力的亞當，當時的情況真是這樣嗎？實在令人懷疑。

在這麼浪漫、斬釘截鐵的演化描述中，有一點頗令人費解，那就是亞當也獲得了好處。海倫·費雪認為，夫妻關係對男人相當「有利」。因為他不必再去保護一群女人，而只需要保護一個女人。舉著達爾文旗幟說這種話的人，從何認定四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一定像大猩猩一樣，擁有成群的母猩猩？而不是像與我們血緣更近的倭黑猩猩一樣，一起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群體裡？或者，如同大部分猴子的行為，是所有男人共同來保護女人？一個女人的男人，身兼她的「保護者」與「供給者」，這似乎是基督宗教的想法，而非生物學的。

在這則神話中，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大腦的變化。海倫·費雪認為，這種演化有利於「遺傳上傾向一夫一妻的男女」，而人類的大腦也發展出相應的化學變化。最遲讀到這裡，不得不讓人驚嘆這簡直是中世紀的煉金術。愛涵蓋了細膩的心理現象和複雜的社會行為，在此被概括為遺傳上的先天傾向，我們可以毫無遺憾的拋開這則神話了。事實上，唯一可能出現的化學變化，是因母子關係或親子關係而產生的聯結荷爾蒙（Bindungshormone，或「關係激素」）。根據各種跡象來看，這種腦部的化學變化，應該不是四百萬年前才開始，而是更早就發生了；所有的猴子都會分泌這種聯結荷爾蒙。它的出現應該比兩性之愛來得更早。

基於上述觀點，奧地利生物學家及行為科學家艾柏·亞貝費特（Irenäus Eibl-Eibesfeldt）於一九七〇年提出了另一項看法。愛最初根本不是發生在男女之間，亞貝費特認為，愛最初應該是源自於母親和孩子的關係。愛產生於哺育下一代的過程，而非來自性欲：「性欲極少是建立聯結的有利途徑，但對人類而言，它卻在這方面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雖然性欲是最古老的欲望之一，但有趣的是，對於個體之間發展長

期關係的聯結，並無什麼助益，除了少數的例外。愛並不源於性欲，但愛能藉由性欲短暫強化關係的聯結。」

亞貝費特的導師是康拉德·勞倫茲，對此他持相反的看法。勞倫茲認為，愛是群體攻擊行為的副產品，而亞貝費特在人身上並沒有看到那麼強烈的動物性，他是一個具有同情心的人道主義者，而勞倫茲不屬於這類型。不過亞貝費特的解釋模型並沒有獲得支持。相反的，費雪的卻大行其道。乍聽之下，費雪的模型似乎合情合理，也合邏輯，但僅止於乍聽之下。因為大自然遵循的不是人類的邏輯，一切並非按部就班進行的：先有欲望，接著墜入愛河，最後就一定有愛。一個對我們來說環環相扣、有意義的故事，未必就是真實的。大自然可不懂人類大師「從欲望到愛」的精心規畫，那比較像是人為的事後推論與建構，基於一種需求，要把自然與文化中混亂的事物，整理得有條不紊、清楚明白。

根據亞貝費特的假設，母親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才是動物界中最強的聯繫，至少在行孵育或哺育的動物身上是如此。眾所周知，母獅子可以為了保護小獅子奮不顧身，犧牲自我，所有母獅子皆如此，無一例外。如果愛是誕生於「巢穴」，而非在那數週之前，這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人類社會裡，一般而言，孩子與母親的關係都比男女關係更為穩固與可以信賴。

持類似看法的還有德國漢堡的心理治療師米歇爾·馬利（Michael Mary），他也認為母子關係才是愛最初的發源地：「母親（或某個跟孩子關係最親密的人）為孩子提供了最初的环境，讓孩子感覺自己受到重視與保護。我們甚至可以說，所有想像得到的人類關係，以及與此有關的經驗，都溯源自我們與母親的關係。這種親密聯結的經驗，透過同時是身體、情感和心理上的親近而形成。藉由這最初、深深烙印下的經驗，此親密關係成為一種關係模式，絕大多數的聯結都以它為基礎。我們會在往後的人生中追求類似的親密關係，涵蓋心理、情感和身體的層面，如情侶的親密關係，也就不足為奇了。」

各種跡象顯示，母親的照顧（有些動物是雙親）是「愛」的發源地。一個全心全意照顧下一代的動物，要能設身處地去揣摩受照顧者的

需求與感受。根據觀察，許多動物都具備這種能力。照顧下一代很可能隨著時間，逐漸演變成對族群中其他弱勢或受傷夥伴的保護，直到擴及沒有血緣關係的成年動物之間。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兒童心理學家史丹利·葛林斯班（Stanley Greenspan）教授和紐約大學的哲學教授史都華·尚克爾（Stuart Shanker），在兩人合寫的書裡甚至認為，母親和孩子的關係是孕育語言、發展文化的搖籃。他們一同撰寫的《第一個想法》

（*The first Idea*）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傑作，書中提到人類文化起源於母親與孩子之間最直接的肢體語言與符號語言。

不管過程如何，原本只存在於母親和孩子之間的感同身受與細膩情感，後來明顯的擴展至族群的其他夥伴。母子關係中的愛，作用範圍擴大後，演變出了兩性之愛。至於這種演變是否「必然」，實在很難講。可以確定的是，如此有助於減輕撫育後代的負擔。但話說回來，就算沒有男女長期的愛情關係，仍會出現其他可能的替代作法，例如由姑姑、阿姨或更上一輩的女性來照顧孩子；這樣的社會行為，不只出現在猴子，也出現在大象和馴鹿的群體中，以及十九世紀人類的市民家庭。

還有一點也是相當明確的，兩性之愛沒有威力強大到足以讓我們的祖先精神崩潰而滅絕。對石器時代的戀人而言，失戀絕不至於教人尋死尋活。

兩性之愛很有可能從母子關係，或其他類型的養育模式（如親子關係）中衍生而來。不過除了男女之愛，我們還有手足之愛、親戚之愛，更重要的是朋友之愛。有些學者主張，人類不得不跟有血緣關係的人較親密。但觀察人類的感情表現，我們實在無法苟同。如果漢彌爾頓的「總體適應度」理論成立，那麼我們與親戚的關係都應該要牢不可破才對，而且不只兄弟姐妹，就連堂、表兄弟姐妹都是如此。在家族中有時是這樣，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就感情而言，親戚在我們的生命中並沒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朋友，我們對朋友的愛甚至會勝於兄弟姐妹。也許根據漢彌爾頓的理論，基因並不贊同此點，但在心靈上跟誰比較親近，血緣並非測量的絕對標準。

「基因決定一切！」此一法則顯然不是何時、何地都適用。人類有

可能愛基因跟自己相差甚遠的人，只要對方在感情或思想上正面回應他，提供信賴感，給予生活或精神的支持。所以，我傾向這樣的假設：我們對「聯結」和「親密感」的需求，源自兒時與父母的關係。兒時或日後，這種需求會在我們與所遇到的其他人身上，尋找符合相應的關係。這才是愛在生物學上的源由，至於遺傳、宗教意義上的繁殖任務，並不能解釋愛。

## 浪漫的三角地帶

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是全球知名的景點，建於十三、十四世紀，是拜占廷風格的建築，五座宏偉的拱頂遠遠高出後來建的威尼斯總督府。教堂內外有超過五百根分別以大理石、花崗岩、鐵石英、蛇紋石，或漢白玉，建造而成的古羅馬圓柱。最具特色的則是那些金黃色的馬賽克裝飾，讓聖馬可大教堂贏得了「金色聖殿」的美名，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前來。

不過，一九七八年來了兩位非常特殊的遊客，美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路翁亭和史蒂芬·傑·古爾德。他們對教堂裡無數的柱拱產生了興趣。不過真正吸引他們的不是柱拱本身，而是界於它們之間的地帶，即兩個拱頂的聯接處，各端點聯接起來所形成的三角形地帶，藝術史學家稱之為「拱肩」（Spandrel）。就建築學的觀點來說，拱肩是建造拱形建物時，並非刻意，但必然會出現的「副產品」。聖馬可大教堂裡的拱肩都用馬賽克裝飾得美輪美奐，因為既然無可避免，那就在裝飾上多加利用。

古爾德和路翁亭看到拱肩時，突然想到，在建築界出現這種非刻意，但無可避免的事物，在生物界會不會也有相同的現象？這會不會就是解答之鑰，說明自然界為何會有如此多樣不可思議的生物形態？是否基因除了傳遞有用的主訊息（如拱頂），也會連帶的傳遞一個或多個附

加訊息（如拱肩）？於是，兩位生物學家開始聯手打造新的生物學概念，稱那些對生存非必要的生物特性、能力或特徵為「拱肩」。

路翁亭和古爾德不只將這個概念應用到自然界中非必要的生物器官，以及沒什麼功能的裝飾組織，還把它引申到人類身上。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宗教。就演化的觀點而言，信仰上帝對人類似乎沒什麼助益，但在具備一定程度的智能和感性之後，人類發展出諸多或許不需要的能力。人類創造無數的「拱肩」，就像是必要適應能力之外的副產品。由此推測，探索死亡的知識和對於死亡的恐懼，都是一種「拱肩」，其形成是人類自我反思帶來的結果；而自我反思的能力，也有可能只是一種「拱肩」，衍生自人類在群體中為了求生存，所必須具備的社會智能。這意味著，當人類祖先理解的事物越來越多，有一天突然領悟到，人是會死的。這種不適感必須克服，於是產生了宗教。換句話說，聖馬可大教堂與眾多拱肩所代表的「信仰」，本身也都只是「拱肩」而已。

據我所知，路翁亭和古爾德並沒有把這個理論套用到「愛」上面。如果，愛的能力真的源自母子關係，那麼其他的應用形式，很可能也只是一種額外衍生出來的「拱肩」。因為人類具備了感性和智能，所以能將自己的感情延伸到家庭以外的範圍。其實不只是人類，根據珍·古德的觀察，黑猩猩和其他人猿也有類似的現象，牠們會建立個人關係，將愛的能力推及至群體的其他成員身上，例如朋友與異性。

如果上述看法沒錯，男女之愛就只是一種母子之愛的「合理剩餘產物」了。母子之愛才是拱頂，男女之愛充其量不過是三角形的「拱肩」。在此意義下，兩性之愛的能力算是一種「適應」的結果，但這種適應並非必要。從遺傳演化的觀點來看，兩性之愛是一種「無害的多餘物」，因為，即使沒有愛情，男女還是過得下去！

愛情不過是拱肩，宗教也是，或許這正好解釋了，為什麼宗教與愛情常被相提並論。愛上帝、愛耶穌、愛馬利亞、愛你的信仰、愛世間唯一的真理，很少有宗教跟基督宗教一樣，對愛有這麼多的要求。伊斯蘭教就完全不是這樣。就心理學而言，宗教跟愛具有相同的功能，都能滿足我們的某些需求，例如對快樂的需求，對認同的需求，對被帶領、指

引的需求，對信賴感的需求，對心靈紓解的需求，對安全感的需求等等。當一個人開始思考自身與所處不穩定的世界時，這些需求就會逐一浮現。

曾有人企圖證明，兩性之愛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投射，它代表了人類對內在穩定及安全感的需求。不管是愛朋友、兄弟姊妹、女人或男人，都是在尋找一種共同性與彼此相屬的感覺。感情的交流讓人類獲得依靠。很有可能，在共同性與彼此相屬中所找到的與投射出的安全感，不知從何時開始，自行發展成另一種演化的動力。人的感性越強，它的範疇與影響力就越大，人類的社會行為也因此而更加獨特且多元。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像人類一樣，在感情與愛的方面擁有這麼多的源頭。

關於愛，最無謂的爭論莫過於：兩性之愛是一種生物現象，還是文化現象？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先知道，生物現象是怎麼過渡到文化現象的？明確的過渡點又在哪裡？其實，文化本來就是生物現象的延續，是人類依據自身獨特性發展出來的，而這些獨特性本身就有它生物上的源頭。所以，這只是觀點的問題，就像製造鼓聲的是鼓還是鼓手？

若是主張「愛」是一種大自然的伎倆，目的在於藉由「性」繁衍出優質的後代，這在生物學上是錯的。因為，沒有愛仍能生出優秀的孩子，因愛而結合卻未必有此結果。有些相愛的人並沒有美滿的性關係，而教人心蕩神馳的性經驗，卻可以發生在不相愛的兩個人身上。人類的某些行為或許真是為了讓基因得到最好的延續，但在尋找伴侶時，往往是考量彼此有沒有共同的嗜好、運動喜好，對於電視節目、電影、音樂的品味是否相同，想去度假的地點、喜歡的餐廳一不一樣，而這些因素在生物演化上毫無價值可言。所以，男女之間的愛，並非各種條件的加總，而是超過它們的加總。「愛」具備獨立的價值，其生物功能並非明確的，它像「拱肩」一般，美得令人目眩神迷，而且非常複雜。

就演化生物學的觀點來看，「愛」不是清楚明白，而是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許多方面皆是如此，後文還會再討論到。在日常生活用語中，無論是剛談戀愛或相愛已久（甚至也包括性愛），都可以用「愛」



這個字指稱，這種泛稱也讓愛變成一件紊亂難解、相當棘手的事。性欲、戀愛和愛，三者之間並無必然關係，沒有其一，還是可以有其二、其三。性欲、戀愛和愛也不需要各自建立在另一個的基礎上。雖然，在與一個愛人的關係中，這三者可以重疊，但並非總是如此，通常也不會長久。

就荷爾蒙的層面來看，性欲、戀愛和建立固定關係（廝守），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就身體的化學作用來看，它們陌生得像匆匆擦肩而過的三個路人。不過有幾個基本問題仍必須釐清，情緒、荷爾蒙、感情、觀念，這之間如何產生關聯？大腦的化學作用如何運作，形成這般複雜、不可思議的東西？例如愛情的觀念。

---

註56：一九二六至二〇一〇，演化醫學奠基者之一。

註57：達爾文常在故居河岸採集蘭花，並拿進溫室培養。

註58：一九三五年生，一九七三年提出紅皇后理論在演化生物學領域奠定地位。

註59：一七二三至一七九〇，哲學家、經濟學家，著有《國富論》。

註60：一九五二年生，研究重點為道德哲學與其歷史。

## 第七章 一個複雜的觀念

為什麼愛情不是情緒？

一種什麼也保證不了，卻一點也不假的感覺。這種感覺除了對「能感受到它的心靈」具有真實性之外，不具任何其他的真實性。它是一種結果，不是一種東西。它根植於自身。所以，它既像夜蛾般易逝，又像上帝般不朽。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sup>註61</sup>

### 性欲、戀愛和愛

愛並不是生命的全部，但沒有了愛，一切了無意義。對人類而言，沒有任何東西像愛這麼重要。愛是人類世界的中央暖爐，是珍貴的情感，讓我們的行為產生動機，並賦予其意義。愛影響我們的社會行為，愛激勵我們、鼓舞我們，但愛也讓我們變得忌妒，充滿恨意，甚至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在Google上搜尋英文love，可以找到超過二十億筆的資料，搜尋德文Liebe或法文amour都可以找到超過一億筆的資料。成千上萬的書籍和電影探討描寫的，除了男女之愛，還是男女之愛。「愛」這個字的威力無遠弗屆。我們可以愛工作、愛祖國、愛上帝、愛親人、愛車子、愛寵物、愛音樂、愛巧克力，還可以根據字義分析出哲學家愛智慧，語言學家愛語言，集郵者愛郵票，腓力普<sup>註62</sup>愛馬。甚至有德國電視台製作了一首〈就是愛娛樂你！〉（We love to entertain you）的歌作為鎮台主題曲。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更喊出要選民基於「愛德國！」投他們一票。美國流行樂天王麥可·傑克森也共襄盛舉，生前受邀上德國現場直播節目《想打賭嗎？》（Wetten, dass...），主持人問他對德國的看法時，他回答：I love it!

「愛」這個字還真是隨興所至，愛怎麼用，就怎麼用。不過，早在

美國流行語入侵前，「愛」就已經被用得非常浮濫了。如今西方人開口閉口都是愛，人類能「愛」到這種程度大概是前所未見。愛動物、愛朋友、愛上帝、愛東西、男女之愛，全都歸在相同的概念下。不管是愛動物、愛朋友、愛上帝、愛東西，它們與男女之愛有一個共通點，即與所愛對象的強烈聯結。而男女之愛其實也分好幾種，性衝動、相戀、愛（非廣義的愛）及伴侶關係，現在所有情況全因「愛」而彼此環環相扣，成為一個整體。於是，「愛」一下子當作概括的觀念，一下子又單指某種特定情況。這種融為一爐的情況，是浪漫主義的傑作與遺毒。放眼歐洲其他國家的語言，情況也沒好多少。英文裡沒有專指「戀愛」的字眼，而是「一頭栽進愛情裡」：to fall in love。

若想了解愛，而且是聰明的去了解，就得先區分愛情各種不同的狀態。它們的共通性不多，差異性卻不小，一點也不像「愛」這個大標題所透露的概括性。前一章提到的人類學家海倫·費雪曾試圖剖析愛，她將愛情分為三部分：性欲、吸引和結合。先不討論這三者能否把愛說清楚，有意思的是費雪的觀點：「我們可以將『愛』視為腦中三個相互區別，但彼此相關的基本情緒系統。每個系統有特殊的神經傳導構造與聯結，通常稱為腦神經系統或腦神經迴路。每個系統負責指揮特定的行為，並有各自不同的發展，以便在鳥類和哺乳類身上操控專屬的繁殖方式。」

前面已詳細討論過，從各種可能性來看，愛並不源自於性，而繁殖不過是次要的。我們唯一能認同費雪的是，「性欲」可藉由大腦的情緒系統來解釋。至於費雪的「吸引」在人類身上應該是「戀愛」，費雪的「結合」在兩性之愛中則是「伴侶關係」。但「愛」呢？怎麼都沒提到「愛」？那三部分（性欲、吸引和結合）加總起來就是「愛」嗎？或者，如我推測的，愛是其他的東西，費雪在人類身上完全漏掉它了，因為愛不是藉由腦內相對應的化學作用就能解釋清楚的情緒系統。（否則以我選擇的居住地盧森堡為例，當地人顯然對神經生物學瞭若指掌，他們從不說「我愛你」，只會平淡的說「我喜歡你」或「我很高興跟你在一起」之類的話。）

先來談談什麼是性欲，馬上就遇到第一個大問題。儘管科學記者提

出過無數的解釋，好讓我們了解，「為什麼我們會飄飄欲仙」、「激情從何產生」，事實上我們對於性欲所知非常有限。沒有一個大腦科學家或生物化學家敢斬釘截鐵的說，性欲是怎麼形成的。即便知道人的腦子裡有各種荷爾蒙、受體和傳訊物質，但它們是如何相互作用或共同作用的，至今仍是一團謎。倘若真如某些暢銷書所宣稱的，醫藥工業肯定早就開始量產能瞬間喚起性欲的仙丹妙藥了。但不管全球的生物實驗室如何致力於研究，目前的成果仍微不足道，定義人類性欲的化學公式尚未問世。我們知道材料與元素，但不知道配方。其實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欲望的產生得靠多重感官。我們受到某人的吸引，可能是因為對方身材迷人，舉止優雅靈巧，或是聲音悅耳，散發誘人的氣味。不過，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如位高權重，知名度高，受到很多人的崇拜。不同刺激在大腦中的接收和處理部位不同。除了吸引力，性欲也視情況而定，面對不同異性時荷爾蒙的分泌量和個人專注的程度都不盡相同。

就目前所知，位於間腦的下視丘對性欲的產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控制女人性欲的是下視丘的腹內側核，控制男人性欲的是下視丘的內側視前核。最近藉助核磁共振成像技術，可以清楚的觀察到，這兩種神經核也和戀愛的感覺有關。性欲和戀愛之間似乎有了生物化學上的關聯，不過面對這種結論仍須謹慎。因為在核磁共振成像儀器外的現實生活中，性欲和戀愛經常是分開發生的。就算戀愛的感覺常伴隨著性欲，但性欲出現時不一定就是戀愛了，否則情色影像的消費者豈不持續處於戀愛狀態中？

再者我們已知，當一個充滿性魅力的人跟我們講話時，我們腦內的傳訊物質多巴胺（Dopamin）會大量分泌，接下來的變化是感覺得到的。血液中的多巴胺濃度提高時，我們對「目標」的注意力也會提高，心跳加速、一股慌亂不安襲來，感覺就像整個人突然「熱」了起來。即便如此，我們仍不能像某些愛情專家那樣突發奇想的下此結論：多巴胺是「在我們腦中喚起性欲」的「分子引爆劑」（der molekulare Initialfunke）。腦中的性欲是透過心理被喚起的，例如在看見帶來誘因與刺激的人時。多巴胺只是忠實的僕人，負責將我們的心理反應轉化成化學反應，並讓所有相關的執勤者都動員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男人的

睪丸酮和女人的動情激素（Estrogen），它們會引起身體一連串的反應，讓我們的觸覺變得敏銳，神經變得亢奮，接著傳訊物質一氧化二氮（nitrogen monoxide）發揮作用，使男性的陰莖和女性的陰蒂開始充血。

近年來許多專家致力於性感氣味的研究。人類的嗅覺是個謎，跟其他感官相比，它的簡單與未進化教人不可置信，但是它對我們的心理又有巨大的影響力。關於嗅覺，費洛蒙（Pheromone）是個神奇字眼，一種可吸引異性的信息素，諸多研究證實費洛蒙對昆蟲世界影響至巨。人類也會釋放費洛蒙，例如雄甾烯酮（Androstenone，或男性酯酮），一種由男性睪丸酮所衍生、藉汗腺釋放的性費洛蒙。某些研究顯示，女性對雄甾烯酮很敏感，不過只能在不過量的情況下。

過去幾年，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細胞生理學家漢斯·哈特（Hanns Hatt）教授的發現備受矚目。哈特利用各種方式測試人類鼻子，除了確認並描述嗅覺受體，對它的基因進行解碼。他還發現，人類不只鼻子有嗅覺，皮膚也有嗅覺。後來他發現卵子會釋放引導精子準確前進的費洛蒙，此研究成果讓他達到學術生涯的巔峰。這種名為「叔丁基苯丙醛」（Bourgeonal，或二甲基乙基苯丙醛）的費洛蒙具有誘人香氣，聞起來像鈴蘭！不只是戀愛中的人，連精子也無法抗拒它的吸引力。

生物化學原料對性欲的影響因人而異。首先是特定的感官刺激引發個人的心理反應，透過心理反應，下視丘開始施展一連串神奇的性欲魔法。下視丘會釋放傳訊物質多巴胺和微量的血清素（Serotonin），以分泌睪丸酮和動情激素。儘管在這一連串的化學作用中許多細節仍有待釐清，對於副作用的研究也仍顯不足，但我們還是可以用海倫·費雪的「腦中的情緒系統」來描述它。對於這個系統的關聯運作，目前我們已知其梗概。

說到戀愛，問題就複雜許多。「全都是化學作用！」乍聽之下似乎沒錯，人體的種種反應似乎都跟生物化學作用脫不了關係，連戀愛也是。即便一切都是化學作用，不代表化學作用就是一切。我會愛上誰，這肯定不是生物化學家能夠預測的，我的欲望的誘因也同樣不可知。

一般而言，戀愛的狀態比性欲持久。性欲來了又走，戀愛平均而言至少持續數星期或數個月。不同於性欲，一旦戀愛，我們會覺得整個世界不一樣了。我們的感官、想法、身體感覺都發生變化，自我關係與世界關係也變了。我們會做以往未必會做的事，我們會因為得到對方的回應而狂喜，因受到拒絕而失魂落魄。

要進入這種令人讚歎的狀態，必須有強大的作用力。沒錯！戀愛時我們滿腦子充斥著愛，主要參與作用的有：與注意力相關的扣帶腦皮質（cingulate cortex），和扮演報償中心的中腦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不可獲缺的當然還有各種化學傳訊物質。當我遇到一個深受吸引的人，體內就會釋放出一種苯乙胺（Phenylethylamin, PEA）的荷爾蒙到血液中。讓我覺得那個人非常吸引我的絕非苯乙胺，而是我的心理。能告訴我誰吸引我、誰不吸引我的，其實是我們的潛意識，意識應該也參與了部分作用。荷爾蒙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執行者，荷爾蒙負責啟動相應的（但有時候也可能是相反的）身體反應。這一點後面還會仔細談到。

輔助苯乙胺並與它共同作用的可能還有：使人激動的正腎上腺素（Noradrenalin），讓人興奮的多巴胺，這些荷爾蒙的分泌量會上升，但有助於入睡的血清素則會下降，於是出現一股難以自持、有點神智不清的衝動，再加上一定份量、具麻醉效果的腦內啡（Endorphine）和可體松（Cortisol），飄飄然的陶醉感油然而生。結果就是：我覺得自己精力旺盛，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對象身上，情緒亢陶然。

戀愛真是一種美好的狀態，也許是世間最美的，至少對幸福的戀人而言是如此。我們知道人類會戀愛，但不清楚人類為什麼要戀愛？海倫·費雪提供的答案，並沒有正中紅心，她認為：「吸引力的出現和發展，是為了讓個體在面對諸多不同潛在的交配對象時，能進行選擇，同時儲備交配能量，並將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基因優秀的個體上。」然而看看實際生活，我們既不會找基因優秀的人交配，也不是為了繁衍而去戀愛。所以上述說法似是而非，解釋不通。

如果海倫·費雪的說法成立，那麼世上的社群動物也會藉由戀愛來



選種，而非只有人類才戀愛。這一點難道不必加以說明？況且，正是因為戀愛，人類才會捨棄遺傳條件最優的對象，而選擇心儀的對象。這與海倫·費雪的說法恰好背道而馳。而且，也有男人愛上無法生育的女人，有女人愛上沒有生育能力的男人。此外，如果戀愛是為了選種，為什麼年事已高的人還會想談戀愛？到了老年，就遺傳角度來看，已經沒什麼選的必要了。

戀愛不是為了遺傳的選種。戀愛這種能力，就我個人看來，簡直是演化上最偉大和最美的謎。戀愛除了會對身體造成極大的負擔，心理壓力也不小，所以戀愛狀態不可能永遠持續。一般認為三年是維持戀愛感受的上限，三到十二個月是平均值。根據國際統計數字，分手或離婚平均發生在固定關係的第四年，如蝴蝶般飄飄然的戀愛又退化成毛蟲的醜陋模樣。戀愛時，只看得見愛人的笑靨，看不見缺牙，現在起再明顯不過的就是缺牙。

要解釋性欲與戀愛並不困難，但要解釋什麼是「愛」，就沒這麼簡單了？以往演化理論和生物學並不重視愛。若問誠實一點的生物學家：「什麼是愛？」答案肯定是聳聳肩或翻白眼。事實上，生物學從沒給過「愛」一個明確的定義，生物學談的大多是愛情減弱後的「伴侶關係」。那麼大腦科學家和生物化學家呢？對他們而言，愛當真只是大腦裡的內分泌作用？是一種可以用神經化學作用描述得清楚的狀態？像性欲和戀愛一樣，單憑荷爾蒙分析就能解釋愛？

只要追隨科學記者或愛情專家的腳步，並相信他們的說法，上述都是有可能的。不過這次的答案竟出奇的簡單，關鍵就在於——催產素（Oxytocin）。

## 田鼠教我們的一課

體型嬌小的平原田鼠（*Microtus ochrogaster*）呈棕色，外型並不起

眼。美國中西部草原上住著數以億計的平原田鼠。牠們白天躲在洞穴裡，夜晚才出來吃田裡的穀類，不過沒有造成巨大的農產損失，所以一般人並不認識牠們。

大約十年前開始，平原田鼠一躍成為愛情領域的大明星。原來這種棕色的小田鼠有罕見的特性：牠們忠於伴侶！平原田鼠行一夫一妻制，而且廝守終身。田鼠爸媽會一起撫育幼鼠。這種嬌小的啮齒動物成了天主教性道德標準的典範。一旦交配，公田鼠和母田鼠便進入廝守終身的伴侶關係。在相遇的第一晚，牠們會一頭栽進瘋狂的生物化學狀態中，一晚交配超過二十次。然後一起築巢，每晚緊緊依偎著睡覺，終日形影不離——能教牠們分開的只有死亡。

這不是典型的田鼠行為。平原田鼠的近親高山田鼠（*Microtus pennsylvanicus*）就非如此。牠們的外表跟平原田鼠幾乎一樣，卻是田鼠界的唐璜，沒有固定伴侶；遇上了，只要喜歡就能交配。

這種差異從何而來？為什麼平原田鼠會如此專一？高山田鼠會如此風流？提出這個問題的是腦神經學家托瑪斯·因塞爾（Thomas Insel），和他所主持的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的約克斯靈長類研究中心（Yerkes Reg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er）。沒想到答案竟出奇的簡單，關鍵就在兩種荷爾蒙：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不管這兩種田鼠看起來有多麼像，牠們腦中的內分泌作用卻大不相同。平原田鼠的腦內有豐富的催產素受體（感受器）和抗利尿激素受體（感受器），但高山田鼠卻很少。結果導致截然不同的行為。平原田鼠交配時，催產素會對母田鼠產生強烈作用，抗利尿激素會對公田鼠產生強烈作用。但這兩種荷爾蒙對高山田鼠的影響卻非常輕微。

為了釐清真相，因塞爾和他的團隊進行實驗：他們以人為方式控制田鼠腦內的化學作用。他們先摘除平原田鼠腦內控制抗利尿激素受體的基因，再將此基因植入公高山田鼠的前腦。果然，原本到處捻花惹草的高山田鼠變成了專情的居家好男鼠。接著因塞爾和他的團隊又反過來拆散一對對幸福恩愛的平原田鼠。他們替母田鼠注射催產素阻斷劑，替公田鼠注射抗利尿激素阻斷劑，平原田鼠原本的專情行為立刻消失，牠們

變得跟高山田鼠一樣「毫無選擇性的進行雜交」。

這真是一項驚人的發現，這對人類的愛情有何啟發？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根據科學記者們的著作，我們能學到的可多了。不少人就認為，我們終於找到了「專情荷爾蒙」。德國作家及科技類新聞記者巴斯·卡斯特甚至主張，催產素是「愛情荷爾蒙」。所以，作用在田鼠身上的化學物質一定能為人類的愛情闢出一條康莊大道。

真的嗎？沒錯，人類的確也會分泌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它們早在二十世紀初就被發現了，不過當時的研究重點在於人體內的水分含量和其排泄。根據演化史，催產素應該是一種存在人體內很久的古老激素。它由九種胺基酸組成，連蚯蚓也會分泌。催產素由下視丘製造，再送到腦下垂體後葉，作用類似麻醉劑，會讓人感覺興奮、飄飄然，並具有一定的鎮靜、舒緩效果。

今天一般都認為，催產素受體對人類結合的欲望和能力起著關鍵的影響。蒙特雷加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賽特·波拉克（Seth Pollak）指出，孤兒體內的催產素低於雙親關係密切的孩子。催產素就像一種長效接著劑，不但會啟動產婦的分娩陣痛、乳汁的供給，還能強化母子關係。對兩性而言，它能讓一開始的性愛關係，延續為長久的伴侶關係。

這些講法乍聽之下似乎很合理，卻經不起進一步的檢驗。沒錯，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讓人類產生興奮、陶醉的感覺。性交時，男性會釋放大量的抗利尿激素和催產素，女性主要釋放催產素。這兩種荷爾蒙的分泌量越大，我們就越覺得陶醉。連性交中的陰莖勃起、子宮或陰道的肌肉強烈收縮，都得歸功於催產素。只可惜這不足以推出結論：人類跟田鼠一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就連那些田鼠專家也強調，他們的研究結果不能任意套用在人類身上。因為人類腦中催產素受體和抗利尿激素受體的作用方式，跟田鼠的大相逕庭。

催產素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僅限於性。幾十年來畜牧業的飼主為了讓動物交配，會為牲畜施打荷爾蒙。鴿子和雞在施打催產素後幾分鐘，就會產生交配衝動。至於人類，兩個曾經發生過美好性關係的人，只要彼此看一眼，就會分泌催產素了。由性產生的聯結多少與催產素有關。就

像它的大量分泌能強化哺乳時母親和嬰兒的關係，這種荷爾蒙也會讓我們想與渴望的對象，有身體上的親密接觸。

但是我們會為此而墜入情網，或去愛人嗎？許多實驗證明，光是擁抱、觸摸或撫摩，就能讓身體分泌催產素。這種荷爾蒙不僅能引起興奮，還會帶來滿足和安定感。有一項差別值得注意，性交和自慰所產生的生理反應不同。手淫只能引發分泌少量的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但一次美好的性經驗，縱使高潮過了很久仍能讓我們感覺到「好棒！」就像許多美好的事物一樣，這種感覺會讓人上癮，使人沉迷於性愛，或產生病態的忌妒心。

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可以讓我們快樂得像隻小田鼠，但我們與田鼠的明顯差別在於：這兩種荷爾蒙無法讓我們忠於伴侶！不管催產素是一種「愉悅荷爾蒙」，或許也是一種「聯結荷爾蒙」，它都絕對不是「專情荷爾蒙」或「愛情荷爾蒙」。如果它真是愛情荷爾蒙，那麼平原田鼠就是世上最能愛、最懂得愛，一輩子都活在愛情裡的動物了。如此草率的結論，我想連最固執的生物化學家也無法苟同。

就算有些多此一舉，瑞士伯恩大學動物研究中心的群體遺傳學（Population Genetics）<sup>註63</sup>學者格拉德·赫克爾（Gerald Heckel），仍以實驗破除了「忠誠基因密碼」的美麗傳說。赫克爾對二十五種田鼠進行研究，他發現所有田鼠都雜交，只有平原田鼠例外。這項研究還有更驚人的發現，平原田鼠身上的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受體並非特例，而是常態，其他田鼠也大多這樣。就基因的角度來看，所有田鼠都要忠於伴侶才對，除了兩種的受體較少，其中之一就是高山田鼠。但應然不等於實然，田鼠的實際行為並非如此。如果一切都由控制了荷爾蒙受體的基因來決定，那麼應該有二十三種田鼠很專情，只有兩種很風流。但事實是（無視於基因的既定情況）二十四種田鼠很風流，只有一種很專情。即使是忠誠的平原田鼠，一輩子與伴侶長相廝守，也偶爾會有出軌的行為。

在田鼠身上我們了解到什麼？不像許多專家學者或科學記者以為的，化學作用對人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企圖在基因上尋找專情和風流

密碼的人，可以省省力氣了。赫克爾證明了，在田鼠身上找不到遺傳基因和社會行為之間的必然聯繫。更可以確定的是：「某些哺乳動物只有單一伴侶，這與基因上的細微差異無關。要說如此複雜且重要的行為，例如交配行為，單純取決於基因，可能性實在非常低。」

另有一派說法主張，催產素可以像接著劑一樣，延續性愛關係成為長久的伴侶關係，這結論下得太草率了。愛情多少與催產素有關，這點已無須爭辯。但兩者的關係就像咖哩之於印度菜，沒有咖哩，印度菜就少了應有的滋味；但光以咖哩這個材料還不足以判斷是一道印度菜。

為什麼會這樣？理由一，兩個人之間有聯繫感並不代表就有愛。例如我很尊敬某個人，自覺情感上跟他有所聯繫，但這不代表我愛他，更別說愛得轟轟烈烈、激情或浪漫了。在海倫·費雪的理論中，結合與其說是愛，不如說是一種聯繫感，單靠催產素或抗利尿激素就足以把雙方拴在一起了。費雪認為：「這種情緒系統的出現是為了促進個人有正面的社會行為，並且 / 或是維繫長期的親屬關係，以便履行身為父母的義務。」

不用追問是什麼具有如此神奇魔力，能驅動並操控整個複雜的過程，光是指出：人類在履行「父母義務」時既不需要愛，也不需要男人，就足以推翻海倫·費雪的說法了。事實上，不只現代人在履行父母義務時不需要愛，也不需要男人，古代人如此，甚至連人猿亦然。市民階級理想中的家庭並非生物演化遵循的標準，那只是諸多家庭模式中的一種，而它的未來前景已令人堪憂。

「相守」跟「相愛」不一樣，所以「費雪模型」很難自圓其說（容我稱費雪為催產素主義者）。只要稍微觀察一下戀人對愛情的期待，就能知道兩者迥然有別。對某些戀人而言，「相守」是戀情消失後還能夠對方做的事，因為多少還有感情。若說相守是兩性之愛唯一且真正的目標，難以獲得支持。

理由二，單靠催產素並沒有辦法製造出「愛」，這比理由一更加重要。當我們跟自己心愛的人做愛，被對方撫摸、擁抱或凝視，大腦會分泌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這是身體的生物化學反應。不過這些反應尚未

訴諸語言文字，還沒有自己的名稱，我們必須藉由語言文字去表達和詮釋它。我們會自言自語的說：「天啊，這次我真的完蛋了！」或更確切的說：「我想，我戀愛了！」「我相信，我愛上他（她）了！」「天啊，我愛死他那種笑容了！」

我們一旦開始描述和詮釋反應，便與自己形成某種關係。我們賦予它名稱、說法和意義，生物化學反應變成：我暈了、完了、戀愛了、陷入愛河等等。箇中奧妙絕不是催產素主義者的「荷爾蒙分泌＝感情」解釋得清楚。再舉個例子，當我說：「我還以為自己愛上他（她）了，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根本不愛他（她）。」難道說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會搞錯？當然不是，荷爾蒙既不會思考，也不能主宰我們的想法。我們怎麼選擇伴侶不是由荷爾蒙決定，它也無法控制我們要不要跟某人廝守終身或是在一起多久。簡而言之，荷爾蒙只是咖哩，不是印度菜。

催產素的分泌會影響我，甚至讓我變了個人似的。可是當我的理智告訴我，這段關係不能繼續時，我還是可以結束它。我會努力說服自己：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直到荷爾蒙分泌不再旺盛並漸趨緩和。反過來說，人類同樣可以在情欲不高漲、荷爾蒙分泌不旺盛的情況下，長時間相守在一起。即便遇到讓我們荷爾蒙分泌旺盛的人，自己還是能選擇並決定，要不要跟對方在一起。從平原田鼠到人類複雜的愛情，是一段漫長的道路。

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是喚起愛情反應的兩個重要因素，但光靠它們絕對無法造就我們稱之為愛情的複雜狀態。愛情不是一杯用荷爾蒙調成的雞尾酒，也沒有「愛情荷爾蒙」這種東西。到底愛情是什麼形態？如果它不是大腦裡的內分泌作用，那麼這個不只是性欲、戀愛與相守的古怪玩意，究竟是什麼？愛情似乎能讓我們的情緒劇烈起伏，難道它一種情緒嗎？

## 情緒和感情



好攻擊挑釁的狼遇到了溫柔又有同情心的長頸鹿，狼問長頸鹿：「你愛我嗎？」長頸鹿有些猶豫的回答：「不愛，我想我不愛你。」狼很驚訝：「什麼——你竟然不愛我？」長頸鹿吸了一大口氣，接著嘆道：「現在我的確不愛你。不過等一下也許會改變。五分鐘後你再問我一次吧！」

這是馬歇爾·盧森堡（Marshall Rosenberg）<sup>註64</sup>筆下的小故事。盧森堡是臨床心理學家，提出了「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的觀念而聞名國際。他以動物為主角寫下諸多倡導非暴力溝通的故事。這裡的重點不是非暴力溝通，而是要區分「情緒」與「感情」。

如果愛情真像許多人不假思索以為的那樣，只是種情緒，那麼長頸鹿的回答就平凡無奇，沒什麼好笑了。情緒來來去去，會在短時間內起伏變化。球迷在觀看自己支持的足球隊比賽時，情緒變化多端，谷底和高峰的轉換只有瞬間。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起起伏伏，充滿速度感。另外，十分鐘前飢腸轆轆對著披薩垂涎三尺的人，十分鐘後可能就飽到吃不下了，也是類似的情況。

情緒emotion源自拉丁文的ex motio，原意是經由運動或刺激而產生的反應。就人類演化史來看，情緒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現象。許多動物跟人類一樣也會有情緒，例如獅子會疲憊，蜥蜴會表現出冷，鯉魚會感到餓，蟾蜍渴望交配。這些都是刺激的反應。情緒產生於小腦與間腦。少了情緒，人類將無所適從，我們會不知道冷，不知道餓，失去生命的活力，凡事不感興趣。情緒的產生不是能控制的，我們會不想表現出來，但隱藏情緒並不容易。重點是：情緒是不能讓它失望的！餓了沒有東西吃會很難受，睏了不能睡覺會很疲倦。飢餓或疲倦都是因為沒有獲得滿足而失望。但就我們所知，「愛」不是這樣，原因很簡單：愛不是情緒，它複雜多了，愛是一種感情！

感情是什麼？美國南加州大學葡萄牙裔大腦科學家安東尼歐·達瑪西歐（Antonio Damasio）<sup>註65</sup>教授是這方面的權威。他對感情的定義

是：「綜括來說，感情是由或簡單或複雜的精神評價過程，以及個人素質對此過程的反應而組成。」簡而言之，當情緒誘發想法時，感情就產生了。這整個過程非常複雜，複雜到大腦科學家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我們只知道，如果繼續堅持感情只是由荷爾蒙分泌和神經傳導物質

（Neurotransmitters）形成，那麼將永遠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利用核磁共振成像來觀察病人可以發現，給病人聽美好的音樂時，某些大腦區域的血液流量會增加。實驗主持者可以從螢幕上清楚看見大腦的影像，並測得明確的數據。至於這段音樂誘發了何種性質的感情，恐怕連病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感情越複雜，越難用化學方式來解釋。

感情不只是情緒，不只是一時的「心理狀態」。忌妒、悲傷、思念家鄉，這些都不是核磁共振成像技術照得出來的。海倫·費雪主張愛情是大腦內分泌傳導作用的產物，這是錯誤的。能將性欲這種「情緒」剖析得一清二楚的理論，碰上了愛情這種「感情」就沒轍了。如果愛情真是一時的心理狀態，那它就會像盧森堡故事裡的長頸鹿一樣，五分鐘變一次。

情緒來來去去，但感情穩定許多。感情較普遍、較持續，而且仰賴一定程度的想像。我不需要想像食物就能感到餓，不需要想像床就知道自己很疲倦。但感情不一樣，我得先想到某個人才能為他哀悼、產生悲傷的感情，此時我在腦海裡想像那個人。羨慕和忌妒也是要想到某個或某些令人羨慕或忌妒的對象，才會產生。愛尤其需要對象。當我說我戀愛了，我一定是愛上某個人。我在他身上投射了某些東西，我的願望、夢想與期待，有了特定的對象和目標。

感情（例如愛）也有別於心情。不同於盧森堡故事裡的長頸鹿，愛不視心情而定。心情是易逝的，半是情緒、半是感情。心情和情緒的共通點是不需要對象或具體的想像；心情和感情的共通點是持續的時間比情緒久。例如，我可以一整天都心情很好，或是很長一段時間心情低落，覺得人生一片灰暗。有時候我們很清楚影響心情的原因是什麼，有時候完全摸不著頭緒，連自己也奇怪，心情怎麼這麼好或差。

姑且這麼說，如果心情看起來是一體的，那麼情緒和感情就是一體

的兩面，情緒形諸外，重點在於身體的感覺（冷、餓、累、性衝動等）；感情剛好相反，主要是內在的精神和想法。不可否認的，感情出現時常會伴隨強烈的身體反應，但感情中的想法不像身體反應那麼單純，而是非常複雜的。情緒出現時很容易判斷，例如我好冷或好熱，我覺得好吃或不好吃，我對眼前這個女人感興趣或不感興趣。但感情就不同了，我很難立刻評判自己有多想家或有多平靜。一旦涉及感情，就沒有單純的「是」或「不是」，也不可能翻來覆去。

人類的情緒大同小異，感情卻有著天壤之別，因為每個人的想法明顯不同。從情感到聰明的想法，有很大自由發揮的空間。感情可以擺脫純粹的情緒刺激，想法可以無涉感情而獨立自主。一切看似沒有什麼問題，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絕大多數的人在感情和想法上都表現得一成不變。我們慣於把時間花在相同重複的感情和想法上，而不是去嘗試新的事物。德國知名導演亞歷山大·克魯格（Alexander Kluge）<sup>註66</sup>說得沒錯：「感情是人類生命中真正的居民。」他們還是一群頑固的保守分子。這或許就是人類的改變如此微小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太少對自己的感情進行思考。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感情？為什麼會對特定的事物產生某些感覺？對待感情，我們今天仍是強烈的市民階級心態：感情就像金錢一樣，可以「有」但不可以「說」。「對於這件事.....您的感覺是.....」這是談話性節目主持人最喜歡的提問方式，恰好印證了這個情況，假如我們能理所當然的談起自己的感覺與感情，我們就不會對這類問題的答案如此好奇了。感情可說是人類自我探索中最後一塊有待開發的領域。可惜，我們在這方面的想法相當有限，了無新意。

感情就像接著劑，把你我黏在一起。感情決定了什麼與我們有關，我們會在乎什麼。如果沒有感情，一切都無所謂了。如果沒有令人激動的感情，就算是最振奮人心的想法也一無是處。如果人類沒有了感情，人生還值得過嗎？會有人希望像《星際爭霸戰》裡的史巴克（Mr. Spock）那樣不帶感情嗎？那一定活得有如行屍走肉。

願望是最吸引人的感情之一。說到這裡，又回到我們的主題

「愛」。人活著不能沒有願望，尤其是某個特定的願望——愛人與被愛。這個願望一開始受到情緒的推動，身為人，我們有種種需求，想與人親近、受到呵護、得到關愛、感受刺激，這都是很情緒的。但愛不是情緒，而是一種感情，並涉及想像、想法、觀念等。它如何從簡單的情緒需求變成複雜的愛情觀？兩者之間有沒有明確固定的聯結？在動物的世界中，聯結欲望和行為的橋樑稱為本能，人類的愛也是如此嗎？它是一種本能嗎？

## 愛是一種本能？

出生於美國新罕布夏州沙柯拉瓦鎮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sup>註67</sup>堪稱現代本能學說之父。任教於哈佛大學的詹姆斯不僅對哲學，也對心理學有濃厚的興趣。十九世紀末的心理學尚處於草創階段，雖然以人類經驗為研究目標，但當時的立論基礎仍薄弱，被視為半科學。德國生物學家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sup>註68</sup>在德國建立了第一個實驗心理學的研究中心，企圖為心理學奠下紮實的自然科學基礎。之前心理學被譏為「經驗心靈學」（Erfahrungsseelenkunde），自此始成為一門研究學科。

一八九〇年詹姆斯出版厚達千頁的《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書中的第一個重點是：人類經驗到的一切心理，都是生理刺激的結果。就像今天催產素主義者視愛情為全然的生物化學反應一樣，詹姆斯也認為人類的所有感情都可歸因於生理。對詹姆斯而言，無論是情緒或感情，都是生理變化引起的。換句話說，我們不會因為難過而哭，只會因為哭了才難過；我們不會因為某人的吸引而產生生理反應，只會因為出現了生理反應，才覺得受到吸引。

那些主張用生化「公式」破解愛情的大腦科學家與科學記者，遵循的正是詹姆斯的傳統。但睿智如詹姆斯，生活在一百年前，思想卻比今

天的許多生物化學家及演化心理學家進步。詹姆斯提出了第二個重點。他認為身體雖然訂下各種感覺的遊戲規則，但它發出的命令並非總是明確的。詹姆斯說，在真實生活中，我們會同時產生多種本能反應，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出現性衝動的同時，感到羞怯；出現好奇心的同時，感到恐懼；看到有人滑倒雖然感同身受，卻忍不住想笑。所以，我們的感覺一如我們的本能，形形色色。不同的情緒雖可歸因於神經傳導，它們還會在我們的腦中形成「混雜感」。

心理學若只是研究感官刺激與反應機制，並無法完整解釋人類的行為。誠如詹姆斯所言，從科學驗證的反應機制到複雜且全面的人類行為，是條漫長的路，對經驗心理學而言甚至遙不可及。詹姆斯認為，人類很可能是唯一會與自己對話的動物。我們的賓我（Me），即自我，與主我（I），即意識流，日日夜夜、每分每秒都在窸窣窸窣的評論個不停，甚至能讓原本目標明確的本能招架不住。詹姆斯認為，就在情緒與想法擦出激烈火花的地方，就在刺激與反應模式因經驗而發生變化，本能受到個人模式影響的地方，自然科學一門的心理學便遇到它的瓶頸。因為，在沒有明確自然法則的地方，人類也無法訂下什麼規則。

本能是人類無法操控的驅動力（Antrieb）。它讓我們活得有目標，但僅止於生物層面。就社會和文化層面而言，本能還需要其他的輔助與修正。比方說，身而為人，我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攻擊性、克制欲望、安撫恐懼。或許，真實世界就存在於本能與行為的拉距中。愛最美好、最撫慰人心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只是一種本能，它遠遠超越了本能。愛是一種需求，同時也是各種想法的匯集；它是人類天生的需求，同時也是靠經驗累積逐漸形成的能力。

所以，浪漫愛情的「愛的本能」（Liebestrieb）大概只存在海倫·費雪這些自恃甚高學者的幻想中吧。他們頑強的想以電腦儀器來證明所謂的「愛的本能」，然而這種作法並沒有找到真相，只顯得荒謬。海倫·費雪以核磁共振成像為四十個受測者做了「愛情速配指數」（Love-o-Meters）分析。她讓受測者看情人的相片，同時觀察他們的腦波變化。根據費雪的說法，「愛情映像管」呈現出「『墜入愛河的大腦』的神奇影像」。以客觀的講法，那不過是間腦裡主司感覺和情緒的中腦邊緣系



統<sup>註69</sup>血流量突然增加了而已。事實上，當我們聞到愛吃的料理或聽到愛聽的音樂時，腦子也會出現相同的反應。

藉由電腦螢幕的影像來說明「愛」，這種作法無異於指著「開關」解釋「光」。事實上，「愛」這個過程涉及好幾個層面：某人對我造成強烈的感官刺激（不一定是性方面），我被那刺激「煞到」，這是一種情緒。接著，我察覺到自己的內在變化，於是進入感情的層面。我不只對那個人發出的訊號有反應，我還會思考讓我產生反應的原因。我可以清楚分辨自己的狀態，是墜入情網就是墜入情網，若是深愛就是深愛。在第三個階段，我會根據對方的期望和需求，有意識的與對方互動，這是經過反思的行為。

這個過程不只在剛墜入愛河時發生一次，它會反覆出現在我們的愛情關係中，前提是真的發展成愛情。我們會持續受到對方的牽制，雖然未必像邂逅時那麼震撼。我們會以對方的需求為依歸，調整自己的行為，即使不是全然的順應。我們會為對方設想，至少相信那是對彼此都好。情緒、感情和行為，三者共同作用，便形成我們稱之為「愛」的東西。三者缺一不可，少了其中任何一項，我們就會覺得這份愛沒有實現、不完整，或有殘缺。

想了解愛，除了探討生物化學、本能學說，還得進一步認識人類的心理和文化。二百萬或四百萬年前的人類祖先，在遇到心儀的對象時，他們的內在感受肯定有別於今天西方文化對「愛」的理解。我們現在具備的情緒反應，就人類歷史而言已經存在很久了，但我們的觀念和想法並非如此，而是屬於這個時代的。若真想了解愛，就不能把愛只當作一種生理反應，必須考量其他層面，並把愛視為一種要求的態度，對別人，也對自己。在這點上人類或許不同於黑猩猩，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正在愛，行為舉止也會有意識的像戀愛中的人。

我們會美化、抬高對方和自己，攜手演出一部冒險電影，而且彼此都心知肚明，劇情由我們來主導。兩人秉持的信念是：「愛」確實存在，彷彿它是具體、真實不虛的東西，可以擁有，也會失去；它就像虛無飄渺的一片霧，籠罩著漫遊其中的戀人。



# 話說「愛」和「桌子」

語言很奇怪。它不是很合邏輯，也不特別有條理。為了探究真理一心想釐清語言的哲學家，大多徒勞無功。理由很簡單，語言最初的目的不是當作一種認知工具，而是為了溝通。

舉個例子來說：「她來自愛與盧森堡。」這句話的文法沒有問題，但意思很奇怪。英國學者吉爾伯特·萊爾（Gilbert Ryle）<sup>註70</sup>畢生致力於研究語言的怪異現象。他就讀於牛津大學時，從偶像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例子中學到，即便是「理想語言」也不可能沒有歧意和誤解。萊爾於是放棄追求絕對正確的烏托邦式語言，轉而尋找符合日常語言應用的聰明規則。

萊爾只有一本真正重要的著作《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一九四九年，這本書一出版，旋即造成轟動。萊爾以充滿熱情的筆調和豐富的舉例，說明人類精神並非獨立的存在，而是逐漸受到身體和大腦生物條件的影響。這似乎不是什麼新觀點，亞里斯多德、啟蒙時代的唯物論者、十九世紀許多哲學家，或威廉·詹姆斯，都有類似看法。然而其革命性意義在於，提出這項觀點的是一位語言哲學家，他源自一個截然不同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哲學家只用邏輯，而非生物學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在一九四〇到五〇年代，大腦科學試圖測量腦內最簡單的電流活動狀態，萊爾便將希望寄託在行為研究上。他很快就了解到，大腦的運作方式和我們用來描述人類精神狀態的概念，有著很大的差距。「精神」（Geist）這個詞存在超過二千年，但它顯然無法對大腦狀態做一對一的說明。同樣的困境也出現在心靈、意識、自我意識、專心等詞彙上。這些用語全都不適合描述腦內的電生理變化，也無法像鑰匙一般開啟大腦這把鎖。他們只是停機坪上到處亂竄的行李車。

萊爾孜孜不倦的從語言中過濾出不合適的情況，並稱之為「範疇錯誤」（category mistakes）。他發現語言中充斥著荒謬的歸類。例如我們會說：「球隊正進入球場。」但事實上進入球場的不是球隊，而是個別的球員。萊爾認為這是典型的「範疇錯誤」，因為球隊並不會跑，球隊和球員分屬兩個不同的範疇，不能互相替換。在萊爾看來，大腦狀態和精神概念的關係也屬於這類錯誤，一個好比是球員，另一個是球隊。若想在腦中尋找「精神」，無異是緣木求魚，就像我們無視球場上的隊員，卻要找出一個叫球隊的東西。

引申到愛情上，萊爾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我們腦子裡並沒有「愛情」這種東西，只有生化反應；第二、我們應該避免用單一名詞，例如「愛」，去涵括各種情緒與精神狀態。萊爾認為，這種混用實在有欠思考，會誤導我們產生奇怪的看法，以為「愛情」真有其物，就像桌子一樣的真實。

對於這兩個結論，可以有什麼看法？第一、萊爾說的沒錯，要從中腦邊緣系統的生化作用推論「浪漫愛情」的存在，是很困難的事，前面已經詳細討論過。催產素也不是「愛情激素」。如此主張的人，愛情這個多彩炫目的綜合體會讓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愛情牽扯的範圍比任何一個生化理論都要龐雜廣大。

第二個結論呢？討論「愛情」或寫一本相關主題的書是錯的嗎？（當然，萊爾肯定不會這麼做。）我要反駁這一點，事實上情況剛好相反。倘若愛情就像鉛筆、樹木那樣具體、清楚明確，大可不必為它長篇大論。如萊爾所說，「愛情」就像其他名詞一樣，以日常口語的方式對真實進行分類，並透過概念來掌握難以捉摸的事物。我們不能因為愛情無法以經驗證實、不符合大腦的狀態，就認定沒有理由談論愛情。其實正因為這樣，愛情更需要解釋，即使無法找到自然科學能驗證的真理。

談論愛情，在最好的情況下，能提升心理學的可信度：我們感覺到，我們想的是相同的事，能夠理解彼此。這可是一項非同小可的成就。持相反意見、滿腦子想著推翻詞彙應用的那些人，只是重蹈維根斯坦的覆轍：維根斯坦認為語言是描述事實的工具，而非人際溝通的工

具。但事實上，我們在用字遣詞時，本來就會受各種心理變化、感受和意向所影響，而非像萊爾強調的那樣，能毫無預設的去使用文字、詞彙。縱使愛情不是存在於真實世界裡的具體之物，但戀人在他們的「愛情」裡，攜手創造了一部屬於他們的電影。當我們一頭栽進愛河，看見的反而不是個別具體的球員，而是存在於概念中的球隊。

所以，如果真想弄懂愛情，除了情緒，還得探討觀念世界及各種既定和非既定的法則。像飢餓這類的情緒，人訴諸「自身」（an sich）就能感覺到，感覺是再確定不過的，冷就感覺冷，累就感覺累。但感情就不一樣，感情無法訴諸「自身」，感情得透過詮釋。「愛情」也是一種詮釋出來的感情，一種名為「愛情」的詮釋。其實，我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自己的感受，未必都能清楚表達。我們的感受中常摻雜著混亂的想法和觀念，搞得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所以才會有人在一起很久了，還不清楚自己到底愛不愛對方。我們要傾聽內心的聲音並自問：這段感情是否符合自己對愛情的理解及看法？

感情能賦予生命色彩，至於是哪種顏色？就取決於我們了，就算不是完全自由、無所限制，那顏色畢竟是我們自己挑選的。如同威廉·詹姆斯所言，我們不是有那些感覺就算了，我們還會解釋它們。吉爾伯特·萊爾也讓我們了解，在名詞的背後隱藏的並非什麼客觀事實，而是概念。所以說，有些人嚴重高估了愛情裡的情緒比重。愛情帶有情緒成分，而誇大情緒的影響力，正是營造愛情的一種典型作法。想像或自以為「操控情緒的那些內分泌，正在對我發揮莫大的作用」，這種想法或許也是愛情的一部分。但切莫輕忽事實，對於愛情，內分泌或情緒不如我們想像的能夠呼風喚雨。

如果愛情不等於情緒，而是我們可以參與創造的東西，那麼它的建造藍圖是什麼？在我們的頭腦中，愛情遵循的遊戲規則是什麼？它的啟動開關是什麼？為什麼？當我們愛時，會有哪些行為和表現？

這些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回答，一個是心理學的，另一個是社會學的。在一般情況下，愛不是發生在無人孤島上，它既是個人概念，也是社會概念。

讓我們先從個人概念開始談起。

---

註61：一八八三至一九六九，存在哲學代表人物之一，曾修習醫學、心理學並執業。

註62：Philipp，源於希臘文的男性名字，原意為「愛馬者」。

註63：又稱族群遺傳學、群體遺傳學，是研究群體的遺傳變化規律的學科，屬於遺傳學分支。

註64：一九三四年生，早年生活在充滿暴力的環境，促使他想要了解什麼讓人們互相傷害、怎樣的溝通方式有助於和平解決矛盾。獲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非暴力溝通旨在，突破引發爭論的思維方式，和平化解人際衝突，進而彼此尊重互愛，同時療癒傷痛，建立和諧的人生。

註65：一九四四年生，在研究情感的神經生物學方面享有名聲，著有《笛卡兒的錯誤》。

註66：一九三二年生，德國新電影導演之一，作品有《昨日女孩》、《帳棚頂上的馬戲團藝人》等。

註67：一八四二至一九一〇，機能主義心理學和實用主義哲學先驅，美國心理學會創始人之一。建立美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

註68：一八三二至一九二〇，現代心理學奠基人，公認也是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創建者。其實驗方法結合了哲學內省法與實驗室儀器。

註69：作者在提到中腦邊緣系統時，大多稱之為「間腦裡的中腦邊緣系統」（das mesolimbische System im Zwischenhirn）。但根據神經解剖學，間腦（英文diencephalon，德文Zwischenhirn）和中腦（英文mesencephalon，德文Mittelhirn）指的是不同的腦區，但間腦下方與中腦相連。間腦裡的下視丘主司性欲，中腦邊緣系統則與情緒有關。本書作者似乎刻意將中腦邊緣系概括到間腦裡。

註70：一九〇〇至一九七六，日常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 第八章 間腦與我

想愛就能愛？

### 「文化生物」之愛

「文化」是生物領域的延伸，但用的是不同方法，若將文化簡化為生物學上的「策略」，恐怕會誤以為人類「退化」了。追溯至四百萬年前的過去，無助於解釋當今的人類及其行為。打著宏觀旗號，以古論今的作法其實很短視。

「一言以蔽之，人類的『真實本性』乃……」這種「一言以蔽之」根本不存在。關於人類本性的描述通常了無新意，徒增臆測。演化心理學家口中那些純粹形式的「男人」與「女人」，並不存在，若遇到，也是千載難逢。大多數人的實際情況與生物學界的陳腔濫調，相去甚遠。

過去四十年，德國社會開放許多，發生性關係的機會遽增，但是新生兒的數量下降。唯有將人類視為「文化生物」（Kulturwesen）才有辦法解釋這種現象。一九五〇年代德國人類學家阿諾德·蓋倫（Arnold Gehlen）<sup>註71</sup>提出「文化生物」的概念。身為「文化生物」，代表了許多意義：文化生物的生命不是由基因決定，不是由情緒或感情做主，也不是由思想來操控。關鍵的影響力來自其他的文化生物。文化生物稱自己為「我」。這意味著他們對自己和他人有某種（持續變化的）看法。文化生物會清楚表達情感，或是加以隱藏；他們會欺騙別人，捏造些什麼，或是自我欺騙；他們也會感到不安、憂心和焦慮。他們不只扮演一種社會角色，而是同時扮演多個。對文化生物而言，在一個人身上可以出現互相矛盾的想法或是對立的感情。所有這些特質，會讓人與人之間互相吸引或排斥。

愛情之於文化生物，它意味著：「愛慕」、「戀愛」或「愛」，不只是間腦裡中腦邊緣系統的内分泌作用，它們也牽涉到個人的自我關

係。我們對他人有反應，無論是使對方興奮、受到吸引，或是感到幸福，都能讓我們快樂而滿足。當我們和伴侶或性伴侶相處時，我們的興趣並非機械的受制於基因的自私傾向，我們玩的是一種社會遊戲，在這個遊戲中，我們透過他人的目光看見自己。我們散發的光芒，就像撞球檯上的撞球碰到了檯邊，會從他人的眼光反彈回來。無論是我們整個人生、性愛、聯結關係與厭惡感、自我形象與自我價值感，都是透過「檯邊的反彈」這種方式建立的。

人類是一種有趣的物種，比演化心理學家要我們相信的有趣得多。不是所有女人都想找一張有價值的長期飯票，也不是每個男人滿腦子都在盤算怎樣把最能生的女人拐上床，好出清精子存量。許多男人和女人寧願選擇不完美或不匹配的對象，或許是出於個人偏好，但也可能是因為「愛」！

人類生命有意思的地方在於，無法憑個人或他人的直覺掌控一切。換句話說：我們很少真的知道他人想要什麼。這其實很好。如果隨時隨地都能憑本能判斷對方的意圖，我們的生命會多麼無趣。幸好真實狀況是，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永無休止的遊戲，也就是詮釋的遊戲。

以「性」為例。外表強壯的公鹿彷彿在對母鹿宣示：我是妳的Mr. Right！而母鹿也能憑本能知道，與這頭公鹿交配是對的選擇。但人類就不一樣了，我們的情況複雜許多。大屁股的美女、寬肩膀的帥哥或許迷人，但笑容不對勁或話不投機，那會澆熄了我們的熱情。何況所謂的優質基因根本無法告訴我們，對方在做愛時是否體貼？懂不懂情色的想像和創意？感不感性，有沒有自信？令人跌破眼鏡的情況不勝枚舉。臉部線條嚴峻、濃眉怒眼的男子骨子裡是溫柔多情、善解人意的小男人；肩膀狹窄、身形瘦小的男子，實際上是叱吒風雲、頂天立地的大男人。中看的美女上了床不一定就能叫人銷魂，不中看的醜女上了床也未必讓人不滿意。

相較於對「性的品質」的主觀評價，我們更要知道，做愛的目的極少是為了生育，當然也不全是為了滿足性欲。除了性欲，催產素主義者還留意到床上的重點，即做愛後的「相守」與相依偎。但他們完全忽略



了一件事，不靠荷爾蒙卻能在中腦邊緣系統產生一種平凡的作用：自我肯定！

性在心理學上是個複雜且寬廣的領域。性伴侶眼中所反映出來的我，很可能比我們以為的還要多。性對人類而言，幾乎都是令人興奮、值得興奮，或覺得興奮的，如此特殊的性質，肯定與灰伯勞和箭毒蛙所經驗到的大不相同。對我們而言，性不只是一種個人的興奮狀態，它還能讓我們藉由「撞球檯邊的反彈」，來獲得某種「自我經驗」。所以，覺得自己夠不夠有男子氣概或女人味，並不是荷爾蒙的問題。對方的反應、對方的眼神、對方的話語，這些因素的重要性，絕不亞於荷爾蒙。

所以做愛好比打撞球，會有一個「我的形象」從對方那裡彈回來。與人做愛的刺激與滿足感，絕非自慰所能達到，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這是一場藉由「共感」（**empathy**）才能完成的遊戲。我們毫無保留的奉獻自己給對方，透過這種方式最終贏得的、反射回來的，卻也是我們的自我。我們滿足對方的性欲，不是出於無私，也不是完全無我的付出，而是透過「反彈」獲得心理上的滿足。當然，這是指具有撞球檯邊般功能、令人滿意的性愛，不是那種有去無回的單向射門遊戲。

人類性愛的玩法花樣百出，讓演化心理學家束手無策。在性能力上，人類並不是最強的動物，但在性行為上是最有趣的，這要歸功於文化。相較於人類，狒狒園裡的交配過程無聊至極。人類在扮演性愛角色時遵循的是藝術法則（**Regeln der Kunst**）；他不但在扮演角色，同時也在玩他的角色。若以演化心理學的立場來看，做愛時根本不該出現主人與奴隸的幻想，也不該有戀物癖。口交就讓人猿感到十分困惑了。人類有許多性愛行為，以生物標準來看，根本是毫無意義且偏離的。如今還有教會企圖以演化論來箝制脫韁的文化，他們似乎沒注意到，不只在所謂墮落的工業國家中，生物學標準不再是標準，在開發中國家、沙漠地區、極地和雨林，幾乎全世界都不是了。

造成這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人類有辦法跟自己的心理（心靈）玩遊戲。人類是一種極具想像天分的生物，而他也懂得運用這項能力。一百年前，威廉·詹姆斯將我區分為「主我」（意識流）與「賓我」（自

我），以釐清大腦中共同作用的各種我。這只是開始。一九二〇年，佛洛伊德將我畫分為三級：「本我」（Es）、「自我」（Ich）和「超我」（Über-Ich）。佛洛伊德潛意識的「本我」可看成詹姆斯隱晦不明的「意識流」，「超我」則可類比為由社會塑造出來、很愛發號施令的「自我」。而夾在這兩位難伺候的主子之間、左右為難的僕人，就是佛洛伊德的「自我」。當初佛洛伊德並不滿意這個三分法模型，如今它們已聞名全球。數不清的心理分析師將它們植入在躺椅上的客戶的腦袋裡。晚近的大腦科學家則分出七到九種「我的狀態」（Ich-Zustände），這些狀態會在我們的感覺或思想中，彼此互補、滋養、交錯與相疊。從詹姆斯兩個人玩的對弈遊戲（二因論），到了大腦科學家就變成多位玩家（各種「我的狀態」）一起上線的電腦遊戲了。

做愛時，各種「我的狀態」會一起動起來。「身體的我」會因荷爾蒙分泌而出現強烈反應；「作為經驗主體的我」感受到自己進入一種高度興奮的狀態；「傳記的我」（autobiografisches Ich，或譯「記錄生平的我」）會滿心歡喜的想著，這一刻我真的跟心儀的對象上床了，共同經歷一次親密的接觸；但同時「道德的我」也會不斷冒出頭來提醒我，我在做的事情是錯的，因為我或對方或我們兩個都另有固定的伴侶。

性愛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大致如此。但切記，千萬不可太過執著於「我的狀態」的既定名稱。目前已約略知道哪個腦區和哪種「我的狀態」有關，對於吉爾伯特·萊爾敲著棺材發出的叮嚀，別充耳不聞，無論是「身體的我」、「作為經驗主體的我」、「傳記的我」或是「道德的我」，這些名詞全都是停機坪上到處亂竄的行李車。

總之，「做愛」和「知道自己正在做愛」，是兩碼子的事！置身其中，同時又是情況的觀察者，是做愛的誘人之處。雖說做愛的至理名言是「先把腦袋丟一邊」，不過這很難做得到。我們是不該讓想法干擾或阻礙我們做愛，但也無法將它們完全摒除在外。飲酒微醺最感愜意，前提是意識還算清醒，能辨識周遭發生的事。相反的，若喝到爛醉如泥、不醒人事，就毫無樂趣可言，更遑論刺激了。

性愛吸引人（或不吸引人）之處，就在於它是一種非常複雜、集各

種意念和觀點共同作用的行為。外遇和出軌的魅力之所以無法擋，並不是因為我們在追求最佳基因，或被先天的繁殖衝動牽著鼻子走，而是我們渴望獲得一個全新的自我形象——深具吸引力、令人怦然心動、魅力四射；我們渴望跳脫老夫老妻多年相處後，再熟悉不過的刻板形象。有時候得到「不應得」或「名不副實」的讚美，比得到「應得」或「名實相副」的令人開心。所以，陌生人的恭維或獻殷勤往往比老夫老妻的讚美來得受用。伴侶之間的心理互動越不複雜，彼此的角色符合預期、形象固定、猜得透彼此，發生外遇的機率就越高。可能發生不等於一定發生，也視個人或社會的道德標準而定，以及個人的需求有多強烈、有沒有機會。

一如情緒衝動之於愛情，性本能對於性行為的重要也常被高估了。雖然性本能會引起性欲，但不是所有的性欲都起因於性本能。性欲有自己的需求和側重點。如此才能解釋，為什麼我們跟某人在一起後，會喜歡那些我們跟別人在一起時無法忍受、討厭或不屑一顧的事物。這除了跟氣味或化學作用有關，絕對也跟存在於兩人之間的感官和思想上的張力有關。對我們而言，從他人眼中看到正面的自我形象，永遠是我們獲得生命活力的靈丹妙藥。在性愛中、在戀人的眼中得到自我認同，絕對是天底下最值得追求的一件事。性愛如此，愛情又何嘗不是這樣：我們每天最在意的就是，自己在那個特別的人的眼中是怎樣的形象。

## 他人眼中的我

他是法國勒阿弗爾市（Le Havre）一位年輕的高中教師，熱愛電影和爵士樂。在同事的眼中，他自以為了不起，又傲慢，大家都避免與他往來，但他不在乎。當出版社決定不出版他的論文和著作時，他感到灰心喪志。幸好學生們熱愛這位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六公分，戴著厚重眼鏡，頭腦犀利，講起課來充滿熱情，亟欲帶領學生一窺哲學堂奧的老

師。

一九三六年，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sup>註72</sup>三十一歲，他所撰寫的《自我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Ego*）被刊在專業的哲學期刊上。在此之前，他熱中於鑽研佛洛伊德，並且把重點放在潛意識的研究上。後來他受到當時幾位哲學大師的影響，例如伯格森

（Henri Bergson）<sup>註73</sup>、胡賽爾（Edmund Husserl）<sup>註74</sup>、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sup>註75</sup>，轉而注意到思想所具有的感官意義（感性的面向）。

上述三位哲學家都以感官知覺（*Wahrnehmung*）作為其哲學思想的基礎。我們所掌握的事實永遠都只是我們所理解的事實。我們的感官如何經驗這個世界，決定了我們怎麼思考；我們怎麼思考，又決定了世界將如何在我們面前開展。

在沙特面前開展的是個悲傷的世界。勒阿弗爾高中對於沙特這樣的人而言是個貧瘠的地方。他覺得自己既孤單又疏離，周遭的人大多難以忍受。他染上迷幻藥麥司卡林（*Maskalin*）後，情況更糟，他變得沮喪，不時心慌，並開始出現幻覺。但他仍勤奮不懈的撰寫論文，與周遭環境的疏離感促使沙特思考：人是用什麼方式認識自己？人如何形成對自己的看法？沙特試圖在《情緒理論大綱》（*Esquisse d'une theorie des emotions*，一九三八）中處理威廉·詹姆斯的基本立場：人類的各種感覺與感情都不過是神經刺激的一種反應。

沙特對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批評詹姆斯不該把心理層面的問題化約為生理層面的。英國腦神經科學家查爾斯·史考特·薛靈頓（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sup>註76</sup>，在二十世紀初藉電生理學（*Electrophysiology*）詳細區分大腦各部位。沙特直接向他拋出這樣的問題：「生理反應，不管它到底是什麼，真的能解釋感情所具有的組織性質？」沙特心裡有清楚的答案，他的答案是：不能！當然不能，因為感情乃大於間腦裡各種生理反應之總合。

同樣的理由也可以拿來反駁今天的催產素主義者。沙特在《自我的超越性》中表示：我們的心理絕不等同於純粹的生理反應，心理永遠與所知的情緒和所知的感情密切相關。例如，當我說「我想家」，那麼我

必須知道：一、自己正在想家；二、什麼是想家，否則我只會覺得心情不好。

我們的意識性思考（bewusstes Denken）會詮釋身體反應並賦予它一個形式。然而惱人的是，我要描述自身感受時，一定得先回想和反思。這又意味著，我必須與我的感受保持距離。於是乎，「我的感受」和「我對這項感受的解釋」永遠不可能是同一的。也就是說，我的意識決定了「我是誰」、「我是如何像我自己所詮釋的那個人」。人類對「我」的看法都是一種自我反思的發明。至於意識尚未介入的那個「前意識的我」（vorbewusstes Ich），我們根本無法掌握，所以沙特說：「自我（Ego）不是意識的主人，而是意識的對象。」沙特甚至這樣結論：人會不斷發明新的自我。「我」就像是「自我詮釋」握在手中把玩的一顆球，「對意識而言，它（自己的『我』）甚至不比他人的『我』更為明確。」

沙特認為，這種不確定性讓人自由。但我們也想說：這種不確定性不同時也讓人不自由？由於我們無法天生就知道自己是什麼，而被迫依附在他人對我的評價和判斷上。唯有在與他人的互動及比較中，我們才能找到並辨認出「我是誰」。倘若世上只有我一個人，或許我永遠無法知道有「我」、「我是我」。因為要知道「我是誰」、「我是怎麼樣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我不是誰」、「我不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的「自我」和「自我價值感」藉由不斷的自我確認而建立。我們的特質、優缺點，對自我吸引人、魅力、影響力的想法，都來自與他人及環境的互動。沒有人能完全置身「比較」之外。我們在觀察別人的同時，也在觀察「別人怎麼觀察我」。這整個複雜的過程，沙特的啟發者胡賽爾稱之為「返回式共感」（reterierte Empathie）：一種會返回自身，自覺與己有關的共感。人類在這方面可說是天賦異稟，登峰造極，動物界中絕無僅有，因為人能做到：我理解你理解我理解你。

我知道我是誰，是因為我能夠區分人我。我們會注意到自己的天分、能力與正面特質，是因為我們看見他人不具備這些或只有一點。我們的獨特性和缺點都是這麼確立的，而別人看待我與看待他人的方式也

不同。所有這些塑造了我們的自我認知，即「自我形象」。這形象無異於是我在他人眼中形象的多重濾光反射。我所享有的自由在於，我對他人給予的評價和判斷，並不會照單全收，也不會一視同仁。通常我們會比較重視身邊的人對我們的看法，比較不重視陌生人的。但也不總是這樣。在乎陌生人的看法遠超過親朋好友的人，在自我認知方面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實質被表象所取代了。

我們自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我們就會是那樣的人，但我們的自我認知通常依附在他人對我的認知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那麼無法忍受他人的藐視。獲得他人的重視是我們建立自尊與自我價值的泉源。自己有沒有性魅力，對許多人（就算不是所有人）而言，並非無足輕重的一件事。有位女性友人最近唉聲歎氣的跟我抱怨：「瞧他們看我那種中性的眼神，唉……」年紀大了以後，她常感嘆許多男人不再把她視作性感尤物。

我們都必須藉由「他人眼中的我」來勾勒自己的輪廓。在諸多「我的形象」中，最重要的就是「那個人」對我的看法，我重視他（她）甚於任何一個人，那就是我愛的人，或愛我的人。

## 你的手臂擁抱著，我之所以為我

躺著，在你身邊  
我躺在你身邊，你的手臂  
擁抱著我。你的手臂擁抱的不只是我。  
你的手臂擁抱著，我之所以為我  
當我躺在你身邊  
你的手臂擁抱著我。



「關於愛情，其實只有戀人和詩人有資格談論或書寫，他們才是真正被愛情感動的人。一旦專家學者強行介入，愛情往往只剩下欲望、反射動作、看似可執行或可學習的行為方式、生物數據、可測量的生理反應與可驗證的心理反應。雖然它們都屬於愛情現象，但靠它們並無法掌握愛情。」慕尼黑心理分析專家弗里茲·李曼（Fritz Riemann）<sup>註78</sup>在《愛的能力》（*Die Fähigkeit zu lieben*）一書中寫下這段至理名言。這本談論愛情的書沒有詩情畫意，卻是研究愛情不容錯過的傑作。此書立意甚佳，反對將愛情化約為欲望、反射動作、可測量的生理反應與可驗證的心理反應，但誠如作者所言，最有資格對愛情發表高見的還是偉大的詩人和戀人。

開場引用的詩句出自奧地利詩人恩斯特·楊德，可謂現代情詩中最美和最真的一首。楊德和沙特一樣都是高中教師，同樣深受憂鬱所苦。對他而言，「躺著，在你身邊」或許正是自我超越的一種方式。光是「躺」和「擁抱」兩個動作，就足以營造出愛人內心深處親密的信賴感。在擁抱中，被擁抱者透過對方獲得自身的意義：「你的手臂擁抱著，我之所以為我 / 當我躺在你身邊 / 你的手臂擁抱著我。」

透過對彼此的意義，戀人又賦予彼此意義。我們從父母那裡本能的感受到第一份受重視的感覺，從那一刻起，我們就擺脫不掉對重視的渴望。父母關懷我們的程度和方式，影響了我們一輩子，影響所及包括：對真摯情感的追求，渴望被呵護、有安全感、穩定感，以及個人對親密關係和人我距離的需求。

人猿（包括人類）都有一項特徵，當對方在我面前表現出某種感覺時，我也會產生相同或類似的感覺。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稱之為情緒的「感染」作用。幼兒時期最初的愛的體驗，通常源自於此：他對我笑，我也對他笑。接著進入較高的意識階段，這在人猿身上已觀察得到，我們會有意識的製造感染力：為了讓他人對我們笑，我們會先對他人笑。再來是第三階段，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評估他的情緒和目的。人類大概從兩歲開始就能清楚分辨，我願意對誰笑，不願意對誰笑。

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就得具備模仿他人感覺的感受力。一九九二年，義大利神經學家賈柯莫·里佐拉第（Giacomo Rizzolatti）<sup>註79</sup>帶領的一組研究人員有突破性的成果。在以獼猴為對象的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了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在第一項實驗中，先規律的給一隻獼猴堅果，讓牠去抓取。在第二項實驗中，獼猴待在透明玻璃後面看著人類取代牠做同樣的動作。令人驚訝的是，兩項實驗結果顯示，獼猴腦部出現完全相同的反應。顯然牠把自己投射到那個人身上，使獼猴感同身受的那批神經元，學界命名為鏡像神經元。

從鏡像神經元到楊德的現代詩，這條路並不漫長。對於他人的情況感同身受，這種能力應為人類祖先帶來不少益處，至少沒讓他們迅速滅絕。能解讀、評價族群中其他人的情緒，並及時給予反應，絕對不是壞事。隨著感同身受敏銳度的不斷提升，它勢必會從感官層面轉移到精神層面。換句話說，當有人對我說「我愛你」時，我不僅會期待對方懂得我的本能需求，還會期待他自覺的，即有意識的，設身處地為我著想。透過這兩點，我知道對方的想法，並確定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重要性。

「感同身受的能力」和「期待對方設身處地為我著想」，此乃愛情的兩大基石。有些心理學家或心理諮商師喜歡鼓吹，光靠所謂的聯結荷爾蒙就能推動愛情，並搞定一切，其實那些荷爾蒙不過是形成愛情的基本前提，並不是愛情的全部內容。

「相愛」和「相守」（或「相處」，想跟對方一起生活）是兩碼子事。愛情其實有很多玩法，有人喜歡被討厭，有人喜歡被虐待，甚至覺得這樣才能感受到對方的重視。近幾年來社會上越來越多人相信唯有彼此保持距離，不要太過了解，才能讓愛情永保新鮮。這些人擔心太過親密，吸引力很快就會消磨殆盡，美好形象也隨之幻滅。此外，不知有多少戀人從來就不肯承認自己不快樂，他們寧願苦戀不可能的對象，也絕不接受（或甚至瞧不起）那些真心愛慕他們的人。這些都是病態嗎？是行為障礙嗎？或屬於愛情的玩法？之後還會談論到。

另外我想問的是，在戀愛對象身上我們尋找的只有「相知」和「相守」？這正是許多兩性書籍令人詬病的部分。它們老喜歡誇大可靠、體

貼、替人著想等特質，以及荷爾蒙的重要性。殊不知，就是有人專門愛挑不值得愛的人去愛，就是有人義無反顧的愛上性格極其偏差的人，並且還愛到天長地久。我們的性動機、情緒動機和心理動機，一遇到愛情往往就不會三位一體了。那麼，它們到底要往何處去？

## 愛情地圖

在此想先提醒，只有極少數的女人嫁給白馬王子，只有極少數的男人娶到白雪公主。說得更謹慎一點，我們幾乎都沒遇到過自己的夢中情人，一次也沒有。只有少之又少的夫妻在長年相處後，還覺得對方好棒，或是還受得了對方。大部分人會說，反正還合得來，但這絕不是愛情，而是對愛情留下的記憶；換句話說，那是伴侶關係！

人生不是許願大會，人生的選擇是有限的。學生時代我曾對一個朋友大發議論，怎麼做才能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女。要如何辨識出她？更糟的是我還剖析：她又要如何辨識出自己的真命天子？我們總是想像著，世上真的至少有那麼一位我的真命天女。萬一不幸就只有獨一無二的一位，她會在哪裡？烏拉圭？烏克蘭？還是烏茲別克？我遇得到她嗎？萬一那個天底下最適合我的人生伴侶出生在十九世紀的維也納，九十年前就一命嗚呼了，那我該怎麼辦？

當年我們是兩個想像力豐富的無知男孩，獲得異性青睞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卻毫無自知之明。原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他的路後來通往南德的城市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我的路去到了盧森堡（比他的遠）。感謝上帝，現在他獲得異性青睞的機會比以前多。走得遠，並不保證找到的人比較合適。

我們到底想找怎樣的人？怎麼找到他？如何辨識他（她）就是正確的人？對方又怎麼知道我們是他（她）要找的人？遇到夢中情人時，我們還是自由之身嗎？還可以自由的戀愛嗎？如果不能，是什麼絆住了我

們？難道左右我們的不只是性，還有形而上的「獵物圖式」（Beuteschema）？

可以知道的是，還沒有人認真研究過自由意志在戀愛中的心理作用。但無論哪種測驗或電腦斷層掃描，都無法具體呈現自由意志的運作狀態。這令人感到慶幸。既然此路不通，就試試別條吧。有人認為，我們的愛情「需求」與「能力」可回溯至兒時經驗。如果這種看法沒錯，我們對伴侶的選擇也脫離不了相關影響，首要是來自父母，其次是兄弟姐妹和其他重要的人。

佛洛伊德早就主張親子關係對我們日後的欲望有重大意義。佛洛伊德的建樹雖多，卻也造成不少誤導，因為他認為愛源自於性。為了自圓其說，他過分誇大嬰幼兒的性感受。如今我們對佛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忌妒和恐懼情結，大多耳熟能詳，這讓佛洛伊德的徒子徒孫及追隨者大傷腦筋，為此他們得大費周章去闡述嬰幼兒時期形成的人格與性欲特質。

幼兒是透過與身邊親近者的互動來創造他的世界，日後他對愛情的種種喜好、需求和恐懼也都由此發展而來。但它們是何時、以什麼方式形成的？

大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約翰·曼尼，第五章提到過他。曼尼認為，情緒上的獵物圖式會在我們五到八歲時形成。日後尋找伴侶參考的標準，就像破碎的馬賽克一樣，逐漸拼湊成一幅圖像。它的作用宛如愛情地圖（lovemap），我們可以按圖索驥，找到戀愛與愛情的方向。但曼尼說，八歲時我們的性特質尚未發展完成，它會在青春期根據現有的愛情地圖來完成。

一九八〇年，曼尼第一次提出愛情地圖的概念時，他相信自己找到一勞永逸處理「性、性別差異和伴侶關係」的公式。原本是鼓吹自由選擇性別的使徒，轉換跑道成為生物學家，並且增補了「自我之超越性」的思考。曼尼說，戀人會互相在對方身上投射一種完美形象，它儲存於兒時記憶的愛情地圖中。也就是說，當我們認為自己愛上某人時，其實是看見一個源自於我們自己的幻象。我們愛上的根本不是某個人，而是

我們自己的投射（projection）。無怪乎愛情的魔力、對方的魅力總會在一陣子之後就煙消雲散，因為沒有人能長久符合那個投射。

生物學的觀點是，自由意志在戀愛時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因為，既然一切兒時已不知不覺的確立，長大後還能有什麼選擇？我們自以為混亂無序的心理狀態，包括情緒起伏、情感衝突與各種需求，事實上都是愛情地圖在默默的昭告它的方針。我們自以為的選擇自由，只是一種早就經由本能規畫的意志路線。

對專家學者而言，這應該是個好消息，因為如此一來就能預測戀愛的心理機制了。當家作主的不再是苯乙胺和催產素，而是愛情地圖了。當我們遇到合適對象時，為了取得主導權，愛情地圖和苯乙胺、催產素之間，可能還會有場激烈的廝殺。曼尼為了便於說明他的愛情地圖，不得不將兒時的影響解釋為具有「情色」意味。這作法很像佛洛伊德，有點危險。

我們的愛情準則與愛情需求，在兒時逐漸顯現出來，這是非常有可能的。比較有爭議的是，它們在五歲時就確立了。「愛情地圖」既無法驗證，也測量不到。每個人的愛情側重的面向南轅北轍，其綜合性也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輩子認定一種類型，比方說非黑髮棕眼或金髮碧眼不可，但也有人對外在條件完全不設限。對某甲「非如此不可的」關鍵，對某乙可能完全無關緊要。有些人尋找一定的人格特質，例如帶來活力或讓人有安全感；有些人在選擇對象時，並沒有設定一以貫之的條件。

對我而言什麼比較重要？頭髮的顏色？氣味？身高？個性？或行為方式？多少也與童年時期認識這些事物的方式有關（通常是不自覺的）。但它們在兒時也含有情色意味嗎？還是象徵著好或壞？吸引人或討人厭？兒時的看法通常比較籠統，無論特徵、性質或行為，往往只分好與壞、正面與負面，不是嗎？權威型父母可能被經驗為正面的，只要對孩子不具攻擊性；一旦權威轉為暴力與壓迫，便可能被經驗為負面的。我們對事物的評價，會透過這樣或類似的方式形成（但也是不知不覺的）。根據觀察，小孩能夠同時對某事物又愛又恨，有對立的感受與矛盾感情。這一切都會在我們的心靈留下印記。

這些印記一定帶有情色意味？不一定，或者極少。很有可能的是，它們都被當作「好」或「壞」的經驗儲存起來，日後才會在與情色有關的事物中反映出來，並顯現在伴侶選擇上。「先於情色」（vor-erotisch）的經驗後來會轉碼至情色上。青春期可能就是這種狀況，但明顯的是出現在日後關於性的自我經驗中。例如某人身上對我們散發出情色魅力的特徵或行為方式，同時會使他喪失伴侶的資格，反之亦然。理想的精神伴侶鮮少同時也是適合的性伴侶，至少難保長久。

我們的愛情地圖真是撲朔迷離，很可能從來就沒有完成過。所以才會經常見到，女人年輕時偏好年紀稍長的男人，一旦過了四十歲，目光就集中在年輕小夥子身上。愛情地圖要怎麼解釋這種變化？莫非它最大的功能在於標誌興趣偏好，並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與不同的人或類型做聯結？這麼看來，愛情地圖相當有彈性，某些高山與縱谷，可以等到我們成年後重新規畫。

愛情地圖不是內建在遺傳密碼上的既定事實。不同於基因對身體發育的控制，愛情地圖不能規定愛情行為的發展。我們也不會像曼尼推測的那般，在我們所愛的人身上投射一個固定、無法動搖的想像。

嬰幼兒和兒童時期的經驗，強烈影響到成年後我們的情欲行為與伴侶關係行為，這一點無庸置疑。此外，很多事情都影響甚鉅，如兒童在原生家庭扮演的角色、受重視的程度。或是雙親的性別角色，孩子也會模仿。沒見識過吵架文化的孩子，長大後面對紛爭，難以堅持立場。在熱情活潑的家庭氣氛中長大的小孩，很有可能成為熱情活潑的人，並傾向尋找熱情活潑的伴侶，否則他很快就會覺得無趣。從小被教導對人永遠要親切和善的孩子，很容易忽視自己的感覺，長大後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家人都很幽默的小孩，長大後如果伴侶毫無幽默感，關係難以維繫，以此類推。

我們不一定總是找與父母相似的伴侶，也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類型，這種關係很少成功。與原生家庭完全不同的伴侶，會在某種程度上總是讓我們感到陌生。儘管具有吸引力，但在長期的伴侶關係中，可能出現不少問題。



幾乎是一種自動的傾向，我們會將原生家庭的一幕幕，重新搬上成年生活的舞台。我們慣於用熟悉的模式、扮演原有的角色。此時若再加上想像力和心理作用的推波助瀾，童年缺乏愛的小孩，長大後很容易會去找讓他大失所望的對象。結果就像是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ed prophecy），證實了他不值得被愛。

令人驚訝的是，最後對於我們所認定模式的證實，反而比追求想要的幸福來得重要。就連負面感受，例如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也成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這種自我認同的頑固僵化總是強過改變的心願。許多人相信自己真的想改變，事實上改變的意願不如他所相信的。大腦科學家認為，成年後我們的個性幾乎底定，頂多百分之二十可以改變。其實，光是頑固的自我認同感，就能讓愛情專家的建議在我們身上失效。睿智的觀點，不可能讓我們一夕之間脫胎換骨。

所幸，這種心靈的美容手術並非絕對必要。即使我們看似一直選錯對象，但對象大多也沒那麼糟。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況且真命天子或天女也可能不存在。如果硬是強迫自己要找到完美的對象，必會帶來不少痛苦寂寞，還不如錯個幾次，體驗變化。

完美對象遍尋不著的原因包括，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最多驚喜和色彩的人，通常不能和我們長期相處、共同經營生活。即便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人生伴侶，隨著時間過去，契合度也會漸漸褪色。這雖是常見的情況，卻非不變的自然法則，還是有不少幸福夫妻，魚與熊掌兼得，生活彩色繽紛，個性契合。不過，即便目前是神仙美眷，如果兩人漸行漸遠且無法讓對方覺得刺激、有趣，最後還是有可能變成怨偶。由此可見，我們渴望的愛情或許不像我們以為的，只要彼此了解、獲得安全感和建立穩定關係就夠了。我們渴望激情的程度絕不亞於前三者。在如今這個極其重視個人化的社會裡，我們對愛情伴侶的期待至少有兩方面：一是你得懂我！二是你得讓我的人生精采！

幾乎沒有人只因為對方懂他而愛上對方。倘若我們的情欲行為和伴侶關係行為在幼兒時期就定型了，那麼長大後，我們一定會在愛情關係中尋找父母曾經發揮的兩大功能：聯結與刺激。父母不只給予我們安全

感，還讓我們的生活豐富有趣。所以，我們渴望「聯結」和「刺激」，對兩者等量齊觀。或許有人不同意，但在長期的伴侶關係中，二者缺一不可。因為它們涵蓋了我們對浪漫愛情的所有渴望。

浪漫主義者堅守一種信念，只要是真愛就能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愛」的概念可讓熱情源源不絕、永不枯竭。能實踐這種信念的人，世上肯定沒幾個，不懷抱這種浪漫「要求」的情人，卻也是寥寥可數。沒有了浪漫信念，即使認定彼此，捫心自問時也不會相信這就是愛情。「彼此信賴」並無法讓我們大刀闊斧的去改變自己的感覺、想法、行為方式，只有熱情與刺激能讓我們整個人脫胎換骨似的。缺乏這種強烈的動力怎麼談得成戀愛？又有誰會在初次邂逅時，一調情就想到老夫老妻生活中的臭襪子？

## 讓人昏頭的吊橋

卡皮蘭諾吊橋（Capilano Canyon Suspension Bridge）是世界上最長的懸索吊橋，至少對走上去的人而言是如此。一百三十六公尺長的鋼索，高吊在加拿大溫哥華北部的卡皮蘭諾河谷上。這座國家公園每年吸引八十萬遊客前來欣賞壯麗的雲杉林。但最受矚目的還是吊橋。站在七十公尺高的吊橋上搖搖晃晃，腳踩著狹窄的木條，往下看是深不見底的山谷。

膽小的人別想挑戰卡皮蘭諾吊橋。像這樣的地方，會讓人特別想要戀愛嗎？一九七四年，未攜伴前來的年輕男子在踏上卡皮蘭諾吊橋前，會邂逅一位美麗的妙齡女子。她趨前詢問，是否願意協助她完成一項科學實驗？實驗內容是：請走到吊橋中央停下，感受一下周遭的景色，然後將自己的印象寫成一小段文字或畫成一幅簡圖。男士回來後，女子會給男士自己的電話，並說：「如果你對實驗結果有興趣，可以打電話給我。」結果有一半的受試者打電話來。

策畫這項實驗的是兩位多倫多年輕學者，唐納德·達頓（Donald Dutton）和亞瑟·艾倫（Arthur Aron）。達頓當時受聘至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短期研究，研究重點為感情。上述實驗讓達頓和艾倫一夕成名。其實，這項實驗與遊客看到風景後有何感想無關。兩位心理學家唯一感興趣的是，回家後有多少男士打電話來？

他們假設，走在令人頭暈目眩的吊橋上會讓人特別緊張，在此情況下男士對年輕美女的情緒反應也會特別強烈；他們追求女人的意願將因此提高。

作為對照組，達頓和艾倫請年輕美女再到另一座簡單的木橋旁重複相同的實驗。結果，來電的男士不到百分之十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吊橋上寫下的感想比在一般木橋上的隱含更多的性暗示。這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如果達頓和艾倫的假設沒錯，男人會把走吊橋的緊張感轉化為遇見年輕美女的興奮感。所以，吊橋晃得越厲害，男人對那位美女的興趣就越高。

唐納德·達頓如今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鑑識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教授；亞瑟·艾倫任教於美國紐約大學石溪分校（也簡稱石溪大學）心理系。他們從這項知名的吊橋實驗中得出兩大結論，一是理論的，一是實務的。在理論方面，兩人指出相當有趣的一點：我們的情緒經常是不明確的，根本無法給它一個單一的詮釋。感覺到某種情緒與理解這種情緒，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所以恐懼和緊張，才會被那些男士誤以為是對異性有興趣的興奮感，而順利克服。達頓和艾倫稱這項吊橋實驗為「歸因錯誤」（attribution error）。說得白話一點，那些男士誤會了，他們完全搞錯自己的心意。

一九六二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史丹利·沙其特（Stanley Schachter）<sup>註80</sup>提出，身體的情緒反應和我們對它的心理詮釋是兩回事。沙其特教授任教於芝加哥密西根大學，熱中研究人類的特殊行為。他的博士論文討論到，當末世預言者面對自己的預言沒有應驗時，會出現怎樣的心理反應。沙其特的興趣在於，人類是怎麼認識和思考這個世界的？某些行為障礙或不良習慣，如厭食症、貪食症、憂鬱症、菸癮或吝

嗇貪婪，是怎麼發生的？

沙其特主張這些行為都跟「歸因錯誤」有關，人類的情緒不包括厭食或吝嗇貪婪。這些行為並非由情緒引起，兩者之間沒有相應關係。顯然當中出現某種過渡和轉化，而且是藉由心理詮釋的功能。對此沙其特提出了「情緒二因論」（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它的重點相當簡單，人類的感情由兩大因素組成，一是生理的刺激和反應，一是與此相應（或不完全相應）的詮釋。

換句話說，我們只能擁有我們所詮釋出來的感情！上一章已經討論過，當情緒引發想法和觀念時，感情於焉形成。想法和觀念是人類腦功能的一項成就，能夠解釋和延伸情緒的內容。對此吉爾伯特·萊爾肯定會補上一句：沒錯，大致如此。但一碰到感情，人類往往詞窮！所以，我們慣於套用一般性概念。一旦我們套用了它們，就會相信我們所感覺到的，真的就跟那些概念一樣，彼此相符，互為表裡。

當小孩興起某種感覺時，如果大人能給他一個明確的解釋，孩子通常會心滿意足。有了解釋，世界再度井然有序。大人也是這樣，當我們遇到不愉快的混亂感受時，如果有人能說出一番明確的道理，我們就會釋懷許多。灰心喪志時，即便「自卑情結」這種專業術語幫不了什麼忙，但只要有人隨便丟一句：這全是「自卑情結」在作祟，還是好過自己在那裡徬徨無助。

達頓和艾倫的吊橋實驗似乎證實了這種心理機制。在情緒激動或緊張的狀態下，我們會產生移情或轉化作用。這個實驗說明了，對異性感興趣或談戀愛，深受「情境」的影響。不管是參加搖滾演唱會、舞蹈課、令人陶醉的聖誕晚會、嘉年華會，或走一趟令人膽顫心驚的吊橋，都有助於我們墜入愛河，作用之大，絕非在菜市場相遇可以比擬。

名噪一時的吊橋實驗，如今只是無數以情緒和「歸因錯誤」為主題的實驗之一。後來的研究進一步指出，仔細校準體內的化學變化，實驗結果會更好。例如經過長時間騎自行車或馬拉松式的長跑後，身體處於高度興奮狀態，平均得花七十分鐘才能恢復正常。最關鍵的時間點落在劇烈運動後的十到十五分鐘，這是產生「歸因錯誤」的最有利時間。身

體還處於興奮狀態，但心理已跟引發興奮的真正原因（劇烈運動）逐漸脫離關聯。此時若出現誘人美女，男人的注意力便會高度集中在她身上。

非常態性的情境有利於非常態性的感情。經歷特殊情境所引發的高昂情緒，甚至能強烈到讓人陷入愛河。不過，能夠如此，不代表必然會如此。還是有情侶是在平凡無奇的情境下愛上對方，也有人無論情境再怎麼特殊也無法來電。如果吊橋前站的是一個沒有好感的傢伙，從吊橋回來後，你還是不會覺得他（她）迷人。甚至出現反效果，走吊橋的緊張情緒強化了你對他（她）的厭惡。還有一種情況讓許多人感到失望，男女在興致高昂的旅途中相識，並結為愛侶，返回家後那股魔力頓時雲消霧散。沒錯，非常態性和特殊性都會隨著時間而消褪，但它們是點燃愛苗的重要刺激。我們不會愛上一個自己一點也不覺得「特別」的人。我們所愛的人在我們眼中一定是「特別」的。沒錯，對我們而言，愛情本身就是一件「特別」的事，否則戀人也不會老將「我們的愛情」掛在嘴上。少了那份特別，愛情就無法成為愛情。

## 愛情是一種特殊性

「自西元前一六四二年起有五個偉大的吻，在掃羅（Saul）和大利拉·科恩（Delilah Korn）無意間發現了吻之後，吻便開始席捲西方。（在此之前情侶總是勾勾拇指。）要替親吻做出明確的歸類實在很難，並會引發極大的爭議。儘管大部分人都同意，親吻的公式是熱情乘上忠貞、乘上強度、乘上持久，但每個人側重的部分仍大異其趣。不管根據什麼系統來評價，至少世人一致認同這是五個偉大的吻，並賦予它們崇高的價值。」

暫且拋開生物學上和人類學上的親吻起源說，它從遠古的嘴對嘴糜食法衍生而來，因為當時沒有嬰兒食品，要讓幼兒吃軟爛的食物就得靠

父母嚼爛再以口餵食。相較於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說法，美國作家威廉·古德曼（William Goldman）<sup>註81</sup>在他的知名小說《王妃新娘》（*The Princess Bride*）<sup>註82</sup>中，所虛構關於親吻的猶太起源故事則美麗多了。也有人主張，戀人的親吻感受只是口腔期的一種殘留，在此則不予討論。有關親吻的解釋不妨參考維基百科的詞條（其論調與古德曼有異曲同工之妙）：「親吻在西方世界大多用來表達愛意或（性）好感。親吻通常發生在兩個人之間，彼此親吻嘴唇或身體其他部位。因互有好感而親吻時，身體的感受往往很重要。戀愛中的親吻常持久而激烈（如舌吻）。由於脣上布滿末梢神經，親吻時感官會特別敏銳。此外親吻的近距離接觸有助於費洛蒙的傳遞，所以親吻能夠提高性欲。」

古德曼的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其實不是親吻，而是對親吻的高度評價。即便說評價親吻的公式為熱情、乘上忠貞、乘上強度、乘上持久，但親吻最棒的地方在於，戀愛中的每個吻都讓人覺得「特別」極了。

「感覺特別」跟「愛情」簡直是密不可分。如果說愛情有部分作用是藉由他人的眼光來呈現自己，那麼我們就脫離不了「特殊性」。因為我們想被他人視為「特別的」，所以我們會覺得對方「很特別」。唯有被特別的人認為特別，我們才能覺得自己特別。透過這種方式，我們的愛情永遠是一種特別的愛，只要我們還感覺得到或相信它。

這背後的心理機制並不難理解。人生中所有特殊性，都只能靠感情來獲得。邏輯思考和慣性動作並沒有為我們製造特別感。透過感情，我們才能體驗到世界是瘋狂、滑稽、奇怪、令人興奮、沮喪、激動的。感情為我們的經驗添加新的品質、價值和重要性。愛情正是一種能讓我們獲得特別感覺的感情。換句話說，愛情的主題就是它所具有的「特殊性」。

對於我們所感覺到的，我們有內在參與感。作為一種強烈感情，愛情讓我們感覺到內在參與感的極大化。在愛情中，我們透過他人的感受，以極特別的方式確認了自己的重要性。我心中「特別」的感覺引發對「特殊性」的渴望，從這種渴望中，一個完全個人的「愛情綱領」於焉成形。戀人會聯手打造一個屬於他們的現實。情侶都以這樣的方式建



構自己的世界。之前根本不屑一顧的事，現在起變得非常重要；之前覺得無聊的事，現在起有趣極了。我們會敞開心胸到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雖然接下來可能慢慢的又闔起來。這是一場令人興致盎然、全面的自我檢視。伍迪·艾倫（Woody Allen）在電影《安妮霍爾》（*Annie Hall*）裡有句台詞：「我老婆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些書，托爾斯泰和卡夫卡。」這兩位作家是男主角在認識他妻子前根本不讀的。至於最愛去的餐廳，分手前是最重要、最美、最浪漫的地方，分手後成為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地，那裡再也找不到一絲浪漫氣氛。如果交了新女友還帶對方去前女友最心愛的餐廳，肯定有詐。

值得注意的是，戀人都會視自己的戀情為獨一無二，雖然他們明明知道這樣談戀愛的不只有他們。每個人的愛情關係是如此的截然不同，而戀愛的模式和儀式卻大同小異。談戀愛時有誰不把「我愛你」掛在嘴邊，不把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不或多或少做出象徵占有的要求，有誰會不希望對方關心自己、呵護自己，不希望見到一些典型的愛情表現或儀式性行為？不這麼做，反而讓人覺得奇怪。我們越覺得自己的戀情不同凡響，其實跟別人的相似度越高。只有那些淡淡說出：「我們的愛，就跟大家一樣。」這種人的愛情或許真有與眾不同之處。

戀人最擅長美化美好的感覺，但不等於憑空捏造，不然約翰·曼尼也不會認為，我們加諸對方身上的形象，是我們根據愛情地圖上的既定圖式做出的投射。只不過所謂的既定圖式似乎不像曼尼說的那樣既定。當然，戀愛時我們都會深陷自己的想像中。正如社會哲學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sup>註83</sup>的珠璣妙語：「戀人愛的只是他眼裡的那個情人。」透過愛情，他人在我們眼中的形象會大幅改變，並讓情人偏離了「正常」的觀看方式。這正是愛情絕無僅有的特質。套句社會學家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sup>註84</sup>的話：「與外在世界的關聯被淡化，而內心的張力被激化（意為增強）。此刻就得靠個人的資源才能確保其穩定性了。」

透過儀式化的行為，我們彷彿重溫兒時在父母身邊擁有（或缺乏）的溫暖。兒童的世界充滿了神奇和儀式性的感官知覺與體驗。對大人而言合乎邏輯、可理解的事，小孩通常會象徵性的評判為對或錯。他們遵

守著自己看不透卻必須視為「對」的準則。小孩會賦予某些他明知不是「真的」東西特殊的光環與價值，如兔寶寶布偶或小狗玩偶。雖然四歲幼童已能分辨這些東西不是活的，也沒有感覺，小孩仍然會給玩具靈魂並愛著它們。

愛情這種關係的性質，讓我們就算長大了，還是懂得賦予事物價值，不讓愛挑剔的理智破壞那份神奇魔力。想想看，清晨端著濃情密意的咖啡在陽台上並肩啜飲，那特別的滋味！若少了身邊的人，一切顯得乏善可陳。「賦予價值」乃人類最珍貴的一項財富。但是，不管是一時興起或自願如此，還是經過左思右想、東看西瞧才想這麼做，兩者都無法賦予事物價值。要產生價值就得靠正面情緒來引發想法。「由情緒產生想法」顯然比「由想法產生情緒」簡單許多。如果有朋友告訴我們，上次他去騎馬（或潛水）感到非常快樂！不管我們有多麼想，但我們的想法無法讓我們變成快樂的騎士或潛水者。

幾乎所有的價值觀都是兒時建立的，兒時沒有機會建立的人，很可能一輩子也找不到，即使出現也無法持久。給事物、興趣、行為方式，增添正面的涵意，通常出現在兒時生活，不然就是短暫在愛情中。我記得十二歲時，我曾難過的對母親表示，我覺得很遺憾，自己沒辦法像幾年前那樣對聖誕節充滿期待。那些曾讓我興奮、覺得很有價值的東西，現在都變得好平凡。母親同意我的看法，小時候對聖誕節的那份特殊感受，再也回不來了，對許多事情的強烈感覺都一去不返。但母親又語帶安慰的說，長大後這一切會得到補償，藉由愛情！

只是很多人的愛情就像我的聖誕節，其中的魔力一段時間後就會消失。之前認為「神聖的」，之後變得平凡無奇。那股魔力總是消失得很突然。數不清的人因此而受苦。幾十年前一窩蜂冒出了許多愛情專家，指導大家怎麼讓愛情永不褪色。根據他們的說法，愛情魔力的減弱、共同打造的現實逐漸消失，既不是血液中苯乙胺分泌量下降，也不是理智在被快樂沖昏頭之後，終於恢復正常，而是愛得不得要領。愛情專家給的承諾是，天荒地老的愛情是可以學習的！但真的嗎？

這就是下一章要探討的主題。對於之前談論過的，在此先做一個簡

短的總述。人類是生物，跟動物一樣擁有情緒。由於天賦異稟，人類還具有建構複雜概念和想法的能力，能將情緒轉為各種模糊的、激勵人心的、沮喪的或美好的感情。感情和情緒不是一對一的關係。之所以不是，原因有二：一、正如沙其特所言，我們不是光有情緒，我們還會詮釋它，並讓它產生某種轉化或「歸因錯誤」。二、語言在說明感情上面臨自身的侷限。就像萊爾所說的，我們慣於為各種一閃而過的反應冠上一般性的名詞，造成我們談論愛情的方式，彷彿愛情跟桌子一樣，都是真實的物件，而非人類靠想像力靈光一閃所建構出來的。

自我詮釋（Selbstinterpretation）將我們從生物結構、動物情緒、本能、內分泌化學作用中解放出來，再上一層則是完全個人的自我概念（Selbstkonzept），它決定了我們如何詮釋自己和他人。我們的自覺性認同（gewusste Identität）和生物性認同（biologische Identität）並不相同，之間的落差創造了自由發揮的空間，對愛情來說也是如此。我們之所以會愛上某人，受原生家庭的影響遠大於生物因素（如較強的生物競爭條件，比較美或比較壯）。只有在青春期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概念還很薄弱、不穩定時，對方的外在魅力才會成為首要考量。

所以，我們的愛情既是經驗也是發明；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奠基於童年經驗的發明，且幾乎與所有重要的感情息息相關。儘管對誰有性渴望牽涉到我們的性欲，但我們會愛上誰，主要還是受原生家庭及童年經驗的影響。我們會愛誰，關鍵仍在於自我概念。

在相同的過程中，我們的自由意志增強了。性欲與意志就此分道揚鑣。誰能引起我們身體的性反應，不完全由我們挑選；但我們會愛上誰，就一定摻雜了個人的想法，至少身為成年人累積了一定的經驗，要不要接受某個人，我們有能力決定（即使得在愛情地圖上繞一繞）。不過話說回來，愛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直接意願。

問題只是：到什麼程度？

---

註71：一九〇四至一九七六，德國重量級社會理論家，也是哈伯瑪斯的老師。著有《科技時代的心靈：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

註72：一九〇五至一九八〇，法國當代著名作家、思想家及存在主義者，出生於巴黎，曾在柏林

師事存在主義大師胡賽爾及海德格。二次大戰期間參與巴黎的反德活動。最重要的代表作《存在與虛無》，提出「存在先於本質」的主張，以此奠定其學術地位。

註73：一八五九至一九四一，法國哲學家，其思想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富活力的哲學思想。著有《創造的演進》。

註74：一八五九至一九三八，德國哲學家、二十世紀現象學學派創始人。著有《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

註75：一八八九至一九七六，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胡賽爾的學生，著有《存有與時間》。

註76：一八五七至一九五二，英國科學家，在生理學和神經系統科學有很大貢獻。一九三二年諾貝爾獎。

註77：一九二五至二〇〇〇，曾獲畢希納獎（德國最具聲望的文學獎），與奧地利國家圖書獎等。

註78：一九〇二至一九七九，德國知名心理學家與心理分析專家。著有《恐懼的原型》。

註79：一九三七年生，目前為義大利帕爾瑪大學教授。

註80：一九二二至一九九七，對於情緒以及食物上癮與肥胖關係有許多研究。

註81：一九三一年生，美國小說作家、劇作家、編劇。

註82：改編成電影後，華語片名改為《綠野芳蹤》或《公主新娘》。全片並沒有公主，只有準王妃。

註83：一八九五至一九七三，德國社會哲學家，參與法蘭克福「社會研究院」的建立，並擔任院長。納粹時期流亡美國，與阿多諾、馬庫色等人在紐約繼續研究工作。二次大戰後返德，回到法蘭克福大學重建「社會研究院」。

註84：一九二七至一九九八，德國當代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二次大戰服役於空軍，曾被盟軍俘虜，待過戰俘營。戰後攻讀法律，通過國家考試任職於行政機關。六〇年代於美國哈佛大學跟隨社會學功能論大師帕森思（T. Parsons）從事研究，返回德國後任教於大學，包括畢勒菲爾德大學社會系。

## 第九章 經營命運

愛情是一種藝術嗎？

### 佛洛姆、縣長與愛的藝術

科西嘉島，一九八一年夏：十六歲的我第一次去到南方，我住在一間小旅館裡，一眼望去全是荒草與灌木。就像所有十六歲的懷春少年，我也滿懷對愛情的遐想，就是書上描寫的那種不可抗拒的愛情；我的荷爾蒙分泌量想必飆到不可思議的程度，瀰漫在旅館周遭的青草味，擾得我幾乎抓狂。最慘的是，跟我來度假的只有我媽；錯誤的人出現在錯誤的時刻。

母親正面臨中年危機。當時中年危機這個名詞才剛問世。她在卡爾維鎮（Calvi）的沙灘上第一次感覺自己老了。與我們住同間旅館的德國遊客成了我們甩也甩不掉的非自願同伴。度假的寂寞讓他們變得熱愛社交，一個是來自波爾茨（Porz）身材矮小的合唱團指揮，和一個灰髮蒼蒼、來自藻厄蘭（Sauerland）即將退休的縣長與他的妻子。晚餐時，總可以聽到縣長大人向合唱團指揮高談闊論他的治縣理念及過人智慧。白天，他則悠閒的攤在躺椅上讀著佛洛姆（Erich Pinchas Fromm）<sup>註85</sup>的《愛的藝術》（*Die Kunst des Liebens*）。他不時朗讀些重要片段給我母親聽，他的行為簡直像性騷擾。那些內容全有關高級知識分子該如何進行「知性調情」。我母親是位女性主義者，對此不感興趣，也不覺得有何獨到之處。所謂的知性調情，縣長大人解釋：「就是不可以直接切入正題。」瞧他盯著沙灘美女的模樣，嘴巴說不可以，但眼睛早就切入正題了。（我猜這位縣長大人如今已追隨在上帝左右。如果老先生還健在，並讀到我這本書，在此謹致上我最誠摯的問候！）

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歸罪於佛洛姆。整件事令我非常反感，一看到佛洛姆的名字就讓我聯想到教堂和保險套。封面上登的作者照片也跟縣長



一個模樣，兩人的名字還非常相似。將近十年的時間，我都以為佛洛姆那本書是專為老先生寫的調情大全。母親也不喜歡那本書，她覺得有些「奧祕」，或許那本書能大賣，關鍵就在奧祕吧。《愛的藝術》應該是最暢銷的非文學類書籍之一，全球熱賣超過五百萬冊。其實，這本書既不是什麼調情大全，也沒有故弄玄虛的奧祕。它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佛洛姆想跟大家說什麼？

埃里希·平卡斯·佛洛姆，一九〇〇年出生在一個信仰極虔誠的猶太家庭裡，父親是法蘭克福一名水果酒商。少年時期長得矮小又不俊美的佛洛姆，對猶太神祕主義充滿興趣。後來他在城裡認識了一幫志同道合的猶太少年，包括德國後來相當知名的電影理論學者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sup>註86</sup>、社會學家羅文塔（Leo Löwenthal）<sup>註87</sup>和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sup>註88</sup>。高中畢業後，佛洛姆前往海德堡念大學，主修法律。受到新朋友的影響，佛洛姆開始夢想建構一個能整合社會主義、神祕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猶太式」綜合理論。完成博士論文後，一九二二年他接觸到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對他而言，這是全新的挑戰。

佛洛姆充滿雄心壯志，渴望為一九二〇年代破碎的戰後世界重建人道主義的理念。同時他還前往慕尼黑和柏林接受精神分析的專業訓練。一九二六年，他與同年齡的精神科醫師弗利妲·賴希曼（Frieda Reichmann）結婚，並在柏林開設一間精神分析診所。從此，馬克斯思想和佛洛伊德理論變得遠比過去他所熱中的神學重要。佛洛姆的新目標是，建立一套奠基於精神分析的社會心理學。他是「法蘭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Frankfurter Psychoanalytisches Institut）的創辦人之一，此研究所隸屬於德國知名的「社會研究院」（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當時他一邊在法蘭克福授課，一邊在柏林看診。一九三二年他與妻子離異，兩年後，他在納粹正式執政前及時逃往美國。

令人意外的是，不像其他德國知識分子到了美國總是難以適應，佛洛姆很快在紐約站穩腳步，不但開起診所，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九三八年，社會研究院播遷至美，在紐約重起爐灶，轟動一時。年紀比佛洛姆小三歲的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sup>註89</sup>是社會研究院裡最被看好的新星，阿多諾非常討厭佛洛姆，過去不把佛洛姆放在



眼裡，現在更視佛洛姆為庸俗的大眾哲學家。

戰後，社會研究院的學者大多重返德國，佛洛姆卻決定留在美國，入了美國籍，他開始在佛蒙特和耶魯授課，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將自己的想法一一付梓。他寫了有關國家社會主義、有關精神分析和倫理學，以及有關精神分析與宗教的書。自一九二〇年代起，被他束之高閣的神學又全派上用場了。一九四四年佛洛姆再婚，對象是與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sup>註90</sup>一起歷盡艱辛逃出德國、信仰虔誠的女攝影師亨妮·古爾蘭（Henny Gurland）。艱苦的逃亡讓她罹患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一九四九年佛洛姆為了妻子的病，移居墨西哥，並在墨西哥大學教授精神分析。

一九五二年亨妮病逝，佛洛姆化悲憤為力量，寫就批判資本主義的專文。他視資本主義為現代社會的膿瘡，是病態的系統。出於對資本主義的厭惡，佛洛姆加入了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USA, SPUSA）。更令人意外的是，不久後他又有了新歡。亨妮死後一年，他與小他兩歲，身材高挑迷人的美國女士安妮絲·傅利曼（Annis Freeman）結婚。婚後佛洛姆與妻子搬到墨西哥的庫埃納瓦卡市（Cuernavaca），住在當地高級住宅區，一棟自己設計的花園別墅中。沉浸於愛情的佛洛姆開始研究禪學，並且寫下他最暢銷的知名著作《愛的藝術》。

這本不厚的書裡有一大部分是在批判當時的經濟思想。資本主義讓人變得膚淺、變得惡劣。二百年前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sup>註91</sup>就曾寫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an*）。他認為，人類其實是善良的，是文明敗壞了人性。盧梭的影響相當深遠，我們幾乎可以稱他是所有「受害理論」（Beschädigungstheorie）的始祖。根據受害理論，是社會狀態讓人無法展現真實本性。重新找回那個受社會或經濟因素迫害而無法開展「真實的」、「本質上的」、「自由的」人，是該理論的目標。這樣的觀點從基督教的原罪，經過盧梭、德國的浪漫主義，到尼采、佛洛伊德，再到阿多諾和佛洛姆可說是一脈相傳。阿多諾著名的短文集《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又譯《小倫理學》），副標「對受損生命之反思」（*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正

是這種思想具體而微的展現。

佛洛姆與阿多諾並非朋友，兩人卻不約而同奠基於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並且有志一同的主張，現代社會勢必對人性造成傷害。他們認為，現代人是不自由的，受到經濟環境和主流道德的

限制，無法展開自我。「批判理論」（Kritische Theorie）結合了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的重點，認為資本主義是萬惡的淵藪。它對人類的壓迫導致社會扭曲變形。換句話說，人類因經濟上的不自由，導致了精神上的不自由。社會上到處充斥著壓迫的機制與偏見。阿多諾稱之為「盲目聯結」（Verblendungszusammenhänge）。

但群眾的盲目聯結對哲學家而言是有利的，因為這更能突顯出哲學家的優越，眾人皆醉我獨醒，只有他們頭腦清楚，能置身事外並看透一切。洞悉別人的愚蠢，通常是讓人自覺聰明傑出的妙方。這種迷人的效果大概就是批判理論能如此風行的祕訣吧。一九六〇年代，批判理論幾乎成了知識分子信奉的另類宗教，他們前仆後繼致力於分析大眾化的錯誤。

如果阿多諾說得沒錯，「置身於錯誤中就不可能有正確的生活」，那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不可能有真正幸福的人生。儘管如此，幸好還是有可能去洞悉他人錯誤的生活。解決之道在於，「超越」主流經濟與政治「系統」。馬克思認為是「存在」（das Sein）決定了「意識」（das Bewusstsein）。所以，針砭「存在」，既存的社會行為，就是在治療人類的意識。因此六八學運在政治上具有雙重意義：一是革命，一是治療。

佛洛姆的思想幾乎與阿多諾如出一轍。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消費者的「擁有意願」（das Habenwollen）是扭曲的，必須接受治療才能找回那唯一、真實且充滿價值的「存在」。阿多諾的理論後來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漸行漸遠，而佛洛姆則一以貫之的將自己的資本主義批判定調為心理衛生。佛洛姆認為，有決心、有毅力、心思敏銳的人類，必須將自己從世俗的需求中解脫出來。唯有如此，才能從消費者變成一個有能力去愛的人。對世界充滿愛，還是充滿吝嗇貪婪，是截然不同的

態度。愛人者並不會想擁有，他尊重一切的存在，並以付出取代強取豪奪。

一九八〇年，佛洛姆在位於瑞士姆拉托市（Muralto）臨馬焦雷湖（Lago Maggiore）的家中過世。去世時，佛洛姆已是家財萬貫的富翁，不僅在瑞士有高級宅第，在紐約曼哈頓的河濱大道旁也坐擁頂樓豪宅。佛洛姆一直到死前都孜孜不倦於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道社會主義。只是他書中大力鼓吹的放棄物質追求，顯然不適用於他自己。那些關於「擁有」的批判乍看之下很容易接受，仔細深思，並沒有解釋得很透徹。為什麼「想擁有」那麼糟糕？它真的是一種罪惡嗎？佛洛姆的那種優質「存在」，不就是我「想擁有」的嗎？對於人類的需求和欲望，我們有什麼替代的選擇嗎？人類會想要擁有，不就是因為擁有能讓我們平靜、獲得心靈的滿足？

要求富裕的人完全不想擁有，堪稱是世上最崇高、奢侈的理念。佛洛姆應該沒料到，自己的書會先一步掌握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的時代精神。女性主義者大力推崇這種批判「男性資本主義掠食動物行徑」的思想；環保運動鼓吹沒有工業污染的乾淨生活；神祕主義靈修者追求全然解脫、不受束縛的精神性。佛洛姆《愛的藝術》成了富裕社會的另類聖經，是一定要擁有真實「存在」的生活指導原則。

如今，佛洛姆的追隨者緊緊抓住這份精神。佛洛姆正是那些著作充斥書店的心理諮商專家的開山始祖。他們在世界各地撒下誘餌，專釣追求意義者、追求性生活和諧者、追求精神幸福者、追求滿足與解脫者。

## 無私的愛？

或許會有人說，佛洛姆的追隨者要寫什麼書，與佛洛姆有何關係？甚至有人認為，佛洛姆當初的主張，立意良善，怎料到如今衍生出這些一派胡言，塞爆書店的書架。

科隆心理學家彼得·勞斯特（Peter Lauster）<sup>註92</sup>堪稱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愛情：此一現象之心理學》（*Die Liebe. Psychologie eines Phänomens*）狂賣超過一百萬冊。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他在德語地區受歡迎的程度媲美今天的約翰·葛瑞和亞倫·皮斯。一如葛瑞及皮斯，勞斯特也將讀者鎖定為女性。據說，女性這種性別比較優秀，因為她們的「感性」（Sensibility）比男人強烈。「感性」是勞斯特書中最具魔力的關鍵字，為了讓這種感性「流暢」，一切阻擋感性的障礙都要排除，婚姻、忠誠也不例外。在婚姻裡委屈求全的人、視忠誠高於感性的人，都是心理「有病」，都被「扭曲」了。

戴著善意的面具故弄玄虛，骨子裡極盡恐嚇之能事。勞斯特在書裡向讀者推銷不可能的任務：活在「此時此刻」。這是極大的挑戰，在現實的日常生活與工作環境中，所有的「此時此刻」都稍縱即逝。只有佛陀、反社會分子和大富翁，才有可能做得到。對一般人而言，這樣的期許根本是苛求，甚至是詛咒。活在此時此刻，等於不斷的與自己擦身而過、錯過了自已。「以存在代替擁有」，此學說的自大之處在於，認為西方世界的人幾乎全扭曲了，心理都有病。就像在阿多諾的批判理論中，我們的自然需求大多成了不當需求，我們的情緒反應也成了不當反應。

這種柔性恐嚇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它導致夫妻反目、吵到無法收拾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夫妻中只要有一方覺得自己不被理解，便一股腦的鑽進那個伴侶根本不懂的「真我」（das wahre Ich）中取暖。於是，伴侶關係失和的原因，不再是下班後轉移到伴侶身上的工作壓力，不再是連上床也要力求表現的負擔，不再是各種或強或弱的忌妒心、猜疑、吃醋等；讓伴侶關係出問題，現在起，千錯萬錯都是「真我」異化的錯。這個「真我」是我內在深處最珍貴的原子核，只要大家放過我，「真我」就能幸福快樂。

讀過威廉·詹姆士的人學到，人類行為不單純源自本能；讀過沙其特的人看到，人不只「有」感情，還會詮釋感情；而讀過大腦科學最新研究的人則知道，人有各種不同「我的狀態」。現在他們將無所適從，不知要去哪裡找這個「真我」。但是，對那些相信專家的人而言，「真

我」是無神世界裡最玄奧的真神；「真我」富有創造性，肉眼雖看不見，但透過沉思冥想即可掌握；「真我」的存在不容置疑。但最重要的，「真我」提供一個絕佳的理由讓人理直氣壯的說：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因為「真我」是好的、善的，導致我的生活出問題、不能圓滿的，一定是外在因素，也就是他人和環境。「真我」讓這種推論顯得再合邏輯不過。

勞斯特的那本愛情大作最令人詬病的一點是：在他眼裡，整個社會充滿了惡（盧梭當初也是這樣）。他認為，資本主義不斷鼓吹消費必導致價值觀錯誤。尤其是男人，盲目追隨資本主義，陷在「以擁有取代存在」的價值觀裡，而他們最渴望擁有的就是性。勞斯特視人類的自然需求為精神錯亂，光這點就相當離譜；更不可取的是，他對女性的盲目推崇。勞斯特信誓旦旦的說，女性是較優秀的人種，因此女性得義無反顧的承擔起「拯救」男性的重責大任。

若不是考慮到可能有很多讀者受到誤導，否則真不該浪費時間探討這種論調。相信女性是較優秀的人種，今天在我們的社會已廣為流傳。男人的問題出在奉理性為主臬，而且不知變通、壓抑內心的問題、嗜性成癮。所以，女人和心理諮商師要拯救的人還真多。

看看勞斯特為男性描繪的這幅諷刺漫畫。言下之意，女性應該是理性較弱、心靈較純淨、性需求較低的。抬起眼瞧瞧現實生活中的女性，這三項預設根本不成立，甚至是睜眼說瞎話。這種茶館心理學所做的評價，真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理性就這麼要不得？為什麼我應該長期追求一些無趣的事情，例如淨化心靈？為什麼對性有需求或「性」致高昂就是壞事？

勞斯特的幸福格言彷彿是再明白不過的經驗。他掌握到的東西，大概只有他自己深得精髓，其他人都不得其門而入。勞斯特遵循一九七〇年代德國年輕人喜歡高喊「愛是……」的作風。他依樣畫葫蘆，將書中標題訂為「愛是關懷」、「愛是冥想」、「愛是自我發掘」。聽起來不像在闡述愛情，而是羅列教條。這些口號根本不能叫定義，比較像萊爾所說的「範疇錯誤」。

愛情真的是冥想？所以冥想也是愛？如果依照勞斯特的看法，戀人是不是什麼都不必做了？勞斯特說：「愛是一種無欲無求的觀望，一種無欲無求的識得，愛是自給自足，愛是自我開展、全然無欲，愛是自我圓滿、全然無求。對以消費為取向的人而言，要掌握此思想精髓的確困難，他們既沮喪又貪婪，無從體會與這世界的真實聯繫。」

讓我們來推敲一下這段話的意思，雖然作者說要掌握其精髓絕非易事。勞斯特想必有特殊管道，否則別人一生不得其門而入的世界，怎麼單就對他敞開了大門。我們實在不得不揭發勞斯特立意良善背後的自大，他的想法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覺悲哀，因為他說我們都是貪婪的消費者，是心靈受到污染、精神墮落的無知者。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主命題上：「愛是一種無欲無求的觀望。」

試問：世上有哪對情侶或夫妻，希望自己的戀情或婚姻是「無欲無求」的彼此觀望？到底有誰但求愛情是「自我圓滿」、「無欲無求」，只夢想在愛情裡心如止水、恬淡自得？如果一個人追求的是這種愛情，有誰能讓他怦然心動？愛情作為兩性之愛，沒有了欲望，無欲無求，這不就像喝著無酒精的啤酒想要醺醺然一樣？

勞斯特端出來的奶粉，嚐起來絲毫沒有奶味。這種新產品的味道淡得出奇。依我看來，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渴望這種不會引發扞格齟齬的平淡愛情。勞斯特「發明」的愛情，排除了原本存在於愛情中的所有衝突與不合理。原本紊亂無序的愛情，變得中規中矩，一種公平、充滿善意，絕不會讓人傷心失望的愛情，於焉問世。

事實上，愛情的紊亂無序就像啤酒的酒精，少了它就不是啤酒了。我們在愛情裡尋找親密，也尋找適當的距離；我們在愛情裡尋求心意互通，也尋求自己的空間；我們要求溫柔，也要求強悍；我們希望對方獨裁，也希望對方拿我沒轍；我們想要對方聖潔，也想要對方放浪；我們既是追逐獵物的狂野獵人，也是孩子慈祥和藹的爸爸（媽媽）。有時我們不會按部就班逐一尋覓，而是讓它們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既是同時發生，又不要同時發生。

對愛情我們有這麼高的要求，不是有了「最優秀」的對象就能了



事。我們要不是心靈導師，不是心理諮商師，不是精神科醫師，而是一個能在各方面與我擦出火花的對手。我們希望對方渴望我，就像我渴望他一樣。作為群體動物，我們無法單靠反求諸己，就滿足得像找到了最安全的巢穴。對我們而言，他人的眼光和存在非常重要。一如沙特指出，我們的自我關係一定跟他人看我的方式有關。沒有人能置身「世」外。所以，關於愛情我們實在不該空口白話的說，人類該追求「內心自由」的境界。「我之所以為我」絕非單靠我自己就能獲得。況且，試問這個自己到底是哪個「我」？在愛情中追求「自給自足」的想法，實在不可取。

「無私無我」的愛，這種愛情觀近乎苛求。它符合了基督教的思想與某些心理治療的方針。近年來，英美地區的心理諮商吹起一股「無條件之愛」（unconditional love）的風潮。他們的基本教義是：愛是分享，不是要求。這種訴求失之偏頗，而最不人性的地方在於，他們認為情人吵架皆可溯因於不當的自私或只愛自己。無私無我的愛情不只不切實際，還過分簡化了愛情，無法找出問題癥結或解決問題。「獲得自身的幸福」，當然是愛情的一大重點！許多心理諮商師鼓吹無私無我的愛，但問問他們，自己是否願意被人無私無我的愛著？我想他們大概也不願意。一個無私無我的人，怎麼有辦法看重自己、看重他的愛？

無私之愛衍生出來的另一項神話是：徹底的合而為一。這也是個歷久不衰的愛情謠言。有些東西，戀人當然願意彼此分享，但有些東西則不願意，空間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之所以會有不想讓伴侶踏入的私密空間，不是因為我們自私、頑固，或故意拒對方於門外，而是因為私密空間能給我們美好的舒適感，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人有這種需求，並視為理所當然。愛一個人不代表隨時隨地都想跟他膩在一起，每個想法都想跟他分享，每個感受都想讓他知道。沒錯，愛的確會讓人想彼此親近，但正因為親近，所以更需要適當的距離，這種距離反而會讓戀人更加親密。克服距離絕非什麼必要之惡，而是愛情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漢堡的心理諮商師米歇爾·馬利在他睿智的著作中，一再強調距離的意義：「因為個體實屬必要，一如他們所追求的聯繫，適時分開是必須的。」愛情讓我們從心理的牢籠中解脫出來，透過另一個重要他人的

觀感，豐富心靈，並大幅擴展對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如果這是對的，那麼少了這個「他人」，愛情就無法出現。如果我們夠誠實就不得不承認，愛情中「徹底的合而為一」，只是海市蜃樓。戀人喜歡交換經驗、發掘共同點，藉此鞏固關係與相互認同，因為他們仍有些不是一起做或一起經歷的事。如果什麼事都在一起，不但沒有經驗可以交換，確認共同點也變得多此一舉，且毫無意義。

## 幸福愛情的必勝法則？

如前所述，如果我們守株待兔，愛情不會從天而降。然而，若不是我們做了什麼，愛情也不會憑空消失。這其實是件好事，因為愛情並不仰賴偶然與巧合。不過，還是有人拿「愛情不會從天而降，也不會憑空消失」來大作文章。就像佛洛姆一樣，上一章提到的心理分析學家弗里茲·李曼強調：「愛情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行動。」不管這句話有多麼動聽，但它的說法是錯的。

如果愛只是行動，不是狀態，那問題就簡單了。只要去做、去行動，所有愛情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但愛過的人都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們的確可以為愛情做很多事，做很多對的與錯的事，但我們絕對無法面面俱到的讓自己的感情永遠不變，也無法讓對方永遠不變。

因為我們無法掌控一切、操縱一切，所以允諾能挽救愛情的心理寶典才會如此盛行。只要感情出了問題或婚姻出了狀況，情侶（夫妻）就會變得很不友善、冷嘲熱諷、神經緊繃、不關心對方……。這時求助坊間的心理寶典，它們會篤定的告訴你，要讓婚姻幸福的「祕訣」在於：「善待彼此，相互關懷！」講得真好！如果我們能夠善待彼此，相互關懷，婚姻還會出現危機嗎？

通常，不是因為我們不關心對方，關係才出現問題，而是因為關係出問題了，所以才不願意關心對方。不是每樁婚姻都值得拯救。大概沒

有一樁婚姻（或關係）單靠看書、聽取建言就能挽回。我們的行為極少因此而改變，至少難以持久。

能作為愛情法則的，不一定是什麼崇高的信念或近乎苛求的口號（如勞斯特的主張）。幾十年來，有許多美國學者在研究戀人的絮語和儀式行為，他們以觀察兩棲動物或螞蟻王國的方式，來研究人類的伴侶行為。他們歸納出的法則，制式到就像汽車工廠的標準作業程序。堪稱業界「教皇」的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約翰·高特曼（John Mordechai Gottman）<sup>註93</sup>教授。維基百科對他的描述幾近歌功頌德：「高特曼博士發展出一種方法，可預測哪些新婚夫妻維持得住婚姻，哪些四到六年就會離婚，準確率高達百分之九十。相同的方法也可預測哪些夫妻的婚姻能維持七到九年，準確率亦高達百分之八十一。」

想認識高特曼理論的人，請購買《恩愛過一生：幸福婚姻七守則》（*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書店裡，還可找到同類型書籍，如《愛的五種語言：婚姻中的成功溝通術》、《成功的伴侶關係：愛的遊戲規則》、《美好關係的祕訣：直接轉換法》，洋洋灑灑。成功婚姻的祕訣想必顯而易見，不然怎麼有這麼多書發表高見。但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有答案了，為何不見婚姻成功的人數上升？

德國科學記者巴斯·卡斯特在讀了高特曼富科學精神又精確的研究後，深受啟發，並且青出於藍，他將高特曼的七大祕訣濃縮為五大「愛情公式」。卡斯特認為，只要掌握這五大要素就能贏得幸福愛情。此五大要素為：關懷、營造「我們的」感覺、接納、正面思考，以及為日常生活製造刺激。無庸置疑，這麼做有助於良好的伴侶關係。但如果說這五大要素能產生並確保愛情，應該沒有人會相信。因為這五大要素也能促進我們與好友的關係，完全無涉愛情。它們是鞏固伴侶內在聯繫的有利基石，但絕對不是什麼愛情「公式」。

另一位德國記者克里斯提昂·舒爾特（Christian Schuldt）<sup>註94</sup>在他名為《心靈密碼》（*Der Code des Herzen*）的大作中，巧妙結合了心理學與社會學觀點，提出了「面對愛情的五大策略」，包括「腳踏實地」，不切實際的理想只會帶來失望；「謹慎看待合而為一」，心靈的徹底契

合，聽起來很迷人，但小心！它是最恐怖的關係殺手；「衝突管理」，戀人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對方身上，長時間下來難免會吵架；「經營感情」，習慣成自然是浪漫的大敵，千萬不能怕麻煩，一定要常常從事活化、增進感情的事；「照見浪漫情懷：我看見我看不見的東西」，學習觀察自己的浪漫情懷，以便正確評估自己，這絕對有益無害。

此五大策略聰明、正確。它可取之處在於，沒有裝腔作勢的搬出自然科學精確的「公式」，也不標榜是絕對有效的妙方。它不一窩蜂追隨知名大學的實驗結果，而是回歸社會學的精闢立論，進行睿智的反思。其核心觀點是：若想了解伴侶，關鍵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意願」！

實際上，只有少數人真的不具備理解他人的能力，無法掌握他人的感受與想法。相較於能力，其實意願更重要。要不要跟對方生活在一起，愛不愛對方，都與我們的意願有關。雖然戀人愛的是兩人共同編織的幻象，但此幻象的基礎是：兩人的期待永遠不會完全一致，所以需要微調與校準。

坊間一些挽救婚姻與關係的建議，的確不錯，但它們絕非一勞永逸的「公式」，不是萬靈丹，也無法保證對方永遠喜歡我、對我感興趣。魅力的消失，不一定是因為我們辜負了對方，或對方辜負了我們。很有可能，當初自以為的契合根本就是誤會一場，經過相處後才發現，第一眼令我們心動的人格特質，其實讓人難以理解，甚至氣得抓狂，這都不是戀愛初期預料得到的。

我們一旦戀愛了，並得到對方的回應，就會創造出一個超級幻象：對方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隨著時間過去，幻象必須經得起各種需求的考驗。有時候魅力猶存，但有時候所剩無幾，或到最後蕩然無存。一開始的幻象會那般真實和強烈，正是因為：戀人根本還沒認識彼此。米歇爾·馬利精闢的分析說：「陌生感正是全然契合的先決條件。正因為他們在許多方面都還不了解對方，所以會產生『完全了解對方』的印象。為了不破壞這種已互相了解的印象，情侶集中火力只談兩人的交集。他們交換柔情密意的眼神、有肢體接觸、親吻、做愛，聊自己的生命故

事，耐心傾聽，夢想共同的未來，允諾永誌不變的愛情。他們只做能獲得正面回應的溝通，迴避否定感。」

幻象是如何形成的，馬利的剖析十分精闢。雖然大多數人不會質疑對方，初相戀時兩人感覺有高度的共同性，但有時候，我們之所以深受對方吸引，不就是因為彼此截然不同？我們會愛上在神奇的魔力下與我們契合的人，也會瘋狂愛上擁有迷人特質的人，而那些特質是我們自己剛好缺乏的。如果在愛情裡尋找的不只是聯繫與安全感，還有刺激與新鮮感，那麼「陌生感與好奇」應當跟「安全感與共同性」同樣重要。在愛情裡盲目的以為相互了解，似乎是無法避免的，只要確認對方的感受與我們一樣強烈。否則，這場戀情會像洗三溫暖一樣忽冷忽熱，甚至淪為悲劇。

在伴侶關係中，感情逐漸褪色，並非什麼不尋常的事，因為彼此已經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一開始讓我們著迷的特質，有可能讓我們著迷一輩子，但也不必非得如此。許多人一天到晚要求伴侶「改變自己」，而且是我們絕對不會對朋友提出的要求，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他們還會搔著腦袋苦惱的問自己：到底該怎麼辦才能讓一切好轉？最方便的當然就是求教於愛情諮商、心理寶典，看看有沒有什麼妙招。

事情其實很簡單，愛情會退燒，伴侶關係會出問題，不只因為我們犯下「錯誤」，或當初擁抱的只是幻象，而是因為生活中許多事情會改變。幸福愛情的一項重要前提是，兩人要有共同或類似的價值觀。伴侶可以選擇不同的政黨，但完全敵對的政治立場並不利於彼此的關係。如果一方追求精神上的滿足，另一方只重視金錢，那雙方關係的契合有限。一方熱愛運動，一方整天盯著電視，這也像缺了什麼。度假時一個想去玩驚險的攀岩，一個寧願悠哉的在沙灘上躺兩週，地老天荒的機會不大。除了重要的價值觀，許多瑣碎的小事也影響甚鉅。如何為日常生活製造火花？其實就是一些小小的儀式，有助於感情的維繫。例如戀人喜歡一再重述第一次相遇的感覺，重溫舊夢就算一種儀式。

儀式的魅力在於，握有通往特殊性的管道。它能賦予事物特殊價值。例如做禮拜的儀式也是它的價值。儀式的慶典過程使精神性的事物

得以被體驗到。將美好經驗儀式化的能力，是伴侶關係一項有趣的指標。如果以往的儀式已停擺或不再有新的儀式，這樣的關係前景堪憂。十年前那首能讓老婆怦然心動、只想與你纏綿繾綣的歌曲，如果放了十年還是同一首，總有一天她會毫無反應。不用心的結果就是，你的愛情聖壇積滿了塵埃。

在這樣的情況下，專家通常會建議來點調劑，為伴侶製造些驚喜或玩點創意。但在繁忙緊湊的職業與家庭生活中製造驚喜，真是說的比做的容易！要為如此熟悉或沒有心情接受驚喜的伴侶，製造驚喜，恐怕還沒見到轉機就出現新的危機了。一個月內連續製造五次驚喜，對方嫌煩的機率肯定大於對你充滿濃情密意。

光看書改變不了生活，也挽救不了婚姻；救得了一時，也救不了一輩子。幸福的愛情不是靠聽取建言。倒也不必因此失望，因為就算看了上千本指導事業成功的書，也未必能成為大老闆。有無數教人致富的書，但百萬富翁的人數並沒有明顯攀升。因為看了瘦身書而變窈窕的，這種話大概也沒幾個人相信。

看書卻無法成功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大部分的人雖然相信自己想改變，但骨子裡真正想改變的人少之又少。我們的自我認知、自我感覺有多頑固，絕對超乎想像。一旦想改變，我們面臨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我最重要的東西將遭到質疑，那就是「自我認同」。即便號稱實踐力最強的德國前外長費雪（Joschka Fischer），在身體力行了「把自己跑回來」而成功瘦身，後來還不是又復胖了。不過，很少有危機戲劇化到必須付出長期的代價。為什麼愛情會例外呢？實際做得到的，通常不及心裡期望的，即使在夢中也希望自己能做到。別說對伴侶，就連對自己我們也無法期待會有徹頭徹尾的改變。所以伴侶治療或婚姻治療，即便玩遍了各式花招和流行把戲，也無法把人送進天堂，反而讓人變得更頑固專制。



# 最後的絕招：愛自己

伴侶治療或婚姻治療正大行其道。「每樁婚姻都值得挽救！」各種廣告與手冊透露這樣的訊息。越來越多夫妻求助於心理諮商。由於效果似乎有限，整個情況也開始改變。幾年前，婚姻諮商仍以促進婚姻和諧為宗旨。諮商師最大的目標就是穩定伴侶關係。只要關係穩定，任務就算達成。夫妻又能和和氣氣的相處，融融洽洽的彼此溝通。不過結局往往是過一陣子後，兩人終於可以在和諧、愉快的氣氛下協議離婚。

前一代婚姻諮商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不認為愛情是伴侶關係的目標。大眾已不接受這種看法，尤其是年輕族群，所幸新一代婚姻諮商已掌握到要點。時代不同，世人對諮商的期待也不同。以前想要挽救婚姻，但現在想要挽救的是「愛情」！避免婚姻衝突已經不夠了。

大衛·史納屈（David Schnarch）<sup>註95</sup>堪稱新一代諮商學派的創建者。他不但是美國科羅拉多州「婚姻與家庭健康中心」（Marriage & Family Health Center）的主任，更是當今流行心理學界最負盛名的諮商大師。一九七七年，代表作《熱情婚姻》（*Passionate Marriage*）一出版即全球熱賣。他的目標非常遠大，婚姻治療的目標不在排除婚姻中的困擾與障礙，而是要確保愛情。他試圖找到維繫愛情那易逝狀態的法則。最後他發展出一項獨門絕招：「愛自己，在自己身上獲得平靜，別奢望從他人那裡得到幸福。」

無疑的，這樣的訴求掌握到當今西方社會高度重視個人化的時代精神。史納屈推出四項法則，只要謹守這四項法則，戀人就可以擁有愛情自主權。德國最近有本暢銷書《嫁誰不重要，愛自己最重要！》，應該就是沿襲自史納屈。

身為現代心理學家又是諮商大師，史納屈的立論基礎當然是大腦科學。他援引之前詳細分析過的海倫·費雪的三大「腦神經迴路」：性欲、戀愛和結合。史納屈最大的成就是，進一步擴充了這三種狀態，他提出：「人類性需求的第四種本能：發展與保有『自我』。這項本能對

性需求的影響甚至大過性欲、戀愛和結合。當渴望、浪漫愛情和廝守的週期過後，它是長期維繫伴侶關係的接著劑。」

史納屈的觀點還真是有趣。他把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多年來基於各種理由，小心翼翼區分的觀念全打散了。當然，知識論的歷史也不是一部持續向前的發展史，它也會出現各種的崩塌或倒退。說性欲是一種本能，可能沒什麼爭議，但要說戀愛也是一種本能，就令人質疑，遑論進一步延伸到：建立「自我」的渴望也是一種本能，這個主張就太躁進了。個人化（建立自我）如此高度複雜的行為，不可能是由動物本能來操控的。史納屈顯然認為，將「建立自我」視為一種「本能」是個絕妙點子。它為心理學的觀點找到一個生物學的基礎，即使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在腦子裡發現那段能驅動我們建立「自我」的腦神經迴路。

為了幫這個「自我本能」打下基石，史納屈前進非洲草原蒐集遠古證據，並確立了這項本能誕生的時間點：西元前一百六十萬年。我們的大腦為呼應建立自我的強烈需求，在此時間點出現了相應的構造。所以，之前我們的祖先都過著「非自我」的人生。海倫·費雪將三條腦神經迴路極富創見的奠基於「性」，史納屈更恣意的將「自我本能」也奠基於性。這種作法，恐怕連性學祖師爺佛洛伊德也要退避三舍。

或許史納屈認為理論上的爭議無傷大雅，重要的是實務。作為接著劑的「自我本能」，到底能多有效的維繫伴侶關係？

史納屈的答案分為四部分，並以四大法則為名，加以包裝。第一項法則：想獲得幸福快樂的愛情關係，就得先保有穩固的自我感覺。「所謂穩固的自我感覺是指，一個人內在自我的穩定性完全不受他人看法的影響。大部分人的自我感覺都是一種反映他人目光的自我感覺，需要他人的接納、認同與支持。」穩固的自我感覺則不然，它是極富自主性的。

史納屈在生物學上的無知，已令人驚訝，他在心理學和哲學上的魯莽，更叫人不敢恭維。「大部分人的自我感覺都是一種反映他人目光的自我感覺。」這句話根本錯了。不是大部分人，而是全部的人。不但沙特曾指出，演化心理學家也證實，我們每個人的自我感覺都是一種反映

著他人目光的自我感覺。如果有人的自我感覺完全與他人的目光無關，問題恐怕不小，因為那「穩固的自我感覺」，會是非常自閉的。

一如佛洛姆與勞斯特，史納屈也是受害理論的信徒。大多數的人都是不成熟且無知的，所以目標就是回歸曾有的完美與無所欲求。

了解這個背景，就不會對第二項法則太意外，「人要控制自己的恐懼，要自我療傷止痛。」多麼美好的訴求，誰不想這樣！如果真能做到，就不僅是偉大的戀人，還是超人，甚至是非人。能控制恐懼感的人，想必無所不能，因為世上沒有讓他害怕的事情。至於能自我療傷止痛，真教人懷疑，他（她）是否還是「人類」？

這項法則最精采的地方是，依照史納屈的理念，人應該要完全自主，且自我圓滿，但這種人哪裡還需要愛情！一切不假外求，人類整個需求結構就瓦解了。需求乃推動人生所有行為的動力。史納屈理想中的典範是自給自足的，這種人怎麼有辦法對他人產生好感？原來，最優秀的戀人是根本不需要戀愛的人。

這種情人肯定乏人問津。不完美的人對完美的人，根本是避之唯恐不及。舉例來說，完美的人怎麼能夠發掘不完美的我們，其實也有優點？完美的人一定覺得社會好糟（雖然他說的可能沒錯），老覺得別人跟他合不來。誰會想要這種「完人」當伴侶啊？我的伴侶雖然有缺點，但我可以接受，而且還因此而愛他（她）。

不過，史納屈第三和第四項法則相當務實。他說，對待伴侶不該反應過度。我們應坦然接受伴侶關係中的某些缺憾，並讓它成為自我成長的動力。這兩項法則充滿智慧，而且不必具備超人的能力也辦得到，尤其要慶幸的是與「自我本能」完全無關。

至於透過史納屈的伴侶諮商來挽救婚姻，根本為時已晚。與史納屈比起來，佛洛姆和勞斯特簡直是無傷大雅的梦想者。一個人只愛他自己，對愛情、另一半，也沒有過度期待，在愛情中能夠全身而退，這當然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但史納屈令人詬病的是，他主張愛自己，並且在心理上不為他人目光或評價所動。這根本是曖昧不清的訊息，美化了「以自我為中心」者，將他們視為模範。而且還讓一般人誤以為自己

優柔寡斷的「愛自己」，是需要治療的。

簡單明白的結論：要擁有幸福愛情並不容易，甚至是種奢求，愛自己又比愛別人更困難。幼年時期沒有愛自己經驗的人，長大後學會愛自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能學會的頂多是，在不太愛自己的情況下，盡量善待自己。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不是煉金術，不能點石成金，把無法愛自己的人瞬間打造成珍愛自己的人。如果有人向你承諾他能辦到，肯定是把你當成傻瓜。

## 愛情的藝術

幸福的愛情關係沒有一定的公式，只有避免伴侶關係留下遺憾的策略，或是將愛情經營得有聲有色的好點子。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但這也已經夠多了。

為什麼那些天花亂墜的祕方助益不大？原因就在於，人無法一夕之間徹底改變自己的感情和行為。讓我們產生衝動和內分泌的，是我們的動物性間腦而非掌管理智的大腦。況且，感情又比理智更複雜、更難以改變。再加上感情並不是一個人的事，所以難度更高。自信、親切、善解人意、彬彬有禮，雖然都是美德，一旦碰上愛情就未必管用（甚至根本不管用）。

這就是知名專家的真知灼見，對於挽救伴侶關係裨益不大的原因。尤其對現代的中年人和年輕人，愛情跟伴侶關係早就不是同一件事了。伴侶關係要的是滿足，愛情要的是快樂。對維持伴侶關係而言，規律分泌些微量的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就已經綽綽有餘，但對愛情而言，分泌再多的多巴胺和腎上腺素，都嫌不夠。要維持伴侶關係，雙方必須契合，但是要感受愛情，對立、陌生和摩擦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長期經營一份「愛侶」關係就得兩者兼具：既要給對方帶來刺激，成為生活精采的最佳保證，又要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始終如一，成為情緒穩定的最

佳保證。

佛洛姆說，愛不只是命運，還得靠經營。這一點他顯然沒說錯，但他肯定沒料到自己會引發以自我療癒為宗旨的婚姻諮商風潮。「藝術」這個詞將戀人提升到藝術家的層次。可惜他們的可塑性在心理治療師、諮商師的分析下，竟成了心理殘障。佛洛伊德式的「受害理論」讓心理治療師、諮商師如虎添翼，所有人類自然的需求，如在愛情中得到對方的喜歡、讚美或認同，這下子全成了心理扭曲或人格不成熟。愛情不是光靠單方面的同理心就能維持，愛情還需要期待、參與以及感同身受。愛情的基礎如此複雜，愛情的觀念如此五花八門：有的人要求愛得公平，有的人又要愛得不公平才行；有的人渴望愛情四平八穩，有的人卻喜歡緊張刺激；有的人非得熱情澎湃、驚天動地不可，有的人又要雲淡風清、安靜恬適。這些全無關乎對錯、成熟或幼稚，也不涉及價值判斷，只要伴侶雙方沒有人因此而受苦。

對愛情最具殺傷力的當屬「追求完美所帶來的恐慌」。追求完美會對我們真實，但是差強人意或不如人意的伴侶關係，造成威脅；其實無論在哪方面，「追求完美」都是最不值得追求的。那些保證讓人成為完美情人的仙丹妙方，實際上都沒什麼效，只是在揣測對方的心意，這樣如何能發展自我？每一種發展都以自我利益為前提，光靠接受他人來取得發展，無異於痴人說夢。

愛情是如此美好的事，怎麼可以苦苦強求？而且，不是每段婚姻都值得挽救。沒有愛卻要生活在一起，是很痛苦的，世上也許還有另一個人能讓生命更美好、更完滿。對他人負責該有一定的限度，也才是對自己負責，這點自私是每個人都該有的。況且，哪個人真心情願伴侶只是基於責任感才不離開自己？

我不知道那位來自藻厄蘭的縣長大人兼愛情專家，從佛洛姆的書中悟出了什麼道理？該從資本主義的物質世界掙脫出來？追求無欲無求的愛？或者看完那本書之後，他的意淫功力更臻上乘？還是他學到了，所謂對愛人的期待，其實是針對我們自己，而非他人？或者他覺得這樣的說法言過其實？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佛洛姆這本書反映的其實是，當

時那個時代對愛情的期待？「愛情」、「贏得愛情」和「維繫愛情的祕訣」，都有時效性，並非亙古不變的？戀人並非生活在白雪公主的童話世界裡，不是越過七重山來到七矮人的家，就能發現「真我」？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關係密碼」，並由我們生活其中的那個社會所塑造.....。

---

註85：一九〇〇至一九八〇，德文Fromm的意思是「虔誠」。美籍德國猶太人。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致力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其思想可視為新佛洛伊德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交匯。被尊為「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

註86：一八八九至一九六六，德國電影理論學者，著有《電影理論》一書，從「重現現實」的角度探討電影藝術的複雜性。

註87：一九〇〇至一九九三，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

註88：一八七八至一九六五，二十世最重要的猶太裔宗教哲學家之一。

註89：一九〇三至一九六九，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作曲家。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父親為酒商，是改信新教的猶太人，母親為歌唱家、天主教徒。納粹時期，改以母親的本姓為姓氏。在法蘭克福大學求學時期，結識學術夥伴：霍克海默與班雅明。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一九三三年流亡美國。返德後，重回法蘭克福大學教學與研究，主持「社會研究院」。有「社會哲學家」的稱號，強調他哲學思想中社會批判的面向，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學術地位顯赫。重要著作有《啟蒙的辯證》、《美學理論》、《新音樂的哲學》、《最低限度的道德：對受損的生命之思索》《否定的辯證》。

註90：一八九二至一九四〇，德國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及翻譯大師。

註91：一七一二至一七七八，法國教育學家、思想家與文學家，影響現代社會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主張人權平等，崇尚自然。有「教育史上的哥白尼」與「自然主義之父」之稱。他提出自然主義教育理念，以兒童中心取代了成人中心。其學說中最重要的是「返回自然」。重要著作有《愛彌兒》、《懺悔錄》等。

註92：一九四〇年生，著有許多心靈勵志類的書籍。

註93：一九四二年生，透過直接的觀察，對婚姻穩定狀態與伴侶關係的分析研究而知名。

註94：一九七〇年生，大學攻讀英語文學、日耳曼語文學與社會學。

註95：婚姻與家族治療師，工作領域包括親密關係及性治療。曾任美國性教育諮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 第十章 再平凡不過的不可思議

愛情與「期待」有何關係？

如果沒聽過，大概沒多少人會陷入愛河。

——法國作家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註96](#)

### 愛情只是一種「發明」

他是哲學家、醫學史家、社會學家；他的人生熱情澎湃、狂野又悲壯。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二六年出生於法國普瓦捷（Poitiers），家中排行老二，父親是解剖學教授及外科醫師。求學時，傅柯雖成績優異，但同學們都不喜歡他。在嚴格的耶穌會中學裡傅柯顯得格格不入，唯一吸引他的是書本，而他那獨樹一格的特殊幽默，大概只有他自己能懂。傅柯從小就跟別人不一樣，而且是非常的不一樣。父親希望他能克紹箕裘成為醫生，但身為兒子的傅柯很早就知道自己會讓父親失望。他沒有學醫，反倒去了巴黎唸哲學和心理學。一九五一年畢業，先後去了瑞典、波蘭和德國。二十八歲出版第一本書《心理學與精神疾病》（*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傅柯關注的始終是那些怪異的、極端的、病態的人——他覺得這些人跟他一樣，不符標準。同時他還熱中研究（無論當時或從前）不見容於公民社會的麻煩或問題行為。在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大學心理系擔任講師時，傅柯完成了長達千頁的博士論文，並於一九六一年出版，書名為《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精神病史》（*folie et deraison*，或譯《瘋狂與文明》）。

傅柯在書中旁徵博引，企圖說明瘋癲的歷史以及各時代對瘋癲的不同評價。青年傅柯在法國克萊蒙費朗大學以二因論的方式處理社會學問

題的同時，史丹利·沙其特也在芝加哥發表了心理學上的情緒二因論。根據二因論，精神疾病並非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判斷，是這個社會判定了這樣的狀態叫作精神病。所以「現象」和「評價」是兩碼子事。精神疾病，包括所謂的「瘋癲」（瘋狂），都是當時人根據當時的風俗習慣及知識，加諸特立獨行者的評價。所以精神疾病不是一種事實，而是一種「歸因」。

法國學界對傅柯這樣的主張未予理會。自負的傅柯豈肯罷休，他繼續堅守立場，並且在他的下一本書裡做了更進一步的探討。這次他不再為具體主題所限制，他要探討普遍的模式（Muster），他提出的問題是：世界自啟蒙時代以降，到底是根據哪些模式在進行分類。他先以此為題，在克萊蒙費朗大學開課，一共來了三十名學生，但他們大多是為了要成為看護或護士而必修這門課。一九六六年授課內容正式出版，旋即造成轟動。《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Les mots et les choses*）受到各界矚目，因為從沒有人用過這種方式和觀點，來探討知識及科學。

傅柯以非正統的觀點重新「建構」知識與真理，成為法國哲學界的耀眼新星。但克萊蒙費朗大學卻在此時派他前往突尼西亞。巴黎的學運如火如荼的展開，許多舊秩序受到衝擊，值此關鍵時刻，他卻只能窩在海邊山丘上的小旅館裡，面對白牆藍窗，埋首寫他有關科學方法論的文章。一九六八年底，傅柯回到巴黎，一回來便加入學運的行列，緊接著由法國左派人士所創建充滿實驗性的學術殿堂萬森納（Vincennes）大學（即巴黎第八大學），聘請他去任教。傅柯的許多主張不但極端，甚至瘋狂。他高喊「人民公敵」、「人民公審」等口號，還想為法國大革命的屠殺行為翻案，力主屠殺是正確的，他大力推崇中國文化大革命。他的特立獨行讓他多花了不少力氣，才升上正教授。一九七〇年，他成為地位崇高的法蘭西學院「思想系統史」的講座教授，並重新定義了這個講座的内容。

傅柯的世界觀與當時盛行於柏克萊及牛津的演化心理學，對人和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對傅柯而言，研究思想系統並沒有什麼可靠的實體基礎，他認為，思想體系的建立，純粹是人類心靈在建構秩序。無論什麼觀念，其實都是以「知識」、「真理」和「權力」為核心。一如沙

特，傅柯也認為，人並非天生具有特質，人是「未定型的動物」。人生就是人不斷詮釋其所在世界的歷程。有權解釋者，藉由他所制定的遊戲規則來決定這個社會該怎麼判斷，以及人們該怎麼看待這個世界。此一基本思想後來成了傅柯的研究利器，七〇年代初期，他開始用這個邏輯來研究「性」。

如果說沙特是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界的浮士德，那麼傅柯就是梅菲斯特——一個致力於顛覆他人立足點的魔鬼。身穿白色高領毛衣、體型高挑、頂著光頭，全身散發出風流氣質的美男子，傅柯儼然知名香水品牌「密使」（agent Provocateur）廣告裡的帥氣型男。他的同性戀傾向與緋聞，成了備受關注的焦點以及媒體的聳動標題。進入七〇年代，他開始撰寫一部學術巨著，也就是多達數冊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傅柯的目標是，找出「社會」怎麼影響和決定我們的性觀念，包括對性欲及情色的看法。他先回過頭去探討基督教世界觀的起源。不同於其他歷史學家，傅柯並沒有視基督教為，藉由戒律和律法來限制人類性欲的專制威權。傅柯認為，基督教早期的性道德是一種新的「自我形塑」方式，一種新的「生命技術」。只可惜，性史的最後一卷，也就是第四卷《肉體的告白》（*Les Aveux de la chair*）最後並沒有出版。性史的第一卷《認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於一九七六年出版，這本書就像性史系列探討的導論，傅柯對他即將從事的研究，做了整體及扼要的說明，他說他要研究的是：統治結構與權力對人類性欲的影響。何以基督教所發明新的人類形象，會成為人類新的經驗形式？所以，是發明決定了經驗，而非經驗決定了發明？傅柯認為，我們的經驗形式來自社會概念，是社會概念賦予了我們經驗形式。所以，我們只能是我們所相信的那樣，至於我們相信什麼，取決於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

《認知的意志》是性史的第一卷。原本大家以為，傅柯接下來會以當代為主題做進一步的探討，沒想到他不但沒有這麼做，還一下子跳回基督教興起之前。性史的第二卷《快感的使用》（*L'Usage des plaisirs*）及第三卷《自我的關注》（*Le Souci de soi*）主要探討古希臘時

期的「性」。古希臘人是用什麼方法讓性愛與道德相安無事？他們創造了哪些觀念和規則，讓親密關係達到如此和諧、美好的境界？

傅柯在病榻上強忍劇烈的疼痛，撐著虛弱的身體，完成上述兩冊書稿的最後校對。對於自己的病，他總說「重感冒」。一九八四年夏初，他在病榻上拿到剛出版的新書，六月二十五日即病逝於醫院——死因為愛滋病。

傅柯的學術貢獻何在？他帶給我們看待事物的全新觀點。他重新審視社會的遊戲規則，也就是他稱之為「真理遊戲」的社會遊戲規則。所有我認為好的、對的、恰當的、美的，其實並非源自於我，而是源自於外在，是我接收了外在的看法；社會其實已經給定了意義，我只能從這些意義中，或積極或消極的進行選擇。但就連我的選擇標準其實也不是我自創的，而是來自於外界。

存在於社會中的真理遊戲不只會影響我們的判斷，還決定了我們的感覺。自我設定和自我感覺，其實都離不開他人的設定與整個社會既定的感覺模式。傅柯想追問的是，照他自己的說法：「當一個人覺得自己錯了，認為自己病了，視自己為罪犯、應受懲罰，當一個人對自己產生這些看法時，他根據的是哪些真理遊戲規則？」其實傅柯最想要問的應該是：「一個人要如何判斷和認定自己的欲望，我們根據的是哪些真理遊戲規則？」

傅柯在他的著作中大量討論到「性」，卻極少提及「愛」。但我們可以援引他的邏輯來提問：愛人者和被愛者，是根據什麼真理遊戲規則感覺到愛的？接著，我們還可以繼續做出「很傅柯」的結論：如果此社會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這個社會自己發明（虛構）出來的，那麼愛情當然也只是這個社會自己發明的社會概念了。所以，就其本身而言，根本沒有愛情這種東西或實體。我們所理解的愛情，我們對愛情的看法、評價、限制，或基於愛情跟另一個人建立關係等等，這些都是為了社會秩序（規範）的建立而產生的。

就此觀點，愛情只是一種社會作用。這種「愛」跟大衛·巴斯在演化心理學教科書裡所主張的愛，南轅北轍。大衛·巴斯認為：「全世界

不同文化的人都親身經歷過這種愛的想法、愛的感覺和愛的行為——從非洲南端的祖魯人，到生活在阿拉斯加冰原上的愛斯基摩人，全都一樣。」基本上，這種「愛情現象」的結構放諸四海皆準。不信的話，你看到處都有人為了表達愛意而高唱情歌，到處都有人為了爭取愛情而反抗父母，到處都有詩歌和民俗資料，證明浪漫愛情關係的存在。

若要正確了解我們的愛情和愛情觀的社會意義，就得先釐清傅柯和大衛·巴斯所代表的兩種互不相容的立場。哪一種觀點是對的？愛情真的古今皆然，全世界都一樣？或者，愛情不過是社會「真理遊戲」的一種作用，具有一定的時效性？若按演化心理學家大衛·巴斯的看法，人類各時代的愛情都相同，只是男女交往的規則、結婚儀式和婚姻形態，會因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但哲學家傅柯的看法剛好相反，他認為所謂的「愛情」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差異極大的「愛情的社會概念」。

以上簡單歸納成兩大問題：浪漫愛情是我們的天性，還是我們的文化？浪漫愛情是經得起時間考驗、古今皆然的經驗，還是一種具有時效性的發明？

## 愛情與西方

敢提筆為人類的愛情觀寫部歷史的，自古以來屈指可數。在這彌足珍貴的少數人中，又以瑞士作家丹尼斯·德·魯日蒙（Denis de Rougemont）<sup>註97</sup>最具代表性。一九三八年他出版了鉅作《愛情與西方》（*L'Amour et l'Occident*）。這個書名取得既美好、又響亮。至今沒有人寫出另一本「愛情與東方」，所以魯日蒙在該領域可謂獨領風騷。但五十年前他有多風光，如今他就被遺忘得有多徹底。來自瑞士法語區的牧師之子魯日蒙，年紀輕輕就寫出一本獨具創見又博學多聞的代表作。據說這本書是他傾「畢生之力」在「一小時內」完成的。從小他就一直在

思考：「愛情在西方國家的傳統中到底是什麼？」他花了兩年的時間蒐集資料、做筆記，飽覽與此相關的所有著作。

成果：一本風格獨具、結合了文學觀點與人格特質史的曠世傑作問世。比傅柯足足早了三十年的魯日蒙，當然沒聽過結構主義，也不知道要分析「愛情結構」，他把重點放在西方各國的神話、文獻與傳奇上，他處理這些資料的態度，就像它們超脫了時間限制，不管對人類、對男人還是女人、對愛情，這些資料永遠有效。出現在他著作裡的詞彙如「愛情」、「婚姻」、「自由」、「忠誠」等，都描述得那般理所當然，彷彿自西元一二〇〇年至今從未改變過一樣。魯日蒙在面對中世紀愛情時，想解決的只有一個問題：愛情與婚姻的衝突。愛情跟婚姻哪個比較重要？哪個較具正當性？是轟轟烈烈的愛情？還是平淡無味的婚姻？

對魯日蒙而言，愛情是一種「經驗」而非「發明」。然而，就連他最常用到的術語「宮廷愛情」，事實上也是一種發明。它是法國浪漫主義學者加斯東·帕里斯（Gaston Paris）<sup>註98</sup>於一八八三年提出來的。至於一個能讓人立刻聯想到中世紀騎士之愛或抒情詩人之愛、廣泛且常見的具體事實，根本不存在。我們腦海中的中世紀愛情，乃根據宮廷詩人、騎士抒情詩人或吟遊詩人所傳唱的詩歌想像出來的。換言之，關於中世紀愛情的知識全部源自於詩歌，我們知道的只是中世紀文學裡的愛情觀，而非實際發生在生活中的愛情。

敢寫書描寫中世紀愛情的人，不是太年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或者兩者皆是。即便魯日蒙蒐集了許多資料，但他對中世紀的了解，絕不會比英國動物學家莫里斯對石器時代的了解來得多。坦白說，中世紀所留下來的文獻，根本不足以讓我們勾勒出一個完整而可靠的中世紀樣貌。問題的癥結就在於，中世紀詩人用極為制式的文學體例來描寫他們的愛情觀。他們在黎明歌曲、抒情小調或十字軍詩歌、對唱歌謠中歌頌愛情，每一次歌頌的重點都不盡相同。中世紀的愛情世界或許就介於嚴肅的宮廷史詩和市井小民粗俗的打情罵俏之間。「當時人的生活與亞瑟王系列小說的描述，根本是天差地別，故事中的英雄窮畢生之力，只為追求宮廷文化的典範，致力於騎士征戰和為宮廷貴婦效勞、效忠。這根



本是詩人編織出來的童話世界，」古日爾曼學家尤阿興姆·本克（Joachim Bumke）<sup>註99</sup>如此寫道：「如今大家已經不再像百年前那樣，對於宮廷愛情毫無質疑。」

真實的中世紀愛情可能與現代的大同小異，也是各式各樣、變化多端或深具衝突性，並且受環境和教育背景等因素限制。中世紀愛情除了追求美德與「藝術」外，應該也追求性愛，充滿激情與渴望。自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sup>註100</sup>寫出了第一本《愛的藝術》（*Ars amatoria*）之後——比佛洛姆早了約兩千年，精神之愛（崇拜愛及侍奉愛）和肉體之愛就時而勢均力敵，時而精神之愛高於肉體之愛。在承諾精神之愛的同時，也渴望獲得肉體之愛，這一點應是古今皆然，古希臘羅馬人和中世紀人對肉體的渴望，應該不亞於現代人。

所以，魯日蒙所謂的「中世紀愛情」應該不存在，那只是後人的虛構發明。歷史永遠立足於當代，由當代人追溯過往而寫成。然而，後人總喜歡把古代發生的事，描述成當代某些行為的先驅或雛型。由於中世紀是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浪漫愛情只能在詩歌中得到頌揚，它是一種理念，不同於今天，沒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將此觀點發揚光大的，首推猶太裔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sup>註101</sup>，他影響了許多專家學者。在代表作，也就是上下兩冊《文明的進程》（*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中，他將西方文明史描述成一部持續朝更高文明發展的演進史。人類從野蠻進化為有教養，從不道德進化成為有美德，從受壓迫進化為自主與自由。愛情也是如此，從充滿社會壓力的關係逐步發展為自由、浪漫的愛情，不只有理念，也能具體付諸實行。

如今大家已普遍相信，自由浪漫的愛情是如此演變來的。其實上述說法既不能說全對，也不能說全錯。沒錯的是，西方國家從中世紀發展至今，人們的自由與選擇的確大增。愛情的情況也是如此。過去不容跨越的社會階級和牢不可破的行為規範，如今也已被打破。戀愛市場的遊戲規則變得自由且寬鬆了許多。但錯的是，西方歷史將持續朝更高的文明發展。伊里亞斯篤定且愉悅的完成了《文明的進程》這部大作，想必是因為二次大戰才剛開始，集中營的夢魘尚未成真。西方文明是有了相當高度的發展，但這樣的文明在二次大戰時犯下駭人聽聞的屠殺暴行，

讓「西方文明永遠向上、向前發展」的說法，頓時淪為謊言與笑柄。

關於中世紀的生活，就連伊里亞斯的觀點也顯得不夠嚴謹，且以偏概全。中世紀的貴族乃社會中的極少數，貴族生活必須謹守各種嚴格規定，不同於一般農民。關於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我們缺乏文字資料的證據，根本無從了解。所以一提到中世紀愛情，大多數人都跟伊里亞斯一樣，指的是範圍極小的宮廷文化和貴族階級。中世紀的宮廷愛情跟我們今天所追求的浪漫愛情有關？真的是浪漫愛情的先驅與雛型？實在值得懷疑。中世紀的宮廷抒情詩和騎士之愛從未把目標設定為，要和自己愛慕的貴婦或淑女有精神或肉體上的結合。雖然一如中世紀的騎士之愛，如今的浪漫愛情也會美化、理想化對方，但這種現象在希臘女詩人莎芙（Sappho）<sup>註102</sup>、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Euripides）<sup>註103</sup>和羅馬詩人奧維德的作品中就已經出現，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有了。美化自己愛慕的對象、理想化對方，並非中世紀獨創。

雖然這才是事實，但伊里亞斯有關浪漫愛情的發軔與演變的觀點，還是被學術界普遍接受。義大利威尼斯卡佛斯卡利（Ca' Foscari）大學哲學系教授烏姆貝托·迦林貝堤（Umberto Galimberti）<sup>註104</sup>便以伊里亞斯的觀點為立論基礎，引申道：「在那個我們因科技而得以擺脫的傳統社會裡，個人並沒有選擇自由，也難以追求自我認同。只有某些特定的團體和為數不多的精英分子，得以奢侈的享有自我實現的機會，當時的愛情並不在於建立兩人的個人關係，而是首重聯結兩個家庭或氏族，藉此保障經濟優勢和家族事業的經營實力，並透過子嗣傳承鞏固勢力，如果雙方都是特權階級，愛情甚至可以增進財富與提升地位。」其實這段話大有問題，因為民主的雅典城和晚期的羅馬也都屬於他所謂的「傳統社會」，但相較於十九世紀的市民階級和小老百姓，有不少雅典人和羅馬人的婚姻是奠基於愛情的。愛情的發展史似乎不是線性的演進，比較像是波浪起伏的運動。

我們必須修正錯誤看法，在今天自由、浪漫的愛情並非自古代一路承先啟後而來；西方歷史也不是一部持續朝更高文明發展的演進史。認清事實後，我們要問：浪漫愛情到底是什麼？古代人對愛情的看法有多少與我們今天的愛情觀相一致？愛情中哪些感覺是歷久不變的？哪些會

因時代、文化不同而改變？

## 受損害的「主體」

要回答上述問題，就必須釐清在西方世界的傳統裡，浪漫愛情代表什麼？對此，演化心理學家有一套說法，他們認為浪漫愛情源自於非洲草原上的生活需求。相對於此，人文科學家和哲學家也有一番見解，他們提出了浪漫愛情的起源神話。

舉例來說，德國弗萊堡大學的社會學家均特·杜克斯（Guenter Dux）<sup>註105</sup>教授敘述一則故事：曾經有過一個時代，主體與自然和諧共存。杜克斯雖沒有明確指出時間點，但他表示在市民階級興起前。在那個時代，主體的一切生活所需都得靠雙手，並且從不會胡思亂想出艱澀的問題，來為難自己。他們不會去思考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只覺得一切理所當然。但隨著市民階級興起，新時代來臨，工業蓬勃發展，現代人的工作世界逐漸形成，生活變得越來越複雜。突然間，一切不再理所當然，主體與自然的關係、與異性的關係，甚至連與自己的關係，全都變了。杜克斯說：「主體失去了原本的世界。」

原本井然有序、緊密相連的世界，突然變得既不確定又一團混亂。「主體在失去了原本的世界之後，陷入意義的危機中。這場危機導因於，主體在他的世界裡找不到能賦予生活意義的憑藉了。在與大自然相處時，行為意義遵循一定的方向，清楚明瞭。但在人際社會中要找到如此明確的意義，簡直不可能。」所以，無論是自然或他人，都無法提供主體需要的生命意義。在此情況下，主體只能把希望寄託在浪漫愛情上。如此一來，一道深刻的生命裂痕於焉產生。一方面，由於主體渴望獲得偉大而統一的生命意義，一個穩定的倚靠；另一方面主體也聰明的自知，根本無處尋得這個倚靠。結果就是，主體勢必會將對於絕對意義的追求，從外在世界轉向內在世界。於是，主體展開一場內心世界的探

索，為自己打造一個由絕對情感所形成完整的心靈世界，與外界無涉、與日常生活無涉。用杜克斯的話來講就是：「此乃邏輯的分裂，即傳統的絕對的邏輯，和新時代重功能性與關聯性的邏輯，此二者的分裂導致主體，跌落喪失意義和追求絕對意義的裂縫中。」

為了重拾與萬物合一的感覺，主體轉向兩性關係去尋找結合的滿足感。他們寄望在兩性結合中重新找到那份已毀壞的感覺。於是乎，如浪漫主義者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sup>註106</sup>所言的，愛情變成了一場「普遍的實驗」（universelles Experiment）。當生命再也找不到超越感官的意義時，愛情適時提供了意義。這就是浪漫愛情的核心價值。

這個故事到底要講什麼？無論它要講什麼，「主體」這個詞一開始就引發我們滿肚子疑問。「主體」指的是誰？事實上，「主體」乃十八世紀的一項發明，當時的哲學家認為講「主體」比「人」恰當，因為主體是人的內在概念，一個獨立於真實世界，獨立於各種高矮胖瘦、不清不楚之具體個人的內在概念。主體代表的是「本質上」的人，而非真實、殊異的人。

這個概念的由來大致如此。但它顯然沒有讓我們清晰明瞭，反而製造了不少混亂。尤其在探討浪漫愛情的形成時，冠上「主體」一詞更加模糊了焦點。「主體」的概念幾乎讓人誤以為，原本生活在與自然緊密結合傳統世界中的人，和百年後與自然失去聯繫的人，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人。這當然不可能。前後兩種情況歷經了好幾個世代。墜入美好世界與敗壞世界裂縫中的悲劇，絕不可能發生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具體的個人只能活在這個或那個時代，並不會跨越時代，並掉到夾縫中。

如果今天還有人開口閉口都是「主體」，大概會讓人覺得他學究氣過重，或走不出學術圈的象牙塔，並且還會加深大家對人文科學的反感，認為這幫人矯揉造作、咬文嚼字到令人厭惡。但這種負面印象還遠不及「主體」對「主體」使用者造成的困擾。所以，遠離浪漫主義哲學家及詩人的用語顯然比較聰明。如今我們稱之為「浪漫主義者」的，其實是一七九〇年到一八三〇年德意志的市民階級知識分子，這批人只是當時社會的極端少數。在同時代的鄰近國家並沒有出現類似的「浪漫主



義」思潮或人物。當時法國、英國的思想家和詩人，皆深受工業化之苦，卻沒有人提出類似德國浪漫主義者的理念，要求與宇宙萬物合而為一。

杜克斯所指的那些偉大「主體」，大概就是十根手指頭數得出來的浪漫主義代表，這些人最擅長天馬行空且異於常人的深奧想像。無論是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sup>註107</sup>、施萊格爾兄弟或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sup>註108</sup>，當他們在圖林根（Thüringen）的小城耶拿（Jena），高談闊論傳統社會中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世界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一個現代的歷史敘述並不存在。當時人對「過去」的了解，大多是傳聞，因此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可以「發明」、「虛構」一個美好的過去，藉以支持自己的論點。

事實上，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不是活在一個與大自然徹底合而為一的世界中。人類的歷史也不是一部持續且線性朝向自我意識發展的人類史。許多資料顯示，古希臘羅馬時期甚至比中世紀進步，但即便如此，相較於之後的基督徒，古希臘羅馬人更覺得自己是宇宙中孤獨無依的流浪者。古希臘羅馬的神只是充滿象徵的形象，他們的行為多少帶有兒童故事的色彩。古希臘羅馬時期少有堅定、虔誠的信仰，與自然的關係也不是沒有存疑的。不管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或希臘三大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sup>註109</sup>或埃斯庫羅斯（Aeschylus）<sup>註110</sup>，他們想表達的都是：天地之大，無所依歸。只有十八世紀末那一小撮極少數的人，如諾瓦利斯、費希特、施萊格爾之流，才會認為美好的古代是既浪漫刺激，又穩固安定的。

浪漫愛情不像是真實世界的一種現象，比較像是文學中的幻想，而它所帶來的影響無與倫比。促使浪漫愛情興起的不是意義的淪喪，而是市民時代嚴苛的階級道德與性道德。一八一三年英國「浪漫主義者」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sup>註111</sup>曾直言不諱的抱怨：「兩性交往不曾擺脫傳統規範的專制束縛，而獲得自由。那些規範就連難以駕馭的激情都要宰制，連最清楚明白的理性推論都要桎梏，並呼籲意志來壓迫我們本能的反應。殊不知，愛情服膺的是對美的知覺。強迫的結果只會讓愛情凋零，因為愛情的本質是自由……男女的結合應如同他們的相愛一般長

久；一旦對彼此的愛慕消失了，任何強迫他們在一起的規範，即便只是片刻，都是無法忍受的專制和不值得的忍氣吞聲。」

這種無法忍受的專制和不值得的忍氣吞聲，是十九世紀初西方國家的普遍現象。它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甚至今天在許多社會中仍餘毒猶存。正因為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限制，更叫人嚮往小說中令人熱血沸騰的愛情。雖然有不少作者是男性，但讀得意猶未盡的絕大多數是十九世紀市民階級婚姻中吃虧的一方：女性。浪漫愛情不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它是文學的產物。直到今天愛情小說仍有它不可動搖的地位。浪漫愛情藉由文學作品逐漸在女性讀者的腦子裡扎根，並形成牢不可破的想像世界。原本是美好的想法，隨著時代推進，變成了對更自由的性道德和婚姻道德的要求。原本是以「愛情」之名，盡義務之實，逐漸變成強調個人意願和選擇。

如果上述推論沒錯，浪漫愛情就不是源自四百萬年前的非洲草原，也不是發軔於一七九〇年的耶拿了。浪漫愛情乃誕生於小說中，最晚可溯至英國啟蒙時代，爾後更橫掃全歐洲。所以浪漫愛情是一種反傳統的幻想與寄託。至於其他關於浪漫愛情緣起的說法，如非洲草原上的怦然心動，或喪失了與大自然的聯繫等，全都只是浪漫至極的「故事」罷了。

面對過去的歷史與其意義，應要小心謹慎，不該一味遵循既定看法。十九世紀以降的歷史敘述，擅長將過去的文化視為今天的前身。不少歷史現象與社會狀態因此而簡化，一些跨越時代的問題，例如愛情，也往往被扭曲。

比較可靠且嚴謹的說法也許是：浪漫愛情是一種渴望，到了十八世紀才有清楚的輪廓。它反對當時婚姻制度的種種限制，以及對感情的不重視。一七七四年，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問世，一舉將歌德推上暢銷小說冠軍的寶座。十八世紀晚期，一些德國思想家順勢拉抬愛情，視其為贏得生命意義的最後堡壘。在這背後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市民階級在與貴族的對抗中，不斷茁壯，另一方面又被僵化的社會與宗教規範所箝制住。



富裕的市民階級推動了沙龍文化的蓬勃發展，那裡成了兩性社交的新場所。但嚴格的社會規範仍壓抑著渴望，讓渴望只能藉由文學來宣洩。這一切與「主體」無甚關聯，所牽涉到的問題是：愛情只能說，不能做。只能寫在小說裡，現實生活中實踐的機會付之闕如。而且在浪漫主義的幻想中，作家很少在作品裡賦予他們渴望的女主角一個平起平坐的伴侶，真正與她分享人生經驗。所以當時的浪漫愛情顯然不符合今天的理想，現代戀人冀求真正的精神交流與心靈融合。

我們之所以會認為現代人的浪漫愛情想像，深受十八世紀末的影響，恐怕得歸功於精神分析。佛洛伊德支持早期浪漫主義的想法，愛情的需求來自於失去。浪漫主義者的失去指的是原先的世界，佛洛伊德的失去指的是幼時的親密關係。所以，佛洛伊德的核心思想似乎已預設了立場。母子關係（或父子關係）的失落感，是我們日後重新建立類似關係的重要動機，這種類似關係就是愛情。然而不幸的是，佛洛伊德視這種渴望為病態的，浪漫主義對受損害主體的想像，到了精神分析就成了精神疾病。原本再正常不過的心理狀態，這下子變成了由原欲

（Libido）引發的腦袋不正常：「自戀」導致我們過分提高了自己。在這種「昇華作用」下，我們也會為了相同的目的而美化、提高我們所愛的對象。

在二十世紀出版的精神分析著作中，有許多精神分析理論將「人與大自然的疏離」及「孩子與母親的疏離」相提並論。兩者都涉及天性的喪失。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環境瓦解了，「我」突然意識到孤單。但別忘了，前面說過，浪漫主義所謂的「失去與大自然的聯繫」，只是少數人的感慨，並非大多數人的普遍經驗。再者，誰說從親子關係轉換到伴侶關係，一定是問題，而不是一種再尋常不過的過程？

人類對愛情的需求怎麼會是導因於受到損害呢？愛情應該是一種尋常的期待，因為感性與理性讓人類能夠將兒時珍貴的經驗，透過其他方式重現於生命。在受損害的推論中，精神分析犯了一個和生物演化理論相同的錯誤，生物演化理論主張：凡存在必有其功能。換成精神分析的說法就是：凡存在必為了補償。

我個人傾向認為，兩性之愛並非一種補償，而是延續，且藉由其他方式來表現。小孩子聽到要過聖誕節莫不欣喜若狂，但到了青春期，能讓他如此這般的，便從聖誕老公公變成了男女同學。就生物學的觀點而言，青春期時我們進入生命另一個嶄新階段；原本在乎的事失去了重要性或漸漸無足輕重。人生有了新的地貌，環境的改變讓許多事情不再「就是這樣」。理所當然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少，不理所當然的事情變得越來越多。這種情況讓人不免困惑又敏感。十八世紀末的知識分子認為這是「失去了原有的世界」，他們自覺是畫時代劇變下的見證者，擘畫出充滿個人激情的「浪漫愛情」想像。這個名詞我們沿用至今，但今天的浪漫愛情比較像十八、十九世紀愛情小說讀者的感受，不帶絲毫「失去原有世界」的慨嘆與悲愴。

## 相同的情緒，不同的想法

經過以上的探討，或許我們該試著回答這個問題：愛情到底是一種各時代都相同的感情，還是會隨著時代而改變？從生理反應的層面來看，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人類的許多情緒反應已經存在數十萬年，甚至數百萬年，至少在性欲方面確實如此。作用於人體的化學傳訊物質（semiochemical），例如多巴胺、苯乙胺、腦內啡，都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了，所以就這部分而言，的確各文化相同。

但下面的問題就複雜了。誠如沙其特所言，人類不是「有」這些感覺就算了，我們還會「詮釋」這些感覺。但大家所採用的詮釋模型，毫無疑問的並不相同。在浪漫愛情的想法出現以前，人們把這種強烈的情緒當作是心情起伏或困擾，沒有人認為這是愛情的浪漫之處，因為根本不認識這個觀念。本章的一開始引述了拉羅什福科的名言：「如果沒聽過，大概沒多少人會陷入愛河。」這麼說或許有點誇張，但又不無幾分道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聽過，我們今天絕不會愛得這般無可

救藥的「浪漫」。根據史料，文藝復興時期和巴洛克時期偶爾才有人談論愛情，不像今天的社會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談論愛情，這也讓我們對愛情產生難以置信的需求，對浪漫更是永遠欲求不滿。

在愛情中，我們感受到的那份激情，其實與前人無異。但愛情不只是一種經驗，它還是一種發明。也就是說，它遵循著各種人為的真理、知識和權力的遊戲規則。換句話說，世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愛情觀念、愛情理想，以及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的愛情的可能性。這三者都無可避免的根植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

落實在具體生活中的浪漫愛情，不可能古今皆然、東西方一致，它會因時代、文化而不同。即便在相同的文化裡也有許多差異，視其所屬的族群、形塑自我認同的影響力而定。舉例來說，二十世紀初的藝術家或波希米亞人對浪漫愛情的期待，肯定和一般市井小民不同。即便是同時代、同年齡層的人，例如一九六〇年代紅極一時的德國名模烏希·歐博梅爾（Uschi Obermaier）<sup>註112</sup>與演技派女星烏希·格拉斯（Uschi Glas），雖然都名叫烏希，也只相差一兩歲，但她們對浪漫愛情的看法肯定大不相同。因此，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民族學專家威廉·賈科維雅克（William Jankowiak）教授和范德堡大學的愛德華·費雪（Edward Fischer）教授，兩人主張浪漫愛情是一種「普遍的感情」，實在很難令人信服。普遍的應該只有強烈波動的情緒，提升且美化對方的熱情，對於戀人無法自拔的想念。這麼說，傅柯應該不會反對吧。但強烈的陶醉感並不是「浪漫愛情」的全部。

愛情這種紊亂難解的感情，不只是情緒，還有想法，後者尤其重要。想法主要源自於期待。如果愛情單純的只是情緒，雙方只要盡情享受愛情的飄飄然，就萬事皆備了。這樣的愛情簡直像一場足球賽，對準一個球門射進去就能成功。不過，在愛情這場遊戲裡有兩個球門。各種共存或並存的觀念想法，會以既複雜又深具差異的方式互相交錯或重疊。身陷愛情關係時，我們至少會期待對方「懂」我，「懂」我的想法。當然，如果他能（即使沒有百分之百的）贊同我的想法，那就更理想了。這是我們對愛情最起碼的期待。愛情少了期待就無法成為愛情。德國牧師暨反納粹民主鬥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sup>註113</sup>曾說：

「愛不要對方的任何東西，愛要為對方付出一切。」這話說得好，卻是錯的。因為在愛情中，我們必定會有所期待。

## 行政專家的愛情

被愛的人通常會覺得價值提升，感到自己很特別，他（她）在對方的眼中是獨一無二的。在愛情裡，一項非常重要的基本期待就是：「請讓我覺得自己很特別！」當然，我們大多沒有說出口，不說也好，畢竟在愛情裡不需要什麼都說出來。說破了，「特別」的魔力就會消失。的確，我們並不喜歡承認：我渴望被愛是因為我希望自己很特別、有價值。

想要「覺得特別」是現代人才有的問題。對這個世界知道得越多，比較的機會越多，也就越難覺得自己特別。我們終於了解到，自己並不特別聰明、不特別漂亮、不特別和善、不特別有天分，不特別完美、不特別有成就、不特別風趣幽默……。每當我們對自己有所期待時，總會發現原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們喜歡展現個人的特別之處，包括音樂愛好、流行品味和居家裝潢等。但是不管我們再怎麼努力，這些特別之處即使沒與幾百萬人雷同，至少也跟幾千人類似。我那經過室內設計師精心打造的居家裝潢、我愛聽的CD都凸顯了個人品味——只可惜，世上有許多人跟我一樣，也聽這樣的音樂，做這樣的裝潢。這些人不但是我不認識的人，還可能是我最討厭的那種人。

對於特別的感覺殺傷力最大的，莫過於職業了。在我們的社會裡，只有極少數人從事特別或別人想像不到的職業。絕大多數的人工作都大同小異，職業很難讓我們覺得特別。或許藝術家好一點，但為數眾多的行政人員則與「特別」無緣。若說一位行政人員更渴望在工作之外，發掘自己的特殊性，這種揣測不會太不合邏輯吧。換句話說，他更渴望被愛，更需要愛情？接下來，就讓我們以一位行政專家為例，看看他是如

何分析愛情的。

尼克拉斯·盧曼，一九二七年出生於呂內堡（Lüneburg），大學唸的是法律，自一九五三年起，先後任職於呂內堡和漢諾威的最高行政法院。但他不滿足於此，閒暇時飽覽群書，閱讀範圍遍及所有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專業領域，並勤於做筆記、歸納整理，放入卡片盒。三十三歲時，盧曼申請到獎學金，赴波士頓哈佛大學深造。他在哈佛攻讀行政學，有幸親炙美國知名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sup>註114</sup>授課，他深受啟發，收穫豐碩的回到德國，隨即在施派爾（Speyer）行政學高等學校擔任講師。但飽學如盧曼，這樣的職位實在大材小用。直到發表了《形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後，才有幸被當時在德國社會學界舉足輕重的薛爾斯基（Helmut Schelsky）<sup>註115</sup>教授發掘。薛爾斯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服盧曼到明斯特大學攻讀博士，並幫助他在極短時間內，先後完成博士論文和取得教授資格。一九六八年，盧曼受聘到剛成立的畢勒菲爾德（Bielefeld）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在盧曼死了十多年後的今天（一九九八年去世），世人將他與傅柯並列，並推崇他們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學家。

對傅柯和盧曼進行比較，是個很有意義的研究。法國思想巨擘和德國知名社會學家，兩人只差一歲，他們的共同點是都具有驚人的自信心，不怕挑戰前人，矢志開創新頁。終其一生兩人並未相識，也不覺得有接觸的必要。

盧曼一如傅柯，他們都對傳統的歷史和社會形式感到質疑。傅柯企圖推翻的是：西方世界的歷史將持續不斷朝向更高的文明發展。而盧曼不能接受的則是：我們只有這個社會，而不是有許多較小的子社會。如果說傅柯的社會學是一門「不連續性」的社會學，那麼盧曼的社會學就是一門闡述各自獨立「社會子系統」（*gesellschaftliche Teilsysteme*）的社會學。所以對他們而言，絕對真理和絕對道德都難以想像。傅柯會說：真理與道德乃當權者定義出來的。盧曼會說：在一個社會系統內，真理和道德都有一定的作用範圍（功能區域），有時重要，有時不重要，舉例來說，對科學而言真理很重要，但對經濟、藝術、行政，則不

太重要。

盧曼在《作為激情的愛情》（*Liebe als Passion*）裡寫道，愛情同樣會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畫出一定的作用範圍（功能區域），即形成「親密關係」系統。此觀點一出，讓許多人跌破眼鏡，因為盧曼的老師帕森思，雖然也把社會畫分成許多獨立的功能系統，但在他的系統理論中從來不包括親密關係。盧曼的系統理論卻試圖處理感情問題。早在他第一次登台授課（一九六八／六九冬季學期），便以愛情為主題，剛好趕上了談論的最佳時機。甫成立於柏林的K1公社（Kommune 1）企圖發展實驗全新的親密關係模式，嬉皮運動和「愛與和平」（love and peace）演唱會的熱潮正盛，愛情頓時顯得眾所矚目。而我們這位穿西裝、打領帶的行政專家不但走在時代尖端，甚至還超越了他的時代。他心底很清楚，六八學運有哪些東西未來將蔚為風潮，哪些訴求不過是曇花一現。至於愛情，盧曼到底提出了哪些見解？

盧曼認為，戀人真正想要的其實是：感覺自己很特殊，也就是感覺自己是「個體」（Individuum）。但社會結構越複雜，這樣的願望越難實現。十年的行政事務經驗讓盧曼更加堅信：社會系統無助於個體性（Individualität）的建立。如今，人們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飽嚙分裂：一個人在家庭裡可能是父母，在職場又有職場的角色，在運動場上也許是保齡球好手或羽毛球健將，到了網路，又是某個社群的成員；另外，他還可能是別人的鄰居，是納稅義務人，是某人的丈夫或妻子。在此情況下，要獲得一個統一的自我認同，真的很困難。社會結構越穩固緊密，人的心理狀態就越顯脆弱。於是我們對愛情的期待就越高，盧曼認為：「在一個充斥著非個人關係的社會裡，要找到讓人體驗並發揮自身統一的點已變得很困難……，被我們視之為愛情而追求，並在親密關係裡尋覓的，其實是自我表述之有效性（Validierung der Selbstdarstellung）。」說得白話一點，就是自我肯定。

第八章和第九章討論到，在現代社會裡，愛情是一面至高無上的鏡子，在鏡中，個人體驗到自身的完整。誠如盧曼所說，戀人依附著對方，而對方「相信存在與表象的統一，或至少以此為自我表述的內容，而另一方又必須對此深信不疑。」這場交互的自我表述的奇怪遊戲，到



底要怎麼玩？能長長久久的玩下去嗎？如果能，它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 對期待的期待

盧曼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愛情不僅是一種遊戲，還是一種符碼（Code），一種根據既定規則進行的遊戲。

個人的「自我概念」，若換成傅柯的說法，就是「自我技術（技藝）」（Selbsttechnik），其乃溝通交流的結果。它藉由說話、閱讀、傾聽、觀察、了解或思考等逐漸形成。「溝通」是盧曼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戀人如何相互溝通？愛情的溝通行為有哪些典型特徵？

在「親密關係」系統裡，溝通的素材不是親吻、擁抱或情話。根據盧曼的理論，親密關係是一種最高層級的溝通形式，它真正的素材是期待。期待不僅打造出整個愛情關係的架構，同時也是愛情真正的主題。但「期待」要怎麼交流？會產生什麼結果？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藉由「溝通」來交流「期待」，以形成堪稱穩定、可靠的「親密關係」系統，即一般泛稱為愛情的過程？

首先，戀人對愛的人會有所期待，而那些期待是可期待的。在愛情關係中，我們首先期待的並不是對方很能賺錢、懂得法律、有藝術創作或者很會傳道等。我們真正期待的是，對方很在意我、關心我、了解我。而且我們還會期待，對方也會對我有相同的期待，他不但懂得我的期待，還能正確的評估我的期待。這就遊戲規則。

這種親密的愛情關係會自成一個由「期待」構成的社會系統。更確切的說，它是由之後所衍生的和已固定的期待，亦即符碼，所構成的系統。我們今天對愛情的理解，比較不像是一種感情，而是一種符碼，有著濃厚的市民階級意味。盧曼認為，這種符碼出現於十八世紀晚期的小說中，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在此意義下，愛情媒介不是一種感情，而

是一種溝通符碼，我們可以根據它的規則來表達、塑造、促進、揣測或否定感情，並且在相應的溝通行為出現時，依此預測後果。」

如果盧曼的看法沒錯，「我愛你！」所要表達的跟「我牙疼！」迥然有別。前者是承諾與期待的完整系統。一個人確定了自己的愛情，等於承諾了，他（她）的感情值得信賴，他（她）願意為所愛的人付出關懷。這也意味著，他（她）準備好表現出在我們的社會裡，符合他人眼光的戀人行為。

戀人藉由「期待」進行溝通。但無論男女，大家都知道，判斷期待的過程非常複雜，一不小心就會招致失望。期待是很容易落空的。再加上，我們本身還會期待，情人將對我們有什麼期待，這點又常讓人迷惑，捉摸不清。所以，戀人「對期待的期待」雖有助於鞏固彼此的關係，但它很容易出差錯。我們企圖用最脆弱的符碼，來鞏固愛情這種最要求穩定的關係，這正是愛情的矛盾之處。

愛情還有另一個麻煩問題，戀人無可避免的會美化對方。愛情會大幅改變和影響我們眼中情人的樣貌，即使在很「平凡」的狀況下，也讓人神魂顛倒。這就是愛情不容混淆的特質，它讓戀人只看見微笑，看不見缺牙！盧曼以一貫獨到的洞悉力解釋：「在愛情中，與外在世界的關係被淡化，而內在世界的張力被激化（增強）。此刻得仰賴個人資源，以確保其穩定性。」

愛情的規則如此不穩定，它要在高度的脆弱不安中，造就既罕見，又近乎不可能的溝通形式。愛情真可謂再尋常不過的不可思議，企圖「在他人的幸福裡找到自己的幸福」。

正因為我們知道愛情近乎不可能，它才格外彌足珍貴。然而，光是意識到「維繫這份不可思議」的困難，就足以威脅到愛情。「因為愛」，我關心我的伴侶；「因為愛」，我做了許多原本不會做的事，看了自己一個人時絕不會去看的電影，當對方高談闊論我原本不感興趣的話題時，竟能聽得入迷。這一切全是因為我愛那個人，因為我們的愛。對戀人而言，愛情就像小孩或寵物，都需要小心翼翼的呵護，為它擔憂害怕。

愛情的弔詭之處，也像養小孩或寵物一樣，越是呵護備至，排除各種威脅，越是會寵壞小孩和寵物，寵壞愛情，愛情不可或缺的張力將消失殆盡。用盧曼的話就是：戀人越有把握，能滿足對於愛情穩定性的期待，愛情關係就會變得越平淡無奇，就正面或負面意義而言，皆是如此。配合完美的「對期待的期待」，的確讓人安心，同時卻也平靜無波，它削弱了讓愛情顯得刺激的「不可思議性」。盧曼認為，將愛情視為感情、性欲和美德的綜合體，這種浪漫想法永遠是一種苛求。要從另一個人的世界裡找到意義，就算只是短暫時間的要求也顯得過分。

以上是盧曼在愛情理論上的貢獻。其優點是指出了唯有掌握「對期待的期待」這場細膩遊戲之要義與規則，才能看清楚愛情關係追求的原來是：內在的穩定化。若非墜入愛河，它絕對不會出現。盧曼的理論也有缺失，他處理愛情問題的手法，相當符合系統理論不理會某些問題的作風；只有從頭到尾不關心人類感情心理狀態的人，才會說出「愛情不是感情」這種話。或許對許多社會學家而言，允許自己目光狹窄，是既合理又正當的研究手段，但一般人肯定無法接受這種說法。更有趣的是，在盧曼的理論中，永遠見不到單戀、失戀或求愛被拒的例子。盧曼的愛情永遠是雙方的，永遠是正處於「交流期待」的狀態中。對盧曼而言，世上只有固定的愛情關係，只有婚姻和伴侶，在這種關係裡才能形成社會學家關心的「系統」，一個名為「親密關係」的系統。

愛情當然是種感情。經由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愛情並非只是生理反應，也不是一時的情緒衝動。愛情是對一種內心起伏狀態，盡情發揮各種想法與觀念的詮釋，而從詮釋到對另一個人的期待，代表「愛情」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中世紀的農夫看到一個農家少女而臉紅心跳，他應該不會認為，自己將在對少女的愛情中找到「意義」。連盧曼自己也說，這是一種現代人才有的「期待」。事實上，即便是現代人，這種「期待」也非理所當然。由於我們的感情非常有可能無法從對象身上得到相同的回應，於是不構成交互穩定的「親密關係系統」。然而它們就因此而不存在嗎？也沒有任何的社會學意義？譬如說，了解一個社會中有多少單方面的愛情，趨勢是上升還是下降，對我們的社會毫無意義嗎？

「我愛你！」這句話不止於感情的表達，在這一點上盧曼無庸置疑是對的。但愛情當然也是一種感情。盧曼的愛情觀念混淆了太多不同的意識狀態。他完全不區分戀愛和愛情，而這種區分不只對生物學，對社會學而言也很重要。例如愛慕某個人不一定要在對方眼裡看見回應；否則的話，青少年對偶像明星的愛，豈不是沒道理可言？這更像一種為迎接未來之愛的青澀練習，不是嗎？再者，如今與戀愛如影隨形的性愛，對追求個體的完整性並非必要。某些人在性愛上的刺激點很可能剛好是另一些人不想要的。性愛的誘人之處未必是要讓自己的主體性受到肯定，反而經常著重在角色扮演的樂趣上，甚至要像打啞謎一樣，才能喚起性欲。

## 結論

經過以上討論，這一章想說明的是什麼？我們對愛情的看法無關乎「生物化學」，只關乎「社會」。相同的內在起伏在不同的社會裡，對於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會有不同的詮釋。流行於現今社會與性牽扯不清的「浪漫愛情」，不過是無數愛情模式中的一種。它的特徵是對「性愛合一」的想像，但在現實生活中幾乎難以實現。雖然在其他時代和文化中也有過類似的愛情觀，但像今天富裕穩定社會下的浪漫愛情，幾乎從未出現過。影響所及，戀人有了全新的「自我概念」，於是全新的「自我技術（技藝）」也應運而生。我們詮釋感情的方式前所未見，行為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不只這樣對待自己，也這樣對待所愛的人。其中重大的改變就是「期待」。我們不只要求性愛合一，還希望強烈且持久，各種期待不斷升高。由於我們也意識到他人的期待不斷升高，又相應的提高自我期待。但是，當「期待」和「對期待的期待」都越攀越高時，能夠滿足的就變得越來越少，再也沒有伴侶能真的讓我們滿意。想愛卻又無法持久幸福的相愛，這之間的矛盾落差，衍生出當代

的核心主題。我們似乎愛「愛情」遠勝過於愛一個人.....

---

註96：一六一三至一六八〇，法國思想家、格言體道德作家，著有《道德箴言錄》。

註97：一九〇六至一九八五，瑞士哲學家及歐洲學倡議者，是歐盟思想的先驅。

註98：一八三九至一九〇三，法國十九世紀知名的中世紀學者。

註99：一九二九年生，長期任教於科隆大學。

註100：西元前四十三年至西元十八年，以「博學詩人」聞名的羅馬帝國才子，《變形記》為其最重要著作，集希臘羅馬神話大成。從創世寫到凱撒之死與奧古斯都繼位為止。

註101：一八九七至一九九〇，德國猶太人，一九三三年後流亡英國與荷蘭，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

註102：約西元前六三〇至西元前五七〇年，一生寫過不少情詩、婚歌、頌神詩、銘辭等，為古希臘九大抒情詩人之一。

註103：西元前四八四至西元前四〇六年，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著有《美狄亞》、《希波里特斯》、《伊蕾特拉》、《特洛伊的婦人》等。

註104：一九四二年生，社會人類學、哲學教授。

註105：一九三三年生，研究重點包括人類精神史。

註106：一七七二至一八一四，德國哲學家、作家、評論家、文學理論家。施萊格爾兄弟中的弟弟，同為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文學的核心成員，均屬耶拿派，重要作品有《古今文學史》、《論北歐的詩藝》、《路琴德》、《近代史論》。

註107：一七六二至一八一四，德國哲學家，浪漫主義思想家之一，也是近代觀念論的理論大師、藝術哲學的重要奠基者。曾當選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有感於普法戰爭德國挫敗，提倡以教育來復興德意志民族，以道德、國家的理想教育國民。

註108：一七七二至一八〇一，德國早期浪漫主義作家、哲學家。本名為Friedrich Leopold, Freiherr von Hardenberg。其「藍花」成為浪漫主義重要象徵，代表著祕密、永遠渴望而不可得的欲求。

註109：西元前四九六至西元前四〇六年，古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伊底帕斯王》為其作品。

註110：西元前五二五至西元前四五六年，古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波斯人》、《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阿伽門農》等為其作品。

註111：56·一七九二至一八二二，英國抒情詩人、戲劇詩人，天賦極高，與拜倫為英國十九世紀詩壇上兩顆巨星。

註112：一九四六年生，一九六〇年代被視為西方性解放的代表人物。

註113：一九〇六至一九四五，德國青年神學家，從學者與牧師成為反抗希特勒的鬥士，遭處死於納粹的絞刑台。

註114：一九〇二至一九七九，美國社會學家，結構功能主義代表人物，二次世界大戰後統整社會學理論。

註115：一九一二至一九八四，德國社會學家，培養許多下一代社會學者，參與畢勒斐爾德大學

社會學學院的創建。



## 第三部 今日愛情

### 第十一章 愛上愛情？

為什麼越是尋覓愛情，越是遍尋不著？

婚姻生活這門藝術定義出一種關係，就其形式而言乃二元的，就其價值而言乃普遍的，就其強度而言乃特殊的。

——法國思想家傅柯

我們在置身天堂時結婚，在共乘一輛車時離婚。

——德國社會學家盧曼

## 愛情作為自我實現

我的祖父母結婚時，兩人都別無選擇。雙方家長皆任職於鐵路局，就這麼約定了。小瑪莉和小威利，相差五歲，嗯，滿合適的。祖父、祖母從此牽手一生，相伴超過五十年。他們倆到底合不合適？從來沒有合適過。祖父母的結婚對象不是自己挑選的，甚至可以說，他們的人生沒有一件事是自己決定的，愛情、職業、住所、醫生、信仰、生活風格、電信業者、社交圈、朋友圈，沒有一樣是自己挑選的。至於心理諮商師，完全沒得選，因為當時還沒有，不過教堂就在村子裡，大家的生活需求都很低。祖父母每四年投票一次，只有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九年，選舉停辦而未前去。關於這個世界，他們知道的國家只有德國和奧地利。祖父一輩子最遠的一趟出門就是參戰，而且沒有人問他：「去波蘭

好嗎？你願意被派去波蘭嗎？」

父母結婚時，他們已經能選擇了。他們對人生有一定的認知，雖然還相當有限。他們結婚得很早，母親當時才二十二歲，時值一九五〇年代晚期。父親不必當兵，因為正好碰上德國史無前例的無軍備時期。他可以安心的上大學，然後成為一名設計師，這在當時是新興行業。接著，德國經濟起飛，一年比一年富裕。到了六〇年代，德國知名記者、作家，同時也是製片人的奧斯瓦特·科勒（Oswalt Kolle）<sup>註116</sup>登高一呼、頌揚自由民主，至此原屬於義務的性行為，也變成了意願和選擇。在此同時，父母親的足跡遍及西歐，甚至遠至摩洛哥，後來他們還搭機前往南韓及越南。他們追求不同於祖父母的生活，企圖擺脫上一代的價值觀。他們退出教會，在郊區買了棟房子，建立屬於自己的家，之後邁入中年危機，家裡加裝了小耳朵，德國電視出現了第三台，遙控器問世。

我高中畢業時，市面上出現了第一台錄放影機。那是一九八四年。當時的電話聽筒還連著長長的電話線，電話是跟電信局租的。德國的經濟持續蓬勃，人民的荷包飽滿。後來，德國企業大規模淘汰學徒，連大學生也變得很難找工作。不過，我還是可以自己選擇要讀哪所大學。不久之後，我可以選擇的電視頻道增加到十個。至於旅行，我想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一九九〇年後，甚至可以堂而皇之的踏進東德。我開始學習使用電腦，追求自己想要的愛情，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看自己想看的醫生，信自己想信的宗教，過自己想過的生活。我可以自己挑選電信業者、社交圈、朋友圈，必要時還能選自己滿意的心理諮商師。我享有自由，並長出了人生的第一撮白髮。之後，防曬乳液的防曬效果增加了十倍，災難性的極端氣候成了既定事實。報上、書上都說，生態的破壞已無法挽回。電視不停的播報著，地球上人口超載，遷徙和爭奪自然資源的戰爭一觸即發。但我們周遭的現實環境裡完全感受不到這股氣氛。大家繼續追求「多還要更多」；我們追求最多的愛、最多的性、最大的幸福、最優質的健康，什麼都要追求到極致。每個人都想獨一無二、功成名就，每個人都想身材苗條、青春永駐。

我們不再跟我們的祖父母一樣，不再過平凡的人生，而是一種「選擇的人生」，或者更確切的說，過著一種「自己打造出來的人生」。沒

錯，我們可以從越來越多的生活選項中做出選擇，而且是非選擇不可。於是我們趕鴨子上架似的被迫自我實現，因為若不這樣做，據說我們什麼都不是。但所謂的自我實現，其實就是從無數選項中做出決定。所以沒得選擇的人就無法自我實現，非自我實現不可的人，絕對不能放棄的就是選擇。於是乎，「做自己！」這個原本令人稱羨的大好機會竟成了一種可怕的威脅。試問，如果我做不成自己，那該怎麼辦？

大家對愛情的期待同樣是「多還要更多」，理由是：因為你值得！在愛情建立的關係中，我們尋找的也許是社會依靠。但在「浪漫」愛情裡，我們想要的更多，我們想要一個自我實現的「完美」機會。

浪漫主義企圖捕捉愛情一閃而逝的身影，並且把它放進「愛」的框架中。浪漫主義希望為愛情描繪出一幅永恆的圖像。這其實不是什麼新點子，無論在古希臘、文藝復興時期或中世紀的宮廷文化裡（至少在觀念上），都有過類似的作法。但這種愛情觀，就像之前說過的，並沒有普及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的祖父母並沒有這種觀念。但今日，浪漫愛情儼然是世人唯一認同的愛情觀，除了在富足的國家（至少西方世界是如此），其他地區也很常見。新式浪漫愛情最特別之處在於「大眾化」。不管當初浪漫主義建構出何種愛情觀，絕非針對普羅大眾。浪漫主義者的理念脫離了平凡人的實際生活，它們屬於上流社會，是藝術家的夢想，是特權分子的熱情。

時至今日，浪漫主義成了每個人理所當然的要求。一說到愛情，不管哪個社會階層都會異口同聲說：「愛情就是要熱情澎湃並且相互了解，波濤起伏並且穩健踏實。」然後人們會嘆口氣，接著說：「只可惜我的情人就是缺少這樣或那樣的特質。」當今社會的富裕乃史無前例，教育程度之高也前所未見。在這樣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同樣史無前例的）自覺有權利要求快樂、幸福與選擇。歸功於汽車、火車、飛機、網路和行動電話，我們大幅克服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當今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就像許多人抨擊的，社會底層的教育像場災難，但大家對幸福、對愛情的要求，放諸四海皆準。或許也不盡然，其中還是有些許差別，流行於大都會的「慾望

城市」文化，想必跟流行於菲士蘭（Friesland）、上法耳茨（Oberpfalz）鄉村的「農夫尋妻」（Bauer sucht Frau）<sup>註117</sup>問題大相逕庭。無論如何，如今每個人都想在愛情裡找到幸福，這樣的需求似乎舉世皆然。

當追求愛情成了一項大眾化的需求之後，愛情原本的叛逆性格就消失了。追求愛情再也不具顛覆性，也不需要對抗社會風俗。相反的，今天的愛情堪稱是最認同社會風俗的行為。十八、十九世紀，追求愛情常常得鬧革命，因為想擁有愛情就得打破階級藩籬，把愛情置於社會考量之上。換句話說，當時人爭取的是：愛情不該由社會規範，該由真摯情感來決定。到了一九六八年，學運的新浪漫主義者提出的訴求又不一样了；他們要顛覆的不是社會階級，而是市井小民保守的「性觀念」。學運提出的主張深具革命性，曾被當時的人視為驚世駭俗，但如今也變得平凡無奇、不具有任何挑戰意味了。今天，沒有人認為性愛自由是離經叛道或要不得的事，這其實也是好現象。社會已普遍接受，戀愛時我們對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擁有自主權。當初浪漫主義者只能藉由文學來表達的理念，新浪漫主義者只能透過行動劇來傳遞的訴求，如今都已在我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們都想活在愛情裡。愛情被我們追求到極致後，愛情本身就已經是愛情的目的了。現代人的伴侶關係經常只是為了愛，跟上幾代的人有很大的差別，正如浪漫主義早期健將施萊格爾所言，這是一場每個人都將參與「普遍的實驗」，只是如今它普遍的程度絕非施萊格爾當初所能想像。

## 自我實現不好嗎？

新式的愛情關係，評價極為兩極化。因為對甲而言，這種愛情關係象徵自由的全面勝利，達到正面「個人化」的最高層級，但是對乙而言

卻是件恐怖的事。例如保守的義大利哲學家烏姆貝托·迦林貝堤就認為，新式愛情一點都不好玩。在「藉由愛情達到自我實現」的關係中，他看到的只有自憐與濫用：「一個無須承受任何限制，得以盡情發揮自我的地方，勢必成為極端個人主義的舞台，在那裡男人一如女人，每個人都只想在別人身上追求自我。這樣的關係中，重點不再是與他人建立聯結，而是如何發展自我、成就自我。這是一種自憐，它在社會中找不到表達的方式，因為社會上每個人的認同，是透過他在系統中的表現及功能來確立的。基於特殊的交互作用，愛情在這個時代，因為自我實現而變得不可或缺，但也因為自我實現而變得前所未有的難以覓得。因為在愛情關係裡，我們想找的不是另一個人，而是想藉另一個人來實現自我……『你』成為實現『我』的工具。」為了對抗這種自我崇拜的趨勢，迦林貝堤提出導正的方法：宗教式的自我淨化。他堅信：「渴望乃超越性。」

不只保守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反對極大化追求自我的新式愛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哈利·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sup>註118</sup>也認為，這種愛情讓人感到不適。一如迦林貝堤，法蘭克福理想中的愛情也是：非自私自利、非以自我為中心、非利己考量的。在他的定義中，愛情極為崇高：「所謂的愛情，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全然無私的關心被愛者的存在，關心對被愛者有益的事。愛人者希望被愛者得以盡情發展，而且不會受到傷害，愛人者這麼希望並不是因為另有所圖……。對愛人者而言，只有被愛者的處境是唯一重要的，無論這些處境與其他事物有何關聯。」

能符合法蘭克福教授定義的大概只有父母對孩子的愛，就連他自己也很懷疑這種「愛的原型」能適用於兩性嗎？所以他很有技巧的做了一個轉折；如果他對愛情的定義不適用於男女，那麼男女之間的浪漫關係就不該叫作愛：「尤其是那種本質上奠基於浪漫和性的關係，就我的定義而言，實非愛的體現與示範。那種類型的關係，通常都與一大堆極為錯亂迷惑的元素結合，根本不符合愛無私關懷的本質；那種類型的關係混亂到讓人無法釐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當然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把男女間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

事，歸咎於它不符合「愛的本質」！幸好這種「本質」僅限於法蘭克福教授的理論。在愛情裡「個人利益必須等同於為對方犧牲奉獻」，這個想法不錯，很符合浪漫主義早期的思想。可惜在現實生活中，一頭栽進愛情的戀人並不認識此二者的等同性，更無法像迦林貝堤所說：「一旦我們發現戀人的個人利益，除了無私無我之外，別無其他時，那個看似存在於追求自我利益和為對方無私奉獻之間的衝突就會消失。」

我們不需要贊同季瑟林的自私理論（「利他主義者的臉一旦被抓破，你會發現藏在底下是一張偽君子、流著血的臉」），也能夠推論出，法蘭克福所主張的「個人利益必須等同於為對方犧牲奉獻」，在實際的愛情關係中，既非常態，也難以維持。或許在某些幸福時刻吧，短暫片刻我們能做到，但是日復一日，許多狀況接踵而來，大概就沒有人做得到了。然而，兩性愛情關係的問題並不在於取消存在於自私和無私之間的衝突，剛好相反，不但不能取消，還必須維持。因為或許正是這份衝突，讓愛情充滿張力。

存在於現代愛情關係中的無數決定，使得「個人利益」常會脫離「無私無我」。事實上，利己與利他本來就是若即若離，並非持續的融合。現代的浪漫愛情絕非無條件且長時間的追求利己與利他合而為一，而是一場永不中斷的（全新）相互理解的冒險。

要心甘情願接受這件事並不容易。也許正因如此，對於在愛情中實現自我利益，抱持批評看法的人，往往誇大其詞、言過其實了。他們認為，現代人在愛情中尋找所有的意義。迦林貝堤就是個例子，他寫道：「為了對抗社會現況，亦即再也沒有人被允許做自己，因為每個人都必須成為機器（Apparat）要他成為的那樣，而感覺到生命被異化。在此情況下，愛情成為意義的唯一避難所。」

據此，我們在愛情中尋找所有的意義。真是如此嗎？迦林貝堤說「再也沒有人被允許做自己」，根據的是什麼？過去的情況有比現在好嗎？我那經歷君主統治、威瑪共和、第三帝國的祖父，比我現在更能做自己嗎？這些主張簡直就像早期浪漫主義者（或今天早期浪漫主義社會學家）的想像：過去的傳統社會總是比現在的更美好而完善。他們指的



那部強制每個人怎麼過生活的機器，到底是什麼、是誰？迦林貝堤的話或許可以用來暗指史達林主義，但並不適用二〇〇九年的西方世界。容我再問一句：今天我們之中有誰覺得生命被「異化」？這是保守派意識形態批評者的典型觀念，承襲自佛洛姆、阿多諾，屬於社會學中最不可撼動的陳腔濫調：世人感覺生活在異化的情況下，這是根據左派理論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批評。但「異化」是發生在我們出生前幾十年，甚至一世紀前的悲劇，今天誰會為此失落而苦惱？一個人是否感到失落、覺得生活悲慘，應該根據他自己的人生經歷，而非前人的。的確，童年時期奉為主臬的價值，成長後竟時過境遷，有人為此失落深感痛苦。然而，異化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必須一心一意懊惱著與大自然漸行漸遠，而不是慶幸自己有中央空調系統可以享用；我們必須深為科技的進步而抑鬱難當，情願回到過去，可以當個貧窮的農夫。然而，今天不論我們如何推崇大自然的浪漫詩意，事實上，只要去市中心那家充滿自然氣息的森林餐廳吃頓飯，我們就覺得很接近大自然而心滿意足了；大概沒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異化」前的時代。

迦林貝堤藉由那不甚可取的理論想要表達的或許是：個人化過程並非只帶來好處。個人化是件好事，它讓我們享有許許多多的自由。從古至今，沒有一個世代能像我們花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在自己的感受上。然而，個人化也帶來了自戀、孤獨和不合群的危機。無怪乎有那麼多社會學家在富裕社會的個人化過程中，不只看到機會，還看到危機，尤其是愛情關係的危機。比方說婚姻，結婚是為了自我實現，離婚也是為了自我實現。個人化是締結婚姻的重要動機，也是婚姻觸礁的主要原因。我們尋找伴侶是為了成為自己，決定分手也是為了忠於自己。這些診斷並非全錯，也不能算全對。問題在於，今天的愛情關係中，「期待」和「對期待的期待」的遊戲變得非常複雜。若將個人化概念跟另一個概念相結合，或許比較能看清這一切，那就是：「回歸」

（Rückbindung）。

# 回歸傳統

就社會學的觀點，個人化讓我們掙脫所有枷鎖之後，生活便擺盪在兩大極端之間：一是自由，一是無所適從；我們雖贏得了自由，同時也失去了依歸。曾經被我們或我們的父母奉為主臬的價值，如今搖搖欲墜。不但宗教失去了意義，世界觀也因各種政治立場而令人難以信服。成為歐洲公民或世界公民，看似四海為家，卻也無處是故鄉。如今，我們無須服膺意識形態，卻得認同企業樹立的系統。我們面臨的窘境是：道德家大聲疾呼道德淪喪，但保守派的古老價值已過時，左派曾高舉的新價值也大多被推翻。或許尚可安慰的是，我們的情況至少比下一代好；我們還有某些原則可遵循，還對這個世界有使命感，還有維護正義與和平的熱忱。至少理論上是如此。

不過，我們很缺乏歸屬感。雖稱不上「異化」，卻常徬徨無助。也許我們的愛情關係終將像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sup>註119</sup>所說：「家庭、婚姻、親職、性、情欲、愛，這些是什麼？喔不，該是或能是什麼？如今都說不準，也問不明白了，沒有人能斬釘截鐵告訴你，一切都得視內容、範圍、標準、道德而定，充滿各種可能性，甚至還因個人而異，因關係而異，得根據所有單一情況來研判、執行、描述、解釋，該怎麼做，做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不這麼做。」

「今天，我們在愛情中尋找所有的意義」，就算這主張是錯的，仍得承認，很難找到人生的意義了。如果個人化是我們如今唯一追求的，那要找到所謂的意義簡直是不可能。二〇〇七年去世的德國法蘭克福社會學家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l-Otto Hondrich）<sup>註120</sup>與貝克的想法相左，他很有技巧的反駁了貝克的個人化論點。洪德里希認為，沒錯，如今我們追求個人化，但同時也追求與個人化剛好相反的東西，它指出了個人化的侷限與困境。洪德里希率先稱這種傾向為「回歸」。

先來看一下現代人的愛情世界。伴侶雙方都希望在這段關係中獲得滿足、認同、熱情與相互理解。套句盧曼的話就是，戀人想在他人的幸

福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假設有對情侶來自不同的家庭，相識之前已經歷過幾段戀情。家庭背景不需要差異很大，之前的戀情也不需要截然不同。我們甚至不用誇張的假設，一個在塞內加爾長大，一個住在萊比錫，想像兩人都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來自德國的中型城市，這樣的條件就夠了。

戀愛初期，愛情美化了所有的差異。但最晚半年，挑剔的目光開始出現。如果此時兩人已同居，衝突勢必上演。男人把衣服往櫃子裡一塞，女人拿出來疊好。即使溝通過，老是收拾殘局的一方難免嘮叨：「算了，你根本不會改，改得了一時也改不了一世。」不同的生活習慣只會對整齊規矩的那一方造成困擾，對隨性混亂的另一方根本不是問題。整齊規矩的一方會覺得這是兩人共同的事，這樣下去會對他們的關係造成傷害。但隨性混亂的一方卻認為，這只是伴侶的個人問題，他（她）太小心眼、愛強迫別人，而且沒有包容心。

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典型個人化的結果。每個人都想要對方用「個人的」方式來過「共同的」生活，沒有人願意讓步。兩人如果還想在一起，最後只好妥協，至於作法，比方說：每個人保有自己整理衣物的方法，但衣服分開來放，各自用各自的櫃子。這對主張極端個人化理論的人而言，無疑是場勝利，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貫徹自己的原則。後果不過是，兩人各行其是以及增加花費。

同樣的現象，細心的觀察者洪德里希看到的剛好相反。他認為，情侶說好不再為衣服吵架，這並不是個人的決定，而是共同的妥協。雙方之所以能達成妥協，並非基於自我考量，而是為了維持這段關係。所以，從現在起，雙方都必須遵守協定並自我克制。於是，這段關係不僅保障戀人的個體性，同時還訂出了遊戲規則。法國社會學家柯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sup>註121</sup>甚至以此為題寫了本書，書名就是《髒衣服：論日常生活之婚姻結構》（*Schmutzige Wäsche. Zur ehelichen Konstruktion von Alltag*，一九九四）。

我們可以從衣服這個例子學到更多！除了伴侶關係中的個人化總會染上「集體化」的意味之外，雙方在走進這段關係時，身上其實都帶著

為數可觀的既定習慣和滿腦子的自以為是。它們所涉及的問題，不只是把衣服揉成一團或折疊整齊而已。

但是，這些既定想法和習慣從哪兒來的？許多理論不是言之鑿鑿，現代人無所適從、沒有確定感，不受傳統束縛？我們為什麼還會捍衛自己的習慣，甚至義無反顧的認定那是「正確的」？這份自信從何而來？不是因為無所適從，我們才會前仆後繼的追求愛情嗎？在現代人的無所歸依與失去方向感中，有一點是相對穩固的，即家庭背景。一個人小時候從父母身上學到的價值觀，其影響力根深柢固。無論青春期如何激烈衝撞、拒絕父母的價值體系，那些價值觀終究會悄悄的回到我們身上。的確，我們是不會再像父母那樣請木工來家裡釘壁櫥，而是到宜家家居（IKEA）買組裝櫃回來，但這只是不同時代的包裝，根本是換湯不換藥。

彷彿喝母乳一般吸入的價值觀，具有強大的穩定性，因為我們長大後幾乎不再建立新的價值觀。歲月增進我們的理解力，讓我們累積許多知識，但不變的是我們的價值觀。一旦和伴侶發生衝突，原有的價值觀立刻會跑出來。只要瞧瞧我們教育子女的方式就能略窺一二。我們在孩子面前搬出的那套金科玉律，不正是當年爸媽嘮叨個沒完、讓我們痛恨不已的陳腔濫調？年紀越大，越會向保守的那一面靠攏，它所喚醒的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東西。

自我實現不只是奠基於無可救藥的個人主義，它還有一個保守的面向。針對當代的社會學分析往往嚴重低估了這部分。舉例來說，六八學運世代堅持自己狂妄年少時的英雄事蹟，其行為態度一點也不輸給反動的上一代，他們頑固的捍衛二戰後自己年輕時期的作為。又例如，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前雅痞兼高爾夫世代（Generation Golf）<sup>註122</sup>，雖然歷經股市崩盤、金融海嘯，仍然堅信人生就是一場本益比的遊戲。我們越懶得改變，越不想持續學習，越容易回歸傳統，傳統對我們而言越顯得重要。援用曾經美好的過去，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吧？

熟悉和傳統的事物都屬於保守的一面，它們跟出生背景和家庭環境一樣，不是我們能自己選擇的，卻是我們長大後塑造自我概念時能選擇

的基礎。它們還是現代「愛情藝術家們」的安全防護網。只可惜兩性關係問題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個人化，極少著眼於回歸傳統。比起那些汗牛充棟、有關「個人化」的論述，「回歸傳統」的研究或許更值得關注。根據「個人化」觀點，兩性問題乃因人而異、因對象而異，「回歸傳統」看到的就不是這樣。傳統因素就像是「愛情地圖」中無法辨識的說明文字，在選擇伴侶時或許不參與作用，但在長期的愛情關係中，卻會影響我們的期待及要求。而且我們年輕時越是覺得自己不傳統，日後回歸傳統的傾向往往越是強烈。

## 追求愛情

現代人的自我理解擺盪在「個人化」和「回歸傳統」兩個極端之間，愛情也是如此。二十年來，社會學為了二者的價值陷入無謂的爭辯中。延續六八學運思想的左派社會學家極力推崇個人化，保守派社會學家則大力鼓吹回歸傳統。對前者而言，象徵愛情與生活形態全新自由的東西，對後者而言正好是足以扼殺婚姻與家庭的恐怖威脅。仔細探究不難發現，這樣的爭論很怪異。今天離婚率高居不下，個人化並非肇因，回歸傳統也未必能拯救伴侶關係。在生活中強調個人至上的人未必無法與他人結合，至於在危機時期思考傳統的人，不代表挽救得了婚姻；陷入絕望才想到回歸傳統，對傳統的婚姻模式而言是可怕的毒藥。只有在那個時代，大家的成長背景相似，都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天主教徒嫁娶天主教徒，農民子女嫁娶農民子女，回歸傳統才能找到共同的聯結。如今，這根本保障不了什麼，反而會讓新建立的價值觀，迅速就被原生家庭的舊價值觀所取代。

過去三十年，德國「一口之家」的數目大幅攀升。一九七〇到八〇年代離婚率暴增，到了九〇年代，德國每三對夫妻就有一對離婚，都市地區更是每兩對就有一對。鼓勵生育成了政府數十年不變的努力目標。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我們對愛情的期待過高？是我們太不切實際，嚮往在浪漫的巧克力中尋找真心？奢望在兩人世界的燭光中、廚房裡、保險套內和壁爐旁，找到人生意義？

第三章曾經提到，根據《明鏡週刊》二〇〇八年四月所做的調查，百分之六十三的德國女性和百分之六十九的德國男性認為「快樂和諧的伴侶關係對人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就是說，約有三分之二的德國成年人同意這項看法。不過有更多的人勾選了「擁有知心好友對人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女性高達百分之七十三，男性高達百分之六十六。

這項問卷調查的結果，讓「無所適從的現代人只想躲進愛情中」的論調頓失光環。不過，另一個問題是：不認為愛情對人生有重要意義的那三分之一，他們不渴望愛情嗎？

答案有好幾種可能。其一，或許那些德國人根本不相信在美滿的伴侶關係中能找到人生意義。或者，今天在許多事物中都能找到人生意義，不必執著於愛情。或者，德國人根本沒有那麼需要「人生意義」，是大家高估了它對我們的重要性。另外還有一種答案隱藏在《明鏡》的另一項調查中：「你為什麼是單身？」有三分之一的男性與女性受訪者認為，是自己「要求太高」。另三分之一表示，單身是因為「渴望獨立自主」。至於其他的原因，有些女性是「曾有過不好的經驗」，男性則是「太過害羞」。

因為「完全不追求愛情」而單身的人其實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單身者之所以單身（尤其是大城市裡），主要是「不敢走進伴侶關係」，他們唯恐「失去的會比獲得的多」。這種「要求過高」、「要求太多」的態度，不只出現在愛情上。一九七〇年代起，年輕人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持續在提升。生活一旦富裕了，自然也要求能從中得到更多。不但物質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金錢不僅能買到商品，還能大幅增加人生的可種能性。隨之而來的就是讓人變得不知足！選擇性越多，越容易不滿意。今天的消費文化不只要「說是」，更要「說不」。因為，我的個體性不只取決於我「選擇」了什麼，還要取決於我「拒絕」了什麼。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的德國小市民常以無產階級和外國人作為諷刺的對象，



而今天的中產階級在選擇心愛的歌曲時，已有一定程度的國際觀了。我用來定義我自己的東西，汰換的速度快得驚人。每個選擇都在等待下一個新的選擇。結果，我們不但大力推崇「終身學習」，還身體力行「終身抱怨」。

所以，浪漫愛情到了今天，對它的要求往往高過於它的可能性。許多人抱怨的原因就在於自身的可能性。如今，西方國家戀愛市場之大與自由，前所未見，但個人在這個市場上的機會未必增加。許多人在選擇伴侶時還是遇到不少限制。比方說，長相一般、沒什麼魅力、職業又很普通的人，大多沒資格挑選自己的夢幻情人。事實上，充滿魅力、條件好的人確實擁有較多的可能性，然而沒有魅力、條件不好的人，不但沒機會，常常還置身噩夢中。因為戀愛市場雖是開放、多元且自由，卻不是人人平等。

至於那些重視獨立自主的渴望大於伴侶關係的單身貴族，往往正處於追求事業甚於愛情的人生階段。可惜的是，他們常會因此錯失良緣。在都會地區有許多人，尤其是女性，是以犧牲家庭為代價，來成就自己的工作與事業。她們並非一開始就設定放棄愛情和家庭，只是長時間沒有伴侶關係讓她們習以為常，也很懂得經營單身生活。於是乎，她們只等待夢中情人主動出擊。遺憾的是，能吻醒睡美人的白馬王子，大多意興闌珊。話說回來，若角色對調，公主想必也懶得搭救王子。

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單身概念」水漲船高，一再被賦予新價值。「搖擺單身」（swinging singles）、「樂單族」（Quirkyalones）等紛紛出籠，單身成了「與眾不同獨立自主者」的代名詞。喊出樂單族的美國女作家莎夏·卡根（Sasha Cagen）認為，真正浪漫的不是令人神經緊繃的伴侶關係，而是無法實現的渴望，愛慕、暗戀比相愛更加浪漫。關於這一點，早期浪漫主義有文學作品為證，現代浪漫主義則以美國電視影集為推手，無法實現的戀情確實比較吸引人。柏林記者克里斯提昂·舒爾特以《艾莉的異想世界》、《慾望城市》兩部影集為例，針對快樂單身所做的分析相當精闢。在他看來，經濟獨立、購物成狂、消費成痴的現代女性浪漫主義者，雖然勇於嘗試無愛之性，但骨子裡最渴望的還是白馬王子，一如「大人物」之於女主角凱莉。舒爾特認為，這些影集最

大的貢獻在於將單身女性塑造成明星。她們在經濟上的確比單身男性來得強。結論呼之欲出：強勢的單身女性要求太高，而弱勢的單身男性表現得太差。

舒爾特進一步分析，隨著新經濟（New Economy）走下坡，單身女郎影集的魅力也隨之消褪。影集所勾勒的生活，多金、富裕、充滿欲望、沉醉在嚮往中，這樣的氛圍不再為大眾所信服。舒爾特的書出版至今四年，如今的環境更為嚴峻，全球籠罩在金融危機的風暴中。下一波熱門影集中的明星，想必不是追求愛情的雅痞，而是終於找到幸福的天涯淪落人。讓單身貴族化身為困境中的偶像，已經沒有看頭了。

當然，現實中依然有單身朋友圍繞著。生活情境不像電視影集可以輕鬆變換。和唯一、同一個伴侶幸福快樂的過一生，對現代人而言，可能性越來越低。所以，暫時或間歇的恢復單身，在現在一如未來，成為一件尋常、會發生的事。

所以，可以想像與實踐的生活形態或許是「序列式一夫一妻制」。這肯定是人類學家海倫·費雪所樂見的，她一直想證明，生活在非洲草原的人類祖先原本就是過著這種生活：男女在一起三、四年，共同撫育孩子到離開襁褓。即使現代人不願生小孩，但「精神上的孩子」，比方說共同的願望、理想或烏托邦理念，還是可以維繫住兩個人。總之，遺傳因素決定了我們會遵循三、四年為一期的共同生活生物週期，然後再分手。海倫·費雪認為，我們現在的生活形態不過是回復遠古的序列式一夫一妻制。

如同前面分析過的，這樣的主張充其量是人類學家的幻想。因為根本無法證明，人類祖先曾過著序列式一夫一妻的生活。事實上，在群體生活中，「阿姨和姊妹式的家庭」還比較有可能存在，若有朝一日回歸此生活形態，也是完全可以想像的。此觀點會在第十三章有關家庭的部分進一步探討。

現代年輕人男女交往的平均次數，肯定比他們的祖父母高，但是否超過他們的父母就不得而知。曲線未必是不斷上升，其終點也不一定是因為集體不願走進伴侶關係，或沒能力經營。最新的研究顯示，德國年

輕人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平均年齡三十年未變；下降的是屬於社會問題的部分。至於年輕人平均的性伴侶數目自一九七〇年起未再上升。即使性行為調查並非適當的依據，但至少由此可知，不能草率下結論說：與上一代相比，現在的年輕人比較沒有能力經營伴侶關係。

現代人的要求都很高，很多事情變得沒辦法無所謂。我們對伴侶有很多要求和期望，難以自我節制。我們當然明白，對方也對我們有很高的要求（包括因自卑情結而產生的嚴苛要求）。愛情市場的前景之所以不樂觀，不只因為年輕人對伴侶有很高的要求，還因為生育率降低，父母都十分關注小孩，也讓孩子將來在尋找伴侶時會以此為標準，期待對方的注意力都在他（她）身上。小時候越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人，長大後越可能要求伴侶以他（她）為重心。我們的「愛情地圖」不僅標示出我們的性格特徵，還標示出我們的行為模式。這些特徵和行為正是日後我們建立價值觀的準則。對於最優化「愛情效益」資本主義式的追求，雖然沒有基因上的依據，卻在發展心理學中找到了根據。

我們追求愛情的模式有著弔詭的結構。我們藉由另一個人來盡可能的感受自我，我們披著「伴侶」這張利他的外皮，極盡自私之能事。表面上看起來無私無我，骨子裡卻只想獲得更多。個體性和對親密關係的渴望，就像兩條交會的鋼索，我們走在上面進行一場奇特的表演，「回歸傳統」則是下方的安全防護網。一旦關係失敗，我們就會跌落網上，重新發現我們的原生家庭與朋友。

這並不否定，親密關係中存在「真正」的關懷與同理心。想在他人的幸福中找到自己幸福，無可避免的也會讓我們把他人的煩惱視為自己的。為他人而「存在」，是人類自古以來便有的一種原始需求。美國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的研究者羅伯特·魏斯（Robert Weiss）認為，沒有機會對他人付出關懷與同理心，比得不到更可怕。無法付出的人也沒有能力去愛。這不是什麼新觀點。在愛情中，我們不只想擁有，我們還想獻上些什麼。是什麼呢？我們的「靈魂」嗎？

# 愛情教

「如今，大家談論愛情和家庭的方式就像幾世紀前人們談論上帝一樣。渴望的是救贖與慈悲；爭辯的是不切實際的流行看法，在渴望的密室中所具有的真實性，這一切都帶有幾分宗教意味，即將彼岸的希望寄託於現世。」這是二十年前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與妻子伊利莎白·貝克在驚世之作《愛情的正常性混亂》（*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一九九〇）中所點燃的火花。這本書針對現代愛情提出了許多看法，包括頗具爭議的觀念與大膽推測。近三十年來，烏利西·貝克帶有挑釁的觀點豐富了德國的社會學界。他任教於慕尼黑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是思想的先鋒，個性天真憨直。身為左派的他，政治立場反覆無常，一下子是激進、敢衝、不肯妥協的前衛派，一下子又是深思熟慮、瞻前顧後的保守派。貝克鼓吹「極端個人化」，對他而言這不僅是理論，更是實際人生。貝克最特別的一點是，無論當代德國社會學家在研究什麼，都可以發現貝克已探索過該領域。貝克乃現代思想的開路先鋒，是意義問題的先驅，他也是傑出的修辭家。

貝克的書就像末世寓言：人們一直在追求愛情，卻再也沒有能力去愛了！對許多社會學家而言，《艾莉的異想世界》確實如貝克所言，代表的是：「愛情變得前所未有的不可或缺，同時也是前所未有的難以覓得。但越是不可能，愛情就越顯得誘人、充滿象徵性、令人神往且具有救贖魔力。如此莫名其妙的運作法則隱藏在離婚和再婚數字的背後，隱藏在那股瘋狂渴望的背後，想要在『你』中找到『我』，並藉此尋獲解脫。這股救贖的飢渴讓世人奮不顧身、前仆後繼。」現代人既是獵人，也是採集者，一心一意追求性與愛、陶醉與滿足。這一切迫使「過去藉由上帝、國家、階級、政治和家庭而得以治理的世界，完全被取代了。現在唯一重要的是我，除了我還是我，不然就是能幫助我成就自我的你。如果這個你不行，還可以換另外一個你。」

所以，我們追求的根本不是另一個人？我們要的根本不是一個合適

的伴侶，因為最後我們不但找不到，甚至也不想要那個絕對了？如今，愛情本身就已經成為愛情的目的。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戀人都知道，愛情自始至終避免不了失望，電影裡的情人一旦得到彼此，接下來就沒戲唱了。高潮迭起已過，劇情無法上攻，只有走下坡了。

在這層意義上，烏利西·貝克視愛情為宗教。愛情乃「宗教後的宗教」、「正統後的正統」、「全心關注自我發展社會中的一塊聖地」。我們熱愛、崇拜、渴望愛情。我們整個身、心、靈都渴望投入愛情的懷抱。愛情超越了所有，是最重要的一種狀態。廣告與媒體不斷推波助瀾，讓我們對愛情的想像無限擴張，渴望在對方的懷裡得到救贖，渴望在床上達到人我合一的境界。

二十年後的今天，貝克的主張依然有效嗎？艾莉是個在沒有神的世界中尋找神的絕望者？是在鞋店裡流連的德瑞莎修女？無庸置疑，今天的愛情是取代了過去宗教曾具有的功能。在宗教中世人期望獲得與神同在的一體感，只要你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祂就會如你所是的接納你，這樣的內在聯繫曾是人們的心靈支柱。藉由上帝的安排，人們在世上找到安身立命的處所，就像愛情能為我們提供避風港，讓那艘名為「共同體」的船靠岸。西方的宗教信仰逐漸沒落，或許就是因為人們在愛情裡發現新的宗教？還是剛好相反，因為虔誠的信仰沒落了，人們才亟需替代品以彌補留下的空白，而讓愛情有了發揮的舞台。只是誰都沒想到愛情會蓬勃發展到這地步。

把對愛情與宗教的想像相提並論，乍看之下並無不妥。就其發展史來看，人類對它們的需求頗相似。人類生物學家卻認為，不管是愛情或宗教信仰，對人類而言都是多餘的。之所以仍會對二者產生渴望，因為它們是人類感性的副產品。其作用都在於填補人類因追問「意義」而形成的巨大缺口。一旦開始知道提出這問題，它就在我們的生命形成缺口。宗教信仰和愛情，衍生自人類的情緒及社交智能，它們都是「拱肩」。比起愛情與宗教的相似性，更令我們驚訝的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們大多是分開的。在一神論的信仰傳統中，總是出現兩相對立的觀念：愛與恨、兄弟之邦與非我族類、教友與敵人、棕枝與刀劍。幸好，現在絕大多數的一神教，例如基督宗教，都不再要求信徒相信只有

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理。現代宗教不再號召聖戰而是追求和平，許多充滿價值的教義也保留下來，例如樂善好施、友愛他人等。

愛情與宗教的共通點是要求全然、極致。兩者都追求完整，完整的人、完整的個人小宇宙。但要掌握住個人、其生命與世界的完整性，根據人類的理解，這是不可能的事。徹底、極致的境界是無法理解，而是要去體會，且是一種自明（Evidenzen）的體會。說得白話一點：完整性必須靠感覺！就像我們對上帝、對死亡的理解總顯得不足，我們對愛情的理解也總是有侷限。德國英美文學學者與文學理論家沃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sup>註123</sup>說：「只要我們活著，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是活著。如果嘗試要去知道，當我們活著時，什麼是活著，我們就被迫為這個無法得知的事情創造意義。我們得不斷創造各種想像，同時也要創造反駁的論點，因為需要去解釋與說明真相，而這才是能突顯其兩難的唯一處境。」

關於愛情，無論我們相信知道了什麼，它都只是一種離開了我們的幻想，便失去真實立足點的想法。正因為如此，它反而能讓各種看似完美的感受與自我感受，盡情發揮。愛情無法被推翻，頂多讓我們失望。我們可以在愛情中感受人我合一，卻不必真的跟對方變成連體嬰；我們可以在愛情裡感受水乳交融，卻不必真的跟對方融在一塊。我們看見「源源不絕的可能性，雖然那在別人眼裡是大胖子、鬍渣，和（嘮叨個沒完的）言不及意。」

此刻即天堂！愛情取代了宗教原本具有的社會功能，成了宗教的後繼者。根據天主教教規，教徒終身不得（若有，只准一次）申請退教，而今天的愛情關係是可以單方面終止的。如果天堂夢碎跌落地獄，便可以解除這項結合。

這一點讓宗教與愛情分道揚鑣。愛情雖然也能提供慰藉、給予接納，點燃希望、塑造意義，但愛情始終是兩個相愛個體之間的事。但宗教不同，它能創造社會意義，為眾人訂出行為規範，形成社會上人與人交往的道德標準。視愛情為宗教的替代品，只會導致嚴重的不合群和排他現象。愛情眼裡容不下沙子，頂多容得下幾個小孩。在愛情中（大多



數的情況）沒有第三者，兩人對抗外在世界，而內在世界就像個防核防空洞，但是只有兩個位置。無所謂，重要的是我們擁有彼此——喔，或許還有金莎巧克力……。

---

註116：一九二八至二〇一〇，德國當代性教育、性啟蒙之父，既是記者又是作家和電影製片，拍攝過多部性教育影片，在歐洲造成轟動。

註117：德國知名的婚友電視節目。

註118：一九二九年生，著有哲學暢銷書《放屁！》，討論社會上的「謊言」，出版至今已有十種語言以上的翻譯版本。

註119：一九四四年生，主要研究領域為「生態問題」、「風險社會」、「個體化」和「全球化」等議題。

註120：一九三七至二〇〇七，曾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社會與政治分析研究所。

註121：一九四八年生，巴黎索爾邦第五大學社會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夫妻關係》、《女人的身體、男人的目光》、《相愛後的第一個早晨：愛情是怎麼發生的？》。

註122：指出生於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成長於一九八〇年代的德國人，家庭經濟條件優渥，由於此世代的父母流行在他們高中畢業時，贈送福斯的高爾夫（Golf）型車款為畢業禮物，而泛稱為「高爾夫世代」。單身主義世代，主張不婚、不生小孩，大多數人不太在乎事業和金錢，感情與性觀念開放。

註123：一九二六至二〇〇七，研究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以及文學閱讀的心理過程。認為文學作品有藝術的一端，即作者的文本，和審美的一端，透過讀者來實現。

## 第十二章 購買愛情

浪漫作為一種消費

我想提醒的是，無數所謂的烏托邦夢想已然實現，由於這些夢想實現了，它們看起來彷彿最精華的部分已被遺忘。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

性骯髒嗎？是啊，如果好好做的話。

——美國導演伍迪·艾倫

## 與眾不同

「我也要跟別人一樣——說這話的女人真是與眾不同！」王爾德於十九世紀末（跨入現代之際）寫下這樣句子，這句話當然也適用於男人。隨著時代變遷，最能代表二十世紀的一句話卻是：「誰要跟別人一樣啊！」

這位愛爾蘭作家生活在廣告時代之前。他深諳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沙龍文化，熟稔打造市民階級自我形象的訣竅，而今這樣的訴求已成西方世界（甚至其他地區）各社會階層的基本要求：與眾不同！突顯個人的不同，在今天顯得如此理所當然，讓我們完全忘了這個詞彙與其用法有多新穎。一九三〇年，西班牙哲學家荷西·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sup>註124</sup>在他的代表作《群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中指出，人們將變成一模一樣的群體動物，只有極少數的精英分子具有獨特性，灰色的群眾沒有容顏。過去的知識名流隱身於群眾背後，如今的知識精英學到的可不是這樣；現在沒人想當「大眾」，沒人願意被歸為平均值。社會各階層群起反大眾。荷西·奧德嘉·賈塞特那個時代的情

況，如今依然成立：大眾永遠是他人。

庸俗的大眾，「他們行為粗鄙，代表例行的權利，並且到處奉行。」這種情況已不復見。當代人的自我認知告訴我們：你、我都是獨立的個體。這種個人化的觀念不是哲學家的發明，而是廣告的產物，問世的時間不超過五十年。人類追求富有、美麗，已有很長的歷史，但追求個人化卻是近幾十年才發生的事。我祖母肯定就沒聽過個人化的生活！

如今最具魔力的關鍵字是「個人化」。從印有自己的名字的咖啡杯到個人專屬網頁，若不強調個人化，商品似乎就沒有賣點。個人化之於現代市場行銷，就像「親愛的……」這種固定格式之於信件。個人化成了我們至少要展現的姿態，至少要被看見的模樣。想跟別人不一樣，這樣的願望讓我們全都變得一樣。

「追求個人化」成了「個人化」的頭號大敵。我們藉流行服飾和各種最新趨勢突顯自己的與眾不同，同時也把自己納入制式中。我們自以為能展現個人特色、個人品味、個人風格的那些東西，若沒有數以百萬計的製造出來，也絕對是成千上萬。我個人的汗臭味或許能讓我獨一無二，但「個人專屬」的香水絕不可能。世上沒有一件衣服能讓我穿起來像裸體時那般獨具特色。

與其說追求個人化是一種事實，倒不如說是一種假象。被某些「個人主義者」視為困境的問題，對購買個人化商品的消費者而言並非如此。後者堅信，只要是經由他獨立自主挑選出來的商品，就一定極具「個人」特色；屬於我的不容混淆，因為它只屬於我，不屬於其他人。事實上，絕大多數人並不想跟別人徹底不同。有誰真的想與自己所處的環境、所屬的團體或族群，格格不入？沒有人想要自由到失去群體的庇蔭與保護，不管它是不是我們能選擇的。對我們的自我認同而言，群體所賦予的歸屬感不可或缺。如今的青少年唱饒舌歌不稀奇，熱中集郵或養魚反倒特別。一個為了展現自我獨特混合風格，而排斥當下特定風潮的青少年，他的行為是傳統的。而一個想徹底異於他人的成年人，當他與所有被接受的模式都背道而馳時，不像銀行行員，不像牙醫，不像公

車司機，不像神父，不像清道夫，也不像搖滾歌手.....，他只會被認為頭腦有問題。

為了維持「個人化」，而畫下與他人界線（其實也是一種假象），這樣的想法成為我們終生的懸念。其實，當我們的個人特質與經濟體系相互作用後，根本很難去區分每個人的差異。人人都想用最低的成本，贏得最高的個人化，商業機制也不斷如此向我們洗腦。如果當真重視成本，我們最該放棄的首推電視與網路。「透過購買來省錢」的幻覺，只會讓我們越陷越深；以為手機答鈴能突顯我們的個人特色，只是一種弔詭的夢想。

美國社會學家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sup>註125</sup>的見解鞭辟入裡，他認為「追求快樂」（pursuit of happiness）如今儼然成為「追求才得以快樂」（happiness of pursuit）。我們追求的不再是滿足，而唯有不斷的追求才能讓我們滿足。七十年前沙特說過：人必須持續的重塑自己。說這句話的時候他顯然沒料到，強悍的消費力把這種訴求推向何等境界。如今「找到幸福」的重要性遠不及「持續尋找」。現代資本主義不斷製造出各種不滿足，滿足的人是最糟的消費者，各種商業機制無不竭盡所能的製造新的刺激與渴望。如今能保障經濟體系正常運作的不是快樂與滿足，而是貪得無饜與惶惶不安。

認同透過複製而產生，這當然不是因為體驗到商品世界的美好。很多事情一直是如此。孩子努力仿效他想成為的形象，大人不也如此。每個人都在仿效，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在於是否仿效，而在於仿效什麼。在這個不斷挑起欲望的社會裡，我們複製的不只是角色與世界觀，還包括各種微不足道的風格，藉由觀察、仿效，我們不停的選擇與做決定。我們被各種供給、形象、全效產品、專屬產品，各種人生腳本和制式心情，團團包圍。連叛逆都淪為商品，龐克族都有了自己專屬的流行服飾。至於那群充滿自覺、渴望遠離文明、遠離消費的人，則有昂貴的休閒服飾店和戶外用品店供他們流連。而旅遊，西藏的個人靈修之旅與多明尼加熱鬧的海灘行程，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

愛情當然也不例外。愛情成了商家的最愛。光是販賣浪漫就能為我

們製造上百萬個就業機會，並且讓全世界數以億計的商人荷包滿滿。沒有一家糖果店不賣心型巧克力。沒有一款香水標榜氣味來自長相醜陋、齙牙咧嘴的麝香動物，強調的永遠只是心蕩神馳。最能挑動女性嗅覺的不再是男人的體味，而是散發自瓶子的氣息。對此種種，我們那承襲自石器時代的腦袋不知作何感想？以色列社會學家艾娃·伊露茲（Eva Illouz）<sup>註126</sup>在她的書中寫道：「以惱人的方式持續存在的愛情衝突，不但接收了各種文化形式，還接收了各種市場語言。」

## 大眾化的浪漫

什麼是文化形式和愛情的市場語言？美國知名的心理學家，塔夫斯大學的羅伯·史登堡（Robert J. Sternberg）<sup>註127</sup>教授認為，愛情語言很像電影。擔任過美國心理學會主席的史登堡曾以愛情為主題，出版過許多著作。在一九九八年的《愛，是一個故事》（*Love is a Story*）中，對於「情侶及夫妻的行為表現如何根據自選的劇本」，史登堡有精闢的分析。我們常感到迷惑不解，許多夫妻一天到晚爭吵卻分不開，甚至能白頭到老；有些夫妻雖然天造地設，是人人稱羨的神仙眷侶，卻可能為了一點小事而從此形同陌路。對此史登堡有睿智的答案：關於伴侶關係有各種不同的劇本。什麼會危害伴侶關係和廝守意願，衡量的標準就像電影和角色。強調和諧勝於一切的人，一旦發展不符他所編織的和諧故事，關係就會生變。嚮往冒險，一心想過多采多姿生活的人，就無法忍受規律及一成不變的關係。無論是溫和的浪漫或驚濤駭浪的愛情，都是自選的影片，哪些問題會引爆分手，全都跟著劇本走。

史登堡一共歸納出二十六種愛情電影的模式。就愛情心理學史的觀點而言，史登堡的故事理論其實延續自約翰·曼尼的「愛情地圖」。基於童年經驗的愛情地圖決定了我們會愛上誰，以及我們會喜歡什麼；長大後，我們不過是將那些既定的因素編入自己的愛情故事中：一個角色

固定的愛情故事，期待和對期待的期待，也都是固定的。

一如曼尼，史登堡也認為，我們的選擇很早就決定了。我們希望過什麼類型的人生，喜劇片或劇情片，最晚到青春期的時候就已經定型。史登堡列出來的劇本有童話故事、上班族電影、家庭喜劇，也包括戰爭片、科幻片等。伴侶雙方喜歡的類型越相似，相處越融洽。在伴侶共同演出的那部影片中，兩人各自扮演什麼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人選定的類型是否相同。只要能清楚知道演的是哪種類型的影片，就能掌握好自己的角色和伴侶關係。

至於我們從哪裡認識自己的影片範本，對史登堡而言倒是其次。總之，為滿足消費需求，一定會有各種類型方便大眾選取，並提供符合期待的服務。不熟悉童話故事的男孩，怎麼演得好白馬王子！

一直以來，沒有人仔細研究過奠基於兒時經驗的人生劇本，以及後來從電視、電影看到的劇情模式，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當真會一輩子照著相同的劇本走？我們跟伴侶之間的互動，不會影響我們對劇本的選擇？伴侶的行為方式不會喚醒或改變什麼嗎？不只是我們的自我形象，還有我們的人格特質，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伴侶關係的影響。相愛或生活在一起的人，會不知不覺中接收對方的動作、表情、用語以及表達方式。有人稱之為「變色龍效應」

（chameleon effect），不過心理學界對此理論的看法仍紛歧。無論如何，伴侶會互相模仿，甚至進入對方原本扮演的角色或形象裡。至此，自我形象與他人形象也變得難以區分。

史登堡的二十六種愛情電影，戀人只能選擇其一，這種非此即彼的分法未免太制式。難道我們的腦子裡不能同時存在多重劇本，甚至是無法相容故事情節嗎？嚮往安穩的家庭生活與渴望冒險電影的精采刺激，喜歡爆笑喜劇與溫馨影片，或者我根本找不到一個滿意的劇本。

史登堡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項論點頗令人信服：我們對愛情的想像和期待都是有所根據的，不是來自詩詞，就是來自戲劇，再不然就是像今天這樣來自影片。我們對自己、對別人的看法總帶有「類型」的元素。這些類型乃環境的產物，亦即源自電視或電影。無論我們將自己畫歸何



種類型，讓我們有所根據的劇本全出自他人之手；幾乎沒有人能從浪漫的素材中自行創新發明。不管送情人紅色玫瑰、下跪求婚，或是安排燭光晚餐，我們都是在複製那些我們看過千百遍的模式。如果有人特立獨行不送花、改送草，求婚時不下跪、改半蹲，大概也沒人覺得他有原創性，只會覺得怪異。

不論美式偶像劇《艾莉的異想世界》和《慾望城市》是否抓到時代潮流，還是引領時代潮流，它們都讓這股潮流更加蓬勃，千千萬萬的觀眾群起仿效。我們自以為獨具特色的個人浪漫，其實只是追隨父母、朋友、電視、電影裡的行為，或類似的行為。我們視為正常的性表現，未必是因為有一個內在聲音這樣告訴我們，而是與他人比較的結果。電影裡的情色場景通常不是根據現實，而是為了畫面效果或運鏡方便。一九八〇年代性愛畫面開始出現在好萊塢的電影裡，自此美式電影免不了有這樣的經典畫面：裸女狂野的髮絡在頸子上劇烈擺盪，床第間充斥著嬌喘與呻吟。典型的性愛場景，真實生活中很少女人會有如此「呼天搶地」的叫聲。對好萊塢而言，這算是含蓄的性愛場面了。畫面上幾乎看不見男主角的臉，只有女主角喘得、震得像在野外騎馬一樣。這種畫面經過千萬次的複製和播放，形成固定的模式，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一旦我們對愛情電影和經典畫面有了固定認知，性愛與浪漫就成了可預期的模式。標準於焉產生，因為大多數人都這麼認定，甚至會模仿。當我們有所感覺時，我們會用名詞將混亂的情緒歸位。當我們在社交時，我們會透過文明的模式來表現我們的想法。無怪乎，法國思想家拉羅什福科會說：「如果沒聽過，大概沒多少人會陷入愛河。」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引申：如果我們不曾透過大眾媒體告知道這叫浪漫，我們大概永遠不會做出這麼浪漫的事。

當代現象之一就是弔詭，例如公開的隱私。在這個什麼都可以藉由媒體大量複製的時代，連我們自覺最隱密的事也成為一種公開的浪漫。在德國，把這種弔詭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當屬女歌手莎菈·寇娜（Sarah Connor）和女主持人古爾肯·卡拉漢希（Gülcan Karahanci），她們相繼把自己的愛情隱私公諸於世，並且拍攝一系列的浪漫紀錄片：《愛是莎菈，愛是麥克》和《古爾肯的夢幻婚禮》。一如那些為兒童、長不大的

大人所寫的芭比劇本，每一幕呈現的都是迎合愛情模式的場景。這些幾乎被用爛的模式原本就是電視的產物，如今又被媒體人拿出來當作範本，在電視上大肆渲染自己的感情與感動。這根本就是複製複製品，然後再等著被複製，而他們卻大聲宣稱：此乃最真實的浪漫。可笑的是，沒有人覺得他們可笑。

大刺刺的在電視上播放自己的隱私，竟成了再平常不過的事，德國記者克里斯提昂·舒爾特認為這種作法深具「教育意義」。影片、談話性節目、婚友節目、廣告、肥皂劇、連續劇，每天不曉得提供我們多少最新的愛情觀點與行為模式，教人眼花撩亂，真不曉得在床上、在跟伴侶互動時，自己該如何舉措手足。與其說提供給了真實性，倒不如說讓人無所適從，不知如何去校準對方的期待。

大眾媒體穩定了我們的期待遊戲，同時也助長它的難度。各種既定期待的背後，其實是苛求。我們知道越多有關他人的性生活與精神生活，比較的可能性就越多。問題是，要跟什麼比？色情光碟裡，專業演員的姿勢相較於一般人的性愛，就像迪士尼的唐老鴨與真實的綠頭鴨。靠電視連續劇來想像一般的愛情生活，完全不切實際。周遭充斥著太多錯誤的範本，讓我們承受沉重的壓力。要愛得像電視一樣，要擁有媒體不斷鼓吹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試問做到的有幾人？

追隨大眾媒體的人，持續生活在各種苛求的威脅中。十八、十九世紀愛情小說的女讀者，在浪漫理念無法落實於真實生活中時，還是得苦守婚姻。但是今天我們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曾經與前夫馬克拍攝《為愛瘋狂》浪漫紀錄片的莎菈·寇娜，如今只要瘋狂不要愛了。<sup>註128</sup>分手需要的東西不多，導致戀人分手的原因，卻經常是沒錢打造兩人共同的愛情片：例如無法像百家得（Baccardi）酒商的廣告那般，徜徉在南太平洋的微風中，或者無法像香菸廣告裡一樣，望著被夕陽染紅的巴黎屋瓦共享一根菸。「再窮也要浪漫」，通常維持不久；連灰姑娘最後也變成有錢人。不過誰知道，隨著浪漫的中產階級沒落，新的劇本即將誕生：人工水池邊的克難式談情，大橋下火盆旁取暖，並分食一小條巧克力，失業救濟總部大廳裡的集體「夢幻婚禮」。總之，我們亟需要嶄新創意。

# 性氾濫及欲振乏力

二〇〇八年，德國老牌名模烏希·歐博梅爾在《明星》（*Stern*）週刊為紀念六八學運所做的專訪中表示，當年她追求的是一個重視性和搖滾精神的社會。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個烏托邦理想徹底實現了。一九六八年，給西方國家帶來的最大改變是美與性的無所不在。無論男女，對於魅力未曾如此的高度重視。時尚雜誌、電視和廣告，不斷塑造魅力趨勢，在人類文化史上前所未見。無數的雜誌封面上，修了又修的臉孔期待著好奇的購買者。這些現象會對我們的大腦產生什麼影響，將引爆何種腦內革命？至今尚未有研究。石器時代的人類若想感受什麼叫魅力，可供挑選的大概只有十或二十張男、女的臉孔，今天至少有上百萬張。

每個人都希望擁有美麗。不同於早期的文化，美麗不只是現代人的願望，還成為時時刻刻評估的標準。願望變成了一種強制，為展現無與倫比的魅力，全球競相推出一張張或真實或虛構的臉孔。借助於流行服飾和化妝品而被視為充滿魅力的人，或許增加了不少，但認為自己很醜的人，數量並沒有怎麼增加。四十歲以後女人正處於生命盛開的階段，但對廣告界而言，四十歲的女人算是化石了。全身肥油的男人和布滿橘皮組織的女人，都沒有機會成為時尚雜誌中愛情或性愛專題的男、女主角，會出現的全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搭配那樣的故事恰恰好）。

對我們的心理而言，魅力就像毒品，永遠不嫌多，再怎麼樣也不夠。只可惜，我們擁有的是一副會隨時間老化的軀體；我們會變胖，會生病，無法青春永駐。不管是我們看別人，或是別人看我們的挑剔眼光，都是隱形的暴力。它讓我們不容易相愛，不容易獲得性滿足。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的女教授艾娃·伊露茲說，這種暴力對真情流露的殺傷力極大：「社會心理學的教科書裡總會提到一項大家耳熟能詳的愛情觀點，愛情一開始總是『盲目的』，唯有當一開始的意亂情迷過去後，我

們才能發現自己盲目的原因。」如今，「愛情作為一種強烈且直接的感情，此模式已失去效力，」因為性與愛已分道揚鑣：「性不再由精神性的愛所啟動，據說『自我實現』得透過試驗一堆伴侶，於是那種經由一見鍾情所體驗到的絕對性，在休閒消費鼓吹的冷靜享樂主義中，以及在選擇伴侶的理智中，逐漸褪色。今天愛情的開始階段是追逐享樂，以及蒐集潛在伴侶的資訊。」

艾娃·伊露茲認為，在這個浪漫是媒體產物的時代裡，愛情市場有三大特徵：一、無論男女，享受性愛成為合情合理的要求，性愛本身就是其目的；二、無論什麼樣的浪漫，如今都有相應的商品或休閒活動可供購買；三、無論男女，都表現得像個情人，雙方的行為基本上很相似，而且到處都一樣；談戀愛時要很專心，樂於傾聽，說甜言蜜語，極有參與感，盡可能的幽默風趣。如果可能的話，假日要安排一堆休閒活動。

若想化魅力為最大利益，就得純熟運用這些技巧與準則。今天每個人都想獲利：獲得享受，獲得真心。有時是前者，有時是後者，有時兩者都要。我個人的價值有多高？能為我帶來怎樣的獲利？我們凡事必問：「值得嗎？」這樣的問題左右著我們的人生，當然也左右著我們的愛情。大眾媒體和這個時代的精神不斷灌輸我們：盡情追求，活出自我，把握一切，什麼都不要錯過。

這導致最重要的一項結果：性無所不在；性是理念，是訴求，是幻想，是煩惱，是要求，是刺激購買的誘因，是嚮往，是競爭……。如今十六歲青少年從電視、電影、海報、光碟和網路上看到的裸女數量，遠大於我們祖父母一輩子見過的。這些孩子沒什麼實戰經驗，但他們自認為理論上什麼都懂，甚至相信那是他們非懂不可的事。氾濫的視覺刺激給孩子們的腦袋帶來嚴重的負擔。這種史無前例的百無禁忌，是一場實驗，長此以往會造成什麼後果，沒有人知道，但絕對值得我們擔憂。

現代人在自戀與色情、網路與「愛的大遊行」（Love Parade）<sup>註129</sup>、暴露狂和威而鋼的交互作用下，將形成怎樣新的性認同，已有學者提供答案。德國醫師同時也是社會學家的福克斯瑪爾·希格齊（Volkmar

Sigusch)<sup>註130</sup>稱之為新性向（Neosexualitäten）。希格齊曾在目前已關閉的法蘭克福性學研究院擔任院長多年，是少數致力於研究性解放對德國社會影響的德國學者。希格齊研究此議題已有四十多年。他認為，「愛情在文化上的轉變」自一九六八年的突破至今，發展過程並非一直線，且有更多的自由、更重視個體性。德國人如今的性愛次數恐怕比過去少。這是多麼奇怪的結果，所以需要解釋。

希格齊認為，性愛的普遍是造成其喪失重要性的主因。傅柯曾視性史為一部特殊的歷史、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被區隔的歷史，但如今性卻是生活化、平凡無奇，且被接受的事。今天的性訴求反而取代了性欲。不必身體力行，不必以身涉險，只要跟著大聲疾呼、全力支持就行了。原本的「包裝」卻變成了真正的內容。希格齊以每年舉行的「愛的大遊行」為例，其目的根本不在於性，而在於自我表述。性不是這個活動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與工具。

如今最適合用來形容性的字眼是「解離」（Dissoziation）、「色散」（Dispersion）和「多樣化」（Diversifikation）。生育、性本能、性欲和親密關係，這些過去聯結在一起的字彙，如今已分離，甚至互不相干了。生孩子靠試管就行了，對欲望的渴望遠勝於欲望，沒有性伴侶能表現得像色情影片或廣告所承諾的。不帶任何情感的性工業重新塑造了我們，也讓我們精疲力竭。許多事變得廉價且唾手可得。傅柯聳動的緋聞如今早已見怪不怪，友善的戀物癖、親切的同性戀、嬉鬧般無傷大雅的性虐遊戲、新性別（Neogeschlechter）已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圈。自由可能導致不負責任，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卸下壓力後要面對的是庸俗化，自由可能造成無所謂。這些正好解釋了普遍的情況：性氾濫及欲振乏力。

一九九〇年代美國曾經做過一份調查，發現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位認為性沒什麼意思，男性是每六位就有一位這麼認為。性冷感和性無能成了一種時代病。根據科隆大學的一項研究，全德國有四到五百萬的男性有勃起障礙。原因何在？心理因素還是生理因素？至今答案不明。

檯面上，「性」變得無比重要；檯面下，許多人「性」趣缺缺，為



此性工業挖空心思，不斷推陳出新。色情行業絞盡腦汁要為舊刺激尋找新玩法。全世界的化學實驗室集一流科學家，孜孜不倦研發最新的壯陽藥和春藥。大家總相信，我們對大腦、對身體的化學作用知道得越多，就越有能力操縱它們。即便在真實生活裡我們沒什麼「性」致，但只要能研發出有效的藥劑，未來一定能重拾「性」福。科技量產的性欲代表著龐大商機，威而鋼只是個開端。敏感帶成了被鎖定的目標，而人類最敏感的地帶非大腦莫屬。如今許多發現堪稱成果卓著， $\alpha$  黑色素細胞刺激荷爾蒙（ $\alpha$ -MSH）就是一例，這種荷爾蒙不僅能降低食欲，還能誘發催產素和多巴胺分泌，其效果的確傲人，不但能讓男人立刻勃起，還能讓女人熱情沸騰。製成噴劑，直接由鼻子吸入效果更佳，不過大前提是必須先獲准上市。

催產素、抗利尿激素和苯乙胺，是能讓人產生聯結感或興奮感的化學傳訊物質，它們跟多巴胺和血清素一樣，都能在腦中形成作用：多巴胺讓人興奮，血清素帶來滿足感。現在我們已經能順利的運用藥物刺激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分泌，但這麼做並非沒有危險。操縱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分泌，無異於嚴重干擾荷爾蒙的正常代謝。不管是多巴胺或血清素都絕非性欲荷爾蒙，它們只具有促進或減緩的功能。藉藥物喚起性欲和增加興奮感，這種作法一定會連帶的誘發其他情緒，甚至影響我們的記憶。

副作用無法預估。德國尚未核准上市的壯陽藥VML 670，原本是用來治療憂鬱症的。它具有神奇的效果，不但能讓人心情轉好，同時還能喚起性欲，但這樣的組合很奇怪。一般而言，這兩種反應不會同時發生。抗憂鬱的藥通常能促進「滿足荷爾蒙」血清素的分泌，結果當然就是性欲下降。因為心情一好，欲望就會消失。這是我們一直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連鎖反應。但果真如此嗎？我們得一定程度的不滿足才能產生性欲？心滿意足的人就比較清心寡欲？愛你自己，那就等著下一場床第危機吧？

生理上的不安全感會對心理造成壓力。壓力越大通常就表現越差（即使服用了壯陽藥）。能讓我們隨時想要就能湧起性欲、飄飄欲仙的萬靈丹，至今尚未問世，要達到那樣的境界，醫藥界還有一段艱苦的長



路要走。沒有任何藥物能讓性欲如所希望的那般持久。自然科學所勾勒的人類形象，常把人類化約為化學作用，但一遇到心理層面就漏洞百出。所謂能挑起性欲的興奮劑，雖然會對我們的生理產生作用，並影響我們的情緒，但要產生相應的感情還是得靠我們自己。號稱威力強大的黑色素細胞刺激荷爾蒙（MsH），也要我們喜歡或愛慕對方才能發揮效果。如果我們覺得對方無趣、沒感覺，甚至很討厭，腦子裡不存在相應的心理反應，那麼威力再強大的化學作用也發揮不了效果。

藉由藥物操縱多巴胺或血清素的分泌量，這種作法不僅能帶來興奮和快樂，還會造成依賴。換句話說，藥效越好越容易上癮。酒精和香菸同樣會影響我們的內分泌。大腦恪守的是化學平衡，縱欲沒有不用付出代價的。酩酊大醉後，我們會頭痛欲裂，咖啡因和古柯鹼效力過後，精神更萎靡，沉溺性愛只會欲振乏力。我們把欲望拉得越高，之後就跌得越深。依賴藥物的人，有一天會變得沒有藥就不行。

這絕非危言聳聽。縱欲的美夢只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在睜開眼，覺醒的那一刻，你將會發現事實竟是如此難以承受。或許你會懊悔：當初要是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那該有多好！

## 走出洞穴

文化為了生活，科技為了生存。從人類祖先舉起第一把原始石斧開始，文化與科技便有此差異。火、武器和工具讓人類的生存優勢大增，而人際規則，例如語言、儀式和繪畫，有效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其目的早就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娛樂。汽車、飛機、相機、電話和電腦不再是生存工具。科技對人類環境形式的影響巨大，它們為文化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但有一項東西幾乎不受影響，就是「內容」。大家透過簡訊和即時通傳遞的智慧，從遠古至今似乎變化不大。我們利用速度極快、充滿未來感的無線溝通技術，利用功

能強大的機器，傳送的只是一個與石器時代象形文字無異的電子笑臉，一個微笑符號。

內容也許一樣或差異不大，但技術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對人類意識還是會帶來重大影響。科技和媒體所展現的形式，重塑了舊有的內容，並賦予它們全新的面貌。螢幕塑造了新的美學典範，一種不真實的人工美感。光滑而平面的形象，取代了原本的真實軀體，所有的皺紋、汗水與體毛通通消失了。二〇〇一年去世的德國文化哲學家迪特瑪·坎柏爾（Dietmar Kamper）<sup>註131</sup>認為，現實生活中我們越來越像「沒有影像的軀體」，但在電視和網路上我們越來越像「沒有軀體的影像」。

媒體塑造出來的人工美感成了典範。從剃掉腋毛、陰毛到整型大改造，人們前仆後繼追求非人性的完美。數百萬年來，體味、分泌物和毛髮標誌且裝飾著人類，如今全成了令人作噁的累贅與困擾。如果說，過去兩百年的市民階級文化史是一部語言及風俗上的身體壓抑史，那麼今天我們正在做的就是：將終於獲得解放的身體徹底揚棄掉。好不容易走出禁忌的陰霾，我們卻再也不認為自己的身體美。我們在雜誌、電視畫面上看到越多的人工美，就越覺得自己的天生體態很醜陋。「完美的『女人形象』，」迪特瑪·坎柏爾有感而發的說：「只是一具屍體。」

科技導致我們發生自我異化？科技讓我們變成隱身於自己體內的異形？科技終將毀掉所有的「真愛」？

「反科技」乃哲學界熱愛的一項運動，以「本質性的」文化對抗「非本質性的」科技。義大利哲學家烏姆貝托·迦林貝堤認為科技是個人之大敵，所以愛情是「這個充斥著匿名的社會，以及因科技時代導致關係全面瓦解而徹底孤寂人類的唯一出路」。

果真如此？在網路上與網友聊天或談情說愛的人，會因為太少跟實體人接觸而「徹底孤寂」？根據恩尼德民調中心（Emnid-Studie）二〇〇三年的調查：德國有百分之八的人是透過網際網路而結成夫妻或情侶的。社會學家盧曼認為：「我們在置身天堂時結婚，在共乘一輛車時離婚。」這句話或許仍適用於今天，只不過天堂得換作虛擬網路。至於「關係全面瓦解」並沒有發生。

網際網路絕非大規模製造孤寂的地方。相反的，它造就了數量龐大到不可思議的全新關係，這些關係絕大多數都很短暫，卻被廣為接受。在實際生活中，人與人的關係其實也很少是既密切又持久的。為什麼在網際網路上就要受到這樣的苛求？維持長久關係，與其說是一種實際需求，倒不如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夢想，不僅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難辦到，就連熱戀中的情人也做不到。浪漫愛情或許只是無數人際關係中的一種。愛情早就喪失了它的永恆性；永恆的只有那段情，而不是時空上的持續。恰恰是今天的年輕人，勇於渴望並且深知關係之易逝。

德國記者克里斯提昂·舒爾特在他名為《心靈密碼》的著作中，對網路世界的愛情有精闢分析：愛情嶄新的真理遊戲，以及由各種藉期待和對期待的期待交織而成的網絡。舒爾特認為：「網路為個體性的表達提供了極優質的先決條件。虛擬世界營造了無遠弗屆的可能性，在匿名的保護傘下，人們得以自由的表達，這在『真實世界』中永遠無法企及。」

網路戀情、網路性愛，或藉網路締結各種長期或短期的伴侶關係，近年來益趨受到重視。在《數位生活二〇〇六年報導》（*Digital Life Report 2006*）委託世界級民調中心TNS Infratest針對十四歲以上德國網路使用者所做的調查中顯示：二〇〇五年擁有新戀情的人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是藉由網路找到戀人的！二〇〇八年十月，德國知名婚友網站KissNoFrog的一份取樣龐大的研究，同樣指出：二十到三十五歲的單身者平均每週花三小時半時間在網路上尋找對象。真實生活中這些人每週只花一小時，或每四週找一個週六晚上花四個小時去認識異性。近年來最流行且成效最卓著的婚友活動就是快速約會（Speeddating）<sup>註132</sup>。早年那種透過（美化過的）照片和資料來認識對方的方式，如今已被視訊網站和視訊聊天室取代。可以「實際」看到對方的長相，聽到對方的聲音，如此一來就能避免浪費時間和精力在「名實不副」的對象身上。

網路上的交友平台成長迅速；測試自己以及和別人交往的機會大增。在實際生活中只會令人尷尬的場面，到了視訊螢幕上，變得輕鬆愉快且毫無壓力。這種透過網路尋找戀愛對象或人生伴侶的方式，不僅打

破了真實空間的限制，還大幅拓展我們的生活與職業視野。網路讓許多人不再裹足不前，不再自我質疑。它成了獨一無二的第二「生活空間」，也成了性質獨特的「愛情空間」。雖然目前網路使用者仍以年輕人居多，但未來一定會對老年人的生活帶來決定性影響。老年人比年輕人更難找到對象。誠如克里斯提昂·舒爾特所說，有特殊需求或是缺陷的人，尤其是網路的受惠者，因為網路提供他們絕佳的機會與管道。單親媽媽、單親爸爸，或是聽障者、菸癮者（或其他類型）、愛滋病患等，都有屬於自己的網站和社群，而且不只一個。在那裡可以遇到跟自己處境相同的人。

批評網路戀情的人認為，網路交友會讓愛情失去原本的浪漫，因為上網交友充滿了目的性，少了遊戲般的互動，少了熱情，有的只是利弊得失的冷靜分析。如果這樣的指責屬實，那麼網路交友的行為簡直與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資本主義式的演化理論）不謀而合：他們都想讓自己的投資，迅速獲得經濟上的最大效益。不過克里斯提昂·舒爾特的看法剛好相反，他認為網路戀情是古典浪漫的重生：「超現代的網際網路具有浪漫傳統。電子郵件和聊天室裡的匿名互動，讓人很容易把對方想像得比實際情況更美好、更聰明，而且每個人都會努力展現自己希望被看見的那一面。換句話說，美化乃預料中的事。愛上一個看不見的陌生人，這種愛情有時比跟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談戀愛更為強烈。將對方理想化，一方面會帶來危機，因為它讓人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另一方面它卻是極為浪漫的事。這代表一種回歸傳統的愛情模式。網路戀情不可能一開始就有肉體結合，這一步總要等到認識之後。如今越來越多的男女把關係建立在一開始就上床，但網路上的愛情遊戲受制於現實，無法把上床擺在第一位。就此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回歸柏拉圖式的愛情理念。」

倘若事實真像義大利哲學家烏姆貝托·艾希林貝堤認為的：今天這個時代讓人變得孤獨；或像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所言：「大眾穴居者得面對孤寂。」那麼網路反而是讓人擺脫孤單寂寞的最佳途徑。許多社會學家只看見危機，沒看見轉機，他們認為：羞於跟人接觸的人會退縮得更嚴重，不擅長社交的人會更加逃避必要的訓練。但整體而言，網

路提供了廣大的現代穴居者一條走出洞穴的路。

我們的社會經過近幾十年的演變，幾乎快忘了怎麼書寫，但會員遍及全球的交友網站，即時提供了新的書寫園地。交友網站之於使用者，就像書信之於浪漫主義者。現代人的「網路抒情詩」跟中世紀的宮廷抒情詩有許多異曲同工之妙。不管得不得體，網友恪守自己的符碼，幽默和原創性不可或缺，並與同時上網的網友形成微妙、直接或間接的競爭關係。唯一的差別在於現代版的抒情詩競唱，不是發生在浪漫主義的重鎮瓦爾特堡（Wartburg），而是在網路上：我的網路就是我的城堡。

過去總說，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個傳統的家、古典的窩，可供市民階級歇息的營帳、最安穩的堡壘。所謂的家庭如今安在？

---

註124：一八八三至一九五五，近代西班牙最偉大的思想家，也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知識領導者之一。曾任馬德里大學教授，後流亡國外，曾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住過一段時間，後定居葡萄牙里斯本。曾返回西班牙訪問並於馬德里講學。

註125：一九一五年生，著有《反動的修辭》。

註126：一九六一年生，著有《情感資本主義》。

註127：一九四九年生，當今發展心理學權威。撰寫心理學教科書為許多學校指定，有關創造力及人性發展的書籍，也成為工商界開發人力資源的參考書。著有《智力三元論》、《認知心理學》等。

註128：莎菈與前夫馬克於二〇〇四年結婚，二〇〇八年宣布分手，二〇一〇年正式離婚。

註129：源自一九八九年在柏林以「寬恕、尊敬、相互理解」為口號，而發起「家園、音樂、抗爭」的政治性活動。目前已由電子音樂狂歡節取代政治訴求，每年七月舉行，很多同性戀者來此聚會狂歡。二〇〇七年主辦單位決定移往德國西南的魯爾區舉辦。

註130：一九四〇年生。

註131：一九三六至二〇〇一，也是作家、社會學家。

註132：或譯「閃電約會」。主辦人會安排一堆男女排排坐，男生一邊，女生一邊，大家迅速而簡短的輪流交談，以這樣的方式同時跟許多人面對面快速相親。

## 第十三章 甜蜜的家庭

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家庭——乃國家希望之所託，乃夢想之翼。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

便宜加油，就有錢買保險套了！

——二〇〇二年連鎖加油站Jet的廣告

### 家庭是一種意願與觀念

廣電處和天主教家庭聯盟一致認為：這次真的太過分了！他們聯手抵制，並要求撤下廣告。他們重炮轟擊的對象是美國石油集團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旗下的子公司Jet連鎖加油站，這次的廣告顯然冒了大不韙。廣告看板上出現面帶微笑的八人大家庭，極為經典的畫面：全家人穿得整整齊齊，頭髮中規中矩的旁分，臉上掛著憨厚的笑容。下面大大寫著：「便宜加油，就有錢買保險套了！」再下面一行較小的字：「Jet幫你全省了。」巴伐利亞家庭政策部長批評這則廣告「變態」，黑森拿騷區（Hessen-Nassau）教會主席痛斥這是散播「暴力訊息」！國際人權社（Die 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ür Menschenrecht, 縮寫IGFM）也表達強烈抗議：「違反人性尊嚴！」這件事發生在二〇〇二年。幾星期後，這些海報與看板全部消失。

在我們的社會裡，「家庭」是個神聖的概念，神聖的程度尤勝從前。公開藐視家庭的人，別人對他的負面觀感，等同於對種族主義者和性別歧視主義者的不屑。如今的德國人並不特別喜歡生養小孩，卻無損於這種社會風氣。家庭的概念不容侵犯。撇開Jet那則深具爭議的廣告不



說，舉目所見，廣告看板上都是笑容燦爛的兒童，牽著他們一臉幸福的爸媽，這類廣告之普遍，簡直創紀錄。

對廣告商而言，浪漫家庭幾乎跟浪漫情侶一樣，都是最受歡迎和最根深柢固的訴求。購買家電用品的人絕大多數不是單身者，食物廣告鎖定的是兒童需求，尤其是早餐廣告。（因為單身者不吃早餐？）最典型的例子是福斯的七人座休旅車，這是一款鎖定家庭和家庭概念的房車。雖然建屋貸款廣告已頗切實際的鎖定不生小孩的夫妻；雖然帶小孩去看病的可能是爸爸一個人，但核心家庭的形象深植人心。如今幾乎沒有什麼「家庭節目」了，因為每個人喜歡看的節目都不一樣。即便如此，給孩子們看的頻道依舊稱為「家庭頻道」。

當今都會區常見的「拼組家庭」（Patchwork Family），對廣告界而言仍是禁忌。所幸，福斯Sharan七人座休旅車的廣告提供了成功反例，首先是一位父親要到前妻那裡載女兒。這畫面立刻吸引目標族群的注意。接著，福斯推出另一支廣告，一名中年男子正在把度假用品搬上他心愛的Sharan。兩個自以為是的傲慢青年出現，在這個父親身邊停下摩托車。他們大肆嘲諷這位父親，就在此時，他高挑、金髮的時髦妻子翩翩而來，後面跟著三位同樣高挑、金髮、打扮入時的女兒，四名美女優雅登車，父親的嘴角揚起一抹笑容，休旅車揚長而去，拋下目瞪口呆的青年：有這樣的家庭才叫炫！這支廣告推出後大受歡迎，在YouTube上有非常高的點閱率。

家庭將我們的社會畫分成不同族群。熱愛家庭而沒有成家的人，少之又少；厭惡家庭卻成家的人，極為罕見。根據《明鏡雜誌》二〇〇八年的調查，約有一半的德國人認為，幸福來自於「有小孩」（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女性和百分之四十八的男性這麼認為）。雖然家庭觀念長久以來備受推崇，但受推崇的其實只有觀念。少於三分之一的德國家計單位是家庭。一九八〇年代起，政府透過媒體大力宣揚家庭，把家庭包裝成一種現代化的生活風格，但情況依舊沒有改善。相反的，九〇年代晚期，大批出現的是現代競技場（股市）上追逐金錢遊戲的單身貴族。

「高爾夫世代」高調成為「無子」世代。將家庭包裝成時髦的生活風格，並沒有提高年輕人的成家意願；股市崩盤後變窮的股市玩家，也沒

有因為受挫而想回歸家庭並生兒育女。

問題主要出在年輕人對伴侶關係有極深的疑慮，就算用當代精神來打造全新的家庭形象，還是打動不了這些人。塑造家庭新形象的作法之所以無法改變德國目前所面臨的窘境，關鍵不在於年輕人是否接受那些家庭觀念，而在於年輕人找不到建立家庭的恰當機會。漢堡的性與伴侶問題專家鈞特·史密特（Gunter Schmidt），一如上一章提到的希格齊，都是德國重要的性學專家，根據他二〇〇二年的調查，三十歲的德國已婚者約只占三十歲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十，但一九六〇年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已婚者的潛在離婚率約為百分之四十，而一九六〇年則為百分之十三。平均每對夫妻所擁有的小孩數，從以前的二點四降到今天的一點四。德國目前每年有超過兩百萬對的伴侶分手，這顯然不利於亟需穩定的家庭規畫。

出現在廣告上的家庭畫面，仍能喚起我們的生活感動，仍代表著我們的夢寐以求的生活風格，但那越來越不真實。二〇〇九年的德國，家庭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是一種理想、觀念、浪漫幻想，甚至是廣告的發明。在實際生活中，完美的家庭就跟完美的婚姻一樣罕見。即便如此，許多組織家庭的新人依然集體夢想著共組愛巢，維持著傳統的家庭形態。一開始，人人總想像著創造一個充滿愛與和諧、能提供安全與庇護的家，還會生很多小孩。雖然別人做不到，但我們肯定可以！

一旦進入家庭，進入日常生活，無數的妥協、無數的阻礙，讓原本的理想備受考驗。於是許多人擺盪在兩大極端間；要不就是不斷的讓步，修改自己先前抱持的家庭觀念，要不就是堅持理想，跟不符期待的伴侶漸行漸遠。許多年輕夫妻，女方之所以離開男方，往往不是因為對家庭沒有理想，而正是因為堅持的理想無法實現，而決定離婚。對家庭的期待越高，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大。這類問題在男性方面也日益嚴重，由於女性伴侶同時兼具妻子和母親的雙重角色，男性對此有著不同的想像，這種情況往往被忽略了。根據刻板印象，父親之所以離開母親是因為自私基因的宿命，並非家庭理想的破滅。

不管伴侶最後會不會分手，其實男女雙方都對家庭抱持很高的憧

憬。然而，今天世人對家庭期待之高、要求之多，乃史無前例，這也是導致許多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根本達不到的「家庭理想」毀了真實的伴侶關係。就連那些因不忠、疏忽、有欠思考、沒有責任感而導致家庭岌岌可危的人，也對理想家庭懷抱一套願景。美好的家庭越罕見，社會對它的集體幻想就越嚴重，越覺得它彌足珍貴。

這種幻想最明顯的標誌，就是以各種可購買的家庭裝備來「表演家庭」。過去，家裡的三個小孩必須擠在小小的金龜車後座，如今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卻得配備一輛七人座休旅車。住在柏林的普倫茨勞貝爾格區（Prenzlauer Berg）或科隆的艾格尼絲區（Agnesviertel）中自恃甚高的人，雖喜歡充滿懷舊氣氛的石版路，但小孩子的娃娃車一定得是避震效果絕佳，一輛至少四百歐元的高檔推車。需要這麼高級的裝備，原因之一：這可是時髦奶爸要推的娃娃車。至於住家，關起門來自然是「十分庸俗」，畢竟花費的重點不在於提供小馬克斯或小蘇菲亞安全感。

如今許多有小孩的夫妻要負責的對象並非伴侶，而是家庭觀念。對上幾代的人而言，家庭是無庸置疑的義務，但時至今日，家庭成了一種「自選曲目」，一種充滿懷舊與傳統幻想的自我展現。所謂的「都市居家」是一排又一排位於郊區相鄰的平房，卻能喚起大眾對都市生活的無限想像，成為現代都會家庭的標準配備。重視個體性的夫妻，購買成屋、建立家庭，這畫面是世人對有小孩家庭生活的典型想像。

只可惜，家庭並沒有復興。根據統計，經得起時間考驗長期存在的家庭，不但未增加，反而減少了。實際存在的家庭數越來越少，但充滿感動與浪漫氣氛的家庭觀念，深植人心，因為它們來自廣告、電影，來自德國老牌歌手與創作者雷恩哈德·梅（Reinhard Mey）的歌曲。或許可以說：正因為美好家庭如此罕見，幾乎快要消失了，家庭才會變成理想主義的聖地。

我們比前人更熱愛自己的理想，卻很少打算要為理想負責。對浪漫愛情如此，對浪漫家庭也是如此。不斷被我們強調的感情與期待，讓家庭變得不再理所當然。浪漫情懷、追求意義和對幸福快樂的期待，都不是有利於家庭穩定發展的因素。現實生活只會把這些理想消磨殆盡；在

權利與義務、自由與透支、自主與配合之間掙扎，只會讓理想漸漸褪色。我們的個人考量會澆熄熱情，我們開始用腦計較，對愛情如此，對家庭也是如此。以色列女社會學家艾娃·伊露茲對婚姻與愛情的看法也適用於家庭。她說：「家庭同樣服膺於經濟行為的優勢，以及對自我滿足與平等的理性追求，至於其他的都是不道德的相對主義，據說那只會摧毀我們的關係和『家庭價值』。」但「家庭價值」到底是什麼？

## 前所未見的家庭

所謂的保守派或市民階級派最愛強調家庭價值，他們不是把「家庭當作價值」，就是訴諸「家庭價值」。我們要鞏固家庭，更重視家庭，或許還要「回歸」家庭。這聽起來很美好、溫暖而熟悉，感覺十分舒適：回歸家庭！問題是，要回歸哪個家庭？

在（德文）字義上，家庭是指住屋中的共同體，並不是指父親、母親和小孩，而是指父親的產業。對羅馬人而言，僕役、奴隸和牲畜都屬於家庭。視家庭為有小孩的婚姻組織，這種定義十八世紀才出現。但十八世紀的人也很少生活在小家庭或「核心家庭」中。數千年來，在歐洲、在世界各地，人類普遍的家庭形態就是大家庭。主要成員為親戚，包括未結婚的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甚至媒母、管家、來投親的遺孤和僕役。鄉下農夫一如城市市民，大家都生活在同族的大家庭中，這種情況跟原始部落及游牧民族一樣。

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建立者恩格斯，出身望族及大家庭，他對小家庭有極深的疑慮。恩格斯不認為核心家庭具有維繫典型人際關係的作用。基於對生物學的高度興趣，一八八四年，恩格斯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一書。小家庭往往把親戚視為亟欲擺脫的麻煩，這更證明了核心家庭的源頭：「家庭保留了下來，但家族親戚系統卻成了化石，當此

系統因循守舊的繼續存在，家庭卻由此獨立發展出去。若居維葉（Georges Cuvier）<sup>註133</sup>根據在巴黎發現的有袋目動物遺骸，而推論出這些骨頭屬於那些曾經在此生活，但後來全數滅絕的有袋目動物；若此成立，我們也可以有相同的把握說，根據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家族親戚系統，我們能夠推論出世上曾經存在過與此系統相呼應，但目前已全數消失的某種家庭形態。」

恩格斯的古動物學舉證，其趣味性顯然高於科學性。不過更有趣的當屬人類學家海倫·費雪的見解：父親、母親與小孩，這種家庭形態誕生於遠古的熱帶草原，真是不可思議的想像。我們找不到可以證明遠古人類祖先曾有核心家庭的證據。比較可能的是，他們很像今天的狩獵社會或採集社會，整個族群共同生活或組成大家庭。就算過去核心家庭曾出現在人類的文化中，也從未成為社會的主流。核心家庭的興起或許該歸功於現代的社會福利法。只要家族經濟繫於一人的收入，所有人都得依賴族長過活，整個家族就離不開這個大家庭。相反的，核心家庭的模式不重視合群，排斥經濟上對他們有所求的親戚或成員。在一個沒有退休金、沒有養老金、沒有撫恤金、沒有社會救助網絡的國家裡，要負擔核心家庭並不容易。

視核心家庭為普遍、正常的家庭形態，是從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而且僅限於都市地區。根據一九九二年版的《天主教教理》對核心家庭的解釋：核心家庭乃「社會生活之起源」。但這裡指的起源肯定不是歷史的起源，因為馬利亞與約瑟並沒有正式結婚，再虔誠的天主教徒也不會認為耶穌基督是婚生子女。核心家庭作為社會生活的起源，它興起與一項令人尷尬的事實有關：族長再也養不起龐大的家族了。十九世紀因為工業革命，大城市出現許多勞動家庭與小市民家庭。在得不到社會支援的情況下，連小孩子都得去當童工，以維持家計，誰也沒錢幫助無法自食其力的家庭成員。不只男人得工作，女人也得工作，這才是現代核心家庭的真正起源。

因愛而結合，這在十九世紀極為罕見，而男人是否忠於妻子也無關緊要，婚姻主要是建立經濟共同體。直到二十世紀，因愛結婚並忠於伴侶的觀念才逐漸與核心家庭結合。現代版的核心家庭在一九三〇到一九

六○年代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並達到全盛。當時的核心家庭在今天看起來，大概連最推崇家庭價值的保守派和市民階級派，都要敬謝不敏。因為沒有丈夫的允許，妻子不准外出工作；女性不得有自己的銀行帳戶，也不能與人締結合約。女人只要被冠上「外遇」的罪名，離婚時將孑然一身，什麼也拿不到。但婚姻中的強暴卻是不違法的。在那段德國經濟奇蹟的黃金歲月裡，愛小孩的事全歸母親負責，父親完全不必操心。父親與孩子之間的互動，頂多就是週末聚會。

今天在德國，結婚的愛侶一旦有了小孩，面對的情況截然不同。從育兒津貼到失業救濟金到養老金，國家會周全的保障小夫妻倆生活無虞。至於忠誠，那是誰也管不了事，遑論懲罰。現在的小孩再也不是幫忙分擔家計的生產者，而是父母「自選的」奢侈品。國家的社會救助網會協助現代愛侶，將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望，進一步擴展為家庭。家庭所肩負的經濟意義越淡薄，家庭所具有的生命意義就越崇高。

對家庭的期待與對愛情的期待，終於日趨一致。期待是全新的，父母的角色也變成全新的。現代情人所期待、所夢想的家庭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家庭，即便曾經出現，也是少數的例外。共組家庭的男女期待一份永不褪色的愛，還有雙方對於孩子的愛。他們期待生活充滿刺激、令人興奮，又期待氣氛和諧、平靜安詳，與對浪漫愛情的期待如出一轍。還期待著彼此的期待能夠契合，得到無限的理解體諒與平等對待。這些苛求在一九五○和六○年代幾乎不存在。

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造成這些苛求的不是社會，而是個人。在德國，負責維持婚姻和家庭的不再是公權力（國家），在民法中「婚姻之義務」已失去重要性；「皮條客」仲介偷腥的已婚人士也不再觸法；第三者大可堂而皇之的與外遇者舉行婚禮；非婚生子女的父親享有等同於離婚父親的法律權利。能維繫家庭的約束力全來自內部，外界的影響微乎其微。

這種發展的結果就是，由夫妻組成的核心家庭雖然被奉為理想，但現實中只是無數選擇的一種。非婚姻形態的共同生活與婚姻形態的共同生活正相互競爭著，例如已分開了但仍一起生活，有小孩的人一起共組



聯合家庭，同性戀伴侶一起照顧收養的小孩，或是不管有沒有結婚，伴侶之間維持著遠距離的關係。於是，由同性戀收養未成年子女組成所謂的「彩虹家庭」不再罕見，離婚夫妻再形成「雙核心家庭」共同撫養小孩也所在多有。如今單親媽媽和單親爸爸數量之多，也是前所未見。

相較之下，完整的核心家庭變少了，這不能完全歸咎於「價值觀的改變」。有可能是，追求自我實現，例如成為職業婦女，這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想要實現的家庭理想，過去並不存在。當代人所夢想的核心家庭是一種超高標的模式，是要讓每個男人和女人都能獲得自我實現和人生意義的家庭。這種「浪漫家庭」不只是理想，還得天天身體力行，去證實它。於是，任務就變成了過分要求，引用德國喜劇泰斗卡爾·華倫汀（Karl Valentin）<sup>註134</sup>在談論藝術時說的一句話：「家庭雖美好，但工作很多。」

回歸家庭並沒有發生，因為只有少數人想恢復過去爸爸上班，媽媽在家照顧小孩，並喜歡做家事的模式。過去的父母或許大多生活不優渥，卻比較不會良心不安。理想的浪漫家庭則翻轉了情況，不管是核心家庭或拼組家庭，今天的經濟條件已大幅改善，但或許跟太過理想化有關係，身為父母的我們卻常感到良心不安：我們真的有成為自己希望的那種完美母親或父親嗎？我們有撥出足夠的時間陪伴小孩嗎？我們有給小孩足夠的愛嗎？在火藥味十足且支離破碎的關係中，我們有提供孩子充分的安全感嗎？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我還是熱情如火、善解人意的情人嗎？

## 爸爸和媽媽

在可笑的面具下可能隱藏著真知灼見：「在新時代中覺醒的女性，承受著極大的對立，根據天性，她們不只是單一個體，甚至可說她們主要不是單一個體，而是種屬動物。在此，她們將學到如何鍛鍊自己成為

稱職的前者與後者，並從中取得平衡。身為種屬動物要鍛鍊自己的生育能力，身為單一個體要鍛鍊自己的愛情能力，愛乃結合了最深的奉獻與最高的自我尊重。」

以上內容出自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全能的妻子：婦女及其協力者的指導手冊》（*Die vollwertige Gattin. Anleitung für die Frau und ihre Helfer*），這本書的作者是荷蘭婦產科醫師凡·德·菲爾德（Theodoor Hendrik van de Velde）<sup>註135</sup>，他在書中想探討的是婦女的種屬功能和愛情能力。書名原本不是「全能的妻子」，頭版問世後兩年才改的，之前是「完美的妻子」。有鑑於這樣的書名對可憐的家庭主婦而言似乎太過苛刻，作者自己也這麼覺得，於是決定更動。

相較於同時代的人，凡·德·菲爾德算是進步的。他擔心現代社會的男女角色會帶來各種新的挑戰與衝擊。他提供性愛諮詢以促進婚姻穩定、和諧，如果夫妻雙方真有意願在此方面下功夫的話。凡·德·菲爾德只花了六年時間就用打字機敲出了五本大作：《完美的婚姻》、《婚姻裡的討厭事》、《婚姻裡的情色》、《婚姻裡的生育力及符合願望的影響力》<sup>註136</sup>，以及《全能的妻子》。凡·德·菲爾德可謂當時西方世界的性學教皇，也是性教育、性啟蒙之父。直到一九三七年飛機失事遇難前，他的書一共再版了四十次。凡·德·菲爾德一九二八年執導的電影《婚姻》（*Die Ehe*），一九六八年也再度重拍。

凡·德·菲爾德比女性主義和一九七〇年代德國婦女解放運動，都更意識到二十世紀的婦女在婚姻中至少扮演兩種角色，且是互相衝突的角色：丈夫的情人和孩子的媽。一方面要對丈夫柔情蜜意，一方面要把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這讓家庭主婦淪為服侍兩個主子的女僕。身為醫師，凡·德·菲爾德認為要解決婦女困境的方法在於技術，他建議婦女鍛鍊自己的陰道肌肉以提高性欲及生育能力。因新時代的性別角色與婚姻狀態而產生的心理問題，顯然不是他的長項。

如凡·德·菲爾德所注意到的，現代伴侶關係面臨的是迎向各方面挑戰時組織安排的問題，這情況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日趨明顯。若說透過技巧或體能訓練能迎刃而解，就是笑話了。當初的技巧有些成為今天

的心理技巧。愛情、浪漫、自由、自主空間、個人化、家庭，在今天以極多樣的方式互相交織，且彼此衝突，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祕訣、技倆或方法，可以輕而易舉的解決各種問題。

它的困難不只在於，一開始能讓人產生浪漫感受的化學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消退。變得平淡還毀不了我們的伴侶關係或家庭。再說沒有灰撲撲的平淡，怎麼突顯得出色彩繽紛的美妙。艾娃·伊露茲因此說：「我們常聽到的抱怨是，『開始階段』的情緒強度消退後，婚姻就會備受威脅，」可想而知：「單調、疲乏、平庸的日常生活是對照的一端，因為有日常生活做比較，浪漫愛情降臨的那一刻才會意義非凡。那一刻之所以石破天驚，就是因為它稍縱即逝，一旦落入日常生活便無法『挽救』。然而，進入『世俗』的日常生活絕非代表愛情就此『消失』，而是開始了某種充滿節奏感的交替，一種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與『神聖』浪漫互動的輪流交替。維繫美好婚姻生活的關鍵，就在於伴侶能否夠抓住這節奏感！」

比起強烈情感的間歇平淡，更令人困擾的是恐懼和擔憂，那常是我們第一時間感受到的情緒。愛情讓我們漫步在雲端，它的標準又是那麼的高，失望總是在一旁伺機而動。家庭同樣遭受相同威脅，而且還是雙重的。一方面，真實的家庭生活並非總是符合浪漫的家庭理想。最遲到了孩子的青春期的，浪漫家庭的憧憬差不多已摧殘殆盡了。根據自然天性的設定，青春期的孩子就是不符合家庭的浪漫氛圍，他們想要脫離與父母的緊密聯繫。另一方面，家庭一旦出現新生兒，就算只有唯一的一個，整個情況會重新洗牌。在孩子會叫「爸爸」、「媽媽」、牙牙學語之前，愛情早就不復從前了。更精采的是，原本被妻子捧在手掌心的親愛老公，現在聽見的卻是不耐的指責：不對！餵寶貝吃果泥的湯匙不能這樣拿啦！要迎接所有的挑戰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愛情關係原本會「帶來」的東西，例如性愛、情緒的穩定和自我認知（至少從佛洛姆開始），有了孩子之後會完全變調，目標和程度都不同。新手父母的家庭絕非宣稱的自我認知團體，況且現在起，他們最想「認知的」只有小孩。

建立家庭彷彿是在「以物易物」。有所獲得的同時，也有所失去。

沒有事情會再像以前一樣。沉浸在父母角色的幻想並盡情演出的人，很少警覺到：他正在讓自己暫時或永遠的失去某些東西。新生兒的誕生將嚴重影響父母的性愛品質，至少做愛次數會劇幅下降，哺乳期間甚至完全停擺。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的分泌量的確會大增，但受惠的是孩子，不是伴侶。如果之前提出的理論沒錯，男女之愛是由父母之愛衍生出來的附加產物，亦即「拱肩」，就生物觀點而言，這樣的變化其實再合理不過：愛孩子只是讓愛回到了它最初的發源地。兩性之愛只是介於拱頂之間的三角地帶。

這種交換的正面意義是，有一個全新的「我們」即將誕生，自我肯定將進入一種未知的境界。家庭在社會中建立只屬於他們自己的小社會，有自己的角色、真理遊戲、期待與對期待的期待。就理念而言，伴侶將獲得一個能提供無限自我探索的廣大空間。但就實務而言，這個空間從各方面看來都很窄小，因為時間會蠶食家庭。得自於家庭的新角色會漸漸落入新的俗套：從性感情人變成爸爸或媽媽。二〇〇五年，德國《焦點》（*Focus*）雜誌稱女人這種轉變現象為「母親化」

（*Muttierung*），而男人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誰要是在荷爾蒙與幸福感的催眠下，沒有對自己感到失望的話，也得面對他人對你（妳）的失望：和沒有小孩的姊妹淘在一起時變得格格不入；沒有小孩的哥兒們覺得自己是一匹孤獨的狼。

愛情符碼於是變成了家庭符碼：我們得在家庭中用精采對抗單調，以安全感對抗不確定感。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意義系統。家人對我們的看法通常跟外人對我們的看法有出入。大人如此，小孩也是如此。父母和兄弟姊妹的看法將成為一個人最牢不可破的自我認知及形象。在家庭中，一個人因巧合或權力結構而顯現出相對的天分與特質，往往會被視為他的性格，甚至是他絕對的形象。但小孩，不管是兒子（女）或再怎麼戀家的人，總有一天會長大、變老，他人對他們的情緒、社交或理性智能，肯定有不同於兄弟姊妹的評價，即便如此，原本家庭生活賦予他們的形象依然根深柢固。世界上最難修正和擺脫的就是家庭窠臼。

家庭會帶來各種嶄新的關係，關係會形成責任壓力。在個人化的時代裡，每個人都被迫去做出選擇，這讓決定變成了苛求或強求。無怪

乎，現在每三個女人就有一個不生小孩。雪上加霜的是，目前的就業市場根本無法配合現代雙薪家庭的需求（至少德國的情況是如此）。一九九〇年，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曾寫道：「社會讓個人孤立無援，尤其是婦女。」但如今男人也面臨相同困境。他們同時受到來自社會和個人期待的壓力，現在他們得拿出來的不只是學經歷，還要家庭經歷，而且是生理與心理層面都要兼顧。

這樣的情況造成社會想像和自我形象的嚴重混淆。一九九〇年代，女性主義者茱蒂斯·巴特勒在提到新經濟的單身理想型時，便認為理論上「家庭已死」。在有同性戀傾向的文化哲學家巴特勒眼中，異性戀令人作嘔。因為浪漫愛情的異性戀傳統，把「男人」和「女人」硬塞進形象既定的行為模式中。浪漫為愛情打造了既定的「角色窠臼」，並導致男女無法從中跳脫去找到自己，發現屬於個人的真實性別。就此而言，浪漫的核心家庭無異於強力水泥，讓「角色窠臼」更加牢固。女人一旦走進浪漫的核心家庭並成為母親後（巴特勒不太關心父親），就會開始自我化約，放棄所有自我探索的機會。根據巴特勒的看法，這些機會包括了對期待的諧擬遊戲、刻意拒絕或忽視既有的文化規範。

不過諷刺的是，如今有許多年輕的母親，尤其在摩登的都會區，反而自行走入設定的角色中。「母職」儼然成為一種公開的走秀，只見現代酷媽語帶調侃的說：「我當媽了，嗯，還不賴！」此情此景大概要讓巴特勒自打嘴巴。在都會區看到的不僅是一場充滿矛盾的母職展演，更是刻意拒絕這母親應有的角色行為。強悍的現代女性主義完全不給她們的精神教母留下台階。德國記者兼作家克里斯提昂·舒爾特，以柏林普倫茨勞貝爾格區的家庭畫面為例，認為那是一種符合時代精神的自我展現：「柏林的例子正好說明……，除了繁殖意義外，生養小孩如今所具有的功能。在普倫茨勞貝爾格區這個舞台上扮演父母，如今成了最時髦的現象，是展演個人獨特性的絕佳機會。」

邁著台步很酷的推著嬰兒車，這樣的姿態與場景成為象徵，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自我肯定，並擺脫「母親化」的宿命，或至少去淡化它、平衡它。這也是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就算箇中樂趣肯定是做的人比看的人多。

當然這種都會的「展演母親」和「展演父親」不能代表絕大多數的爸媽。到了柏林十公里外的城鎮，也許就是另一個世界了。從這些年輕的酷爸酷媽身上可以學到，家庭和個人不一定是衝突的。事實上，現今的個人化也成了一種強制，不再是無限開展自我的聖地。家庭也未必會帶來新的束縛，反而成為擺脫舊有約束的舞台。有些會變成強制選擇的可能性，就此消解。沒有休閒時間的人無須面對選擇休閒活動的困擾；自願為孩子自我受限的人未嘗不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處。不管家庭形態如何演變，它是一種混合著強制與自由的生活形態，這種形態也會被其他、新的混合著強制與自由的生活形態所取代。那些自由與強制會有所不同，但其混合方式可能很吸引人。有一點不容忽略，即便照顧小孩帶來許多壓力與負擔，卻沒有父母真心希望小孩消失。

這種充滿正面意義的反應，吸引了許多專家學者深入研究。沒錯，幾乎所有的父母都愛他們的小孩，並且不願意失去他們。但問題是，小孩真像父母所說能帶給他們許多快樂與幸福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暨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sup>註137</sup>和同事亞倫·克魯格（Alan Krueger）<sup>註138</sup>對此深感興趣。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可靠且有效衡量快樂指數的系統。首先他們預設，人們在填寫問卷時通常會自我欺騙。在回答有關快樂的大問題時，我們慣於衡量損益，然後得出類似「總結」的答案。我們的真實感受往往是被扭曲的，是經由我們自己美化出來的。因此，卡尼曼和克魯格設計出來的問題並不是：「孩子能為你帶來快樂嗎？」而是要求父母一點一滴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結果出爐，但它肯定不是孩子樂見的。至少美國父母認為，跟孩子相處當下的疲憊感絕不亞於採購或打掃。但這些父母在之前的訪談中卻做出總結，孩子是讓他們獲得快樂的最重要因素。健忘，讓他們對孩子的記憶比實際相處時愉悅。顯然，人生意義不只是所有快樂時光的加總。

## 大象家族



德國的都市地區，每兩個家庭就有一個是核心家庭；法國的都市地區，百分之三十的家庭是核心家庭。除了核心家庭以外，其他包括單親家庭、再婚家庭，或近年來數量驟增的聯合家庭，也就是所謂的「拼組家庭」。

拼組家庭其實不是什麼新的家庭形態，《舊約全書》中就出現過了，其形成有時甚至是種義務。比方說丈夫早逝，根據「利未拉特婚姻」（levirate marriage，即「叔娶寡嫂制」）的風俗，死者的兄弟必須娶死者之妻，並撫養他的小孩。宗教與神話乃拼組家庭的起源地。不管是希臘神話裡的宙斯，還是北歐神話裡的奧丁，祂們都製造過不少拼組家庭。神都這麼做了，古代文化當然也視之為理所當然。格林童話裡出現過不少拼組家庭，並透過精采的故事讓這個主題延燒了上百年。糖果屋裡的兄妹、灰姑娘和白雪公主，都是拼組家庭的受害者，他們的悲慘遭遇皆起因於母親早逝。

如今形成拼組家庭的原因或許和過去不同了，但其結構和問題卻大致相同。雖然法律在裁決家庭問題時，仍以核心家庭的狀況為標準，但近幾十年來社會對拼組家庭的接受度已大增。至少在都市地區，它已是一種普遍的家庭形態。來自拼組家庭的孩子不再受到排擠，而是被廣為接受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

拼組家庭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利弊得失仍難斷定。因為每個拼組家庭的差異極大，很難拿來互相比較。有的很成功，有的很失敗，有的很和諧，有的爭吵不休，但核心家庭不也如此。父母離異對孩子可能是個惡夢，也可能是種解脫，因為緊張的家庭關係終於可以解除；父親或母親的新伴侶在教育能力上或許更稱職，但也可能更糟；有些父親和繼父之間會形成嚴重的競爭關係，有些則不會；有時新加入的孩子會很快與大家打成一片，有的孩子卻會因為搶東西、爭地盤、爭寵，而紛擾不斷。完全一樣的拼組家庭並不存在。

有人說，拼組家庭的孩子比較容易鍛鍊出核心家庭的孩子所無法具備的能力。拼組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差異變大了，關鍵在於這幾十年來核

心家庭縮小了，甚至大多只有一個小孩。許多的能力，比方說分享、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幫助他人、居間調解、解讀感受、揣測他人意向的能力，據說相較於「爸媽與小孩」的三人家庭，這些能力在大家庭或拼組家庭中比較容易培養訓練。針對這個問題，尚需要可靠的長期調查，以及深入廣泛的研究，這些答案在今天仍付之闕如。

不過，拼組家庭倒是能為浪漫愛情帶來幾分好處。社會對夫妻離異的接受度越高，婚姻和伴侶關係越得以和平落幕，伴侶的自主空間也就越大。週末或假日時，孩子一次跟父親過、一次跟母親過，這種模式有利於爸媽和新伴侶的相處，為浪漫加分。即便這不是拼組家庭的原意與目標，卻是它帶來的附加好處，也可視其為一種拱肩。

一旦拼組家庭成為一般模式，甚至有可能是未來最常見的家庭模式，它所帶來的影響肯定不僅於此。不只分手伴侶還能維持心理上的聯繫，親戚尤其是（外）祖父母的重要性，將突然倍增。過去一百年來，親戚從來沒有這麼受重視過。單親爸媽要兼顧孩子與工作，拼組家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外）祖父母突然變得炙手可熱。大家都很需要他們，他們堂堂登場，出現的頻率增加，終至不可或缺。社會學家卡爾·奧托·洪德里希在他的書中寫道：「核心家庭的框架一旦瓦解，我們就會轉換某一其他部分進入其他框架，並投向其他人。他們很可能是父母、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姑姨、叔舅、（表）堂兄弟姊妹、朋友，即原本熟悉的故舊。」過去恩格斯視為「成了化石的親戚關係」，將再度復活。

如今，不管是保守派或左派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不得不正視一件事，核心家庭的瓦解強化了傳統的家庭聯繫。一方面，「多代同堂的家庭」代表著保守與市民階級的模式，即在核心家庭出現之前的家庭模式。一如過去，當雙親或單親爸媽在時間或金錢上有所匱乏時，這種家庭具有經濟支援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會遇到這種困境大多是因為父母想兼顧工作與家庭，這是現代人才有的利益衝突。今天的大家庭，其成員（有些包括朋友在內）很少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而有「地點多元化」的傾向，也就是大家散居各地。這要歸功於現代化的交通運輸，讓大家庭成為可能。

威廉·漢彌爾頓，那位以親屬的「總體適應度」為其理論核心的生物學家，看到這種情況一定會深感欣慰。因為親戚之間好久沒有這樣關心彼此的繁殖成果了。不過相應的關係原則並沒有形成，這種實踐在未來會如何發展，實難預料。倘若情況真如洪德里希所說，其發展趨勢不是「從傳統的聯繫與強制走向選擇性的聯繫，而是剛好相反」，原生家庭將變得日趨重要，那麼下一個世代的人該怎麼辦？他們之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是來自核心家庭。所謂的「原生」將會變得很複雜，有時要加上（外）祖父母、阿姨，甚至更多人，最後大概誰也不必為你的原生負責了。回頭尋找自己的根源，洪德里希稱之為「回歸」，但這樣追尋也將更難找到靠岸的港灣。

就我的想像，未來的家庭關係可能會像大象家族。象群生活在一起，由眾母親、阿姨、（外）祖母、姑婆、姨婆、孩子及孫子共同組成一個大家庭。象群的首領是一隻經驗豐富年長的母象，由牠指揮象群遷徙或停留，並下達各種行為指令，甚至「價值」判斷。大象家族裡見不到成年公象。公象大約到了十二歲就會像中邪一樣，冬天一到，年輕公象腦中的睪丸激素大量分泌，嚴重影響牠的行為。雄性荷爾蒙的量暴增到六十倍，導致公象的眼角及汗腺都流出黑色分泌物，不但長鼻子腫脹，全身還散發出濃烈的汗臭味及尿騷味，陰莖的外皮變成綠色。當波斯人的戰象出現這種著魔似的現象時，波斯人就會說「Musth」，意思是中毒了。公象一旦出現這種情況，象群便容不下牠。這時牠得獨自或與其他公象結伴而行，在森林或草原流浪。之後等到睪丸激素再次作祟，本能驅使牠去交配，牠才會接近象群。但這時公象只能從旁接近一隻母象，然後與其交配。但牠不會屬於大象家族。

但大象不是人。大象跟人的共通點僅在於兩者皆為哺乳動物，乃五千多種中的兩種。在此以大象家族的結構為例，用意絕對跟演化心理學家不同。當今西方社會讓我聯想到大象家族，不只是因為近十年來常聽到的批評，這是「沒有父親的社會」。的確，背棄家庭的男人今天依然為數眾多，但從一九九〇年代起便沒有持續攀升。單身漢一起生活的情況，絕大多數的男人在學生時代結束後就不會做這種事了。舉大象為例，主要是想說明新的大家庭結構。目前，原生家庭大多侷限於真正有

血緣關係且範圍很小的近親。但隨著拼組家庭的興起，未來我們的原生群體，就遺傳和社會意義而言，會變得越來越多樣。在此情況下，女性取得主導地位並躍居核心，並不令人意外。

當然，以上只是大膽假設，未來發展走向是否如此或類似，尚在未定之天。其可能性不只牽涉到社會的心理動能，還有經濟的。當社會不再富裕，我們的選擇就會受限。貧窮與飢餓向來有助於肉體與靈魂的團結。值此經濟不景氣的時代，那些自我實踐的幻想也應知所節制。就此看來，在金融風暴時期，傳統家庭模式的復興，未必是件完全不可能的事。

---

註133：一七六九至一八三二，法國博物學家與動物學家。

註134：一八八二至一九四八年。

註135：一八七三至一九三七，其著作曾被天主教教會視為禁書。

註136：德文版為：Die vollkommene Ehe (1926), Die Abneigung in der Ehe (1928), Die Erotik in der Ehe (1928), Die Fruchtbarkeit in der Ehe und ihre wunschgemäße Beeinflussung (1929)。

註137：一九三四年生，其專長領域是研究心理及經濟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尤其有關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

註138：一九六〇年生，普林斯頓大學經濟與政治學教授。

## 第十四章 真實意義與可能意義

為什麼愛情對我們依然如此重要？

或許我不得不說  
有愛，便有結束  
或者我還有理由相信  
我們都將被接納  
在恩賜之地

——美國流行樂知名歌手保羅·賽門（Paul Simon）[註139](#)

### 史賓塞的夢想

「此乃顯而易見，增進智能與社會進步兩者永遠攜手共進，就像是因與果。」文化的社會關聯越複雜，人類就越聰明；人類越聰明，文化就越複雜。當英國哲學家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註140](#)寫下這段話時，畫時代的革命正要登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剛問世。達爾文在一八五九年對自然界的看法，後來被史賓塞引用到社會學領域：永無止盡向前推進的演化法則乃自然賦予的社會進步法則。從星球、苔蘚、鼯鼠到人類，遵循的都是同樣的法則，一切會益趨美好與完善，終致完美的合諧。

但要了解這一切，包括人類的一切，不該先將推動宇宙進步發展的法則搞清楚嗎？史賓塞的夢想是先從生物學著手，然後到心理學、社會學，再到倫理學，一步步分析人類。這種夢想在今天更甚以往。所以，史賓塞才是社會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的真正始祖，不是達爾文。然而，用來建造地基的生物學法則，若想一路延伸到一樓的心理學、二樓的社

會學、頂樓的道德倫理，這種思維模式已經落伍了。因為，單憑基因和荷爾蒙解決不了今天的愛情煩惱、兩性衝突和家庭問題。若想對圖書館中汗牛充棟的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等著作視而不見，執意化約所有觀點以迎合生物演化法則，實在是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了。

基於好奇，我決定依樣畫葫蘆，建造從生物學、心理學，到社會學的樓層來爬梳愛情，預期每層樓都有自己的特色與嶄新內容。雖然說萬丈高樓平地起，每層樓都奠基於下一層，但不可諱言，一旦進入新樓層就會遭遇新的問題，並發現它自己的法則。基因驅使我們繁殖；性欲驅使我們追求滿足欲望；情緒促使我們正視本能與愛情的感受；愛情激發對愛情的思考；愛情的思考又編織出各種想像與期待。但是，基因的邏輯不適用於性欲，性欲的邏輯不適用於感情，感情的邏輯又不適用於思考，思考的邏輯則不適用於行為。

如果我們真想了解人類的演化，就該運用心理學的方法去研究演化，而非只是用演化的角度去理解心理。「一旦涉及心理學，再怎麼宏偉堅固的東西都會瓦解，」一九一一年，當時二十六歲的匈牙利哲學家喬治·盧卡奇（Georg Lukács）<sup>註141</sup>在〈心靈與形式〉（*Die Seele und die Formen*）這篇文章中寫道：「一旦涉及心理學，行為本身就不重要了，只有行為的動機才重要；一旦需要理由、需要說明，所有的固定性與明確性就會消失。縱使稍有殘留，也會被理由所形成的洪流徹底沖刷掉。」

盧卡奇這段話並非針對演化心理學，因為當時演化心理學尚未興起。至於演化心理學的先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不是盧卡斯要攻擊的對象。盧卡奇只是想釐清，什麼才是對人類最務實的描述，什麼是可以確立的。因為「人」遠超過其所有行為的加總。倘若有一個外星人行為學家用望遠鏡觀察人類，一定會覺得人類的行為無聊至極：睡覺、穿衣、吃飯、走路、坐下、說話、脫衣、偶爾交配，然後再睡覺、穿衣……。讓人之所以為人的是看不見的目的、動機、願望、企圖、渴望、衝突、敷衍、前後不一、猶豫不決、痛苦等。沒有了這些，人類目前的演化狀態，那迅速變化、非理性、情緒化、反覆無常的愛情與性欲動能，都將無從理解起。



從核心鞏固愛情的並非自然法則，而是單單一個字——「愛」，如果沒有「愛」這個觀念，我們或許就會像拉羅什福科說的，根本不知道要去戀愛。我們的愛情觀和今天對愛情的浪漫想像，決定了愛情模式，並賦予其合法性（Legitimität），去愛上一個人並且想一直跟他（她）在一起。此合法性是必要且重要的。之前在第六章提出了，兩性之愛既非本能，也不具有演化上的必要性。兩性之愛比較像拱肩，就跟宗教一樣，都是人類情緒智能的副產品。就生物觀點而言，母親對孩子的愛具有生物意義，但男女之愛並沒有，它甚至會干擾基因的最優化選擇。

兩性之愛在社會形態與風俗習慣允許的範圍內，具有合法性。這種合法性讓我們在親子之間的強烈聯繫消失後，轉而將這種情感需求以「非正規」的方式投射在伴侶身上。所以可以結論出：一、童年或幼兒時期所經驗到的愛，將對我們之後的兩性之愛，即愛的「非正規」投射，產生一輩子的影響。在我們第一次親吻心愛的男孩或女孩前，我們的「愛情地圖」早就規畫好一切。

二、根本沒有所謂的愛情化學作用，我們的大腦裡並沒有愛情的「運作模式」。愛情既沒有生物上的必要性，也不具有非凡的意義，所以我們的大腦沒有發生相應的演化。存在於腦中的各種化學作用，例如跟性欲有關的化學作用，讓人精神振奮的化學作用，跟安全感、好感、信任感有關的化學作用，在我們的腦中各自運作，彼此有如路人一般陌生。這種認知在西方文明史中就像一種心照不宣的「沉默知識」，直到市民階級興起才有了改變。一場「普遍的實驗」隆重登場，「什麼都想要」可說是浪漫主義的發明。浪漫主義將原本清楚畫分的領域，如性欲、熱情及長相廝守全混淆在一起。結果，浪漫愛情成了腦神經迴路無法解決的難題，也是現代人在生物與心理上的苛求。

性興奮和廝守意願不只是偶然擦出的火花，「浪漫愛情」也成為對伴侶基本而合理的期待。愛、戀愛和性，如今儼然一體，我們總喜歡把它們聯想在一起，彷彿浪漫愛情是常態而非特例。我們信仰愛情一如前人信仰上帝。我們夢想著駕著家庭馬車就可以通往幸福天堂，車輪也不會壓垮或弄髒閃閃發亮的天堂小徑。

然而，現實中總是事與願違。當愛情的意義是廝守與相互理解時，我們期望伴侶不要有太多變化；當對愛情的要求是精采與刺激時，我們又期望關係充滿變化，並不斷對伴侶提出新的要求。在變動不安的關係中，我們渴望穩定；在平靜無波的關係中，我們渴望刺激與變化。當然，這指的是「愛情」本身，不是伴侶。所以，愛情關係不是太激烈，就是太平淡，而我們所謂的「真愛」應該是不偏不倚、冷熱適中的。我們多麼希望那是一場小提琴、電吉他、豎琴和定音鼓的和諧演奏；我們期待在享受多巴胺的熱情澎湃時，也能感受到血清素的寧靜祥和；我們想在催產素彈奏起充滿安全感的旋律時，苯乙胺也能擊出激情狂放的鼓聲。

這就是我們的夢想。但回歸現實，我們很清楚生活不是一場夢幻音樂會。越來越多的人企圖藉由熟悉的、符合時代的方式，尋求解決之道。當「應然」與「實然」無法配合時，我們就會根據功能來拆解我們的需求，根據神經化學與心理來進行分工：我們在家扮演家庭「煮」婦（夫），想聊天、調情時就上網，要滿足性需求時找專門的性伴侶，需要慰藉和安全感時就與姊妹淘或哥兒們廝混。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行為返回浪漫主義之前的情況：性與廝守乃兩碼子事！肉體上的伴侶滿足我們的性欲；精神上的伴侶與我們心靈契合。

當今社會的富裕和有閒，助長了此種風氣。我們再也不需要長大，意思是成熟和定型。唯有無須面對殘酷環境淘汰壓力的人，無須擔憂饑荒、酷寒、戰爭和危難的人，才能負擔得起這種追求，追求浪漫愛情的人我合一，脫離繁殖的任務。

一九二〇年代，法國醫師艾米爾·德瓦（Emil Devaux）提出這樣的見解：人類之所以長期具有學習能力，是因為人類大腦很大一部分在出生後才發育完全。如果德瓦醫師的看法沒錯，我們的文化應當也是如此。德瓦醫師稱這種出生後大腦仍繼續成長，且有助於人類智能發展的現象為「幼態延續」（Neotenie）。藉此概念，我想以「文化幼態延續」來說明人類因富裕且有閒，而出現整體成熟遲緩的現象。文化幼態延續讓現代人可以一輩子不必長大，這是優勢（或是詛咒）。相較於猿猴的嬰兒，人類的嬰兒顯得特別無助。同樣的，相較於在本能引導下穩定成熟

的人類祖先，文化幼態持續的現代人也顯得特別無助。

「中年危機」的說法幾乎過時了。因為今天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根本是持續處於中年危機。最晚到二十五歲，中年危機就會發作，然後一輩子不會結束。我們很早就感覺來到「中年」，而且停留在這裡的時間變得很久。歸功於飲食、醫藥與媒體，富裕國家的青少年以極驚人的速度成長與成熟。大家都想活得長久，而且當然不願意變老。藉由體能鍛鍊、美容良方、心靈課程和飲食保健，我們企圖青春不老。我們想要永遠追求，不要到達終點。這麼做雖然有趣，但也很累。

文化幼態延續將徹底改變我們的人生規畫，原本符合浪漫理想的核心家庭，變成了過渡階段。即便建立一個穩定成功的家庭，它也不再是最終的人生目標。現代人建立家庭的時間雖然越來越晚，但因壽命延長，孩子長大離家後，父母通常還有很長的一段人生。目前西歐人民平均壽命約七十五歲，未來三、四十年，甚至可能延長至九十五歲。當孩子離家後，父母才走到人生的中間點。結果不難想像，不只男人，連女人也仍「性」致勃勃，即使沒有生育的必要了，情緒動能將會與生物動能脫鉤。

## 與愛情打交道的方式

荷蘭靈長類專家和行為學家法蘭斯·德瓦爾推測，世上大概沒有任何動物會像人類這樣承受著巨大的「內心衝突」。在浪漫主義者鼓吹伴侶要合而為一後，愛情關係中快沒有呼吸的空間了。這種人我合一的狂喜境界初被認為是稍縱即逝的狀態，甚至只是文學的虛構。到了十九世紀，浪漫愛情才真正移植到個人身上，且遮遮掩掩的落實在生活中。進入二十世紀後，愛情關係成了眾人的普遍期待。結果，今天的男女關係存在著劇烈的衝突——忠誠與不忠、個人化與回歸傳統、自我實現與家庭。諸如此類的「真理遊戲」，一兩百年前根本無法想像，因為這些要

求在過去都是不合理的。

如今的愛情關係岌岌可危，但並非不可能。艾娃·伊露茲認為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握著一手好牌，他們最有機會實踐浪漫的愛情，「因為他們擁有必要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愛情實務一般而言必須符合社會認同，在特殊情況下還必須符合工作認同。換句話說，富裕者可以毫無困難的建立自己的烏托邦意義，並在浪漫愛情中擺脫固定的價值感與認同感。」

現今的中產階級欠缺價值感與認同感，並非因為太過自私或性道德淪喪。在商品社會中，選擇機會大增，也導致不得不追求個人化，於是各種價值百花齊放。所以，現代人的無所適從不是因為價值的欠缺，而是價值的氾濫。置身於「真摯」情感與可購買商品的叢林中，置身於富裕浪漫和感動浪漫的混淆裡，我們很容易迷失。尤有甚者，沒有攜伴參加的加勒比海之旅也可以很浪漫，但沒有加勒比的伴侶關係就敬謝不敏了。

比起從前，價值不是變少，而是變多。幸福的伴侶關係是我們的渴望，沒有伴侶的幸福也可以是避風港，但沒有幸福的伴侶關係是不受歡迎的。相較於現代人的諸多要求，前人的顯得黯然失色。現代人擇偶時重視「特別」而非「可靠」。個人化的姿態能提升我們的價值，讓我們成為令人渴望的伴侶。誰會夢想毫無特色的另一半呢？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就像國王或好萊塢巨星，藉由身旁的伴侶來突顯自己的特殊性，瞧瞧我們——瞧瞧別人看我們的眼神。

情況變得弔詭，追求愛情時想要的，跟身處愛情時想要的，相去甚遠。追求愛情時希冀的是穩定與聯繫，獲得愛情後渴望的是自由與刺激。我們的腦中充斥著各種想像，真實與虛幻，不斷交替著。

負面來看，我們變得不可靠、無法捉摸；我們搞不懂自己，也搞不懂他人。史登堡的劇本已不適用，不但不吻合我們的角色，也無法長期演出。只要換了男女朋友，我們也要視情況更換角色。我們熟知各種俗套，知道自己該怎麼演，對方該怎麼演。愛情商品工業早就根據我們的心理，製造出一應俱全的浪漫產品，在電影、電視或巧克力廣告中，有

關愛情的內容隨處可見。我們自以為專屬於我們的幻想，原來不只屬於我們。

正面來看，沒有什麼事情嚇得了我們。與性有關的我們全不陌生，至少理論上如此。無論什麼兩性衝突都不會讓我們束手無策，就連我們的孩子在真正遇到狀況之前，也都準備好了，因為昨晚的連續劇已經演過了。曾經讓上幾代人大感震驚、意外或困擾的狀況，如今我們都耳熟能詳。習以為常，大幅提升了心理的適應力。初見史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宏偉，少年歌德震懾得感動落淚。要是被今天口裡嚼著口香糖、看什麼都見怪不怪的中學生撞見，肯定要笑他無聊。一九二〇年，哲學家華特·班雅明被時速四十公里的柏林電車嚇到，以為自己將喪失理智，今天他肯定適應不了飛快的摩托車。

浪漫愛情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理所當然過。沒有人會為它感到震撼，因為在愛情降臨前，我們早就對它瞭若指掌。我們熟悉所有的困境，那些浪漫主義者眼中的絕望，在我們看來沒什麼大不了。勇氣與情感的拉鋸，謹慎與威脅的抗衡，愛情遊戲的所有內容從一開始就能預見。發生在個人身上的真理遊戲，或許每次都是新的，但其模式早已是眾人皆知的。期待和對期待的期待，還是會落空，仍會因失望而心痛，但沒有事情能讓我們感到意外。到了適婚年齡，我們渴望自組核心家庭，就算願望沒有實現，我們也不會深感訝異。

當然，在伴侶關係和家庭關係中，角色畫分得越模糊，發生衝突的機率就越高。然而，我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知道對方要什麼。我們的祖父母從不會講出口的話，如今無論男女，都會要求伴侶講清楚、說明白。過去的人談情說愛主要是靠歌謠和書信，今天的夫妻則是開誠布公的談心，即使有一方，或下次是另一方，覺得這樣做很困難。

未來願景？如今我們被愛情資訊團團包圍，無論是愛情的內容或結果都知之甚詳。但我們不清楚有了這麼詳細的資訊後，得面臨怎樣的處境與後果。被摸清底細的愛情，還有樂趣嗎？還有可能單純的去愛嗎？或者，我們該對它嘲諷？現代社會已從宗教的意義中解放出來，將彼岸的希望寄託於現世、宛如置身天堂的處境，這些都需要透過人類來創

造，而人類也已看透自己的手法。富裕和有閒有利於這種創造。不過，沒有自然法則能保證永遠的富足。文化幼態延續的實驗讓人類充滿自信，但它不該毫無節制的擴張下去。當雅典的民主達到高峰，雅典哲學家為人類帶來了自我啟蒙，之後不到幾十年，雅典文化便崩潰了。

## 四方形的鱷魚

這本書一開始談的是動物，最後也以動物收尾。「關於人類他說不清楚的事，他就會舉奇怪的動物為例。」我的繼子大衛老是喜歡這麼說我。不過在這本書裡，我提到動物，大多是為了指出演化心理學家的不當類比。但接下來的例子，或許印證了我兒子所說的。在德國導演亞歷山大·克魯格一九六七年拍攝的電影《帳棚頂上的馬戲團藝人》（*Die Artisten unter der Zirkuskuppel: ratlos*）中，有個相當有趣的橋段：有個男人買了一隻鱷魚和一個水族箱。鱷魚很小，水族箱也不大。老闆警告他，鱷魚長得很快。不久，水族箱對鱷魚已經太小。但買鱷魚的男人根本沒把老闆的話放在心上。小鱷魚不斷長大，水族箱還是那麼小。有一天鱷魚塞滿了整個水族箱。為了適應環境，鱷魚最後長成了四方形。

我不知道你對這個故事有何感想，但我想到的是愛情關係。我們給了愛情一個框架，讓它在裡面成長。愛情於是逐漸開展、茁壯，變得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複雜，但框架沒有隨著調整改變。於是，許多事情跟當初設想的不一樣，情人開始互相指責。但是誰讓我們失望了？是鱷魚？還是水族箱？

當然會有人事後諸葛，說鱷魚本來就不是養在水族箱裡的動物，但也有人認為不該用水族箱來養鱷魚。其實，就連動物園根據大自然所打造、稱之為「心理境況」（Psychotopie）的環境，也不能保證鱷魚永遠快樂。沒有「框架」可以提供人類持續的穩定感和親密感，即便專為現代人量身設計的人性「心理境況」也做不到，無論是宜家家居賣場中，



擺著設計師沙發、書架、雜誌架與抽油煙機的模擬屋，還是排排站的成屋與住宅大樓、體驗餐廳與速食連鎖店的開放動物養殖區、遊樂園與都市森林、迪士尼櫥窗或度假中心，全都做不到。

我們真的知道自己要什麼嗎？知道什麼才是對自己有益的嗎？當我們噴著香水、打扮完畢，留連在五光十色夜生活的珊瑚暗礁中，穿梭在各種小丑魚、神仙魚、大斑裸胸鯨、雙髻鯊的身邊時，難道真如義大利哲學家迦林貝堤所說，我們追尋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個有能耐摧毀我們的自主性，改變我們的認同，徹底推翻其防衛機制的人」？

答案其實模稜兩可且充滿矛盾。這本書所探討的動物，就其奇特的性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言，他總是追尋全部且又互相矛盾。他既要安全感又要新奇陌生，要親密又要保持距離，要興奮又想平靜，要強烈又得溫和，要顛覆又求認同。認同之前先行顛覆，此乃哲學思維之理想。反過來或許更行得通。無論如何，我們都太高估了自己的改變意願和長期的改變能力。許多大腦專家推測：成年之後，人格還能改變的幅度頂多百分之二十。所以，迦林貝堤所談到「無條件的過渡到另一種狀態中」，無異於苛求，就像那些雖然立意良善，卻製造出心理暴力的心理治療師，他們的治療簡直在幫助病人喪失自我。

無論是相信極端生物學家堅持的「自私原則」，還是追隨心理治療師、生活哲學家（如思想警察般）所立下的利他規範，總之人類這種世上最奇特的動物，並不需要取法伯勞鳥、格鬥蛙或田鼠。即便愛情像演化心理學家認定的，是一種「取得資源」的途徑，那些資源也未必只是優秀基因、金錢和權勢。它是一種與我們整個人、整個心理有關的可能意義，唯有透過另一個人才能得到啟發。當我們走向另一個人時，當我們在心靈上將自己「奉獻」給另一個人時，我們的視野開拓了，於是可能意義取代了原本的真實意義。如何去感覺、去看、去想或生活，都充滿各種可能性。它遠遠超乎生物的「資源」。堆滿食物的糧倉當真比得上散發魅力的聰明才智、讓人神魂顛倒的音樂才華、令人為之心動的風情萬種，或是無與倫比的幽默風趣？

一旦戀愛，我們的各種可能性就會被開啟，我們的動機變得很強

烈，我們的嚮往變得很熱切，我們的渴望變得很火熱。在一起久了之後，當戀愛變成了愛，之前遠大的可能性將縮回到眼前。我們不再想化腐朽為神奇，我們只想擁抱熟悉、擁抱信賴，偶爾來點小小的精采與刺激，此生足矣，我們不再需要驚人之舉。

真實意義與可能意義密不可分且交相作用。這股動能支配了我們的人生，也摧殘、修補了我們的人生，然後再次打擊它。史賓塞的夢想，世界的本質和人類的本質終將達到完美和諧，所有元素終能和解，這根本只是幻想。真正符合人性的不是獲得永恆不變的幸福，而是懷抱獲得這種幸福的夢想。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也沒有任何經驗指出：人類祖先具有複雜化學作用的腦，曾朝向幸福的能力進行「最優化」。適應環境不需要持續的幸福，也不可能導致幸福拱肩的意外出現。相反的，生命若要創造此物，常得藉助於彼物。我們腦也是如此：任何一種強烈情感都會挑起剛好相反的情感。生命的一切似乎得透過對立面才能贏得自身的價值：沒有品嚐過孤單寂寞，怎麼懂得心靈契合的可貴？不曾忍受單調庸俗，哪知浪漫之美？沒有傷心痛苦過，怎麼了解什麼是生命的喜悅？倘若沒有死亡，哪來的永生？

如果世上沒有失敗，就不會有成功。愛情，身為人類最由衷的渴望，它展現的正是這股精髓：愛情是不可思議、獨特、脆弱且岌岌可危的。若是排除這些特質，愛情將變得無聊至極。「愛得理所當然」之所以是崇高感情，正因為它一點也不理所當然。

## 甲板上的微笑

因為它一點也不理所當然.....

老婆的手已經握在門把上了。外頭的是星期天的傍晚，金色的夕陽擁著夜色。冬日天空一抹來自極地的雲絮正要歸鄉。妻子望著我微笑，我們打算外出用餐。我即將完稿。還有什麼要說的？

對某些人來說，消費買不到愛情，溝通技巧得不到、也挽回不了愛情。愛情可以讓人痛徹心腑、肝腸寸斷，它是永遠的弔詭，永遠無法企及的嚮往：「悲傷與愛情的甜蜜。甲板上她對著我微笑。此乃人間至美。這讓人簡直想死，卻還得把持住自己，這就是愛情了吧。」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三十歲的卡夫卡在一趟南方之旅中，邂逅了年輕的瑞士女孩，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段文字。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愛情並沒有這麼難。就像我們常聽到的建言，愛情其實很簡單：多關心對方，常跟對方說愛他，吵架時不要超過底線，經常調整自己的心態，避免做籠統的攻擊，不要指責對方：「你老是……」、「你每次都……」，常為兩人世界製造小小的驚喜或冒險——喔，對了，有事沒事常送束花討老婆開心……。至於，那些在愛情中不能說的事，還是保持沉默吧！

---

註139：一九四一年生，也是創作者，與好友共組流行音樂史上重要的二重唱團體「賽門與葛芬柯」，〈寂靜之聲〉、〈惡水上的大橋〉已成經典，榮獲包括終生成就獎等共十三座葛萊美獎。

註140：一八二〇至一九〇三，也是社會學家、教育理論家與早期社會進化論者。從未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大多憑自學與獨自思考，寫出有關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教育學的重要著作。

註141：一八八五至一九七一，也是文學理論家與批評者，承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

# 參考書目

## 第一章 一筆不明就裡的遺產

愛情與生物學有何關係？

Die SPIEGEL-Titelgeschichte: *Der liebende Affe*, in DER SPIEGEL, Nr. 9, 28.2.2005. David Buss' Lehrbuch trägt den Titel: *Evolutionäre Psychologie*,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Pearson Studium 2004. Michael Ghiselin prägte den Begriff »Evolutionäre Psychologie« in: *Darwin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cience 179, 1973, S. 964–968. Darwins Buch *Die Abstammung des Menschen* (1871) ist erhältlich bei Fourier, 2. Aufl. 1992. Edward O. Wilson prägte den Begriff »Soziobiologie« i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Die Erfolgsbücher von Desmond Morris sind *Der nackte Affe*, Droemer Knaur 1968 und *Der Menschen-Zoo*, Droemer Knaur 1969. Als Prototyp für die gegenwärtige evolutionäre Psychologie steht wiederholt: William F. Allman: *Mammutjäger in der Metro. Wie das Erbe der Evolution unser Denken und Verhalten prägt*, SPEKTRUM 1999. Zu den Grenzen der Paläoanthropologie siehe einen ihrer renommiertesten Vertreter: Richard Leakey: *Die ersten Spuren. Über den Ursprung des Menschen*, C. Bertelsmann 1997. Frühe soziobiologische Betrachtungen des Menschen finden sich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bei: Herbert W. Franke: *Der Mensch stammt doch vom Affen ab. Übereinstimmungen im tierischen und menschlichen Verhalten*, Kindler 1966; Hans Hass: *Wir Menschen. Das Geheimnis unseres Verhaltens*, Molden 1968; Erich von Holst: *Zur Verhaltensphysiologie bei Tieren und Menschen*, Bd. I und II, Piper 1969; Otto Koenig: *Kultur und Verhaltensforschung. Einführung in die Kulturethologie*, DTV 1970; Wolfgang Wickler: *Sind wir Sünder? Naturgesetze der Ehe*, Droemer 1969; ders.: *Die Biologie der zehn Gebote*,

Piper 1971; ders. *Verhalten und Umwelt*, Hoffmann und Campe 1972; Irenäus Eibl-Eibesfeldt: *Der vorprogrammierte Mensch. Das Ererbte als bestimmender Faktor im menschlichen Verhalten*, DTV 1976. Angeführt werden weiterhin: Konrad Lorenz: *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 Versuch einer Naturgeschichte des menschlichen Erkennens*, Piper 1973; Julian Huxley: *Ich sehe den künftigen Menschen. Natur und neuer Humanismus*, List 1965. Das Zitat von Friedrich Engels stammt aus der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 Dietz Verlag 1962, S. 36–84. Den Begriff »reziproker Altruismus« prägte Robert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in: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S. 35–57. Frans de Waals kluge Bemerkungen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aus dem Verhalten von Menschenaffen die menschliche Natur zu erkennen, stehen in: *Der Affe in uns. Warum wir sind, wie wir sind*, Hanser 2005. Das angeführte Buch von Jerome H. Barkow, John Tooby und Leda Cosmides (Hrsg.) heißt: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2. Zur »seriellen Monogamie« als natürlichem Verhalten des Menschen siehe: Helen Fisher: *Anatomie der Liebe. Warum Paare sich finden, binden und auseinandergehen*, Droemer Knaur 1993.

## 第二章 基於經濟考量的性？

為什麼基因不是自私的？



Über die Unberechenbarkeit der Evolution: Jacques Monod: *Zufall und Notwendigkeit*, DTV, 2. Aufl, 1975. Die wichtigsten Schriften von William Hamilton sind: *The moulding of senescence by natural selection*,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2, 1966, S. 12–45; *Selfish and spiteful behaviour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 in: Nature 228, 1970, S. 1218–1220; *The geometry of the selfish herd*, 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31, 1971, S. 295–311; *Altruism and related phenomena, mainly in social insects*, in: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3, 1972, S. 193–232; *Sex versus non-sex versus parasite*, in: Oikos 35, 1980: 282–290; *Narrow Roads in Gene Land*, Bd.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Narrow Roads in Gene Land*, Bd.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Von Richard Dawkins Werken seien angeführt: *Das egoistische Gen* (1976), Spektrum 2007; *Der blinde Uhrmacher: warum die Erkenntnisse der Evolutionstheorie beweisen, dass das Universum nicht durch Design entstanden ist* (1986), DTV 2008; *Und es entsprang ein*



*Fluß in Eden* (1995), Goldmann 2000; *Gipfel des Unwahrscheinlichen. Wunder der Evolution* (1996), Rowohlt 2008; *Der entzauberte Regenbogen* (1998), Rowohlt 2008; *Geschichten vom Ursprung des Lebens* (2004), Ullstein 2008, *Der Gotteswahn* (2006), Ullstein 2007. Gegen die Theorie des egoistischen Gens argumentieren die Bücher von Richard Lewontin: *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Menschen. Genetische, kulturelle und soziale Gemeinsamkeiten* (1982), Spektrum 1986; (mit Steven Rose und Leon J. Kamin) *Die Gene sind es nicht ... Biologie, Ideologie und menschliche Natur* (1984), Beltz 1999; (mit Richard Levins)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Harper 1993; *Die Dreifachhelix: Gen, Organismus und Umfeld* (2000), Springer 2002. Von den zahlreichen Werken von Stephen Jay Gould seien genannt: *Der Daumen des Panda. Betrachtungen zur Naturgeschichte* (1980), Suhrkamp 1989; (mit Elisabeth Vrba) *Exaptation. A missing Term in the Science of Form*, in: *Paleobiology*, 8, Nr. 1; S. 4–15; *Wie das Zebra zu seinen Streifen kommt* (1983), 2. Aufl. Suhrkamp 2008; *Das Lächeln des Flamingos. Betrachtungen zur Naturgeschichte* (1985), 2. Aufl. 2009; *Bravo, Brontosaurus. Die verschlungenen Wege der Naturgeschichte* (1991), Hoffmann und Campe 1994; *Ein Dinosaurier im Heuhaufen. Streifzüge durch die Naturgeschichte* (1995), Fischer 2002; *Illusion Fortschritt. Die vielfältigen Wege der Evolution* (1996), 2. Aufl. Fischer 2004; *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rwins Hauptwerk ist erhältlich als: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ten durch natürliche Zuchtwahl* (1859),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2. Das Zitat von Karl Marx über Darwin ist zitiert nach: Adrian Desmond und James Moore: *Darwin*, List 2. Aufl. 1995; Zu Robert Trivers' Bio-Ökonomie siehe: *Social Evolution*, Benjamin/Cummings 1985; *Natural Selection and Social Theory: Selected Papers of Robert Trivers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mit Austin Burt): *Genes in Conflict: The Biology of Selfish Genetic Ele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第三章 勢利的伯勞，不動如山的蛙

男人與女人想要什麼？

Über das tatsächliche Brutverhalten des Grauen Würgers berichten Piotr Tryjanowski und Martin Hromada: *Breeding biology of the Great Grey Shrike Lanius excubitor in W Poland*, in: Acta Ornithologica. 39, 2004,

S. 9–14; dies.: *Research activity induces change in nest position of the Great Grey Shrike Lanius excubitor*, in: *Ornis Fennica* 82, 2005, S. 20–25; dies.: *More secluded places for extra-pair copulations in the Great Grey Shrike Lanius excubitor*, in: *Behaviour* 144, 2007, S. 23–31. Der wichtigste Vertreter der Adaptionstheorie, wonach alles in der Natur seinen Zweck haben soll, ist George C. Williams: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Siehe auch ders.: *Sex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ders.: *Natural Selection: Domains, Levels, and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ders. und Randolph M. Nesse: *Warum wir krank werden* (1995), C.H. Beck 1997; *Das Schimmern des Ponyfisches. Plan und Zweck in der Natur* (1997), Spektrum 2001. Weitere Hauptwerke der evolutionären Psychologie neben den in den Kapiteln zuvor schon genannten sind: Steven Pinker: *Wie das Denken im Kopf entsteht* (1999), Kindler 2002; ders.: *Das unbeschriebene Blatt. Die moderne Leugnung der menschlichen Natur* (2002), Berlin Verlag 2003; Susan Pinker: *The Sexual Paradox: Men, Women and the Real Gender Gap*, Scribner 2008. Eine einfache Erklärung der Liebe auf der Grundlage von evolutionärer Psychologie und Biochemie versucht Bas Kast: *Die Liebe und wie sich Leidenschaft erklärt*, Fischer 2006. Zur Kritik an der evolutionären Psychologie siehe dagegen Philipp Kitcher: *Vaulting Ambition: Sociobiolog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Gerald Hüther: *Die Evolution der Liebe. Was Darwin bereits ahnte und die Darwinisten nicht wahrhaben wollen* (1999), 4. Aufl. 2007; John Dupré: *Darwins Vermächtnis. Die Bedeutung der Evolution für die Gegenwart des Menschen* (2003), Suhrkamp 2005; David J. Buller: *Adapting Mind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Persistent Quest for Human Nature*, MIT Press 2005; An den »Krieg der Spermien« glaubt Robin Baker: *Krieg der Spermien. Weshalb wir lieben und leiden, uns verbinden, trennen und betrügen* (1996), Limes 1997; ders.: *Sex im 21. Jahrhundert. Der Urtrieb und die moderne Technik* (1999), Limes 2000. Eine Zoologie der menschlichen Sexualität entwirft Jared Diamond: *Warum macht Sex Spaß? Die Evolution der menschlichen Sexualität* (1997), C. Bertelsmann 1998. Die Ergebnisse von David Buss' Studie finden sich in: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mate preferences: Evolutionary hypothesis testing in 37 cultures*, 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 1989, S. 1–49. Ausführlich dargestellt auch in ders.: *Die Evolution des Begehrens. Geheimnisse der Partnerwahl* (1994), 2. Aufl. Goldmann 2000. Zur Ego-Theorie des Mannes: Ben Greenstein: *The Fragile Male, The Decline of a Redundant Species*,



Boxtree 1993. Victor Johnstons Theorie von der Attraktivität der Testosteron-Gesichter findet sich das erste Mal in: ders. und andere: *Male facial attractiveness: evidence for hormone-mediated adaptive design*, i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22, 2001, S. 417–429. Die zitierte Studie in: ders. und Pamela S. Scarbroug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men's facial preferences as a function of digit ratio and mental rotation ability*, i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26, 2005, S. 509–526. Die Gegenthese von der höheren Attraktivität starker androgyner Gesichter formulieren Lynda Boothroyd und David Perett: *Partner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masculinity, health and maturity in male faces*, i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3, 2007, S. 1161–1173. Die Symmetrie-Thesen von Randy Thornhill finden sich in: ders. *The allure of symmetry*. *Natural History* 102, 1993, S.30–37; ders.: und S. Gangestad: *Human facial beauty: Averageness, symmetry and parasite resistance*, in: *Human Nature* 4, 1993, S. 237–269; ders. und K. Grammer: *Human (Homo sapiens)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sexual selection: The role of symmetry and averageness*,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08, 1994, S. 233–242; dies.: *Facial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and fluctuating asymmetry*, in: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5, 1994, S.73–85; ders. und P. Watson: *Fluctuating asymmetry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9, 1994, S. 21–24. Zitiert wird aus dem SPIEGEL 17, vom 21.4.2008 die Titelgeschichte: *Wie ticken die Deutschen? Warum wir so sind, wie wir sind*. Das Zitat von Wladimir Solowjew stammt aus Kai Buchholz (Hrsg.): *Liebe. Ein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Goldmann 2007.

## 第四章 我看見的，你看不見

男女的想法真的大不同嗎？

Von den Büchern der Unterhaltungs-Psychologen Allan und Barbara Pease seien erwähnt: *Warum Männer nicht zuhören und Frauen schlecht einparken. Ganz natürliche Erklärungen für eigentlich unerklärliche Schwächen* (1998), Ullstein, 33. Aufl. 2007; dies.: *Warum Männer lügen und Frauen immer Schuhe kaufen. Ganz natürliche Erklärungen für eigentlich unerklärliche Beziehungen* (2002), Ullstein 2004. Aus den gesammelten Werken von John Gray sei genannt: *Männer sind anders. Frauen auch. Männer sind vom Mars. Frauen von der Venus* (1992), Goldmann, 38. Aufl. 2008) Den Mythos von der eindeutigen und das Verhalten festlegenden neurologischen Geschlechterdifferenz enttarnt der Sammelband

von Claudia Quaiser-Pohl und Kirsten Jordan: *Warum Frauen glauben, sie könnten nicht einparken – und Männer ihnen Recht geben. Über Schwächen, die gar keine sind*, DTV 2007. Zur Kultur der Mbuti und der San, siehe Mark S. Mosko: *The Symbols of »Forest«: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Mbuti Cul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Bd. 89, Nr. 4, 1987, S. 896–913; Richard B. Lee: *The Kung San: Men, Women and Work in a Foraging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John Marshall und Claire Ritchie: *Where Are the Ju / Wasii of Nyae Nyae? Changes in a Bushman Society 1958–1981*, *Survival* 1984. Ein frühes Werk über den vermeintlichen Gehirnnunterschied von Frauen und Männern ist: Anne Moir und David Jessel: *Brainsex. Der wahre Unterschied zwischen Mann und Frau* (1989), Econ 1990. Noch früher war der Sammelband der Herausgeber Michele Andrisin Wittig und Anne Petersen (Hrsg): *Sex related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ing*, Academic Press 1979. Die Schädelmessungen von Paul Broca finden sich in seinen *Memoires d'Anthropologie*, 1. Bd (von 3), Reinwald 1871. Über den vermeintlich riesigen Gehirnnunterschied bei Frauen und Männern schreibt Louann Brizendine: *Das weibliche Gehirn. Warum Frauen anders sind als Männer* (2006), 3. Aufl. Hoffmann und Campe 2007. Die hoch zweifelhafte Studie über den Balken zwischen rechter und linker Gehirnhälfte stammt von Christine De-Lacoste-Utamsing und Ralph L. Holloway: *Sexual dimorphism in the human corpus callosum*, in: *Science* 216, 1982, S. 1431–1432. Die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von Robert Bennett Bean findet sich in: *Some racial peculiarities of the Negro brai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 5, 1906, S. 353–432. Das zitierte Werk von Simon Baron-Cohen ist: *Vom ersten Tag an anders. Das weibliche und das männliche Gehirn* (2003), Heyne 2006. 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hohem Testosteronspiegel und guter räumlicher Vorstellung bei Männern beschreibt Doreen Kimura in: *Sex and Cognition*, MIT Press 1999. Über das komplizierte Verhältnis von Testosteron, Rangfolge und Hierarcheverhalten bei Affen und Menschenaffen, siehe [http://www.gender.org.uk/about/06encrn/63\\_aggrs.htm](http://www.gender.org.uk/about/06encrn/63_aggrs.htm).

## 第五章 性別與性格

我們的第二天性



Otto Weiningers Buch ist verfügbar als: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Sonderausgabe: Eine prinzipielle Untersuchung* (1903), Matthes & Seitz 1997. Über Otto Weiniger siehe: Jacques LeRider und Heimito von Do-

derer: *Der Fall Otto Weininger: Wurzeln des Antifeminismus und des Antisemitismus*, Neuaufl. Löcker 1985; Jörg Zittlau: *Vernunft und Verlockung: Otto Weiningers erotischer Nihilismus*, Zenon 1990; Chandak Sengoopta: *Otto Weininger: Sex, Science, and Self in Imperial Vien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John W. Money prägte den Begriff »Gender« in: ders. und Hampson und Hampson: *Hermaphroditism, gender and precocity in hyperadrenocorticism: Psychologic Findings*, in: *Bulletin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96, 1955, S. 253–264. Simone de Beauvoirs Klassiker ist erhältlich als: *Das andere Geschlecht: Sitte und Sexus der Frau* (1949), Rowohlt 2005. Das angeführte Buch von Judith Butler ist: *Das Unbehagen der Geschlechter* (1990) Suhrkamp 1991; vgl. auch dies.: *Körper von Gewicht. Die diskursiven Grenzen des Geschlechts* (1993), Suhrkamp 1997. Zur Gender-Problematik siehe weiterhin: Ursula Pasero und Christine Weinbach (Hrsg.): *Frauen, Männer, Gender Trouble. Systemtheoretische Essays*. Suhrkamp 2003; Claudia Koppert und Beate Selders (Hrsg.): *Hand aufs dekonstruierte Herz. Verständigungsversuche in Zeiten der politisch-theoretischen Selbstabschaffung von Frauen*, Ulrike Helmer 2003. Marlis Hellinger und Hadumod Bußmann (Hrsg.): *Gender Across Languages,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men*, Benjamins 2003; Hadumod Bußmann und Renate Hof (Hrsg.): *Genus – Geschlechterforschung/Gender Studies in den Kultur-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Kröner 2005; Margret Meads Samoa-Buch ist erhältlich als: *Jugend und Sexualität in primitiven Gesellschaften, I. Kindheit und Jugend in Samoa*, DTV 1987. Ihr Hauptwerk erschien als: *Mann und Weib. Das Verhältnis der Geschlechter in einer sich wandelnden Welt*, Ullstein 1992. Das Zitat stammt aus: Anne Roel George Galord Simpson (Hrsg.): *Behavior and 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Derek Freemans Gegendarstellung erfolgte in: *Liebe ohne Aggression. Margaret Meads Legende von der Friedfertigkeit der Naturvölker*, Kindler 1983. Siehe auch ders.: *The Fateful Hoaxing of Margaret Mead.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her Samoan Research*. Westview Press 1998.

## 第六章 達爾文的疑慮

是什麼將愛與性分開？

Zum Missverhältnis von sexueller Rolle und Brutpflegeaufwand bei Seepferdchen siehe: A.B. Wilson, A. Vincent, I. Ahnesjö, A. Meyer: *Male pregnancy in seahorses and pipefishes (Family Syngnathidae): Ra-*



*pid diversification of paternal brood pouch morphology inferred from a molecular phylogeny*, in: *Journal of Heredity* 92, 2001, S. 159–166; dies.: *The dynamic of male brooding, mating patterns and sex-roles in pipefishs and seahorses (Family Syngnathidae)*, in: *Evolution* 57, 2003, S.1374–1386. Das Zitat von Axel Meyer stammt aus: *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 12, 2003, Seite 78. Zur »Tangled-Bank«-Hypothese siehe Robert Trivers: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 Campbell (Hrsg.):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1871–1971, Aldine, S. 136–179 sowie George C. Williams: *Sex and Evolution* 197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ur »Red-Queen«-Hypothese siehe William Hamilton: *Extraordinary sex ratios*, in: *Science* 156, 1967, S. 477–488 sowie Leigh Van Valen: *A new evolutionary law*, in: *Evolutionary Theory* 1, 1973: 1–30. Einen Überblick dazu verschafft Richard E. Michod: *Eros and evolution: a natural philosophy of sex*, Addison-Wesley Publishers, 1995. Das Zitat von Arthur Schopenhauer stammt aus ders.: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zitiert nach: Kai Buchholz: *Die Liebe. Ein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Goldmann 2007. Die zitierte Darwin-Biografie ist Adrian Desmond und James Moore (1991): *Darwin*, List 1995. Das Zitat von Adam Smith findet sich in ders.: *Theorie der ethischen Gefühle* (1759), Meiner 2004. Die Eigennutz-Theorie von Michael T. Ghiselin findet sich in ders.: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Die Geschichte von Flo und Flint steht in: Jane Goodall: *Ein Herz für Schimpansen. Meine 30 Jahre am Gombe-Strom* (1990), Rowohlt 1991, auf den Seiten 220–235. Die Kritik an Ghiselins Eigennutztheorie von Christine Korsgaard findet sich in: Frans de Waal: *Primaten und Philosophen* (2006), Hanser 2008, hier S. 116–138. Der Ursprung der Paarbeziehung in der Savanne ist bereits das Thema von Helen Fishers erstem Buch: *The Sex Contrac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ur*, Morrow and Company 1982. Ausführlicher und erweitert vorgestellt ist es in dies.: *Anatomie der Liebe. Warum Paare sich finden, binden und auseinandergehen* (1990), Droemer Knauer 1993. Dass die Liebe nicht aus der Sexualität entspringt, meint Irenäus Eibl-Eibesfeldt: *Liebe und Hass. Zur Naturgeschichte elementarer Verhaltensweisen*, Piper 1970. Von den zahlreichen Büchern des Therapeuten Michael Mary, der der evolutionären Psychologie kritisch gegenübersteht, seien genannt: ders.: *5 Lügen die Liebe betreffend*, Bastei Lübbe 2001; *Und sie verstehen sich doch. 10 neue Lügen die Liebe betreffend*, Bastei Lübbe 2006. Stuart Shankers Überlegungen zum frühkindlichen Lernen finden sich in ders. und Stanley I. Greenspan: *Der erste Gedanke:*

*Frühkindliche Kommunikation und die Evolution menschlichen Denkens* (2006), Beltz 2007. Richard Lewontin und Stephen Jay Gould führten das aus der Architektur stammende Wort »spandrel« (Spandrille) in den evolutionären Kontext ein, in: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 1979, 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d. 205 1979, S. 581–598.

## 第七章 一個複雜的觀念

為什麼愛情不是情緒？

Von Helen Fishers Versuchen, die Liebe im Kernspintomografen sichtbar zu machen, handelt ihr Buch: *Warum wir lieben. Die Chemie der Leidenschaft*, Patmos 2005; siehe auch dies.: *Lust, Anziehung und Verbundenheit. Biologie und Evolution der menschlichen Liebe*, in: Heinrich Meier und Gerhard Neumann (Hrsg.): *Über die Liebe. Ein Symposium*, Piper 2001. Von den neueren Büchern zur »Liebes-Chemie« seien genannt: Theresa L. Crenshaw: *Die Alchemie von Liebe und Lust. Hormone steuern unser Liebesleben*, DTV 2003; Gabriele und Rolf Froböse: *Lust und Liebe – alles nur Chemie?*, Wiley-VCH 2004; Marco Rauland: *Feuerwerk der Hormone. Warum Liebe blind macht und Schmerzen weh tun müssen*, Hirzel 2007; *Liebe, Licht und Lippenstift: »Das Beste von John Emsley«*, Wiley-VCH 2007; Klaus Oberbeil: *Das Geheimnis der erotischen Intelligenz: Wie Hormone und Biostoffe Gefühle wecken und Beziehungen festigen*, Herbig 2007. Die Bedeutung des Oxytocin bei Präriewühlmäusen untersuchten Larry Young, Zuoxin Wang, Thomas R. Insel: *Neuroendocrine bases of monogamy*, in: *Trends in Neuroscience*, 21, 1998 S. 71–75; Larry Young, Roger Nilsen, Katrina G. Waymire, Grant R. MacGregor und Thomas R. Insel: *Increased affiliative response to vasopressin in mice expressing the V1a receptor from a monogamous vole*, in: *Nature* 400 (19), S.766–76, 1999; Larry Young, M.M. Lim, B.Gingrich: *Cellular mechanisms of social attachment*, in: *Hormones and Behavior*, 40, 2001, S. 133–138; Larry Young und Zuoxin Wang: *The neurobiology of pair bonding*, in: *Nature Neuroscience* 7, 2004, S.1048–1054. Zur Kritik daran siehe Sabine Fink, Laurent Excoffier und Gerald Heckel: *Mammalian monogamy is not controlled by a single gene*,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r.7, 2006; Gene E. Robinson, Russell D. Fernald, David F. Clayton: *Genes and social behavior*, in: *Science* 7, (322), 2008, S. 896–900. Die Geschichte von Marshall Rosenberg stammt aus ders.: *Gewaltfreie Kommunikation. Eine Sprache des*



*Lebens*, Junfermann, 6. Aufl. 2007. Zur Theorie von Emotionen und Gefühlen siehe: William Lyons: *Emo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nald de Sousa: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MIT Press, 1987; Paul Griffiths: *What Emotions Really Ar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Antonio Damasio: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99; ders.: *Descartes' Irrtum. Fühlen, Denken und das menschliche Gehirn*. List 1994; ders.: *Der Spinoza-Effekt. Wie Gefühle unser Leben bestimmen*, List 2003; Achim Stephan und Henrik Walter (Hrsg.): *Natur und Theorie der Emotion*, Mentis-Verlag 2003; Martin Hartmann: *Gefühle. Wie die Wissenschaften sie erklären*. Campus 2005; Heiner Hastedt: *Gefühle.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Reclam 2005. Das Hauptwerk von William James ist: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0. Gilbert Ryles Hauptwerk ist erhältlich als *Der Begriff des Geistes*, Reclam 1986.

## 第八章 間腦與我

想愛就能愛？



Arnold Gehlen definierte den Menschen als »Kulturwesen« in: ders.: *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Junker und Dünhaupt 1940. Der zitierte Essay von Jean-Paul Sartre zur »Transzendenz des Ego« und die »Skizze einer Theorie der Emotionen« finden sich in ders.: *Die Transzendenz des Ego. Philosophische Essays 1931–1939*, Rowohlt 1997. Das Zitat von Fritz Riemann stammt aus ders.: *Die Fähigkeit zu lieben*, Reinhardt, 8. Aufl. 2008. Das Gedicht von Ernst Jandl ist enthalten in: Klaus Siblewski (Hrsg.): *Ernst Jandl. Poetische Werke*, Bd.8, Luchterhand 1997. Giacomo Rizzolattis Forschungen zu den »Spiegelneuronen« werden bilanziert in: ders. und Corrado Sinigaglia: *Empathie und Spiegelneurone: Die biologische Basis des Mitgefühls*, Suhrkamp 2008. John Money prägte den Begriff der »Liebeskarte« (lovemap) in ders.: *Love and Love Sickness: the Science of Sex, Gender Difference and Pair-Bondi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siehe auch ders.: *Lovemaps: Clinical Concepts of Sexual/Erotic Health and Pathology, Paraphilia, and Gender Transposition in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Maturity*, Irvington 1986; ders.: *Vandalized Lovemaps: Paraphilic Outcome of 7 Cases in Pediatric Sexology*. Prometheus Books 1989; ders.: *The Lovemap Guidebook: A Definitive Statement*, Continuum 1999. Zum Konzept der Liebeskarten siehe weiterhin Ayala Malakh Pines: *Falling in Love: Why We*

*Choose the Lovers we Choose*, Taylor & Francis 2005. Das Brückensexperiment von Arthur Aron und Donald Dutton wurde beschrieben in ders.: *Some evidence for heightened sexual attra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1974, S. 510–517. Stanley Schachters Emotionstheorie wurde das erste Mal vorgestellt in ders. und Jerome Singer: *Cognitive,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69, 1962, S. 379–399. Siehe auch ders.: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in: Leonard Berkowitz (Hrsg.):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S. 49–79. Das Zitat von William Goldman stammt aus ders.: *Die Brautprinzessin*, Klett-Cotta, 3. Aufl. 2004. Max Horkheimer ist zitiert nach Kai Buchholz (Hrsg.): *Liebe. Ein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Goldmann 2007.

## 第九章 經營命運

愛情是一種藝術嗎？

Erich Fromms Klassiker ist erhältlich als ders.: *Die Kunst des Liebens*, 66. Aufl. Ullstein 2007. Zu Fromms Biografie siehe Rainer Funk: *Erich Fromm*, Rowohlt 1980; Helmut Wehr: *Erich Fromm. Eine Einführung*, Junius 1990. Jean-Jacques Rousseaus Klassiker ist: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ie Grundlagen der Ungleichheit unter den Menschen* (1755), Reclam 1998. Adornos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liegen vor als: ders. *Minima Moralia*, Suhrkamp 2004. Das angeführte Buch von Peter Lauster: *Die Liebe. Psychologie eines Phänomens*, Rowohlt 1982. Ein englischsprachiges Werk zur »unconditional love« ist: Greg Baer: *Real Love: The Truth about Finding Unconditional Love and Fulfilling Relationships*, Gotham Books 2004. Die genannten Liebesratgeber sind: John Mordechai Gottman: *Die 7 Geheimnisse der glücklichen Ehe*, Ullstein 2002; Gary Chapman: *Die fünf Sprachen der Liebe. Wie Kommunikation in der Ehe gelingt*, Francke 2003; Hans Jellouscheck: *Wie Partnerschaft gelingt – Spielregeln der Liebe: Beziehungskrisen sind Entwicklungschancen*, Herder 2005; Ariel Kane und Shya Kane: *Das Geheimnis wundervoller Beziehungen: Durch unmittelbare Transformation*, Winpferd 2005. David Schnarchs Werk über die Kunst der Selbstliebe als Voraussetzung der Liebeskunst ist ders.: *Die Psychologie sexueller Leidenschaft* (1997), 6. Aufl. 2008; siehe auch ders.: *Die leidenschaftliche Ehe. Die Rolle der Liebe in der Paartherapie*, in: Jürg Willi und Bernhard Limacher (Hrsg.): *Wenn die Liebe*

*schwindet.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Paartherapie*, Klett-Cotta, 2. Aufl. 2007.

## 第十章 再平凡不過的不可思議

愛情與「期待」有何關係？



Michel Foucaults Werk über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liegt vor als ders.: *Der Wille zum Wissen*, Suhrkamp 1983; *Der Gebrauch der Lüste*, Suhrkamp 1989; *Die Sorge um sich*, Suhrkamp 1989. Eine vorzügliche Foucault-Biografie ist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1989), Suhrkamp 1991. Denis de Rougemonts Klassiker wurde zuletzt aufgelegt als ders.: *Die Liebe und das Abendland*, edition epoché 2007. Joachim Bumkes Grundlagenwerk zur Litera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ist ders.: *Höfische Kultur. Literatur und Gesellschaft im hohen Mittelalter*, 2 Bde., DTV 1986. Norbert Elias klassische Studie über die Entwicklung unserer Kultur ist der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2 Bde., Suhrkamp 19. Aufl. 1995. Das mehrfach zitierte Buch von Umberto Galimberti ist ders.: *Die Sache mit der Liebe. Eine philosophische Gebrauchsanweisung* (2004), Beck 2007. Günter Dux' Geschichte vom romantischen Liebes-Subjekt findet sich in ders.: *Geschlecht und Gesellschaft. Warum wir lieben. Die romantische Liebe nach dem Verlust der Welt*, Suhrkamp 1994. Zum romantischen Selbst- und Weltverständnis siehe weiterhin Rudolf zur Lippe: *Bürgerliche Subjektivität: Autonomie und Selbstzerstörung*, Suhrkamp 1975; Karl Heinz Bohrer: *Der romantische Brief. Die Entstehung ästhetischer Subjektivität*, Suhrkamp 1989; ders.: *Die Kritik der Romantik*, Suhrkamp 1989. Das Zitat von Shelley findet sich in H. Höhne (Hrsg.): *Percy Bysshe Shelley. Ausgewählte Werke. Dichtung und Prosa*, Insel 1985. Zur Psychoanalyse der Liebe siehe Martin. S. Bergmann: *Eine Geschichte der Liebe. Vom Umgang des Menschen mit einem rätselhaften Gefühl*, Fischer 1999; Kurt Höhfeld und Annemarie Schlösser: *Psychoanalyse der Liebe*, Psychosozial-Verlag 3. Aufl. 2001; Sebastian Krutzenbichler und Hans Essers: *Muss denn Liebe Sünde sein? Zur Psychoanalyse der Übertragungs- und Gegenübertragungsliebe*, Psychosozial-Verlag 2006. Die Studie von William Jankowiak und Edward Fisher wird bilanziert und ausgewertet in dies.: *Romantic passion: A universal exper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klas Luhmanns Werk über die Liebe ist ders.: *Liebe als Passion*. Zur Codierung von Intimität, 5. Aufl. 1999; siehe auch die unlängst erschienene Vorstudie: *Liebe. Eine Übung*, Suhrkamp 2008.

## 第十一章 愛上愛情？

為什麼越是尋覓愛情，越是遍尋不著？

Das Buch von Harry Frankfurt ist ders.: *Gründe der Liebe*, Suhrkamp 2005. Den Begriff »Rückbindung« prägt Karl Otto Hondrich in ders.: *Liebe in den Zeiten der Weltgesellschaft*, Suhrkamp 2004. Rückbindungseffekte und Vertragsstrategien in Partnerschaften untersucht Jean-Claude Kaufmann: *Schmutzige Wäsche: Ein ungewöhnlicher Blick auf gewöhnliche Paarbeziehungen*, Uvk 2005; siehe auch ders.: *Was sich liebt, das nervt sich*, Uvk 2008. Zu den neuen Singles siehe Sasha Cagen: *Quirkyalone: A Manifesto for Uncompromising Romantics*, HarperSanFrancisco 2004. Eines der besten Bücher zur Bestandsaufnahme der Liebe in der Gegenwart ist: Christan Schuldt: *Der Code des Herzens. Liebe und Sex in den Zeiten maximaler Möglichkeiten*, Eichborn 2004. Die Studien des Einsamkeitsforschers Robert Weiss finden sich in ders.: *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MIT Press 1975. Zu Liebe und Einsamkeit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aus psychoanalytischer Sicht siehe: Paul Verhaeghe: *Liebe in Zeiten der Einsamkeit*, Turia & Kant 2003. Das erwähnte Buch von Ulrich Beck u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Neuauflage Suhrkamp 2005. Zur Individualisierung siehe auch Anthony Giddens: *Wandel der Intimität. Sexualität, Liebe und Erotik in modernen Gesellschaften*, S. Fischer 1993; Bernhard Schulze: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Campus 2. Aufl. 2005; Norbert Bolz: *Das konsumistische Manifest*, Fink 2002. Das Zitat von Wolfgang Iser stammt aus Hans Mayer/Uwe Johnson (Hrsg.): *Das Werk Samuel Becketts*. Ein Symposium, Suhrkamp 1975.

## 第十二章 購買愛情

浪漫作為一種消費

Ortega y Gasset wird zitiert aus ders. *Der Aufstand der Massen*, Rowohlt 1956. Mit der Unterwanderung der romantischen Liebe durch die Wirtschaft beschäftigt sich in ideologiekritischer Perspektive Eva Illouz: *Der Konsum der Romantik. Liebe und die kulturellen Widersprüche des Kapitalismus*, Suhrkamp 2007. Vgl. auch dies.: *Gefühle in Zeiten des Kapitalismus*, Suhrkamp 2007. Eine historische Übersicht über die Moral und Kommerzialisierung der Liebe in den USA bietet Steven Seid-



man: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Routledge 1991. Die Formulierung »happiness of pursuit« entstammt Albert Otto Hirschman: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tten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 Aufl. 2002. Das Konzept der Liebesdrehbücher findet sich in Robert. J. Sternberg: *Love is a Story. A New Theory of Relationshi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ehe auch ders.: *The Psychology of Lo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New Psychology of Lo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Über die Spielarten heutiger Sexualität klärt auf Volkmar Sigusch: *Neosexualitäten: Über den kulturellen Wandel von Liebe und Perversion*; Campus Verlag 2005; ders.: *Sexuelle Welten: Zwischenrufe eines Sexualforschers*, Psychosozial-Verlag 2005. Zum Thema siehe auch Gunter Schmidt: *Sexuelle Verhältnisse. Über das Verschwinden der Sexualmoral*. Rowohlt 1998; ders. *Das neue Der Die Das. Über die Modernisierung des Sexuellen*. Psychosozial-Verlag 2004; ders.: und Silja Matthiesen, Arne Dekker, Kurt Starke: *Spätmoderne Beziehungswelten. Report über Partnerschaft und Sexualität in drei Generation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Über die Entwicklung neuer Lustmittel schreibt Christiane Löll: *Die Lust im Kopf*, in: DIE ZEIT Nr. 3/2002. Der zitierte Artikel »Corpus absconditus« von Dietmar Kamper (2001) findet sich unter [www.heise.de/tp](http://www.heise.de/tp) im Internet. Über die Liebe in unserer Zeit und insbesondere auch im Internet siehe Christian Schuldt: *Der Code des Herzens. Liebe und Sex in den Zeiten maximaler Möglichkeiten*, Eichborn 2004. Der Digital Life Report von TNS Infratest findet sich unter [www.tns-infratest.com](http://www.tns-infratest.com); die Umfrage von KissNoFrog unter [www.kissnofrog.com](http://www.kissnofrog.com).

### 第十三章 甜蜜的家庭

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Gunter Schmidts Zahlen stammen aus: ders. (Hrsg.): *Sexualität und Spätmoderne*, Psychosozial-Verlag 2002. Zum Zusammenhang zwischen Sexualmoral, Partnerschaft und Familie siehe auch ders. *Sexuelle Verhältnisse. Über das Verschwinden der Sexualmoral*, Rowohlt 1998; *Das neue Der Die Das. Über die Modernisierung des Sexuellen*, Psychosozial-Verlag 2004; ders. (mit Silja Matthiesen, Arne Dekker, Kurt Starke): *Spätmoderne Beziehungswelten. Report über Partnerschaft und Sexualität in drei Generation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Zur Geschichte der Familie siehe Jack Goody: *Geschichte der Familie*. C. H. Beck 2002. A. Burguière, C. Klapisch-Zuber, M. Segalen, F. Zonabend

(Hrsg.): *Geschichte der Familie*. 4 Bände, Campus Verlag 1997. Christian und Nina von Zimmermann (Hrsg.): *Familiengeschichten. Biographie und familiärer Kontext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Campus Verlag 2008. Seine Ansicht über die Familie findet sich in Friedrich Engels: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n: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and 21, Dietz Verlag 1962, S. 36–84. Zur Soziologie der modernen Familie siehe Paul B. Hill, Johannes Kopp: *Familiensoziologie. Grundlagen und theoretische Perspektiv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5; Robert Hettlage: *Familienreport – Eine Lebensform im Umbruch*. C. H. Beck 1998; Rüdiger Peuckert: *Familienformen im sozialen Wandel*.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4; Birgit Kohlhasse: *Familie macht Sinn*. Urachhaus 2004. Van der Velde's Werke erschienen als: *Die vollkommene Ehe. Eine Studie über ihre Physiologie und Technik*, Montana-Verlag 1926; *Die Abneigung in der Ehe. Eine Studie über ihre Entstehung und Bekämpfung*, Benno Konegen Verlag 1928; *Die Erotik in der Ehe. Ihre ausschlaggebende Bedeutung*, Benno Konegen Verlag 1928; *Die Fruchtbarkeit in der Ehe und ihre wunschgemäße Beeinflussung*, Montana-Verlag 1929; *Die vollwertige Gattin*, Carl Reissner-Verlag 1933. Der FOCUS-Titel lautet: *Die Muttierung. Wenn aus Frauen Mütter werden und wie Männer darunter leiden*, in: FOCUS, 21, 17.5.2005. Die Studien zur Glückseinschätzung von Daniel Kahneman und Alan Krueger finden sich in: dies.: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in: *Science* 306, S. 1776–1780, 2004;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Nr. 1, S. 3–24, 2006.



## 第十四章 真實意義與可能意義

為什麼愛情對我們依然如此重要？

Herbert Spencers *System der Synthetischen Philosophie* erschien 1875–1895 auf Deutsch in der Schweizerbart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11 Bände). Zitiert wird aus den *Principien der Soziologie*, Bd. I. (1877). Das Zitat von Georg Lukács steht in: *Die Seele und die Formen*, zitiert nach Kai Buchholz (hrsg.): *Liebe. Ein philosophisches Lesebuch*, Goldmann 2007. Das Zitat von Franz Kafka findet sich in: ders.: *Tagebücher 1910–1923*, Neuausgabe Fischer 1997.

# 專有名詞對照

Androstenone 雄甾烯酮（或男性酯酮）

Annie Hall 《安妮霍爾》

Antrieb 驅動力

Apparat 機器

Ars amatoria 《愛的藝術》

attribution error 歸因錯誤

Australopithecus afrarensis 阿法南方古猿（又譯非洲南方古猿）

Bantus 班圖人

Behaviorism 行為主義

Bell Laboratories 貝爾實驗室

Beschädigungstheorie 受害理論

Beuteschema 獵物圖式

bewusstes Denken 意識性思考

Bindungshormone 聯結荷爾蒙（或關係激素）

biologische Identität 生物性認同

Bonobo 倭黑猩猩

Borat 《芭樂特：哈薩克青年必修（理）美國文化》

Bourgeonal 叔丁基苯丙醛（或二甲基乙基苯丙醛）

Brain Sex :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woman 《腦內乾坤：男女有別，其來有自》

Bushmen 布須曼人

Capilano Canyon Suspension Bridge 卡皮蘭諾吊橋

category mistakes 範疇錯誤

central Sulcus 中央溝

chameleon effect 變色龍效應

Chance and Necessity 《機會與需求》

Chimpanzee 黑猩猩

cingulate cortex 扣帶腦皮質

Code 符碼

Coming of age in Samoa 《薩摩亞人的成年》

Corpus Callosum 胼胝體

Cortisol 可體松

Cro-Magnon 克羅馬農人

das Bewusstsein 意識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das Habenwollen 擁有意願

das Sein 存在

das wahre Ich 真我

Deep Brain Stimulation 腦深層電刺激術

Der Code des Herzens 《心靈密碼》

der molekulare Initialfunke 分子引爆劑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Die Artisten unter der Zirkuskuppel: ratlos 《帳棚頂上的馬戲團藝人》

Die Fähigkeit zu lieben 《愛的能力》

Die Kunst des Liebens 《愛的藝術》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少年維特的煩惱》

Die Liebe. Psychologie eines Phänomens 《愛情：此一現象之心理學》

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 《鏡子的反面》

Die Seele und die Formen 《心靈與形式》

Die vollwertige Gattin. Anleitung für die Frau und ihre Helfer 《全能的妻子：婦女及其協力者的指導手冊》

Digital Life Report 2006 《數位生活二〇〇六年報導》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an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Dispersion 色散

Dissoziation 解離

Diversifikation 多樣化

Dopamin 多巴胺

Electrophysiology 電生理學

Emnid-Studie 恩尼德民調中心

Empathy 共感

Endorphine 腦內啡

Epigenetics 表觀遺傳學

Erfahrungsseelenkunde 經驗心靈學

Eros und Psyche 《愛神與賽姬》

Es 本我

Esquisse d'une theorie des emotions 《情緒理論大綱》

Estrogen 動情激素

Ethology 動物行為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演化心理學》

Focus 《焦點》

folie et deraison 《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精神病史》，或譯《瘋狂與文明》

forensic psychology 鑑識心理學

Frankfurter Psychoanalytisches Institut 法蘭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功能性磁共振斷層攝影

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 《形式組織的功能與後果》

Geist 精神

Gender 社會性別

Gender Trouble 《性別風波》

Generation Golf 高爾夫世代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性與性格》

gesellschaftliche Teilsysteme 社會子系統

gewusste Identität 自覺性認同

Gibbon 長臂猿

Gladiatorfrog 格鬥蛙

Gorilla 大猩猩

Hamilton-Schule 漢彌爾頓學派

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性史》

Hite Report 《海蒂性學報告》

Holocene 全新世

Homo erectus 直立人

Homo habilis 巧人

Homo rudolfensis 盧多爾夫人

Homo sapiens 智人

Homo sapiens idaltu 長者智人  
Hypothalamus 下視丘（又稱下丘腦）  
I 主我  
Ich 自我  
Ich-Zustände 我的狀態  
Inclusive fitness 總體適應度  
Individualität 個體性  
Individuum 個體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社會研究院  
Insular dwarfism 島嶼侏儒化（或譯島嶼微型化）  
Inuits 伊努特人  
Ituri 伊圖里  
Kalahari 喀拉哈里  
Kommune 1 K1公社  
Kritische Theorie 批判理論  
Kulturwesen 文化生物  
L'Usage des plaisirs 《快感的使用》  
La Volonté de savoir 《認知的意志》  
L'Amour et l'Occident 《愛情與西方》  
lateral sulcus 外側溝  
Le deuxieme sexe 《第二性》  
Le Souci de soi 《自我的關注》  
Legitimität 合法性  
Les Aveux de la chair 《肉體的告白》  
Les mots et les choses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  
levirate marriage 利未拉特婚姻（即叔娶寡嫂制）  
Libido 原欲  
Liebe als Passion 《作為激情的愛情》  
Liebestrieb 愛的本能  
limbic system 中腦邊緣系統  
love and peace 愛與和平  
Love is a Story 《愛，是一個故事》

Love Parade 愛的大遊行

lovemap 愛情地圖

Love-o-Meters 愛情速配指數

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心理學與精神疾病》

Mammutjäger in der Metro. Wie das Erbe der Evolution unser Denken und Verhalten prägt 《都會裡的猛象獵人：演化遺產如何塑造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Marriage & Family Health Center 婚姻與家庭健康中心

Maskalin 麥司卡林

Mbuti 木布堤

Me 賓我

Meme 瀾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

Microtus ochrogaster 平原田鼠

Microtus pennsylvanicus 高山田鼠

Minima Moralia 《最低限度的道德》，又譯《小倫理學》

mirror neuron 鏡像神經元

MsH 黑色素細胞刺激荷爾蒙

Multitasking 多任務處理

Muster 模式

Mutation 突變

Muttierung 母親化

Nature 先天 / 天生的

Naturrecht 自然法

Neogeschlechter 新性別

Neosexualitäten 新性向

Neoteny 幼態延續

Neurotransmitters 神經傳導物質

New Economy 新經濟

nitrogen monoxide 一氧化二氮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 非暴力溝通

Noradrenalin 正腎上腺素

Nucleus praeopticus medialis 內側視前核



Nucleus ventromedialis 腹內側核  
Nurture 後天 / 教養的  
Orang-Utan 紅毛猩猩  
Oxytocin 催產素  
Parsifal 《帕西法爾》  
Passionate Marriage 《熱情婚姻》  
Patchwork Family 拼組家庭  
Phenylethylamin, PEA 苯乙胺  
Pheromone 費洛蒙  
Pleistocene 更新世  
Population Genetics 群體遺傳學家  
projection 投射  
Psychotope 心理境況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快樂  
Quirkyalones 樂單族  
Recht des Stärkeren 強者權利  
reciprocal altruism 互惠利他行為  
Red Queen Hypothesis 紅皇后理論（也稱紅皇后效應或紅皇后假說）  
Regeln der Kunst 藝術法則  
reterierte Empathie 返回式共感  
Rückbindung 回歸  
Schmutzige Wäsche. Zur ehelichen Konstruktion von Alltag 《髒衣服：論日常生活之婚姻結構》  
Science 《科學》  
Selbst 自我  
Selbstinterpretation 自我詮釋  
Selbstkonzept 自我概念  
Selbstreflexion 自我反思  
Selbsttechnik 自我技術（技藝）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性擇  
self-fulfilled prophecy 自我應驗預言  
Semiochemical 化學傳訊物質

Serial monogamy 序列式一夫一妻制（或譯系列式一夫一妻制）

Serotonin 血清素

Socialist Party USA 美國社會黨

Spandrel 拱肩

Speeddating 快速約會

sperm wars 精子戰爭

Stern 《明星》

Struggle for Life 生存鬥爭

survival machine 生存機器

swinging singles 搖擺單身

Symposium 《饗宴》

Tangled Bank Hypothesis 河岸灌木叢理論（也稱灌木叢理論或茂密河岸假說）

Testosterone 睪丸激素（或稱睪固酮）

The Anatomy of Love: A Natural History of Mating, Marriage, and Why We Stray 《愛慾——婚姻、外遇與離婚的自然史》

The Concept of Mind 《心的概念》

The Descent of Man 《人類起源》，或譯《人類的由來》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 《自然經濟學與性的演化》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Male and Female Brains and the Truth About Autism 《基本差異：男女的腦袋以及關於自閉症的真相》

The Female Brain 《女人的大腦很那個……》

The first Idea 《第一個想法》

The Fragile Male 《脆弱的男性》

The God Delusion 《上帝的幻覺》，或譯《上帝錯覺》

The Human Zoo 《人類動物園》

The Naked Ape 《裸猿》

The Princess Bride 《王妃新娘》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心理學原理》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群眾的反叛》

The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

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 《恩愛過一生：幸福婚姻七守則》

Through a Window: My thirty years with the chimpanzees of Gombe 《大地的窗口：珍愛猩猩

三十年》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愛麗絲鏡中奇緣》

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 情緒二因論

U.S.News & World Report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文明的進程》

Über-Ich 超我

universelles Experiment 普遍的實驗

Validierung der Selbstdarstellung 自我表述之有效性

Vasopressin 抗利尿激素

Venus of Willendorf 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

Verblendungszusammenhänge 盲目聯結

vorbewusstes Ich 前意識的我

vor-erotisch 先於情色

Wahrnehmung 感官知覺

Wernicke's area 韋尼克區

Why is Sex Fun 《性趣何來》

# 人名對照

Adorno, Theodor W. 阿多諾  
Aischylos 埃斯庫羅斯  
Allen, Woody 伍迪·艾倫  
Allman, William F. 威廉·奧爾曼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Aron, Arthur 亞瑟·艾倫  
Baron-Cohen, Sacha 薩夏·巴隆科恩  
Baron-Cohen, Simon 西蒙·巴隆科恩  
Barthes, Roland 羅蘭·巴特  
Bean, Robert Bennett 賓恩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波娃  
Beck, Ulrich 烏利西·貝克  
Benjamin, Walter 華特·班雅明  
Bergson, Henri 伯格森  
Boas, Franz 蘭茲·鮑亞士  
Bonhoeffer, Dietrich 潘霍華  
Boothroyd, Lynda 琳達·布斯羅伊  
Brizendine, Louann 露安·布哲婷  
Broca, Paul 保羅·布洛卡  
Buber, Martin 馬丁·布伯  
Buffon, George-Louis 喬治·路易·布封  
Bumke, Joachim 尤阿興姆·本克  
Buss, David 大衛·巴斯  
Butler, Judith 茱蒂斯·巴特勒  
Cagen, Sasha 莎夏·卡根  
Carroll, Lewis 路易斯·卡洛爾  
Clermont-Ferrand 克萊蒙費朗  
Connor, Sarah 莎菈·寇娜

Cosmides, Leda 勒達·康斯邁德  
Crick, Francis 克里克  
Cuvier, Georges 居維葉  
Damasio, Antonio 安東尼歐·達瑪西歐  
Dawkins, Richard 理查·道金斯  
Desmond, Adrian 戴斯蒙德  
Devaux, Emil 艾米爾·德瓦  
Diamond, Jared 賈德·戴蒙  
Dupré, John 約翰·杜皮  
Dutton, Donald 唐納德·達頓  
Dux, Guenter 均特·杜克斯  
Eibl-Eibesfeldt, Irenäus 艾柏·亞貝費特  
Elias, Norbert 伊里亞斯  
Eliot, George 喬治·艾略特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Euripides 歐里庇得斯  
Fichte, Johann Gottlieb 費希特  
Fischer, Edward 愛德華·費雪  
Fisher, Helen 海倫·費雪  
Fliess, Wilhelm 威廉·弗里斯  
Foucault, Michel 米歇爾·傅柯  
Frankfurt, Harry 哈利·法蘭克福  
Freeman, Derek 德雷克·弗里曼  
Fromm, Erich 艾瑞克·佛洛姆  
Galimberti, Umberto 烏姆貝托·迦林貝堤  
Gasset, José Ortega y 荷西·奧德嘉·賈塞特  
Gehlen, Arnold 阿諾德·蓋倫  
Ghiselin, Michael T. 麥可·季瑟林  
Glas, Uschi 烏希·格拉斯  
Goldman, William 威廉·古德曼  
Goodall, Jane 珍·古德  
Gottman, John Mordechai 約翰·高特曼

Gould, Stephen Jay 史蒂芬·傑·古爾德  
Gray, John 約翰·葛瑞  
Greenspan, Stanley 史丹利·葛林斯班  
Greenstein, Ben 本恩·葛林斯汀  
Hamilton, William Donald 威廉·唐納·漢彌爾頓  
Hatt, Hanns 漢斯·哈特  
Heckel, Gerald 格拉德·赫克爾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  
Heine, Heinrich 海涅  
Hirschman, Albert 阿爾伯特·赫緒曼  
Holloway, Ralph L. 哈羅維  
Hondrich, Karl-Otto 卡爾·奧托·洪德里希  
Horkheimer, Max 霍克海默  
Hoyle, Fred 弗雷德·霍伊爾  
Hromada, Martin 馬丁·赫洛馬塔  
Husserl, Edmund 胡賽爾  
Hüther, Gerald 蓋拉德·許特  
Huxley, Julian 朱利安·赫胥黎  
Illouz, Eva 艾娃·伊露茲  
Insel, Thomas 托瑪斯·因塞爾  
Iser, Wolfgang 沃夫岡·伊瑟爾  
Jagger, Mick 米克·傑格  
James,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Jandl, Ernst 恩斯特·楊德  
Jankowiak, William 威廉·賈科維雅克  
Jaspers, Karl 卡爾·雅斯培  
Jessel, David 大衛·傑塞爾  
Johnston, Victor 維克多·強斯頓  
Kahneman, Daniel 丹尼爾·卡尼曼  
Kamper, Dietmar 迪特瑪·坎柏爾  
Karahanci, Gülcan 古爾肯·卡拉漢希  
Kast, Bas 巴斯·卡斯特



Kaufmann, Jean-Claude 柯夫曼  
Kimura, Doreen 多琳·木村  
Kluge, Alexander 亞歷山大·克魯格  
Kolle, Oswalt 奧斯瓦特·科勒  
Korsgaard, Christine 科斯嘉  
Kracauer, Siegfried 克拉考爾  
Kraus, Karl 卡爾·克勞斯  
Krueger, Alan 亞倫·克魯格  
La Rochefoucauld 拉羅什福科  
Lacan, Jacques 雅各·拉岡  
Lacoste-Utamsing, Christine De- 拉蔻絲烏坦辛  
Lauster, Peter 彼得·勞斯特  
Leakey, Richard 理查·李基  
Lewontin, Richard 理查·路翁亭  
Lorenz, Konrad 康拉德·勞倫茲  
Löwenthal, Leo 羅文塔  
Luhmann, Niklas 尼克拉斯·盧曼  
Lukács, Georg 喬治·盧卡奇  
Malthus, Thomas Robert 托瑪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Mary, Michael 米歇爾·馬利  
Mead, Margaret 瑪格麗特·米德  
Mey, Reinhard 雷恩哈德·梅  
Meyer, Axel 阿克瑟·邁雅  
Moir, Anne 安妮·莫伊爾  
Money, John 約翰·曼尼  
Monod, Jacques 賈克·莫諾  
Moore, James 摩爾  
Morris, Desmond John 德斯蒙德·莫里斯  
Novalis 諾瓦利斯  
Obermaier, Uschi 烏希·歐博梅爾  
Ovid 奧維德  
Paris, Gaston 加斯東·帕里斯

Parsons, Talcott 帕森思  
Pauling, Linus 萊納斯·鮑林  
Pease, Allan 亞倫·皮斯  
Perrett, David 大衛·裴瑞特  
Pollak, Seth 賽特·波拉克  
Reimer, David 大衛·利馬  
Riemann, Fritz 弗里茲·李曼  
Rizzolatti, Giacomo 賈柯莫·里佐拉第  
Rosenberg, Marshall 馬歇爾·盧森堡  
Rougemont, Denis de 丹尼斯·德·魯日蒙  
Rousseau, Jean-Jacques 盧梭  
Ryle, Gilbert 吉爾伯特·萊爾  
Sappho 莎芙  
Sartre, Jean-Paul 尚·保羅·沙特  
Schachter, Stanley 史丹利·沙其特  
Schelsky, Helmut 薛爾斯基  
Schlegel, Friedrich 施萊格爾  
Schmidt, Gunter 鈞特·史密特  
Schmitt, Carl 卡爾·施密特  
Schnarch, David 大衛·史納屈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華  
Schuldt, Christian 克里斯提昂·舒爾特  
Seiji Ogawa 小川誠二  
Shanker, Stuart 史都華·尚克爾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萊  
Sherrington, Charles Scott 查爾斯·史考特·薛靈頓  
Sigusch, Volkmar 福克斯瑪爾·希格齊  
Simon, Paul 保羅·賽門  
Simonyi, Charles 查爾斯·西蒙尼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Solovyov, Vladimir Sergeyevich 索羅耶夫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史賓塞  
Sternberg, Robert J. 羅伯·史登堡  
Strindberg, August 奧古斯都·史特林堡  
Thornhill, Randy 蘭迪·松希爾  
Tinbergen, Nikolaas 尼可拉斯·汀伯根  
Tooby, John 約翰·托比  
Trivers, Robert 羅伯特·崔弗斯  
Tryjanowski, Piotr 皮歐瑞·堤昂瑙斯基  
Tucholsky, Kurt 庫爾特·圖霍斯基  
Valen, Leigh Van 凡威倫  
Valentin, Karl 卡爾·華倫汀  
Velde, Theodoor Hendrik van de 凡·德·菲爾德  
Waal, Frans de 法蘭斯·德瓦爾  
Wader, Hannes 漢納斯·華德  
Wallace, Alfred Russel 阿弗雪德·羅素·華萊士  
Wallace, Edgar 艾德格·華萊士  
Watson, James 詹姆斯·華生  
Weininger, Otto 奧托·魏寧格  
Weismann, August 奧古斯特·魏斯曼  
Weiss, Robert 羅伯特·魏斯  
Williams, George Christopher 喬治·威廉斯  
Wilson, Edward O. 艾德華·威爾森  
Wundt, Wilhelm 威廉·馮特  
Zweig, Stefan 史蒂芬·茨威格

哲學家 38

## 愛情的哲學

原著書名 / Liebe: Ein unordentliches Gefühl  
作者 / 理查·大衛·普列希特 (Richard David Precht)  
譯者 / 閻旭玲  
責任編輯 / 程鳳儀、陳玳妮、楊如玉

版權 / 黃淑敏、林易萱  
行銷業務 / 周丹穎、周佑潔、賴正祐、黃崇華  
總編輯 / 楊如玉  
總經理 / 彭之琬  
事業群總經理 / 黃淑貞  
發行人 / 何飛鵬  
法律顧問 / 元禾法律事務所 王子文律師  
出版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 bwp.service@cite.com.tw  
Blog: http://bwp25007008.pixnet.net/blog  
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 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58372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封面設計 / FE設計  
排版 / 冠玫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 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經銷商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178022 傳真：(02) 29110053

■ 2011年3月10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 2021年10月5日三版

定價 320元

Original title: Liebe: Ein unordentliches Gefühl by Richard David Precht  
©2009 by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München,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626-318-022-2 (EPUB)